

哲学小辞典合集

上海《哲学小辞典》编写组

2024年8月再版

毛主席语录

一切共产党人和革命干部，都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都必须学会在实际工作中运用辩证唯物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最重要的保证。

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编者按

本书非编者所写，作者是在上世纪那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的上海写作组，于一九七五年五月出版，印数十万册。

成书至今，已近五十个春秋过去了。受限于当年技术，本书没有电子存档，如今网络上流传的均为扫描版，阅读起来不太方便。为了方便同志们阅读和学习这本哲学书，编者将原书内容电子化，重新排版成适合大家阅读的书籍格式。虽然文字经过了几番校对，但字数庞大，恐难免会有纰漏之处，若有同志发现，请及时联系告知我们。

本书名为《哲学小词典合集》，是把《哲学小词典——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部分》、《哲学小词典——外国哲学史部分》以及《哲学小词典——儒法斗争史部分》三本书的词条做了适当的挑选，合并而成。其中第一本书的词条基本全部收录，后两本则只收录了目录里“学派”和“名词”这两部分的词条。

编者认为这本书是革命运动的产物，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当年革命实践进行的一次理论梳理和概括，也是对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进行的一次系统化，所以此书意义非凡！在本书中，同志们可以看到鲜明的时代特征，里面诸多语句用词、涉及人物等无不告诉我们它为何而来，为何而存在。

此书同样存在褒贬不一的情况，有人说这本书是迎合政治运动而作、有人说这本书沿袭“苏马”体系、有人说这本书把马克思主义变得庸俗和僵化了，等等等等。这都没有关系，有褒就有贬、有贬就有褒，无论是褒是贬，都不影响我们阅读它并在实践中去检验书中所言的道理和是是非非。

老一辈革命者，大多是泥腿子干革命，他们吃了很多苦头、付出了很大代价才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走弯路不可避免，但之所以走弯路，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毛主席说的：“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我们现在有这个理论学习条件，就应该珍惜，把自己理论水平提高，将来可以为革命出更大的力，也可以避免在紧要关头被一些“理论家”给欺骗和蒙蔽。

只有人人，或者说无产阶级的绝大多数都具备了相当高的政治觉悟，无产阶级才能真正当好家、做好主，而要有相当程度的政治觉悟，理论学习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这本书希望大家可以多看看，总归是有用的。

编者：电报频道“毛主义哲学”（@maoism1966）

联络员：电报机器人“毛主义哲学联络员”（@Maoism1966Bot）

此致敬礼！

Telegram 频道推荐：

👉 [毛主义哲学](https://t.me/maoism1966)（<https://t.me/maoism1966>）

👉 [到工人中去](https://t.me/BeWithWorkers)（<https://t.me/BeWithWorkers>）

👉 [革命火炬](https://t.me/gczy2022)（<https://t.me/gczy2022>）

👉 [Marx BBS™](https://t.me/mlmbbs)（<https://t.me/mlmbbs>）

👉 [马列毛主义与革命左翼图书馆](https://t.me/taipingtianguo)（<https://t.me/taipingtianguo>）

目录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部分

【哲学总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	1
哲学	3
哲学的基本问题	4
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6
世界观	7
方法论	8
自然观	10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11
唯物主义	13
朴素唯物主义	14
机械唯物主义	15
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17
庸俗唯物主义	18
唯心主义	19
主观唯心主义	20
客观唯心主义	21
物质	23
客观实在	24
世界的物质性	25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26
自然界	26
无机界	27
有机界	28
宏观世界	29

微观世界	30
存在	31
运动	31
静止	33
时间和空间	34
三度空间（三维空间）	35
思维	35
精神	36
意识	38
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39
思想	40
思想体系	42
观念	43
知识	44
才能	45
语言和思维	46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48
认识论	49
主观和客观	50
主体和客体	51
知行统一观	52
思想路线	54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55
世界可知性	56
唯物论的反映论	57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58
唯心论的先验论	59
天才论	60
内省的经验论	62

不可知论	62
怀疑论	63
感觉论	64
经验主义	66
唯理论	67
社会实践	67
实践和认识	69
感性认识	70
理性认识	71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72
经验	74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75
感觉	76
知觉	77
表象	77
映像	77
科学的抽象	78
概念	79
判断	80
推理	81
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	83
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致	84
规律	85
主观能动性	87
实事求是	88
科学的预见	89
动机和效果	90
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	91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92

真理	93
真理的客观性	94
真理的阶级性	95
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96
普遍真理	97
真理的标准	99
真理和谬误	100
一元论	101
二元论	102
本体论	103
宿命论	103
目的论	104
有神论	106
无神论	107
泛神论	108
自然神论	109
神秘主义	110
信仰主义	110
直觉主义	111
客观主义	112
自然主义	112
主观主义	113
教条主义	115
烦琐哲学	116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唯物辩证法	117
辩证法	120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	122
古代辩证法	123

黑格尔辩证法	125
对立统一规律	127
一分为二	129
两重性	132
两点论	133
重点论.....	134
矛盾	136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137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139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140
矛盾的同性和斗争性	142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143
基本矛盾	145
统一体.....	146
差异	148
内因和外因	149
根据和条件	150
共性和个性	151
绝对和相对	153
对立面的转化	154
物极必反	155
波浪式前进	156
新陈代谢	158
吐故纳新	159
新事物和旧事物	160
主流和支流	162
正面和反面	163
平衡和不平衡	164
批判和继承	165

破与立.....	167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168
务虚和务实	169
具体事物具体分析	170
范畴	172
质和量.....	173
规定性.....	174
量变和质变	175
渐变	177
飞跃（突变）.....	178
部分质变	180
肯定和否定	181
否定之否定	182
本质和现象	183
假象	184
全局和局部	185
个别和一般	187
内容和形式	188
原因和结果	190
必然和偶然	191
必然和自由	193
可能和现实	194
有限和无限	195
间断性和不间断性	197
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	198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	199
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	200
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	201
属性	202

度.....	203
度量关系交错线	204
扬弃	205
异化	206
辩证逻辑	206
形式逻辑	208
具体和抽象	209
分析和综合	210
归纳和演绎	211
形而上学	212
庸俗进化论	215
外因论.....	216
矛盾调和论	218
合二而一	220
无冲突论	222
诡辩论.....	224
折衷主义	225
相对主义	226
绝对主义	228
机械论.....	229
均衡论.....	230
循环论.....	232
虚无主义	233
形式主义	234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235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237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239
生产方式	239

生产力.....	241
生产关系	242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	244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245
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247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249
社会	250
社会的基本矛盾	251
原始公社制度	252
奴隶制度	253
封建制度	255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57
资本主义制度	258
社会主义制度	260
共产主义	262
国家消亡	264
历史唯心主义	265
英雄史观	267
多元论历史观	268
唯生产力论	269
综合经济基础论	271
社会达尔文主义	272
社会有机论	273
地理环境决定论	274
地理政治论	276
阶级和阶层	276
阶级斗争	278
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	280
阶级分析方法	281

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	282
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283
国家	285
政权	286
国体和政体	288
人民民主专政	289
资产阶级民主	290
自由、平等、博爱	291
宗教改革运动	292
社会革命	293
暴力革命	295
资产阶级革命	296
产业革命	297
新民主主义革命	298
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300
政变	302
无产阶级政党	303
路线斗争	305
党的基本路线	306
反潮流.....	308
群众路线	309
群众、阶级、政党、领袖	311
权威	312
爱国主义	313
国际主义	314
第三世界	316
民族	317
民族主义	319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320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322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323
无产阶级专政	325
无产阶级民主	327
民主集中制	328
社会主义革命	330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33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334
资产阶级法权	336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	337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和差别	339
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和差别	340
帝国主义	341
社会帝国主义	343
法西斯主义	344
现代军国主义	345
霸权主义	346
沙文主义	348
种族主义	348
世界主义	350
战争与和平	350
唯武器论	352
和平主义	353
修正主义	354
现代修正主义	356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357
和平过渡	358
和平共处	360
和平竞赛	361

和平演变	362
全民国家	363
全民党.....	364
阶级斗争熄灭论	365
人性论.....	366
人道主义	367
“左”倾机会主义	369
右倾机会主义	370
国防哲学	371
社会意识形态	373
政治和经济	374
法律	376
艺术	377
科学	379
道德	380
宗教	381
家庭	383

外国哲学史部分

【外国哲学学派】

古希腊罗马哲学	385
米利都学派	386
毕达哥拉斯学派	387
埃利亚学派	389
智者派（诡辩学派）	390
斯多葛学派	391
新柏拉图主义	392
欧洲中世纪哲学	393
经院哲学	394
唯名论.....	396

唯实论（实在论）	397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397
启蒙运动	399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400
德国古典哲学	402
思辨哲学	403
自然哲学	404
空想社会主义	406
批判主义（批判哲学）	407
老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右派）	409
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左派）	410
人本主义	411
“真正的”社会主义	412
无政府主义	413
功利主义	414
实证论.....	415
新康德主义	416
新黑格尔主义	418
人格主义	419
民粹派.....	420
“合法马克思主义”	421
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	422
内在论.....	423
唯能论.....	425
“物理学”唯心主义	426
经验一元论	428
寻神说和造神说	428
实用主义	429
工具主义	431

新实在论	432
批判实在论	433
逻辑实证论	434
语义哲学	435
新托马斯主义	436
存在主义	437
神学	438
拜物教.....	440
多神教.....	441
一神教.....	443
犹太教.....	444
佛教	446
基督教.....	447
天主教.....	449
伊斯兰教	451

【外国哲学名词】

逻各斯	452
第一次推动	453
实体	455
天赋观念	456
乌托邦主义	457
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	457
此岸性和彼岸性	458
二律背反	459
绝对命令	460
绝对观念	461
自我意识	462
反思	463
中介	464

独断论.....	465
唯我论.....	465
唯灵论.....	466
自然符号论	467
符号论.....	468
经验符号论	469
嵌入说.....	469
感觉复合	470
世界要素	471
原则同格	472
思维经济原则	473
蒙昧主义	474

儒法斗争史部分

【学派】

法家	475
儒家	477
名家	479
阴阳家.....	481
思孟学派	482
程朱理学	483
陆王学派	484

【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及其领袖】

柳下跖（生死年不详）	485
陈胜、吴广	486
绿林、赤眉起义	488
黄巾起义	489
黄巢（？—公元884年）	490
王小波、李顺	491
方腊.....	493

钟相、杨么 494

【名词】

法治 498

礼治 500

井田制 501

分封制 502

郡县制 503

克己复礼 504

正名 505

天命 506

忠恕 507

孝悌 508

法后王 508

法先王 509

仁政 510

仁义 511

中庸之道 512

性善论 514

性恶论 515

良知良能 516

王道 516

法、术、势 518

耕战 520

参验 521

焚书坑儒 522

天人合一 524

三纲五常 525

性三品说 526

三世说 527

目录

三统说	528
三从四德	529
讷纬	530
形神	531
道统	532
道器	533
性命	534
格物致知	535
天理人欲	536
知行	537

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部分

【哲学总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

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学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之一，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源泉。当时欧洲许多国家的资本主义相当发展，生产力、阶级斗争和自然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水平，无产阶级已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激烈。如法国的里昂工人起义、英国的宪章运动和德国的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罢工运动等等，都表明了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迫切需要反映本阶级利益、揭示社会发展规律以指明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自然科学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重要条件。当时大工业的发展也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和其它巨大成就，使人们能够用自然界本身的原因来系统地解释自然界的发展过程，这就宣告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自然观的破产。马克思、恩格斯在亲身参加和领导革命斗争的实践中，总结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丰富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批判地继承了人类一切文化科学的优秀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抛弃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抛弃了他的形而上学，从而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个伟大变革。毛主席指

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矛盾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克服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变化发展的；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又反作用于物质；物质世界是可知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通过实践由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由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辩证唯物主义贯彻到社会领域，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最革命、最彻底、最完备的科学理论，它使人类哲学思想发展到一个全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声明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是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体现了无产阶级根本利益；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这两个最显著的特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性和科学性统一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斗争中产生、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等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斯大林在同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其它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主席在同党内机会主义路线和国际上的修正主义作斗争中，也总是从哲学的高度清算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世界观，在斗争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革命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我们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能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正确分析情况，总结斗争经验，找出事物的发展规律，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自觉执行革命路线，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哲学

毛主席说：“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773—774 页）这就是说，哲学是世界观，是人们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是研究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的一般规律的学说。哲学一词最初出自希腊文，它的原意是爱智慧，与现在所说的哲学含义不同。

哲学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哲学思想萌芽于原始社会，系统的哲学思想则是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形成的。哲学属于上层建筑，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为经济基础服务。一定历史时期的哲学，表现了一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生产力和人类认识发展的一定的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哲学发展的源泉。

在哲学史上，当人们的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还很不充分、科学还没有分类时，哲学和其它具体科学是混在一起的。十五世纪下半叶以后，具体科学才从哲学中分化出来，这是一个进步。但是旧哲学，尤其唯心主义哲学家仍然把哲学作为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这就阻碍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结束了把哲学作为“科学的科学”的神秘状态，从根本上解决了哲学和具体科学的关系。

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一切哲学派别按照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分成两大阵营，凡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源，属于唯物主义阵营；凡认为精神是世界的本源，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几千年来哲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其中还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全部哲学言论，都是以说明这两条路线的根本对立为中心的。**”（《列宁全集》第二卷 344 页）

在阶级社会里，哲学是有阶级性、党性的。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反动阶级为了奴役人民，单靠棍棒、鞭子不够，还要靠精神棍棒，即利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被压迫阶级和劳动人民要求得解放，在搞武装斗争的同时，还要有思想武器，这就要掌握

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一般是反动阶级、阶层的 worldview；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一般是进步阶级、阶层的 worldview。因此，哲学总是同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的。在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同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在理论上的反映。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但是，仍然存在着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因此，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也将长期存在。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它把辩证唯物主义贯彻到一切领域，使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它宣告了一切旧哲学的终结。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 worldview，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是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服务的。

哲学并不神秘，哲学来自社会实践。社会实践的主体是劳动人民，劳动人民完全能够掌握哲学。我们要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伟大教导：“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

哲学的基本问题

也叫哲学的根本问题、哲学的最高问题。恩格斯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19 页）具体说，哲学的基本问题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方面是指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即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凡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物质是第二性的，属于唯心主义阵营；凡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的，属于唯物主义阵营。这是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哲学基本问题第二个方面是指思维能不能正确认识并反映存在，即思维和存在有无同一性的问题，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的本身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四卷 221 页)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划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哲学基本问题的两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 而第一个方面是主要的, 是基础。

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问题所以成为哲学的基本问题, 这是由于它是哲学上一切其它问题分歧的由来, 是解决其它一系列哲学问题的前提和基础, 任何哲学家都回避不了这个问题。全部哲学史就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

一切唯心主义都是主张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 因而都是错误地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一切唯物主义者都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则。但旧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 在自然观上贯彻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则, 而在社会历史领域里却背弃了这一原则, 陷入历史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的唯物主义, 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它认为在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决定精神, 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同时又承认精神的反作用,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这就彻底批判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并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阐明了哲学的基本问题, 这是对几千年来哲学史的科学总结和高度概括, 深刻地揭示了哲学上两军对敌的实质和哲学史发展的规律。毛主席在革命实践中,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决定精神、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则, 同时又充分肯定精神对物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 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重要原理, 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理论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 是我们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我们掌握了这个武器, 就能识别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潮和口号, 就能够揭露他们所推行的思想政治路线都是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理论基础的。

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哲学的流派很多，但归结起来只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大阵营，它们之间的斗争，就是哲学中的两军对战。

全部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两军对战的历史，同时交织着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古今中外，都不例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在中国，先秦有五行说（宇宙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组成）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同神创论的宗教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以荀况、韩非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法家同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儒家的斗争；两汉有王充的无神论同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的斗争；魏晋隋唐有唯物主义无神论同佛教唯心主义的斗争；宋明有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理学的斗争；以及近代的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等等。在欧洲，古代希腊有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同唯心主义者柏拉图的理念论的斗争；中世纪经院哲学内部，有代表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同唯心主义的实在论的斗争；十七、十八世纪英、法等国，有机械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十九世纪德国古典哲学中，有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斗争。

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哲学的两军对战中产生发展的。它的诞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使两军对战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资产阶级捡起了历史上一切没落、腐朽、反动的哲学垃圾作为工具，力图维护和挽救其覆灭的命运；无产阶级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及其意识形态，这是一场大决战，因而斗争更为激烈、尖锐、复杂。资产阶级利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一方面赤膊上阵，公开对抗；另一方面又钻进马克思主义哲学阵营内部，打着红旗反红旗。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彻底的革命性和高度的科学性，对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展开了坚决的斗争。列宁、斯大林在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马赫主义和托洛茨基、布哈林以及其它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主席在同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特别是在同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我国人民以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同刘少奇、林彪的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斗争，是两千年来哲学上两军对战的继续。

哲学中的两军对战，反映了社会上敌对阶级之间根本利害的冲突。一般说来，唯物主义代表进步阶级、阶层的利益，唯心主义代表反动阶级、阶层的利益；而辩证唯物主义则代表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利益。哲学上的两军对战同政治上两条路线斗争是紧密结合的。中国共产党经历的历次路线斗争，反映在哲学上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资产阶级政治路线的哲学根据。

哲学中的两军对战还会长期进行下去，这是由于哲学中两军对战除了阶级根源外，还有认识论的根源。即使在阶级消灭以后的共产主义社会，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还会通过各种不同形式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自觉地划清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界限，坚定地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进行不调和的斗争。

世界观

也叫宇宙观，是人们对世界及一切事物的根本看法。世界观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基本出发点。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就是哲学。世界观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特别是阶级地位的不同，对事物就有不同的看法，形成不同的世界观。世界观的不同，观察和处理问题就会有不同的立场、观点、方法，不同的思想感情和态度。因此，世界观问题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在阶级社会里，不同阶级有着不同的世界观。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表现。一般说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保守势力和反动阶级的世界观，对社会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进步势力和先进阶级的世界观，对历史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在现代，世界观基本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和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的世

界观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它是在同各种错误的世界观斗争中产生发展的。它揭示了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正确地反映了世界的本来面貌，是科学的世界观。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它认为世界是精神的产物，是静止不变的，这是对客观世界的歪曲。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集中表现。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学者胡说无产阶级世界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已成为全民的世界观”，公然否认世界观的阶级性，充分暴露了他们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

路线斗争总是同世界观的斗争紧密相联的。一定的世界观是一定的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导思想；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是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依据。修正主义者为了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总要利用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来与辩证唯物主义相对抗。

毛主席说：“**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社会主义革命愈深入，两种世界观的斗争也就愈激烈。“**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对我们改造世界观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要解决世界观的问题，必须长期进行自觉的斗争。我们必须使自己的思想适应飞跃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做革命的促进派；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这样，才可以和工农群众有共产主义世界观方面的共同语言，才能自觉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方法论

关于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的学说。方法论同世界观是一致的，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方法论，是关于认识和论理的方法。唯物辩

证法认为世界是发展的物质世界，这是世界观；拿这个世界观去看世界，解决问题，指导革命，进行工作，这就是方法论，此外并没有别的什么单独的方法论。

形而上学同辩证法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方法论。形而上学用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世界，必然歪曲地反映客观世界，这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黑格尔的辩证法，虽然其中有合理部分，猜测到了客观事物的某些矛盾和运动，但它是唯心主义的，不能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也不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辩证法是在同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辩证法斗争中产生的。它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看世界，认为统一的客观物质世界是不断运动的，各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世界。由于它是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丰富实践经验中概括出来的理论，因此它反过来又成为指导三大革命实践的普遍真理。只有它才是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两种方法论的斗争，在现代，反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论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锐利武器，是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方法的辩证统一体。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才能掌握唯物辩证法。不掌握唯物辩证法，就不能树立和坚持无产阶级立场，就容易上当受骗，甚至走上邪路。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经常采用形而上学方法，如以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方法攻击、污蔑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是这样；我党历史上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从陈独秀、王明到彭德怀、刘少奇、林彪等也都是这样。因此，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斗争，反映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从世界观、方法论上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这对提高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有着重大的意义。

在革命队伍内部，也要研究方法论，只有自觉用唯物辩证法作指

导，才能搞好各项革命工作。

自然观

人们对自然界的总的看法。围绕对自然界的本原是物质还是精神的不同回答，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自然观的对立和斗争。

“唯物主义的自然观不过是对自然界本来面目的朴素了解，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27 页）自然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唯物主义自然观正确地反映了自然界的面貌。唯心主义自然观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产物，它歪曲地反映了自然界。

辩证唯物主义以前的自然观，由于受阶级和科学发展的限制，都不是科学的自然观。如古希腊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自然观，把自然界看做是某种从混沌中产生出来的东西，是不断发展的，这从整体上说是正确的，但缺乏科学论证，因而是直观的，朴素的；近代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力图用经验材料进行科学论证，克服了古代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自然观的朴素性，但它对自然界的看法却是形而上学的；黑格尔的自然观，虽然猜测到了自然界矛盾运动的某些方面，但受到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最后仍然陷入形而上学。

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才是真正科学的自然观。它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不生不灭的；矛盾斗争是自然界运动的根本原因；自然界的发展是无限的、多样的，具体的物质形式是有限的，有生有灭，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自然界的发展进程是有规律的矛盾运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它彻底的批判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并同旧唯物主义自然观划清了界限，实现了自然观上的巨大革命。

自然观是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同社会历史观紧密相连。在阶级社会里，自然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的。中国先秦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提出天命论的自然观，认为天是有意志的神，是决定自然界一切的，以此论证反动统治者受命于天，奴隶制度是

天经地义、万世长存的。法家的杰出代表荀况批判了天命论的自然观，提出了“天行有常”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天不是神，而是自然，自然界的變化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以此驳斥孔孟儒家鼓吹的奴隶制万世不变的谬论。随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两种自然观的斗争更加激烈和复杂。资产阶级往往披着“最新科学哲学”的外衣，宣扬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自然观；现代苏联修正主义借口科学技术的发展，胡说时代改变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原理很多地方不适用了。他们反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服务的。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科学技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自然观。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即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以后又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以能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并且把它应用到各个领域，使人类的认识发生空前的大革命，主要是当时资本主义和阶级斗争以及自然科学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近代无产阶级在斗争中逐渐由“自在的阶级”转向“自为的阶级”，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进入“有意识有组织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期”（《实践论》）的斗争经验的总结。恩格斯说：“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54 页）当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达尔文进化论）则是辩证唯物主义产生的重要条件。恩格斯说：“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41—242 页）

辩证唯物主义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但它和黑格尔的辩证法、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又是根本对立的。列宁说：“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人类社会的认识。”（《列宁选集》第二卷 443 页）辩证唯物主义在人类认识史上，第一次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科学地结合起来，使世界观和方法论完全一致起来。它在观察、分析、解决问题（即矛盾）时，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强调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及其固有的辩证性质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它始终坚持物质是第一性、精神是第二性的原则。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其变化运动是有规律的，是可知的；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等等。辩证唯物主义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并且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深刻地指出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所具有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

辩证唯物主义在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解决了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这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能解决的。它唯物地认为认识开始于经验，同时又辩证地认为认识有待于深化，即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因此，它既克服了经验论的片面性，又克服了唯理论的片面性。毛主席说：“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实践论》）

辩证唯物主义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紧密地结合起来。它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毛主席说：“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唯物主义

同唯心主义根本对立的哲学派别。唯物主义正确地回答了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它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物质是世界的本原，精神是物质的产物和反映。承认物质是不依赖于精神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这是唯物主义的基础。人们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长期实践过程中，逐渐摆脱迷信和妄想（唯心主义），逐渐认识世界本质，深信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从而形成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按照客观世界本来面貌去认识世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的新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都不断地丰富和发展了唯物主义学说。

在哲学史上，唯物主义一般是进步阶级、阶层的世界观。唯物主义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所处的时代、实践条件和阶级地位的不同，在各个特定历史阶段表现的形式也有不同。恩格斯说：“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24 页）在古代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它把具体的物质形态作为世界的本原，朴素地把自然现象看成是无限多样性的统一。如中国先秦有五行说，把金、木、水、火、土五种具体物质作为万物的本原；战国时期的荀况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总根源。古希腊的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说，把原子作为万物的根源；赫拉克利特说：“世界是包括一切的整体，它不是由任何神或任何人所创造的，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按规律燃烧着，按规律熄灭着的永恒的活火”。朴素唯物主义一般代表着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派、新兴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中革新派的利益。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当时生产和自然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朴素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局限于表面、直观地反映，带有朴素的猜测、臆想、自发的性质。在近代有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世界观。它利用十七、十八世纪的自然科学，特别是力学的成就，唯物主义地回答了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可知性。如英国的培根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法国的狄德罗把统一的物质实体看作是一切自然现象的基础；德国的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永恒存在。中国的严复由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然科学的影响，也有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倾向。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克服了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猜测、臆想等缺陷，但因阶级地位和科学发展水平的限制，存在着机械性、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等局限性。十九世纪中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总结了人类历史的优秀成果和自然科学的成就，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旧唯物主义有根本的区别。它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结合起来，并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完成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的伟大变革。它是唯物主义发展的高级形式，并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辩证唯物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因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攻击它。叛徒、卖国贼林彪把孔老二鼓吹的“智”说成是“唯物论”。“智”在儒家学说中是伦理范畴，孔老二用它来吹捧没落奴隶主贵族具有所谓先天的智慧。林彪把反动的东西冒充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他反党反人民的思想工具。我们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必须坚决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孔孟之道，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必须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学会分清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

朴素唯物主义

也叫自发的唯物主义。指用某种或几种具体的物质形态来解释自然界本原的一种学说。在哲学史上，一般指古代的唯物主义。它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不是神创造的，而是由某种或几种具体的原始物质变化发展而来的。如古代中国西周的史伯提出“五行说”，认为“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古希腊的泰勒斯、阿那克西米尼、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分别把水、空气、火、原子作为万物的本原，古代印度的斫婆伽派有“四大”说，把地、水、火、风作为万物的本原。恩格斯曾指出：朴素唯物主义“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形体的东西中，在某种特殊的東西中去寻找这个统一”。（《马克思恩格

斯全集》第二十卷 525 页) 朴素唯物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首先肯定了世界的本原是物质，但只是归结为某种具体的物质，还带有感性的直观的性质；其次，它初步看到了事物的矛盾运动，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朴素唯物主义产生在古代奴隶社会。当时生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促进了科学的发展。人们在同氏族宗教观念以及反动奴隶主的上帝创世说的唯心主义斗争中，把科学知识中包含的唯物主义观点的萌芽加以概括提高和系统化，创立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一般地说，它代表了奴隶主民主派、新兴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中革新派的利益。他们以朴素唯物主义为武器，同唯心主义者进行斗争。如我国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法家杰出代表荀况，在同孔孟宗教唯心主义天命论的斗争中，提出世界万物都是由物质性的“气”构成的；天就是自然，是物质的；天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运动的。荀况还进一步提出“戡天”——征服自然的主张，这是光辉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况在斗争中发展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

朴素唯物主义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是进步阶级、阶层反对反动阶级、保守势力的斗争武器。它打击了古代宗教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并初步概括了阶级斗争的经验和古代自然科学知识的成果。朴素唯物主义由于历史的阶级的局限，对自然界各种现象只能凭日常生活经验进行分析解释和猜测，缺乏一定的科学论证。至于在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时，却是唯心主义的。朴素唯物主义还不是科学的世界观。在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它往往抵挡不住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进攻，甚至还会滑向唯心主义的泥坑。因此，我们在斗争中，要批判地总结朴素唯物主义的历史经验，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做一个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机械唯物主义

也叫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它把世界上化学的、生物的各种物质运动形式，都归结为机械运动，用纯粹机械力学原理来解释一切现象，甚至把人也看成是机器，否认各种物质运动形式的质的区别。它把事物运动的原因，归结为外力的推动，否认事物内部矛盾斗争是事物发展的

源泉。它把事物的运动发展，看成只是数量的增加和减少，过程的循环和往复，否认事物的质的飞跃。

在认识论上，它认为人的认识像镜子一样，只是消极的被动的直观的反映事物。它否认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不懂得人们的认识是在实践基础上的辩证发展过程，不懂得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

在历史观上，它是唯心主义的。它用自然界的规律来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把气候变化、地理条件和人口增减等，说成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懂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否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机械唯物主义观点，早在公元前约五世纪古希腊阿纳克萨哥拉和德谟克利特的哲学中已有萌芽。机械唯物主义盛行于十七、十八世纪的西欧，代表人物在英国有培根、霍布斯、洛克；法国有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当时自然科学中只有机械力学得到显著发展，化学、生物学等都处于幼稚状态，形成了一般都用机械力学原理来说明一切自然现象的情况；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处于搜集材料、分门别类、实验分析的阶段，这样就给人们留下了一种用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看问题的习惯；这些条件以及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当时唯物主义的机械性、形而上学性和不彻底性。机械唯物主义的缺点是严重的，然而却是不可避免的。它比之古代的朴素唯物主义，虽然在辩证法方面有所退步，但整个说来是前进了一大步，克服了过去的朴素性，并力图用经验材料作为论证的依据。在当时，它是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经院哲学和维护科学的思想武器，曾起过进步的作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严复由于受到西欧哲学的影响，他的哲学具有机械唯物主义倾向。他肯定自然界是物质的，说“大宇之内，质力相推”，宇宙万物的变化，是机械运动的“质”（物体）和“力”（运动之力）的相互作用，这在批判理学的先验论中，曾发挥过一定的战斗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同机械唯物主义是根本不同的。列宁在批判马赫主义所谓新物理学的错误时指出，它“忽视了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

义的差别”。（《列宁选集》第二卷 267 页）现代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常用机械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向马克思主义革命辩证法进攻。因此，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同各色各样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观点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

指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自发产生的唯物主义观点，“即绝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我们意识所反映的外界客观实在的自发的、不自觉的、不定型的、哲学上无意识的信念”。（《列宁选集》第二卷 353 页）自然科学工作者在科学实验中，不自觉地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承认物质的客观存在，承认认识是对外部世界的反映。德国著名自然科学家海克尔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而他通过科学研究，却自发地得出了唯物主义的结论。但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唯物主义观点是不彻底的，他们在认识自然科学的一些具体问题上，抱自发的唯物主义态度，但在自然科学之外，要他们对整个世界作出解释表明自己的世界观时，就陷入了唯心主义。而且就是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也有着局限性。如牛顿在科学上有很大功绩，但他不懂得物质运动的辩证规律，不能科学地回答天体运动的原因，最后只好以神的第一推动力来解释，导致唯心主义。由于自然科学工作者不懂得辩证法，因此不能回答自然科学最新发现所提出的理论问题。如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物理学界发现了电子，推翻了原子不可分的陈旧观念，马赫主义者利用这一点大肆宣扬所谓科学产生了“危机”、“物质消灭了”，这种谬论曾使许多不坚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受到影响。列宁说：“我们必须懂得，任何自然科学，任何唯物主义，如果没有充分可靠的哲学论据，是无法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袭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的。”（《列宁选集》第四卷 608—609 页）

自然科学工作者不能满足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不然就不能自觉地从哲学高度去分析问题，更不能自觉地用历史唯物主义去观察社会问题。因此，自然科学工作者在实践中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使自己成为一个自觉的辩证唯物主义者。

庸俗唯物主义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流行于德国的一种卑劣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潮。主要代表有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等。庸俗唯物主义虽然表面上承认客观世界的物质性，但他们却以肤浅卑劣的庸俗形式来歪曲唯物主义，把意识也当作物质。他们认为，意识只是人脑分泌出来的一种液汁，如同肝脏分泌胆汁一样。他们把意识和物质完全等同起来了。

关于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个几千年来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基本问题，是个极其严肃的问题。庸俗唯物主义却加以粗陋浅薄的解释，这样就取消了物质先于意识还是意识先于物质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因而也就否认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严格界限，否认了物质同意识的辩证关系，否认了意识的革命能动作用，否认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两条路线斗争。

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认为，人的聪明取决于营养好坏，而且思想也像一切生理特点一样会遗传下去。他鼓吹剥削者生活好、营养好就聪明，劳动者生活差、营养差就愚笨。这种反动的营养决定聪明论和聪明遗传论，是直接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是同孔孟之道的“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剥削者聪明、劳动者愚笨永远不变）的谬论唱的是一个调子。庸俗唯物主义在政治上拥护资本主义，宣扬改良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庸俗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十八世纪机械唯物主义坚持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对立和斗争。庸俗唯物主义在扩大唯物主义的幌子下，抹杀了哲学上两条路线的对立和斗争。当时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马克思主义已经产生并广泛传播，自然科学正蓬勃发展，一八四八年发生了革命运动。这些都沉重地打击了唯心主义，使唯心主义处于危机之中。在这时，庸俗唯物主义混淆物质和意识的区别，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和唯心主义效劳。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意识根本不是人脑分泌出来的液汁。意识不是物质的东西，而是对物质的反映，是精神的东西，意识同物质是

有区别的。如一部车床，可以用来生产，而关于一部车床的意识却不能进行生产。同样，关于热的意识不能用来取暖，关于饼的意识不能用来充饥。意识只是物质的反映形式，意识不等同于物质。物质是意识反映的客观内容，物质也不等同于意识。意识来源于物质，是人们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产生的。当意识产生后，对物质又有着反作用。毛主席说：“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庸俗唯物主义进行了尖锐严肃的批判。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一书中，揭穿了庸俗唯物主义为剥削阶级效劳的反动本质。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里，揭露和讽刺它是唯物主义的“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被毕希纳、福格特和摩莱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24 页）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狠狠地批判了俄国庸俗唯物主义的经济主义、自发论。

唯心主义

同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哲学派别。唯心主义错误地回答了物质和精神谁是第一性这个哲学基本问题，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物质是第二性的，精神是世界的本原，物质是精神的产物。唯心主义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叫主观唯心主义，认为个人的主观意识是世界的本原，世界只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是“我”的感觉、观念的产物。如中国宋朝的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英国的贝克莱说，事物是“感觉的组合”。另一种叫客观唯心主义，认为在个人的主观意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所谓“客观”的“世界精神”，这种“世界精神”就是世界的本原。如中国宋朝朱熹说的“理”，德国黑格尔说的“绝对精神”，就是“世界精神”。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由它产生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客观唯心主义说法不一，实质相同，都把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把物质作为精神的产物，是对客观世界本来面貌的歪曲反映。

唯心主义的思想早在原始社会就已萌芽，是原始人的蒙昧无知的

产物。唯心主义哲学，是在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和对立、社会产生阶级过程中形成的，它同宗教有着密切联系。唯心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也是一切机会主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论基础。唯心主义一般是代表反动阶级的利益。反动阶级对劳动人民除了用武装镇压外，还用唯心主义从精神上进行奴役。唯心主义是反动阶级的工具，这是唯心主义的阶级根源。唯心主义的认识根源，是主观同客观相分裂，认识同实践相脱离，用孤立、静止、片面、僵化的形而上学观点来看待复杂的认识过程，把认识过程的某个侧面过分地加以夸大。列宁说：“**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412 页）

唯心主义是唯物主义的死对头，两者的斗争乃是阶级斗争在哲学上的表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虽然也同唯心主义进行了长期曲折的斗争，但只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才给唯心主义以彻底的致命的批判。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唯心主义经常变换形式。如古代有孔孟之道、柏拉图的理念论等；近、现代有新托马斯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马赫主义、实用主义，以及刘少奇、林彪鼓吹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等等。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是永远不会完结的。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但由于仍然存在着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存在着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因此，仍然存在着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斗争。我们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坚持不懈地同唯心主义进行斗争。

主观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主观唯心主义把个人的主观感觉、意识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只存在于“我”的感觉、意识之中，是由“我”的感觉、意识产生的。中国先秦的孟轲说：“万物皆备于我”。明朝的王守仁说：“宇宙万物皆吾心中之物”。英国的贝克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奥地利的马赫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等等。这些都是主观唯心主义。在主观唯心主义者看来，只有“我”的主观感觉、意识才是真实存在的，客观事物不是真实存在的。

贝克莱以苹果为例，胡说苹果不过是“我”的色、香、味、硬度等感觉的组合而已。如果没有“我”的感觉，就没有苹果，也没有一切事物，这显然是荒谬的。主观唯心主义在认识上的错误在于它不是把感觉、意识看作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相反地把人的感觉、意识绝对化、神秘化，片面夸大为唯一的真实存在，颠倒了感觉、意识同客观事物的反映；客观事物是感觉、意识的内容，是不依赖人的主观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离开了客观事物的感觉、意识，只能是纯粹主观的臆想。主观唯心主义从世界只是“我”的感觉、意识出发，不可避免地要否认在“我”之外的一切客观事物。列宁说：“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表象而已。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列宁选集》第二卷 36 页）

主观唯心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是剥削阶级利益在哲学上的表现。现代主观唯心主义流派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等等。它们都是帝国主义腐朽堕落、悲观绝望思想在哲学上的反映，是垄断资产阶级垂死没落的哲学。如存在主义宣扬世界上的一切事物不过是人的“自我”的表现，周围世界是和“自我”格格不入的、相互敌对的；每个人都是孤单的，人的存在就是期待着死亡的来临，活着就是等死，“研究哲学就是研究死亡”，“谁自觉走向死亡，谁就是自由”。这些反动谬论，既是资产阶级垂死前的悲鸣，也是他们麻痹人民的反动思想工具。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也用主观唯心主义疯狂地向马克思主义进攻，妄图阻挠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例如，在我党历史上，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便是最狂妄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推行的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林彪及其死党鼓吹反动的天才论，否认事物的客观存在，否认认识来自实践，也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

客观唯心主义

唯心主义哲学的主要派别之一。客观唯心主义认为，有一种神秘的不依赖于主观意识的客观精神，它是世界的本原，一切事物都由它产生。如我国南宋儒家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

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他说的这个“理”是在宇宙形成之前就存在的独立的精神，天地万事万物都由这个客观的“理”产生。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把“绝对精神”作为世界的本原，认为“绝对精神”在世界之前就已存在，世界万物都由“绝对精神”产生。在客观唯心主义者看来，物质世界的各种事物，如日月星辰、人类社会、动物、植物、原子、电子等等，都不过是“理”、“绝对精神”的体现；没有“理”、“绝对精神”，便没有世界的一切。这是对客观世界本来面貌的歪曲反映。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物质是不依赖于精神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先有物质，后有精神；精神无非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是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以后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现象，即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离开了物质就没有精神，根本不存在什么独立的精神，世界也不是由什么“理”、“绝对精神”产生的。

客观唯心主义在认识上的错误，在于把认识的某一方面绝对化、神秘化，把它看作脱离客观事物的东西，并片面夸大为宇宙万物的基础。客观唯心主义的超自然、超人类的所谓“理”、“绝对精神”，实际上是上帝的代名词，不过是哲学化了的上帝创造世界的反动宗教说教而已。

客观唯心主义是剥削阶级的世界观，是剥削阶级的利益在哲学上的表现。现代帝国主义在新形势下抛出的新托马斯主义便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变种。它宣称私有制是符合上帝的自然法的，人同上帝要合作，赞扬不抵抗精神。它主张有两个世界：一个是经验的世界，一个是超经验的世界。前者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后者只有通过信仰才能把握。超经验的世界对于科学家来说是不可知的，要克服这种不可知，必须承认宗教信仰。它疯狂攻击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认为只有信仰宗教，才可以得到“真正的民主与自由”，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才可以和好相处。新托马斯主义妄图从思想上解除工人阶级的武装，对抗无产阶级革命，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

物质

“物质是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这种客观实在是人通过感觉感知的，它不依赖于我们的感觉而存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列宁选集》第二卷 128 页）列宁的这个物质定义说明，物质是不依赖人的感觉而存在的客观实在，它是可以认识的，一切精神现象都是物质的反映。

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是由无限永恒运动着的物质构成的。运动是物质的根本属性，物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时间和空间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人类出现以前，物质就客观存在着；人类出现以后，它也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着。人的意识是高度发展的产物，意识不能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

物质是永恒存在的，不生不灭的，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世界上存在的各种事物、现象，如原子、细胞、山川河流、日月星辰、社会中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等等，都是物质的不同形态。世界上各种具体事物的产生和消失，只是物质的不同形态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如人们把钢铁造成机器、人类社会形态的变化等，都不是创造或消灭物质，只是改变物质的形态。自然科学上的物质不灭定律，就是讲物质能依一定的规律在形态上发生转化。但不论怎样转化，物质总的质量不会有任何增加或减少，这是自然界的最重要规律之一。自然科学关于物质不灭定律的大量论据，证明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不灭基本原理的正确。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根本不存在有不依赖于物质的所谓独立的精神的东西。

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不同于自然科学上的物质结构概念。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指的是整个物质世界；自然科学的物质结构概念，指的是具体的物质形态。两者有区别，又有联系。哲学上的物质概念是一切自然科学研究的出发点，而自然科学对物质结构认识的深化，又会以新的内容不断丰富哲学的物质概念。

围绕物质观念，哲学上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切唯心主

义者对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无不恨之入骨，他们为了攻击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说了许多胡话。如阿芬那留斯说：“‘物质’只不过是一种抽象，也就是一切中心项都被抽象掉的对立项的总和。”马赫说：“我们称之为物质的东西，只是要素（‘感觉’）的一定的有规律的联系。”贝克莱说：哲学家所说的物质，或心外对象的存在，《圣经》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他叫嚷，“物质只要被逐出自然界，就会带走很多怀疑论的和渎神的体系，带走无数的争论和纠缠不清的问题”。唯心主义者总是主张把物质赶出自然界，要消灭物质。十九世纪末电子的发现，推翻了物理学上原子不可分的陈旧观念。可是马赫主义者又跳出来大叫：“物质消失了”，还胡说什么“新”物理学把唯物主义驳倒了，乘机向辩证唯物主义进攻。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彻底批判了他们的谬论。列宁讽刺攻击唯物主义的哲学和神学教授们说：“他们曾经一百次、一千次地宣告唯物主义已被驳倒，可是直到现在，他们还在一百零一次、一千零一次地继续驳斥它。”（《列宁选集》第二卷 16 页）叛徒、卖国贼林彪继承历史上唯心主义者的衣钵，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胡说思想可以代替物质，推行一条从意识到物质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为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制造理论根据。但是，不论唯心主义者采取怎样的手法攻击唯物主义，他们总是以失败而告终。

客观实在

同主观意识相对而言，指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能为人的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存在，即物质。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事物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客观实实在在的东西，也就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物质。人们通过感觉来感知客观实在，即客观实在为我们的感觉所复写、摄影、反映。关于表达这个客观实在的哲学概念，列宁曾说：“这个概念很早以前就制定出来了，它就是物质。”（《列宁选集》第二卷 128 页）自然界、人类社会、物质运动、时间和空间等等，都是客观实在。

唯心主义宣称物质是“无”，否认物质是客观实在；或者把客观

实在说成是感觉、精神的产物。这都是错误的。

世界的物质性

指世界统一于物质，离开物质就没有世界。世界是物质的世界。物质是永久与普遍存在的，是不生不灭的，不论在时间与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世界上存在着无机物、有机物、生物以及人类社会等等形形色色、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是物质的不同表现形态。

恩格斯说：“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83 页）这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由于世界的物质性，因而才有各种事物的统一性。如细胞学说阐明了植物、动物、有机体都由细胞组成，揭示了生物发生过程的统一性；能量守恒与转化定律从自然界的机械、物理、化学等物质运动形态的相互转化，揭示了他们的统一性；物种起源学说阐明了一切有机体都由单细胞胚芽长期发展而成，揭示了生物各物种之间的统一性；从陨石的 analysis 中看到，地球上存在的化学元素同其他星球上是一样的，揭示了地球同其他星球的原子构成的统一性；历史唯物主义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中，揭示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基础。可见，不论自然界、人类社会，都是物质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实在。物质形态的多样性，是世界物质性的表现。

世界的物质性的观点，是人们在长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发展。唯心主义根本否认世界的物质性，认为世界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精神的产物。客观事实和科学实践彻底驳斥了唯心主义的谬论。旧唯物主义坚持了世界物质性的观点，但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它是形而上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物质性的特点，是在实践基础上总结了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丰富经验，它深刻地揭示了客观世界的本质，既反对了唯心主义，又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是唯一正确的。世界物质性的观点，指导我们一定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貌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实践中坚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

学。

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

唯物主义哲学最根本的观点。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不依赖于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是世界的本原；意识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物质的反映。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产生意识、决定意识。自然科学的实践证明，物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地球约有六十亿年的历史。开始时地球上根本没有生物，以后才从无机物产生有机物，产生有生命的物体。最初出现的生物体只有刺激感应，没有意识；后来低级生物逐渐发展到高级生物，从类人猿经过长期劳动变成了人。人们在实践中，通过感官对外界事物的反映和人脑的加工而产生了人的意识。列宁说：“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完全一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思维、感觉是第二性的东西。”（《列宁选集》第二卷 40 页）

唯心主义反对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观点。例如黑格尔认为“绝对精神”是第一性的，客观世界是“绝对精神”产生的，是第二性的。朱熹说：“宇宙之间，一理而已。”（宇宙万物都是由精神的“理”产生的）。他们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完全是头脚倒置的哲学。旧唯物主义在自然观上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则，但在社会观上却认为，社会意识是第一性的，社会存在是第二性的。它在社会领域里背叛了唯物主义，因而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辩证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不仅在自然界坚持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则，并把它贯彻到社会历史领域，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认为物质和意识存在着辩证关系，在一定条件下，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原理，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在革命实践中坚持这一原理，对增强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分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是十分重要的。

自然界

指自然科学所研究的有机界和无机界。自然界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物质世界。它在时间上无始无终，在空间上无边无际。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处于相互联系的运动变化之中，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在不断地产生发展和消灭之中，处在不断地运动之中。地球形成至今已有六十亿年，最初没有有机物，从无细胞结构的原生生物发展到细胞结构的有机物，从植物发展到动物，以致在一百多万年前产生了人类。唯心主义、宗教神学把自然界说成是上帝的创造，或者人的思想的产物；形而上学把自然界的事物看成是彼此孤立、循环往复、只有量的增减而无质的变化。自然界发展变化的事实，彻底驳斥了唯心主义、宗教神学和形而上学的谬论。

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但是自从自然界出现了人类以后，不仅自然界作用于人，而且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人们在同自然界的斗争中，不断认识自然界的客观规律，并利用它来为人类服务。例如，毛主席亲自树立的全国农业的一面红旗——大寨，解放前是“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亩平，年年灾情多”，产量很低，人穷、地穷、村子穷。解放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贫下中农坚定地走农业合作化的道路，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完全大变样，将“七沟八梁一面坡”变成大片的梯田和小平原，低产变成高产，用大干战胜大灾，特大灾年保丰收，为国家作出很大贡献。这说明只要路线对头，又有冲天干劲，就可以不断改变自然面貌。

自然科学就是人类在实践基础上对自然界斗争和认识的理论概括。随着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也不断深入，自然科学的成果也越来越丰富发展。在阶级社会里，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动是受着阶级性制约的，和阶级斗争密切相关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从自然界的客观实际出发，把革命精神和科学精神紧密结合起来，遵照毛主席的伟大教导：“**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无机界

同有机界相对，指无生命的自然领域。无机界和有机界是自然界的两大领域。无机界由各种无生命物体组成。无生命物体又叫做非生物（如水、空气、土壤、石头等）。无机界内部的矛盾斗争，是无机界运动的根本原因。无机界按照自己内部的特殊规律发展着。无机界的运动，根据自然科学已发现的，有机械、物理和化学三种基本形态。三者性质不同，但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由一种运动形态过渡到另一种运动形态。

无机界和有机界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都统一于物质，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无机界和有机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地球上本来只有无机界，没有有机界。有机界是从无机界发展转化而来的。无机界是有机界产生、存在、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无机界就没有有机界。有机界和无机界是相互作用的，如有机界的有机体森林，对无机界及整个环境面貌的改变起着重要的作用。唯心主义把无机界的发展看作是外力的推动；形而上学把无机界和有机界割裂开来，看成是互不相关的、不发展的、不转化的，这都是错误的。

有机界

同无机界相对，指有生命的自然领域。有机界和无机界是自然界的两大领域。有机界由有机体组成。有机体又叫生物体，或生物有机体。它是一切有生命的个体的统称，包括植物、动物、最原始的单细胞生物、无细胞形态的物质以及人类本身。

有机界的发展有着自己的特殊规律。有机界的物体通过新陈代谢、同化异化、遗传变异等矛盾斗争，不断地运动变化着。地球上原来只有无机界，没有有机界。约在二十亿年前，地球上由于物质运动，出现了有生命的蛋白体。从此，自然界由无机界产生了有机界。恩格斯说：“一切有机体，除了最低级的以外，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即由很小的、只有经过高度放大才能看得到的、内部具有细胞核的蛋白质小块构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16 页）有机界一形成，就有着自己的发展过程，从生命发生，进化到单细胞、多细胞生物，约经历了十五亿年。随着生物种类的逐渐增加，在动物方面，由无脊椎动物进化

到脊椎动物（鱼类），由鱼类进化到两栖动物、爬虫类；植物方面，由低等的藻菌类过渡到适于陆生的原始蕨类，裸子植物（如松柏）等，约经历了三亿五千万年。鸟类、哺乳动物的形成，约有一亿五千万年。人类的出现，约有一百多万年。由此可见，有机界的物体，经历了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辩证发展过程。

有机界和无机界的区分是相对的，它们都统一于物质，都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无机界是有机界产生、存在、发展的前提和条件，没有无机界就没有有机界。有机界是无机界发展的更高阶段。

唯心主义认为，无机界向有机界的转化，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转化，是概念的转化。这就否认了无机界和有机界的客观性，否认了两者转化是物质世界合乎规律的发展过程，是完全错误的。形而上学认为，细胞只能产生细胞，物质是没有运动变化的，有机界的物体是彼此孤立没有发展的。有机界发展的事实告诉我们，地球上本来没有细胞，细胞是从原生质发展而来的。细胞本身也是在不断发展的，高等生物就是由低等的单细胞到多细胞到植物、动物发展而来的。我国科学工作者，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经过反复实践，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就进一步证明了无机物和有机物、简单有机物和复杂有机物都是可以转化的。一切都在运动变化和发展着。形而上学否认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是不符合事实的，是违反辩证法的。

宏观世界

同微观世界相对，又叫大宇宙，是宏观物体、宏观现象的总称，通常指行星、星系等巨大物质体的领域。在物理学中，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是根据不同的物质结构、层次、时空关系和运动的规律性来区分的。宏观世界是经典物理学研究的对象。一般地说，宏观物体指自然界中大于一亿分之一厘米的物体，如大分子、晶体、行星、恒星等等；宏观现象指宏观物体在宏观空间范围内的各种现象，如人走路、地球运转；有时动量很大的微观粒子在大范围内的现象，如加速器中基本粒子的运动等，由于经典力学的原理也适用，所以也叫宏观现象。宏观物体的

长度以厘米、米、千米计算，运动的时间间隔以秒、小时、年度计算。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宏观世界是以微观世界为基础，宏观世界的物体都由微观世界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组成。不论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的物体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是统一于物质的。

唯心主义认为宏观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形而上学认为宏观世界是静止的、没有运动发展的。这都是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都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无限发展着的物质世界，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随着事物的发展、实践的深入、科学的进步，人们对宏观世界的认识也是不断深入的。在十八世纪以前，人类心目中的宇宙只是太阳系。现在，人们知道的大宇宙已是由千千万万个银河系组成的星系团、超星系团以至于总星系。太阳系范围可说是大了，它的直径有一百二十万万公里。同太阳系比较，地球只是沧海一粟。而银河系的直径大约有十万光年（光行的速度是每秒三十万公里，光行一年的路程叫“光年”，接近十万亿公里），厚度大约是一万光年。太阳在银河系中运转一周，大约需要二亿年。太阳同银河系相比，也只是大海一滴。而在大宇宙中，银河系又只是一颗沙粒而已。总之，宏观世界是无限的。

微观世界

又称小宇宙。微观物体和微观现象总称微观世界。在物理学中微观物体一般指自然界中小于一亿分之一厘米的物体，例如原子、电子、基本粒子等；微观现象是指微观物体在微观空间范围内的现象。有时动量很大的微观粒子，在大范围内的现象，如加速器中基本粒子的运动，由于适用于经典力学的原理，则属于宏观现象。微观物体运动时间间隔以一亿分之一秒计算。微观世界是相对于宏观世界而言的。自然科学在研究原子、电子、基本粒子过程中，发现这个领域同宏观世界的物体一样，充满着复杂多样的矛盾运动。微观世界同宏观世界虽有不同特性，但它同宏观世界一样，都具有一定的物质结构、时空关系和运动的规律性。

马赫主义从主观唯心主义立场出发，认为凡是感官不能感觉到的

电子、原子等东西，都是“纯粹思维的东西”，从而否定微观世界物体的客观物质性。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微观世界同宏观世界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宏观世界的宏观物体，都由微观世界的原子、电子、基本粒子等组成；微观世界的物体是宏观世界物体的基础。但它们都统一于物质，都是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永恒运动着的客观物质世界，都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形而上学认为，世界是有限的，原子是不可分的，这也是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大宇宙、小宇宙都是无限的，都是可分的，无论在时间、空间上都是没有穷尽的。银河系外有无数个银河系，原子可以分，原子核、电子、基本粒子也都是可以无限地分下去的。

存在

也叫客观存在，指思维以外的客观物质世界。在哲学基本问题中提出的思维对存在、精神对物质的关系，存在和物质这两个概念，意义是相同的，都是指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贝克莱认为“存在就是被感知”，黑格尔认为“存在”是“绝对精神”，这都是唯心主义的，是对存在的歪曲。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列宁说：“一般唯物主义认为客观真实的存在（物质）不依赖于人类的意识、感觉、经验等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不依赖于人类的社会意识。在这两种场合下，意识都不过是存在的反映”。（《列宁选集》第二卷 332 页）

有时，存在这个概念是相对于不存在而说的。存在指“有”；不存在指“无”。这里“存在”的含义与上面一种不同。江湖骗子杜林说，“世界统一于存在”，这是妄图利用“存在”概念的不同含义，耍弄花招，搞混阵线，以此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原理，贩卖唯心主义货色。

运动

物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形式，是物质多样性的表现。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物质的运动离不开时间和空间。

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运动的物质，也不存在没有物质的运动。整个物质世界，小至微观粒子，大到日月星辰，从非生物到生物，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都处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之中。

物质运动必取一定的形式。根据现代科学已经达到的认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物质运动，可以归结为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五种基本运动形式。物质运动是不生不灭的，物质运动形式都是互相依存的，本质上又互相区别，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实践证明，摩擦生热、生电，是机械运动转化为物理运动。热引起燃烧，是物理运动转化为化学运动。无机物经过化学作用出现有机物，产生生命运动。生物发展，出现了类人猿，在劳动中类人猿变成了人，产生了人类的社会运动。物质运动形式的转化和发展，又是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简单到复杂的无限前进的过程。以不同的物质运动形式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形成了各门科学。毛主席说：“人的认识物质，就是认识物质的运动形式，因为除了运动的物质以外，世界上什么也没有”。（《矛盾论》）

“运动本身就是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60 页）物质的运动是由于物质内部存在着矛盾，矛盾双方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推动着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物质运动的源泉。运动不是外来的，是物质内部本身固有的。矛盾是简单的运动形式（例如机械性的运动）的基础，更是复杂的运动形式的基础。

物质运动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静止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静止是运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是事物的发展还没有变为另一事物以前的一种运动形态。整个世界就是一个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统一的物质运动过程。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运动的基本观点，是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唯心主义否认运动是物质的属性，认为运动不是物质的运动，而是离开物质的某种精神的活动或上帝作用的结果。形而上学否认世界是运动的，汉朝的儒家董仲舒认为，“天不变，道亦不变”，把宇宙和社会的本质看作是永远不变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运动

观都是为剥削阶级反动统治服务的。旧唯物主义虽然承认世界的物质性，但是不了解物质和运动的内在联系，以及运动的辩证性质，把一切运动都归结到机械的运动，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是错误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达尔文主义，抹杀复杂的社会运动形式和生物运动形式的区别，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运动形式，企图以生物运动形式来代替社会运动形式，胡说弱肉强食、生存斗争也是社会的运动规律，这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掠夺政策效劳的反动谬论。

静止

相对于运动而言，是运动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即事物处于不显著的量变或平衡的状态。运动是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是物质存在的方式，是物质本身固有的属性；静止则是相对的、暂时的、有条件的，是运动的一种特殊情况。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矛盾论》）运动中包含着静止的因素，静止只有在事物运动发展中才存在的。如火车停在车站，在地面上位置没有移动，这种在力学意义上的静止，并不妨碍火车参加地球的运动，也不妨碍组成火车这一物体的分子、原子的运动变化。

正确认识事物运动过程中的相对静止，对于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有着重要作用。恩格斯说：“**物体相对静止的可能性，暂时的平衡状态的可能性，是物质分化的根本条件，因而也是生命的根本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63 页）物质所以表现千千万万种不同形态，正是由于它们有着相对静止和暂时平衡的状态。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区别各种事物的性质，认识和把握事物的具体形态。

形而上学把相对静止绝对化，把运动的特殊情况当作普遍情况。如我国汉朝儒家董仲舒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把宇宙和社会看作是绝对静止的、永远不变的，这种反动思想曾长期为腐朽的剥削阶级所拥护。诡辩论否认事物的相对静止，把客观世界看成混沌一团，认

为事物性质是不能区别的，客观事物是瞬息万变、不可捉摸的。我国战国时期的没落奴隶主阶级思想代表庄周，否认事物的相对稳定性，抹杀生和死、可和不可之间的质的差别，从而得出“是亦彼也，彼亦是也”的相对主义结论。这些都是错误的。

时间和空间

物质存在的基本形式。时间是表现物质运动发展的顺序和可持续性。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时间的特点是一度性，就是说朝着一个方向发展，是一去不复返的。空间是表现物质运动的位置、范围和伸张性。物质世界的任何事物在运动过程中，都具有一定的位置，并且不断地变化着；空间的特点是三度性，就是说具有长度、宽度和高度。

时间和空间是客观的，都不是独立的脱离物质的东西。世界上既不存在离开时间空间的物质运动，也不存在离开物质运动的时间空间。比如光速每秒三十万公里，说明光的运动既在时间中，又在空间中。一切运动着的物质无不如此。列宁说：“唯物主义既然承认客观实在即运动着的物质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也就必然要承认时间和空间的客观实在性。”（《列宁选集》第二卷 176 页）运动着的物质世界是永恒的、无限的，时间空间也是永恒的、无限的。具体事物是有生有灭、暂时的、有条件的，具体的时间空间也是暂时的、有限的。整个物质世界是无限和有限的统一，时间和空间也是这样。无限存在于有限之中，通过有限表现自己，无数有限的时间空间，构成无限的时间空间。

人们关于时间空间的認識，不是主观自生的，而是客观实在的时间空间的反映，它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时间空间的观点，是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康德把时间空间看成是先天就有的直观形式，马赫主义认为时间空间是依赖于人、为人所产生。他们都把时间空间看成是主观的，否认时间空间的客观性，这是唯心主义的，是错误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虽然承认时间空间的客观性，但是不理解时间空间和物质运动的辩证关系。如牛顿提出绝

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并把时间和空间看作是彼此分开的，这显然是错误的。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时间空间的观点，对我们进行革命实践有着重大意义。不论社会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都有一个时间和空间的问题，如速度、布局、计划、群众运动的规模和深度等等，都是与时间空间联系着的。没有时间和空间观念，对现实和历史问题就不能作出正确的评价。因此，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必须要有科学的时空观。

三度空间（三维空间）

指客观存在的空间。空间具有三度的特性，即长度、宽度和高度，这个三度也叫三维。空间的三度性，表现在经过空间的任何一点，可以并且只能做出三条互相垂直的直线。任何物体都存在于三度空间之中。物质世界的三度空间是无限的，具体物体的三度空间是有限的。无限的三度空间通过有限的三度空间表现出来，无数有限的三度空间组成无限的三度空间。

马赫主义认为，凡是人们感官不能直接感觉到的东西，如化学元素、电子等，都是“纯粹思维的东西”，不存在于三度空间中，而存在于“非三度空间中”。它的所谓“非三度空间”，就是离开现实的三度空间之外的“空间”。戳穿了说，不是别的，无非就是上帝居住的那个“天国”。这样，它从否认化学元素、电子的物质性，进而否认空间的普遍性、客观性，否认三度空间的普遍性、客观性。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批判这种唯心主义观点时指出，“自然科学毫不怀疑它所研究的物质只存在于三维空间中，因而这个物质的粒子虽然小到我们不能看见，也‘必定’存在于那个三维空间中。”（《列宁选集》第二卷 182 页）马赫主义反科学的“非三度空间”谬论，不过是为信仰主义大开方便之门而已。

思维

指理性认识以及运用概念、判断、推理等形式反映客观事物本质

的思考过程。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将丰富的感觉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从而得出反映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概念和理论。思维不同于感性认识，它是认识的高级阶段，是对客观事物的间接的概括的反映。平常说的“开动脑筋”，“让我想一想”，都是运用概念来作判断和推理的思维活动。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都是思维的过程。思维能动地反映存在，又能动地反作用于存在。思维要通过语言来进行，语言是思维的工具。没有语言就无法进行思维，思维和语言是密切相联的。

思维这个概念，有时相对于存在而说，就是指精神、意识。唯心主义把思维看作是世界的本原，是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的东西，这是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是世界的本原，思维不能离开物质，不能离开社会实践，不然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恩格斯指出：“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23 页）庸俗唯物主义把思维看作是人脑的分泌物，如同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这是把思维和物质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其结果必然导致唯心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为，思维和人脑是有区别的，人脑只是思维的器官，思维是人们社会实践的产物。如果把思维活动和生理活动等同起来，这就抹杀了思维的社会性。

思维在人们社会实践和认识过程中有着重大作用。“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它的规律性，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实践论》）我们应该在实践中，遵循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凡事都要用脑筋好好想一想，多想出智慧，不断夺取革命新胜利。

精神

同物质概念相对，是物质的反映。人们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认识、观念、思想、理论、学说、路线、政策、计划、办法等，都是精神的东西。精神来源于物质，物质决定精神，没有物质就没有精神，物质是第

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一定条件下，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唯心主义把精神神秘化、绝对化，认为精神是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产生物质、决定物质；形而上学否认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这都是错误的。

精神是社会现象，是人类所特有的。精神的产生和发展受着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制约，同人们的相互交往和语言的产生、发展紧密相联。精神的内容，不管所反映的是正确的、错误的或者是幻想，都可以从社会存在中找到根源。每一个社会都有和它相适应的社会意识（精神）。随着社会的变化，社会意识也必然或迟或早地发生变化。社会精神现象即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并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在阶级社会中，精神有着阶级性。敌对阶级之间精神力量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52 页）反动阶级的反革命精神，歪曲地反映了客观现实，逆历史潮流，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阶级的革命精神，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符合历史潮流，推动社会前进。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彻底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埋葬帝、修、反，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是彻底革命的精神，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在革命实践中起着巨大作用。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都必须具有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充满革命信心、精神焕发、干劲冲天的。毛主席说：“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有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能不怕困难，勇往直前。英勇的大庆工人，以“两论”（《实践论》《矛盾论》）起家，运用唯物辩证法，把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大搞群众运动，艰苦奋斗，同天斗，同地斗，同阶级敌人和帝、修、反斗，高速优质地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使精神变成了物质力量。那种对社会主义事业，拖拖沓沓，百般强调困难，把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却认为做不到。这种右倾保守思想是一种萎靡不振的非无产阶级的精神，是懦夫和懒汉世界观的

表现。我们一定要发扬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永葆革命青春，不断前进。

意识

人脑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等都属于意识范畴。意识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了人类以后才有的精神现象，是人类在同自然界斗争的劳动实践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30 页）自然科学证明，在地球上没有人类以前，意识是不存在的。在低等有生命的有机物中，只有刺激感应。低等动物发展到高等动物，专门从事反映机构的神经系统才逐步发展。动物界向人类的发展，劳动是猿变成人的决定因素，也是人脑这个复杂的思维器官和人的意识产生的决定因素。意识不是别的，就是发展到高度完善的物质即人脑的机能，是物质的反映，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总之，人的意识产生、发展，不但同生理发展中的高级神经系统不可分离，而且同社会发展中的劳动生产不可分离，和语言也是紧密相联的。意识在认识过程中，通过低级的生动直观和高级的抽象思维这些形式来反映客观世界。客观物质世界是意识的内容。物质产生意识，意识依赖物质，意识产生后具有相对独立性，在一定条件下反作用于物质。列宁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228 页）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又有反作用。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具有阶级性。

在意识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坚持了意识来源于物质、物质第一性和意识第二性的正确观点。但由于受着阶级、历史等社会条件和自然科学水平的限制，它认为意识只是对物质消极的直观的被动的反映，而不了解意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不了解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和意识的反作用。庸俗唯物主义认为，意识是人脑分泌出来的一种液汁，人脑分泌这种液汁，如同肝脏分泌胆汁一样。这样便把作为人脑这个物质的一种属性即意识，与物质等

同起来了，抹杀了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的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取消了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严格界限，否认了意识的反作用，实质上把意识作为第一性的东西，以致陷入唯心主义泥坑。唯心主义把意识绝对化，人为地把意识加以夸大和歪曲，认为意识是脱离物质、产生物质而独立存在的本体。客观唯心主义把人的主观意识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或上帝的启示；主观唯心主义把意识说成是个人头脑的自由创造，这都是错误的。

意识相对于物质而言，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意识和物质、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都是同一含义的对称概念。

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指在物质决定意识的前提下，意识具有一定的独立作用。意识的相对独立性表现在几个方面：在意识的作用上，旧意识并不随着产生它的物质条件的消失而立即消失，还可能在一个相当时期对事物发展起着阻碍作用；先进意识在客观物质基础上一经产生，对事物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在意识对物质的关系上，同一形态的国家之间，意识的发展同物质经济发展的水平并不都是一致的。有的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思想意识的发展水平可能超过经济上先进的国家，如十八世纪末，法国的哲学和政治思想超过了经济上先进的英国。出现这种情况，是由于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正处于经济高涨的阶段，当时国内阶级矛盾特别尖锐，是经济、政治上的大变革在思想上的反映和表现。当然，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特定条件下，所以能出现先进的思想意识，仍然是以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为前提的。如果没有经济上的高涨和政治上的变革，也不可能有思想意识上的发展。恩格斯说：“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485 页）在意识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上，哲学、政治、法律、文学、艺术、宗教等意识形态之间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的，如无产阶级的政治，对革命文艺的发展就起着重大作用。每一历史时期的政治、哲学、文艺等意识形态，都同以前这方面的意识形态有着继承关系；意识的历史继承性，是受阶级性制约的。反动阶级的政治、哲学、文艺等意识形态，继承历史上反动落后的东西；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继承了历史上的优秀成果；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历史上一切最优秀的成果。

机械唯物主义否认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把意识看作是客观事物简单的消极的反映，是没有能动性的，意识完全机械地随着客观事物的消失而立即消失。这是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唯心主义把意识的相对独立性绝对化，得出了意识决定物质的谬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脱离物质而绝对独立的意识是不存在的。没有物质，就没有人类，就没有人的头脑，没有客观事物作用于人脑，就不可能有任何意识。但是，意识对物质有它的能动的反作用和自己的发展特点。当然，意识的这种独立性是相对的。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对革命实践有着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占着统治地位，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具有优越条件。但正如列宁所说：“旧社会灭亡的时候，它的死尸是不能装进棺材、埋入坟墓的。它在我们中间腐烂发臭并且毒害我们。”（《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 407 页）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要从旧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它就必须清除这个基地。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因此，我们必须重视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继续批判旧制度和旧思想，普及、深入、持久地开展批林批孔斗争，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巩固和扩大无产阶级思想阵地，并在斗争中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思想

哲学上所说的思想这个概念，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人们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开始得到的是感性认识，毛主席说：“这种感

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正确思想是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反映，错误思想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反映。实践是检验思想是否正确的标准。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任何思想都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并随着它的改变而改变。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0页）

在阶级社会中，思想有着阶级性，不同的阶级具有不同的思想，不存在超阶级的思想。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思想上的斗争是社会上阶级斗争的反映。我国先秦时期的儒法斗争，是没落奴隶主阶级同新兴地主阶级阶级斗争在政治、思想上的反映。在现代，辩证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之间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的反映。思想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阶级内容、表现形式和特点。人们的思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存在有着反作用。反动阶级的错误思想阻碍社会的发展；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推动历史的前进。马克思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就是一部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斗争的历史。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就是同各种剥削阶级、修正主义反动思想斗争并战胜它们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正确地指出了思想的来源、本质、特点和作用。唯心主义把思想看作是天上掉下来的或者是人脑里固有的；形而上学否认思想对存在的反作用。这都是错误的。

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掌握思想教育，是无产阶级团结广大革命群众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无产阶级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是上层建筑领域里

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战斗中，我们必须加强思想工作，进行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这是思想战线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思想体系

一定阶级或一定社会集团的思想观点的总和。政治、哲学、艺术、道德、宗教等是思想体系的表现形式。在阶级社会里思想体系有着阶级性，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经济上政治上占支配地位的阶级，它的思想体系也占着统治地位。在过去的阶级社会里，都是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占着统治地位。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占着统治地位。

思想体系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属于上层建筑。它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思想体系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存在有着反作用。不同阶级的思想体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进步阶级的思想体系推动社会的发展；反动阶级的思想体系阻碍历史的前进。敌对阶级之间思想体系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腐朽没落的思想体系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进步的革命的思想体系是在斗争中产生发展的。现代反动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是对社会存在的歪曲反映，它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为了挽救其垂死的命运，资产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利用各种渠道，散发毒气，争夺阵地，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较量。修正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同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一道，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他们都企图倒转历史车轮，但这只能是痴心妄想。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是在近代大工业和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它是客观世界规律的科学反映，是指引人们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指路明灯，真正代表了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的思想体系，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强大武器。

毛主席说：“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下一阶段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46-647 页）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

观念

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一种反映形式。观念的内容来源于客观事物。马克思说：“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217 页）唯心主义把观念看作是天赋的或者是主观自生的，这都是错误的。观念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正确的观念，反映了客观现实的本来面貌，如“群众是英雄”的观念，它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本质，反映了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真正创造者是人民群众；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社会的主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错误的观念是对现实的歪曲反映，如宗教观念，它宣扬的上帝和鬼神，实际上是没有的。鬼神观念只是把现实事物的不同部分，经过人脑的想象虚构出来的。观念是对现实的反映，对现实有着反作用。在实践基础上得到的正确的观念、思想，又反作用于实践，推动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革命的促进作用；错误的观念、思想，则起着阻碍社会历史前进的作用。实践是检验观念是否正确的唯一标准。在阶级社会里，人们的观念具有阶级性，一定的观念反映了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资产阶级私有观念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的反映，又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服务的。观念上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和表现。观念具有相对的独立性。观念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的。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71-272 页）

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在一定条件下，观念的东

西可以变成实在的东西。列宁说：“观念的东西转化为实在的东西，这个思想是深刻的：对于历史是很重要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117 页）

知识

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积累和总结。“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773-774 页）

知识来源于实践，是后天才有的。把知识看作是先天就有的，这是唯心论的先验论，是错误的。广大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群众的实践是一切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源泉。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就要积极投入广大群众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中去。实践是知识的基础，也是检验知识的标准。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但人不能事事直接经验，事实上多数的知识都是间接经验的东西，即一切古代和外域的知识。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两个部分。在我为间接经验，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来说，任何知识都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离开实践。书本知识是重要的，但它是知识的“流”，而不是“源”。否认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活动，否认知识来自实践，这就否定了认识论的唯物论。

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这是对客观事物局部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认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这是对客观事物全体的、本质的、内部联系的认识。感性知识是理性知识的基础，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发展。它们是相互联系的，在实践基础上统一起来，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否定感性知识向理性知识的发展，这就否定了认识论的辩证法。

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需要我

们抱诚实和谦逊的态度。有一种人忽视实际经验，重视现成的书本知识；另一种人轻视书本知识，偏重于感性和局部的知识。这两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两者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才能获得好的和比较完全的知识。因此，有书本知识的人，要向实际方面发展，深入群众，接触斗争实际，在三大革命实践中把书本知识和革命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认真读书，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为理论。知识来自实践，但真正的科学知识对实践有着重大的指导作用。我们应积极投入实践，重视在实践中学习，不断总结经验，使感性知识上升到理性知识，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获得比较完全的知识，更好地指导革命实践。

列宁曾多次赞扬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以及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并得出结论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从全部人类知识中产生出来的典范。”“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列宁选集》第四卷347-348页）毛主席也教导我们说：“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498页）这都说明，要想真正做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必须自觉地在革命实践中坚持为革命而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历史知识和三大革命斗争的实际知识。

才能

属于知识范畴，指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才智和能力，即通常说的才干和本领。人们的才能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通过社会实践获得的。你要有造机器、种田、打仗、绘画的才能，你就一定要参加做工、种田、打仗和绘画的实践。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离开实践就不可能有什么才能。群众是实践的主体，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个人才能的获得和发展都离不开群众。社会实践越多，接触联系群众越多，并且善于向群众学习，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这种人的才能就越大。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

践经验的战士。

才能的发展是受着社会经济条件和科学文化水平的制约。在古代，人们只能有制造石器、铜器、铁器的才能，不可能有制造万吨水压机和掌握电子计算机的才能。才能是随着事物的发展、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发展的。才能的大小不是凭主观吹嘘决定的，而是要受实践检验的。

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对才能都有不同的看法，并利用才能来为自己的阶级服务。资产阶级把才能当作剥削和压迫人民、损人利己、唯利是图、为名为利和升官发财的资本。无产阶级从彻底革命的观点出发，把才能看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条件。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劳动人民的才能的使用和发挥，受到了严重的压抑。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广大工农群众的才能，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和充分的发挥。如我国大庆石油工人，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进一步提高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觉悟，大大发挥了聪明才智。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八年，原油产量以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三十一的速度持续跃进。才能又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要推进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事业，我们就要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统帅下，积极参加斗争实践，刻苦学习革命理论、历史知识和三大革命斗争实际知识，增长才干，又红又专。

围绕着才能从哪里来的问题，几千年来的哲学家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唯心主义鼓吹天赋才能，叛徒、卖国贼林彪宣扬天才论，自比天马，把才能说成是先天就有的，否认才能来自实践、来自群众，否认才能是后天才有的，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是为其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

语言和思维

语言是人们表达和交流思想认识的工具，思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间接的概括的反映。语言和思维都是社会现象。思维是语言的内容，语言是思维的形式，两者有着内在的联系。思维只有通过语言才能表达。

语言必须有思维活动的成果（即思想），才成为人们交流思想认识的工具。没有思维的语言，和没有语言的思维，都是不存在的。斯大林说：“不论人的头脑中会产生什么样的思想，以及这些思想什么时候产生，它们只有在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在语言的词和句的基础上才能产生和存在。没有语言材料、没有语言的‘自然物质’的赤裸裸的思想，是不存在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马克思语）思想的实在性表现在语言之中。”（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语言和思维都是在劳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人类由于参加社会生产劳动，在猿变成人的过程中，外界客观事物通过感觉器官作用于大脑，产生了思维。社会生产劳动，要求社会成员彼此必须交流思想认识，才能有协调的共同活动，于是就产生了语言。

随着实践的不断丰富，人们的思维能力就不断提高，思维活动的成果（即思想），也由简单到复杂，由浅入深，语言的词汇也由少到多，由内容贫乏到日益丰富。随着实践的发展，许多新思想随着新事物的出现而出现，许多新词汇、新术语也随之产生；有些概念和词汇也增添了新内容。

在实践基础上，思维的发展促进了语言的发展。语言的发展对人们巩固思维成果，提高思维能力，掌握和使用人类已经得到的知识，传授经验，交流思想认识，也起着促进作用。

语言和思维都有各自的规律。语言的规律，一般是指语法。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和语法，它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思维规律是客观事物规律的反映，是哲学和逻辑学的研究对象。

江湖骗子杜林说有一种抽象的和纯正的思维，是不通过语言来进行的。这种把思维和语言割裂开来的论点，是为他宣扬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作辩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狠狠地批判了这个谬论，并讽刺他说，“这样说来，动物是最抽象和最纯正的思维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23 页）了。现代资产阶级的语义哲学，把语言看作是主观任意确定的、不表达思维、不反映客观内容的符号。他们认为，

只要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名词去掉，世界上的阶级斗争也就不存在了。这种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不过是反映了资产阶级自欺欺人、腐朽没落、垂死挣扎而已。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

也叫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关于认识的来源、内容、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科学理论。它是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基础上，在同唯心主义认识论的斗争中，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进一步加以发展的。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一个是它的阶级性，公然申明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再一个是它的实践性，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唯物地辩证地解决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彻底贯彻从物质到意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坚持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的原理。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强调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依赖关系。它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生产斗争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在阶级社会里，各阶级成员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因此人的认识主要依赖于生产活动，并通过生产活动逐渐了解自然界，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了解人和人的关系。这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人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证明。马克思主义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认为客观世界是辩证运动的，人的认识也是辩证发展的，即是由不知到知、由片面到全面、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人们的认识在实践的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而后一个飞跃比起前一个飞跃意义更加伟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即实践论。它认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毛主席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

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一切修正主义者总是竭力歪曲、篡改、攻击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以唯心论的先验论来冒充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可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同唯心论的先验论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毛主席说：“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如果我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不了解人的思想、意见、政策、方针、计划、结论、大块的文章，滔滔不绝的演说是从哪里来的，不理解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这样就往往会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分不清是非，甚至上当受骗。因此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搞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伟大义务。

认识论

关于认识的来源、内容、发展过程及其规律的哲学学说。在哲学史上，几千年来围绕着人的认识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问题，展开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唯心主义认识论从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基本前提出发，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否认人们的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这是一条从意识到物质的错误的认识路线。唯心主义认识论中有一派是客观唯心主义者，他们把认识看作是天上掉下来的，认为世界是精神的，不是物质的。这种“精神”，中国的朱熹称为“理”，德国的黑格尔称为“绝对精神”，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称为“天主”。他们胡说人的认识是由“理”、“绝对精神”或“天主”给的；“圣人”、“天才”是“理”、“绝对精神”的体现者，或者是由“天主”决定的、另一派是主观唯心主义者，他们把认识看作是人

的头脑里固有的，认为客观世界只是人的感觉、观念的产物。中国的孟轲说“万物皆备于我”，英国的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奥地利的马赫说物体就是“感觉的复合”。一句话，他们都把认识看成是主观自生的。刘少奇鼓吹先知先觉，林彪宣扬天才论，这都是否认认识来源于实践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另外，英国的休谟和德国的康德，否认人们可以认识世界或可以彻底认识世界，这是一种不可知论。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都不能正确解决认识世界的问题。

唯物主义认识论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基本原则出发，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是可以认识的，人们的认识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是一条从物质到意识的正确的认识路线。中国的公孙龙说：“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夫名，实谓也。”认为天地和它所产生的东西都是物，即实际事物；“名”，即认识是对“实”的称呼、反映。荀况认为：“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人具有认识客观事物的能力，客观事物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法国的狄德罗说：“物质是我们感觉的普遍原因”。唯物主义认识论也就是反映论，承认还是否认反映论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重要区别。

旧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在古代是朴素的自发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发展到近代成为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由于它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不能了解实践对认识的决定作用和认识过程的辩证法，因此，它们的认识论是直观的消极的反映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才是唯一正确的认识论。它坚持从物到意识的认识路线，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认为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这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科学地全面地解决了认识论中一系列根本问题，克服了旧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性，彻底驳斥了唯心主义认识论和不可知论，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次大革命。

主观和客观

主观指人们的认识 and 思想；同主观相对的是客观，即被认识的对象。客观是不依赖于主观而独立存在的，是主观的来源；主观是客观的反映。在一定条件下主观又能动地反作用于客观，对客观起着决定的

作用。

客观事物总是作为过程向前发展的。任何一个过程都由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相互斗争而得到发展。人的主观反映客观也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曲折、复杂的。在革命实践中，主观同客观有时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其中有阶级的和认识的原因，如站在错误的立场上，用绝对化、简单化的方法，片面和表面地去认识客观事物，就会使主观认识和客观实际情况不相符合。要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只有在反复的实践中，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周密思索，掌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才能逐步使主观符合客观，实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毛主席说：“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203 页）

唯心主义认为主观决定客观，它夸大主观的作用，颠倒主观和客观的关系；形而上学认为主观不能反作用于客观，抹杀主观的能动作用。修正主义、机会主义都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历史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落后于客观事物的发展，企图把历史车轮拉向后退；历史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超过了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甚至把幻想当真理，把可能当现实，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叛徒林彪鼓吹“从思想的形成过程来说，是从客观到主观”，“从办事情的过程来说，倒过来，是从主观到客观”。他完全否认了人们认识客观事物必须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把密切相联的思想形成过程和办事情的过程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种“倒过来”的哲学，是典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主体和客体

认识论的一对范畴。主体指人或人的思想。客体指人的实践和认识的对象，它是不依赖于主体而存在着、并能为主体所反映的客观实际。

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上，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展开了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唯物主义承认‘自在客体’或心外客体，认为观念和感觉是这些客体的复写或反映。与此相反的学说（唯心主义）认为：客体不存在于‘心外’；客体是‘感觉的组合’。”（《列宁选集》第二卷 20 页）唯心主义从意识到物的认识路线出发，认为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主体产生客体，客体依赖于主体。马赫主义把物这个客体看作是由感觉这个主体产生的，即是感觉的复合，认为主体和客体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它以“结合”为幌子，把客体“结合”到主体（感觉的复合）中去，以此否定客体对主体的决定作用。旧唯物主义从物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出发，认为客体决定主体，主体依赖于客体，没有客体就没有主体；但它把主体仅仅看成是消极的被动的，不了解主体对客体的反作用。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又辩证地看待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它认为客体决定主体，主体对客体又起着反作用。主体同客体组成一对矛盾。主体作为矛盾的一方，不是消极、被动地适应客体，而是把客体作为自己活动的对象，通过实践，能动地影响和改造客体。在改造客体的同时，也不断改造主体自己。主体不仅指个人，也指集体。人民群众、阶级、政党是实践的主体，也是认识的主体。主体的实践和认识是不断发展的。如无产阶级在初期是一个自在阶级，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还不认识；以后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经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用以教育无产阶级，这样就使无产阶级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时就成为自为阶级。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发展，有力地推动了人类社会这个客体的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主体和客体的观点，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彻底驳斥了唯心主义。

知行统一观

关于认识和实践统一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唯物地辩证地阐述了知（认识）和行（实践）统一的原理，认为行是知的基础。要得到知，必

须亲自参加行，没有行就没有知。但人们不可能事事都直接去行，还需要间接的经验，这就是一切古代的和外域的知识。这些知识归根结底也是古人和外人从行中得来的。一切真知都发源于行，随着行的发展而发展。行是知的目的，又是检验是否真知的标准。人们通过行开始得到的是感性知识，感性知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物质变为精神，得到理性知识。这种理性知识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认识，反过来可以指导行，使精神变为物质，这是认识过程中一个更重要的飞跃。毛主席说：“**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致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

唯心主义从意识到物的认识路线出发，认为知是行的基础，行是知的表现，没有知就没有行。中国南宋唯心主义者陆九渊提出“知先行后”。明朝唯心主义者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认为知和行是一件事，都由主观的心产生，知的时候就是行了，行本身就是知的体现。他说：“只说一个知，己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己自有知在。”“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这种用知来代替行、排斥行的谬论，是唯心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旧唯物主义在知行的关系问题上，坚持了从物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先秦唯物主义者荀况说：“知之不若行之”，“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有了知识不去实行，知识虽多也没有用处。清初唯物主义者王夫之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行可以得到知，而知不能离开行。由于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旧唯物主义不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他们把行看作是个人的行为，不是看作社会实践，不了解知对行的反作用，因此对于知行的统一问题，不能给予正确的科学的解决。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知行统一观，既彻底地批驳了唯心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又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知行统一观上的局限性，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全面地解决了知行的统一问题。

马克思主义知行统一观，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在于说明世界，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它要求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改造世界的

斗争中，做到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者右的错误思想。

思想路线

也叫认识路线，指人们在认识上所遵循的方向和道路。对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就形成了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一条是从物质到意识的唯物主义思想路线，另一条是从意识到物质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与此同时，还交织着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正确的思想路线，如实地反映着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错误的思想路线，歪曲地反映着客观现实。

思想路线的斗争，在阶级社会里反映着敌对阶级之间的根本利害冲突，是阶级斗争的表现。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也是思想路线上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反映着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代表进步阶级的正确思想路线是在同代表保守、反动阶级错误思想路线的激烈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决定了思想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由于仍然存在着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而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的两条思想路线的斗争依然存在。

思想路线是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思想路线的斗争往往是政治路线斗争的先导，又是政治路线斗争的反映，并且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林彪反党集团鼓吹的天才论，贯彻的是一条从意识到物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这条路线就是为他们在政治上反党篡政的反革命活动服务的。

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我们要在实践中，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为指导，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思想路线归根结底是一个世界观问题。批林批孔和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

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也是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观、进行反修防修的重大措施。我们要在这场斗争中，不断提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觉悟，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加强对主观世界的改造。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恩格斯说：“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21 页）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哲学的基本问题之一，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分为可知论和不可知论。主张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称为不可知论，主要代表是休谟和康德。大多数哲学家肯定思维和存在有着同一性，但其中存在着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分歧。唯心主义主张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以思维第一性、存在第二性为基础的，它同唯物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主张是根本对立的。旧唯物主义从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原则出发，承认思维能反映存在，两者有一致的关系，但它不懂得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不懂得思维和存在的辩证关系，把思维看作只是对存在的消极的直观反映，这是形而上学地理解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存在第一性、思维第二性的原则，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认为思维和存在是对立的统一，即思维和存在在时间基础上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毛主席说：“一切矛盾着的東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矛盾论》）思维和存在这对矛盾同一切矛盾一样，他们相互依存，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因此，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科学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

同一性的问题。

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拼命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思维和存在同一性的原理。伯恩斯坦公开反对这个原理，把它歪曲成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等同论。刘少奇及其在哲学界的代理人杨献珍抛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反动谬论，胡说“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唯心主义”；林彪又变换手法，鼓吹“思想可以代替物质”、“超过物质”；他们都反对把革命的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否认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否认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原理，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

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光辉哲学著作，精辟地阐明了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这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伟大真理，这是批判一切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锐利武器。

世界可知性

指客观世界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这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即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肯定回答。

在哲学史上，存在着关于世界是否可知的斗争。不可知论者休谟和康德声称，世界是不可知的。然而绝大多数哲学家都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但其中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的分歧。唯心主义由于从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错误观点出发，虽然承认世界是可知的，但是不能真正解决认识世界的问题。如黑格尔把客观世界当成绝对精神的产物，他所说的世界可知性，实际上只是指绝对精神的可知。旧唯物主义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观点出发，承认物质世界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是可以被人们认识的，认识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它唯物地解决了世界可知性的问题；但由于它不懂得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不懂得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把认识看作只是对客观世界直观、消极的反映，仍然不能真正解决认识世界的问题。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认为客观世界不是不可捉摸的，在反映和被反映之间没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思维和存在有着同一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存在是思维的来源。实践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基础，也是检验世界可知性的标准。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上没有不可知的事物，只有已经认识的事物和尚未认识的事物之间的差别。过去没有认识的，现在可以被人们认识，现在尚未认识的，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将来可以被人们认识。每一次革命斗争的胜利和科学技术的发明，都充分证实世界及其规律是可知的。比如过去人们并不认识从煤焦油中提炼茜素，随着实践的深入发展，人们不仅从煤焦油中提炼出茜素，还提炼出合成纤维、合成橡胶和塑料等化学工业原料。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世界可知性的观点，是无产阶级与革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它彻底驳斥了不可知论，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可知论，又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可知论的局限性。

唯物论的反映论

唯物论的认识论的基本观点，同唯心论的先验论相对立。它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出发，认为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一切唯物论的认识论都是反映论。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不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不了解认识的辩证法，把认识看作是照相式的机械的反映，这是一种消极、直观的反应论。它不能科学地解决认识论的问题，也不能彻底粉碎唯心论的认识论和不可知论。

我们通常讲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指的是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它不仅肯定物质决定意识，而且肯定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它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并从人的社会性，从人的历史发展来考察认识问

题，强调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它认为人们在实践基础上，不仅能反映客观世界的表面现象，而且能深入地正确地反映客观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客观世界是复杂的矛盾运动的过程，因而反映这个过程的人的思想，也是复杂的、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的运动。列宁说：

“自然界在人的思想中反映，应当了解为不是‘僵死的’，不是‘抽象的’，不是没有运动的，不是没有矛盾的，而是处在运动的永恒过程中，处在矛盾的产生和解决的永恒过程中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08页）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认识是一个辩证的发展过程，经历着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能动的飞跃，又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能动的飞跃，即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的两个飞跃过程。实践是认识的来源，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改造客观世界，同时改造主观世界，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既坚持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又坚持了认识论的辩证法，克服了旧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局限性。

唯物论的反映论是同唯心论的先验论根本对立的。叛徒、卖国贼林彪鼓吹反动的天才论，竭力以唯心论的先验论来冒充唯物论的反映论，妄图篡改党的理论基础，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还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人的知识、才能是后天才有的，还是先天就有的，这个认识论的根本问题，是几千年来两条认识路线斗争的主要内容。这个斗争到今天还在继续，它是政治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路线同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反映。我们必须坚持辩证唯物论的反映论，彻底批判唯心论的先验论。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灵魂，指人们在实践过程中能动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它区别于旧唯物主义的反映论。旧唯物主义不懂得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不懂得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把人看成是

脱离社会的超阶级的生物学上的人，把人的认识看作象照镜子一样，消极、直观地反映客观世界；更不懂得认识的根本任务是能动地改造世界。它是一种消极、直观地反映论。在哲学史上，唯心主义曾经对认识的能动的方面有所发展，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6 页）

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它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实践的观点，把实践的观点作为反映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认为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过程，就是人们发挥主观能动作用，积极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它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不仅指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且肯定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能动的反作用。人们的认识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由现象到本质，由感性到理性，由低级到高级的不断深入地辩证发展过程。人们得到正确认识后，又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主观世界。社会实践是无穷尽的，人们对事物能动的反映和改造过程也是无止境的。毛主席指出：“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24-625 页）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彻底地否定了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

唯心论的先验论

同唯物论的反映论相对立的一种唯心论的认识论，是剥削阶级的反动哲学。它把人的知识，才能说成是先于客观事物、先于实践经验，是先天就有的，根本否认认识是对客观事物的反映，否认认识来源于实践。唯心论的先验论早就有了，如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孔丘说，圣人是“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轲说，“不虑而知者，其

良知也”，“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良知良能，就是先知先觉）。古代希腊的柏拉图认为，灵魂是不死的，知识是人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哲学家康德，公开宣称自己的哲学是“先验的唯心主义”，认为决定知识的先验范畴是“理智中先天赋有的”。在哲学史上，唯心论的先验论有两种：一种是客观唯心论的先验论，认为人的思想是天上掉下来的；另一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认为人的思想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它们鼓吹的都是一条从意识到物质的认识路线。

一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总是利用唯心论的先验论来攻击马克思主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江湖骗子杜林公开宣扬唯心论的先验论，猖狂进攻马克思主义。恩格斯写的《反杜林论》，彻底粉碎了杜林的进攻，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屁股后面，叫嚷要“回到康德那里去”，妄图用康德的哲学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二十世纪初，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等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给予彻底的痛斥。刘少奇宣扬“头脑制造法则”，林彪鼓吹反动的天才论，他们都以唯心论的先验论作为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根据，向马克思主义猖狂进攻，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

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几千年来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问题。在现代，它反映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也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毛主席的《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光辉哲学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从政治、思想、理论上彻底揭露和批判了唯心论的先验论，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罪恶阴谋，在斗争中进一步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天才论

主张知识才能先天就有、历史是由英雄创造的反动谬论。天才论的哲学基础是唯心论的先验论。它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是先于感觉、先

于经验，是上帝赋予的或是人脑里固有的。天才论在社会历史观上，就是英雄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把历史看作是由英雄人物凭主观意志随意创造的。人的知识才能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这是几千年来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从物到意识的认识路线出发，认为人的知识才能是属于认识范畴，人的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没有客观就没有主观，认识是后天才有的，不是先天就有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脑中固有的。认识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社会实践是千百万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革命活动。没有实践，没有千百万劳动群众的实践，就没有知识才能。离开实践的天才是根本没有的。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或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因此，坚持实践的观点同承认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

天才论历来是剥削阶级维护和巩固反动统治的思想工具。我国先秦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孔丘，为了“克己复礼”，挽救和复辟奴隶制，宣扬天才是“生而知之”的，自称“天生德予余”。叛徒、卖国贼林彪也竭力鼓吹天才论，叫嚷什么“天赋天才”，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无耻地标榜他是应当统治人民的所谓“天才”人物。天才论是林彪篡党夺权的反动理论纲领，是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工具。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反动的天才论曾经作过严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一八五零年就指出，天才论是要“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307 页）这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天才论的反动实质。毛主席的《实践论》也是对天才论最有力的批判。毛主席在同林彪一类骗子的天才论的斗争中，戳穿了他们的谣言和诡辩，揭露了他们反党篡权的反革命阴谋，进一步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内省的经验论

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一切知识只是由人的纯粹主观的内省体验（人的心灵活动）产生的，否认经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主要代表有贝克莱、休谟、马赫、阿芬那留斯等。如马赫认为，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感觉，经验不过是感觉的复合而已；阿芬那留斯认为，经验是心理的东西，经验同客观世界毫无关系，是纯粹心理活动的体验。内省经验论者用人的心理活动即内省体验来解释经验，否认客观世界是经验的来源和内容，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和认识的实践性，目的是宣扬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路线，为反动阶级服务。

辩证唯物主义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认为内省经验是没有的，经验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对事物认识的总结，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获得并表现出来的。生产经验是从生产实践中产生的，阶级斗争经验是在阶级斗争实践中得来的。物质世界和社会实践是经验的基础，脱离物质和实践的内省经验论是完全错误的。

不可知论

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它否认人们认识世界或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这是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一种学说。不可知论的思想，早在古希腊皮浪的哲学中就存在。哲学史上不可知论的著名代表，有英国的休谟和德国的康德。休谟认为认识不能超出感觉，感觉以外的客观世界是不是存在，是无法知道的。康德认为人的意识之外存在着“自在之物”，但又认为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休谟和康德的差别只是表面的，他们的共同点，都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不可知论者路线的本质，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就是他不超出感觉，他停留在现象的此岸，不承认在感觉的界限之外有任何‘确实可靠的’东西。关于这些物本身……，我们是根本不能确实知道的，这就是不可知论者的十分肯定的声明。”（《列宁选集》第二卷 105 页）

不可知论妄图回避物质和意识谁是第一性这个哲学基本问题，调

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抹杀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实际上它否认感觉之外存在客观世界，把感觉同物质分离开来，否认客观实在，就是在唯心主义地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不可知论把认识局限于感觉，这样，感觉成了隔离认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不可知论认为人们只能认识现象，可是客观事物的现象和本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脱离本质的现象，也没有脱离现象的本质，人们在实践中可以透过现象认识本质。不可知论割裂了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实质上否定了认识的辩证法。

不可知论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极为流行，如马赫主义、实用主义鼓吹世界是不可认识的，认为人们只能认识“感觉”或经验，否认社会发展的规律，否认社会实践的作用，以此来麻痹和愚弄人民。这说明不可知论是剥削阶级的反动工具。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等都曾经批判过不可知论，特别是黑格尔在唯心主义的范围内揭过不可知论的老底。但是他们由于唯心主义或形而上学的局限性，不可能彻底驳倒不可知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才能彻底驳倒了不可知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不存在不可知的事物；只有已经认识和尚未认识的事物之间的差别。过去未被认识的，现在已被人们认识；现在尚未认识的，随着实践的发展，将来可以被人们认识。实践是人们认识的基础，也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所谓路线斗争不可知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是错误的。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特别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可知论，反对不可知论，这对区分什么是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用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怀疑论

对人们认识客观世界和客观真理表示怀疑的一种哲学学说。怀疑论把怀疑作为认识一切事物的原则。

怀疑论在哲学史上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古希腊怀疑论的创始人是皮浪，他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事物是不是存在也是不能知道的，因此

知识是不可靠的。他主张对事物不作任何判断，对现实生活不要关心，这样可以避免一切纠纷，保持安静生活。这反映了古希腊没落奴隶主阶级垂死绝望的思想，说明他们面对无法解决的现实矛盾，只能苟安偷生、得过且过。蒙田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怀疑论的代表人物。他是一个有神论者，但他从资产阶级个性自由原则出发，对中世纪经院哲学抱怀疑态度，认为经院哲学是混乱不堪的，内容是彼此矛盾的，其中没有确实可靠的东西。这种观点在反对经院哲学和封建蒙昧主义斗争中，起过一定作用，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但它的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毕竟是唯心主义的东西。笛卡尔是十七世纪怀疑论的主要代表。他主张对任何事物都要怀疑，唯独对“我思故我在”是不容怀疑的。到了十八世纪，怀疑论以不可知论的形式出现，主要代表有英国的休谟和德国的康德。休谟认为，认识只能来源于感觉，感觉来源于什么是不知道的。康德承认意识之外存在着自在之物，但又认为人们只能认识现象，不能认识自在之物。休谟和康德都把认识停留在感觉和现象上，都怀疑人们可以认识客观事物的本质，实际上是怀疑客观世界的存在。十七、十八世纪的怀疑论，从笛卡尔的重视理性到休谟、康德的贬低理性，为宗教信仰开辟地盘，更加暴露了资产阶级的妥协性。怀疑论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广泛流行，如马赫主义、实证主义等都在继续散布怀疑论思想。

怀疑论在现代是极端反动的，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思想工具。林彪一类骗子利用怀疑论，竭力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以此制造混乱，搞混阵线，干扰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一切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在实践面前都是站不住脚的。恩格斯说：“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21 页）

感觉论

也叫感觉主义。它认为人的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感觉论从感觉出发，可以走向唯心主义，也可以走向唯物主义，关键在于对哲学基

本问题如何回答。唯心主义感觉论从意识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观点出发，认为认识的来源只是感觉，除此而外，就什么也不存在或什么也不知道了。如贝克莱说：“存在就是被感知”，物体只不过是感觉的组合。休谟说：“人心中从来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知觉”，并且无论如何也不会获得有关知觉和客体的关系的任何经验。马赫主义认为，感觉是世界上万事万物的基础，客观事物是“感觉的复合”，只有感觉才能被设想为存在着的東西。唯心主义的感觉论，把感觉看作主观自生的，否认感觉反映的内容是客观世界，这完全是一条从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列宁说：“**唯心主义哲学的诡辩就在于：它把感觉不是看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看作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像，而是看作‘唯一的存在’。**”（《列宁选集》第二卷 46 页）

唯物主义感觉论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观点出发，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认识的来源是感觉，感觉是物质的反映，物质是感觉的本原。如古希腊的伊壁鸠鲁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感觉是认识的来源，错误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感觉的错误解释和判断造成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狄德罗认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感觉是我们一切知识的源泉”。拉美特利说：物质是我们感觉的普遍原因，“除了感官以外，再没有更可靠的向导”。如果想认识真理，就必须从感觉开始。唯物主义感觉论承认感觉来源于客观世界，这是贯彻了从物到意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但旧唯物主义者承认感觉是客观事物的反映的同时，却把感觉作为认识的全过程。它不懂得感觉只是事物表面、片面和不完全的反映，是没有反映事物本质的，不懂得感性认识必须上升为理性认识，不懂得认识过程的历史性和辩证法，因为不能建立起科学的认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这些问题，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了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由感性认识到论理认识的推移的运动**”。（《实践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开始于经验，离开感觉经验人们就不可能产生认识。但是，认识不能停留在感觉经验，认识有待于深化，即由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这样才能反映事物的本质。所以说：“**这种基于实践的由浅入深的辩证唯物论的关**

于认识发展过程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是没有一个人这样解决过的”。（《实践论》）

经验主义

也叫经验论。它认为感性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片面地夸大经验的作用，以为只有感性认识可靠，而理性认识是靠不住的。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分为两种不同的经验论，即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唯心主义经验论。在欧洲哲学史上，唯物主义经验论的主要代表有培根、霍布斯、洛克、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他们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物质，经验的内容是客观物质世界，一切知识都由经验产生。唯心主义经验论的主要代表有贝克莱、休谟、康德等人。他们所说的经验都是主观自生的，否认客观物质世界是经验的来源和内容，从而否认世界的物质性。马赫主义者鼓吹心理经验决定物理经验，把经验看作是纯粹主观的东西，说它是世界的本质，这完全是贝克莱唯心主义经验论的翻版。马赫主义者利用经验这个字眼，耍弄花招，贩卖唯心主义黑货。在现代资产阶级哲学中，唯心主义经验论的流毒较广，如实用主义、逻辑实证主义等，都属于这一流派，是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服务的反动工具。

唯物主义经验论，在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斗争中，起过积极的作用。但它对经验的了解是狭隘的，不懂得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内在联系，不懂得认识依赖于实践和认识的历史性、辩证性，因此，它在认识论的全体上是错误的。

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形式，它和教条主义一样，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是很大的，它使人们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革命队伍中的经验主义者，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中，往往不能及时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容易上当受骗，甚至成为机会主义的俘虏。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毛主席说：“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

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776-777 页）一切革命者都要自觉地避免和克服经验主义。

唯理论

也叫理性主义，是一种片面夸大理性认识作用的学说。它不承认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基础，认为只有理性认识靠得住，只承认理性的实在性，不承认经验的实在性。毛主席说：“**这一派的错误在于颠倒了事实。**”并进一步指出：“**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实践论》）由于对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分为两种不同的唯理论，即唯物主义唯理论和唯心主义唯理论。在欧洲哲学史上，唯心主义唯理论的主要代表有笛卡尔、莱布尼茨、黑格尔等。他们把理性作为世界的本原，或者认为理性是离开感性而独立存在的。唯心主义唯理论颠倒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客观事实。

斯宾诺莎是唯物主义唯理论的主要代表。他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则出发，承认理性认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这是正确的。但他认为感性认识是不可靠的，只有理性认识才能正确认识世界，这就夸大了理性认识的作用，不懂得认识的历史性、辩证性，不懂得理性的东西之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来源于感性。因此，唯物主义唯理论只有部分的真理，在认识论的全体上是错误的。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从物到意识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正确地阐明了认识和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既彻底地揭穿了唯心主义唯理论的错误实质，又克服了唯物主义唯理论的片面性。

社会实践

人类社会活动的总称，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实践。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实践也就是阶级实践，三大实践都是阶级的实践。离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对一切社会实践活动就不可能作

出正确的说明。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都是社会的人所参加的，离开人类的社会实践，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自然也就更谈不上有人的认识了。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就是不懂得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社会实践，它是决定人类的一切活动的基础，因而也是人的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但是，人的社会实践，不限于生产活动一种形式，还有多种其他的形式，如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的活动等，都是人的社会活动形式。自从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在任何阶级社会里都居于主导地位，是一切活动和斗争的纲。因此，阶级斗争的实践对人的认识的发展具有深刻的影响。

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离开了社会实践即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就失去判断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例外。毛主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也不但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科学地构成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革命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实践所证实的时候。”（《实践论》）所以说，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

毛主席在《实践论》和《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等著作中，深刻地阐明了社会实践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重要意义，反复强调实践出真知，真正亲知的是天下实践着的人，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毛主席把实践性明确地规定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辩证唯物论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毛主席又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是极其重要的发展。

林彪反党集团拼命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和反动的天才史观，反对

社会实践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决定作用，否认人民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结果彻底垮台。这说明一切反对革命实践，站在人民群众反面的反动派，都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实践和认识

实践是人们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认识是人们通过实践对客观事物的反映，两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依赖于实践。人们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人的正确认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里固有的，只能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从根本上说，要认识就要实践，没有实践就没有认识。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认识必须为实践服务。毛主席说：“**抓着了世界的规律性的认识，必须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实践论》）实践也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实践的发展推动着认识的发展。实践经历着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人们的认识也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认识依赖于实践，又反作用于实践。人们在实践中得到的认识，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把它再回到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去，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广大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实践的主体是工农群众，群众的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党的路线和政策来自群众的实践，又指导群众的实践，并在群众实践中得到检验、实现和发展。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在阶级社会里，实践和认识是受着阶级性制约的。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人们对于社会历史只能限于片面地了解，这一方面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一方面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只是到了伴随大工业而出现了近代无产阶级时，才能有对社会历史的发展做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社会的认识变成

了科学。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哲学，都没有正确地解决实践和认识的关系。辩证唯物主义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唯物地而且辩证地指出认识的深化运动，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毛主席在《实践论》中对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做了全面地阐述，“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毛主席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中，又提出了“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的著名论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一切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特征，都是主观和客观相分裂，认识和实践相脱离。我们必须彻底批判这些错误思想。林彪反党集团宣扬天才论，把人的认识归结为天赋，否认实践的决定作用，抹杀认识来源于实践，这是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是为其篡党夺权，建立法西斯王朝的阴谋服务的。

感性认识

相对于理性认识而言，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事物表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认识，即感觉和印象的阶段。毛主席说：“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感觉、知觉、印象等都是感性认识的形式。感性认识的特点，是对客观事物具体、生动、形象、直接的反映。

感性认识在认识中有着重要作用。人们的认识过程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任何知识的来源，在于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感性认识是认识的第一步，没有这个第一步，就没有以后的第二步，就不可能有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是依赖于感性认识的，理性的东

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但是感性认识是客观事物表面的、现象的、外部联系的认识，是不完全、不深刻的认识，还没有反映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性。如人们通过感觉器官只能认识白天黑夜的交替，星辰位置的变化，却不能把握天体运行的规律。毛主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实践论》）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而到达于思维，到达于逐步了解客观事物的内部矛盾，了解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间的内部联系，即到达于理性认识的阶段。如果满足于感性认识，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因此，有了感性认识，还必须把它上升到理性认识。否认感性认识，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否认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都是否认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是错误的。

理性认识

相对于感性认识而言，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全体、内部联系的认识。人们开始得到的是感性认识。毛主席说：“**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概念、判断、推理等都是理性认识的形式。理性认识的特点，是对客观事物抽象、概括、间接的反映。

理性认识是由感性认识发展而来的。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一方面必须在实践过程中，掌握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的感性材料，这样，才能充分地真实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另一方面，为了使实践中得到的感性材料上升到理性认识，还必须经过头脑这个加工厂的思考加工，即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去粗取精、如同沙里淘金；去伪存真，就是对材料鉴别，分清真假；由此及彼，就是把握事物的内在联系；由表及里，就是透过现象看到本质。通过这种改造制作工夫，才能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理性认识在认识中有着重要作用。认识的真正任务，是由感觉到达思维，由感性到达理性，由现象进到本质。感性认识只是属于事物的片面、现象和外部联系的东西；理性认识则推进了一步，到达了能够认识事物的全体、本质和内部的联系、到达了暴露周围世界的内在的矛盾，因而能在周围世界的总体上，在周围世界一切方面的内部联系上去把握周围世界的发展。理性认识比之感性认识，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理性认识是对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的抽象和概括。这种在实践基础上的科学抽象，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它在实践中可以指导人们的行动。因此，理性认识是人们认识过程的高级阶段。

从人们整个认识运动来说，到了理性认识阶段，认识运动并没有完结，而只是完成了非十分重要的一半。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更重要的还在于人的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这一个飞跃。这是由于理性认识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是否可靠，它本身是不能证明的。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把理性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从认识的目的来说，不仅在于说明世界，更重要的是拿了对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认为理性认识可以不从感性认识得来，或片面夸大理性认识作用，认为它可以不受实践检验并指导实践，这都是违背认识论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是错误的。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

也叫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物质变精神，是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飞跃，指人们在实践中，无数客观外界的事物，通过眼、耳、鼻、舌、身等感官反映到头脑中来，经过多次反复，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阶段，即由物质到精神、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精神变物质，是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飞跃，指把第一阶段得到的认识再回到实践中去，看这些精神、思想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地说，成功的就是正确的，失败的就是错误的。有时有些失败并不是由于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所

以暂时失败了，但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精神变物质，这是认识过程的第二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由思想到存在的阶段。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统一的，是相互联系，相互转化的。第一个飞跃实现了从物质到精神的转化，在认识过程中有着重要意义。人们认识的真正任务，在于经过感觉到达理性认识，了解事物的规律性。但它是否正确反映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没有得到证明。精神变物质，这是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考验后产生的飞跃，比前一次飞跃，意义更加伟大。因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别无其他目的。精神、思想、理论只有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才能得到检验、修改、补充和发展，此外别无其他办法。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基础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使客观物质变成主观精神，也只有通过实践，才能使精神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的认识运动，经历了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两个阶段，算是完成了，又没有完成。在实践中由于客观过程的反映和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使得人们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由理性认识即思想、理论变成或大体上变为事实时，对某一事物一定阶段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一般说来，由于受着主观和客观条件的限制，实践和认识往往要经过多次反复，才能在实践中得到预想的结果。同时，由于事物和实践的不断发展，认识也必然随着发展。因此，从过程的发展说，人们的认识运动又是没有完成的。毛主席说：“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那里来的？》）

毛主席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对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精辟阐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重大发展。阶级敌人对这个原理总是进行恶毒攻击。刘少奇、杨献珍抛出所谓“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的谬论，认为精神不能变物质，胡说“精神变物质是唯心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同时又认

为，精神对物质有着反作用，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着反作用，甚至在一定条件下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不但不是什么唯心主义，恰恰相反，正是避免了机械论，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证明，并将继续证明，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原理，是千真万确的普遍真理，它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理论武器。

经验

也叫“感觉经验”，属于感性认识。它是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人的脑子里所形成的感觉、印象的东西。也就是人们亲身从社会实践中直接获得的关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第一手材料。毛主席说：“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实践论》）这句话阐明了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原理。人们如果只看重书本知识而忽视亲身参加实践的经验，就不可能达到真知，难免要犯教条主义的错误。但是，直接的感觉经验，在知识发展的过程中，还只属于感性阶段。所以毛主席又说：“有工作经验的人，要向理论方面学习，要认真读书，然后才可以使经验带上条理性、综合性、上升成为理论，然后才可以不把局部经验误认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776-777 页）因此，感性认识有待于上升到理性认识。如果片面地夸大了经验的重要性，贬低理论的重要性，那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总之，贬低经验的作用或片面地夸大经验的作用，都是违背辩证法的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

在对经验这个概念的理解上，从来就存在着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在经验问题上，除了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之间的斗争外，还存在着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斗争。列宁说：“我们从哲学史中知道，对经验概念的解释，使古典的唯物主义者 and 古典的唯心主义者划分开来了。”（《列宁全集》第二卷 149 页）例如英国的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和不可知论者休谟等人，都是打着“感觉经验”的旗号向唯物主义进攻的。而他们所谓的“经验”，不是人对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人的头脑

中主观自生的东西。并且在贝克莱看来，“经验”还是上帝安排在人的心灵中的。又如马赫主义者利用“经验”一词，挂出了“经验批判主义”、“纯粹经验哲学”、“经验一元论”、“经验符号论”等五花八门的招牌，同时又挖空心思造出了什么“感觉的复合”、“世界要素”、“心理经验”、“物理经验”等一系列冒充科学的新名词，用来代替物质，取消经验的客观内容，贩卖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破烂货色。尤其是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之流，更妄图用他的伪科学来“修正”马克思主义。列宁指出：“马赫主义者用来作为其体系的基础的‘经验’一词，老早就在掩蔽各种唯心主义体系了”（《列宁选集》第二卷 151 页），又说：“目前，各色各样的教授哲学都以侈谈‘经验’来掩饰它们的反动性。”（《列宁选集》第二卷 149 页）

“经验”一词，在日常用语中，有时也指理性认识。例如，上升成为理性认识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便和“感觉经验”不是一回事。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

直接经验指人们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所获得的知识，间接经验指别人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所获得的知识，包括古今中外别人的知识。毛主席说：“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而且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说来，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实践论》）人们要正确认识客观事物，首先必须重视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取得直接经验。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革命的理论和方法，你就得参加革命。否认直接经验，否认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就不是一个唯物论者，也就不能得到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但一个人不可能事事直接经验，即使他的经验再丰富也是有限的，事实上多数的知识来自间接经验。因此，我们在认识和改造世界中，既要注意利用自己的直接经验，也要注意利用别人的间接经验。对待别人的经验，既要虚心学习，又要分析研究，不要生搬硬套。对于正面经验要认真对待，吸取有益的东西；对反面经验也要

善于总结，引以为戒。学习别人的经验，也不能离开自己的实践，只有以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为基础，才能真正理解和判断间接经验，从而正确吸取别人的经验，避免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以自己的直接经验为基础，并不是别人的经验不重要，如果古人、他人在获得直接经验时，是科学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这些知识就是可靠的，就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充分重视直接经验而又不忽视间接经验，并把两者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比较完全的知识，做到把别人的经验变为自己的东西。外国的经验，古人的经验，对我们来说，都是间接经验。为了吸取其有益的东西，必须遵循“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只强调直接经验而否认间接经验，或者只强调间接经验而否认直接经验，都是错误的。

感觉

客观事物表面的个别特性通过感觉器官在人的脑中的直接反映。感觉是物质作用于人们的感官引起的。如一面红旗，当人们看到它时即有红颜色的感觉。同人的眼、耳、鼻、舌、身五个官能相应的感觉，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每种感觉器官都分工执行不同的反映职能，如眼睛管看，耳朵管听，等等。人的感觉是人类在长期社会生产劳动实践中产生、发展起来的，与动物的感觉有着根本的区别。人们的实践越丰富，对事物的感觉也就越敏锐。感觉是人们认识事物的第一步，是感性认识的一种形式，为思维提供认识材料。任何知识都离不开人的肉体感官对客观外界的感觉。否认知识来源于感觉，必然导致否认直接经验，否认亲自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就不是唯物主义者。

在感觉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唯心主义走的是一条从感觉到物质的认识路线，否认感觉来源于客观物质世界，例如马赫主义认为“物体是感觉的复合”，把整个物质世界看成是“我的感觉”，显然是荒谬的。唯物主义走的是一条从物质到感觉的认识路线，认为客观物质世界是感觉的本原，感觉只是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这是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

对事物的感觉是认识的开始，没有感觉就没有认识，但感觉有它的局限性。毛主席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感觉只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解决本质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实践论》）因此，我们不能停留在感觉阶段，而要在感觉的基础上使认识不断深化，使感性认识发展到理性认识。

知觉

人们对客观事物表面的各个特性综合的直接反映。如一面用布做的红旗，有红的颜色、长方形状、软的布料等特性。人们对这面红旗这些特性综合的直接反映，就是知觉。知觉是比感觉进一步的感性认识。感觉只反映事物表面的个别的特性，知觉则反映事物表面的各个特性的总和及其外在联系。人们的知觉是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丰富、发展，并受实践的检验。知觉、感觉和表象都是感性认识，有着局限性。有了对事物的知觉，还必须在实践基础上不断深化、提高，上升到理性认识。

表象

客观事物的现象在人脑中再现的形象。如人们离开北京后脑海中重现的雄伟的天安门；老工人回忆旧社会生活时头脑中出现的地主、资本家凶狠的面目，这都叫表象。表象来源于客观事物，是客观事物的反映。列宁说：“恩格斯在他的全部论述中总是把‘感性表象’解释为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的映像”。（《列宁全集》第二卷 112 页）实践是表象的基础，又是检验表象的标准。表象还没有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列宁说：“表象不能把握整个运动，例如它不能把握秒速为 30 万公里的运动，而思维则能够把握而且应当把握。”（《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246 页）有了对客观事物表象的认识（即感性认识），还有待于把它提高到理性认识上去。

映像

也叫模写，是客观事物的现象在人脑中的反映。映像作为反映形式是主观的，而反映的内容是客观的。没有客观就没有主观，没有被反映者就没有映像。实践既是映像的基础，又是检验映像的标准。人们的**感觉、知觉和意识**等都是客观世界的映像。唯心主义从感觉到物的错误认识路线出发，否认人们的**感觉、知觉和意识**是客观世界的映像。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揭露和批判了这种谬论。他说：“唯心主义哲学的诡辩就在于：它把感觉……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像，而是看作‘唯一的存在’。”（《列宁选集》第二卷 46 页）在映像问题上，同整个哲学问题一样，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唯物主义把映像看成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唯心主义把映像看作是神秘的、主观的东西。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对于唯物主义者说来，‘实际感知的’是外部世界，而我们的感觉是外部世界的映像。对于唯心主义者说来，‘实际感知的’是感觉，而外部世界被宣称为‘感觉的复合’。”（《列宁选集》第二卷 109 页）

科学的抽象

正确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一种认识方法。抽象就是透过现象，找出本质，把在实践基础上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去掉事物次要的、非本质的东西，找出主要的、本质的特性，形成对事物的概念。人的阶级性这个概念的抽象，是把各种各样的人，抽掉了人的男女性别、年纪大小、个子高矮、身体强弱、不同籍贯等非本质的、次要的特性、找出在阶级社会中人的本质特性，这就是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都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唯心主义借口抽象的东西不像具体的东西那样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从而否认概念内容的客观性，这是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科学抽象不是胡思乱想。人的阶级性这个概念的抽象，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它以阶级社会的客观现实为依据，反映了人的阶级的本质。由科学抽象得出的概念不是更空虚而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了客观事物。列宁说：“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

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181 页)毛主席称这种科学的抽象“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实践论》)毛主席批评那些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的庸俗事务主义者不懂得科学抽象(即理论)的重要意义,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实践论》)

概念

反映客观事物本质的一种理性认识。概念是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形成的。人们在不断实践基础上,对丰富的感性材料反复思考,撇开事物的表面、次要和非本质的因素,抽象和概括出事物的本质,在人们的头脑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就产生了概念。如政治经济学中的价值概念,它把市场上各种各样商品,抽掉了商品的关于吃的、用的、穿的、大小、形状、花式品种等非本质的次要特性,找出所有商品的一个共同本质特性,就是商品价值都是劳动创造的,都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从而得出商品价值这个概念。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的差别。毛主席说:“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方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实践论》)概念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思维的过程,调查研究的过程。概念是通过语词表现的。概念产生后,对人们的实践和认识起着重要作用。各门科学的认识成果,都是通过形成各种概念来加以总结和概括的。

概念体现了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概念作为反映的形式是主观的,而它的内容来自外界事物,是客观的。唯心主义把概念说成是先天的,或纯粹思维的产物,否定概念的客观性,割裂主观和客观、形式和内容的辩证关系,这是错误的。概念的矛盾运动是客观事物矛盾运动的反映和表现。如价值概念,反映了商品两重性的矛盾;国家概念,它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压迫的工具,反映了社会的阶级矛盾运动。随着事物的矛盾运动、实践的发展,人们

认识事物本质的可能性就愈大，原有概念的内容也得到不断丰富、发展并得出新的概念。毛主席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概念，标志着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认识的新发展，从而使人们在新事物面前，处于更自觉、更主动的地位。

概念反映了个别和一般的辩证统一。客观存在的事物都是个别的、具体的东西。如房子，谁也没有看见过普遍的抽象的房子，看见的都是具体的房子。房子的概念是各种具体房子的抽象和概括。个别包含着一般，一般寓于个别之中，并通过个别表现；没有个别，就没有一般。

概念是灵活性和确定性的辩证统一。由于客观事物的发展，反映它的概念也是发展的、灵活的。同一概念在事物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如人民的概念，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历史时期就有不同的内容。同时，概念的内容在一定条件下，又有着相对稳定性，所以概念又是确定的。把概念僵化，否定灵活性，这是形而上学；主观任意改变概念内容，否定确定性，这是相对主义，也是诡辩论。

判断

理性认识的一种形式，是人们运用概念对事物有所断定，作出肯定或否定的论断。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判断来说，就是断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具有纸老虎的性质。判断由概念组成。一个简单判断有主词、宾词和联词三个部分：主词（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表明被断定的对象；宾词（纸老虎）表明对主词作出的断定；联词（是）是把主词和宾词联结起来。由两个以上简单判断组成的判断是复合判断。平时在人们认识和处理问题时，如生产任务能否完成，调查研究后怎么下结论，发生了事故，究竟是政治事故还是责任事故等，都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

判断是在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判断的形式，都需要经过无数次的反复实践和思考。如军事指挥员进行作战部署，使用一切侦查手段取得敌情，又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

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加上自己方面的情况，研究双方的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判断作出后是否正确，还必须由实践检验。只有正确反映客观现实的判断，才是正确的判断。有了正确的判断，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把自己的观点、判断、思想传给别人。因此，判断的形成过程，是实践的过程，思维的过程，调查研究的过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唯心主义否认判断的客观性，把判断说成是主观自生的，或者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这都是错误的。

判断反映事物的矛盾运动，每一个判断都包含着个别与一般的联系。如“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这个判断：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是个别；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是一般，因为一切阶级敌人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因此，这个判断已经包含着个别与一般的辩证法。随着实践和认识的发展，人们对客观事物的判断不断地深化，各种判断的形式，也随着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如人们对能量转化定律的认识，开始得到的是“磨擦是热的一个源泉”，这是个别判断。随着实践的发展，又得出“一切机械运动都能借磨擦转化为热”，这是特殊判断。通过不断的再实践，再认识，又得出“在每一情况的特定条件下，任何一种运动形式都能够而且不得不直接或间接地转变为其他任何运动形式”，这是一般判断。判断的这种从个别到特殊到一般的辩证过程，表明人们是能够认识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充分反映了思维形式和人类认识发展的一致性以及思维规律和自然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的一致性。

判断对实践有着反作用。人们根据错误的判断去行动，就会使工作受到挫折，甚至失败；正确的判断对人们的实践活动则有着指导作用。

推理

理性认识的一种形式，是从已知判断推出新判断的思维过程。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得到了对事物的概念，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以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人们平常说的所谓“眉头一

皱计上心来”、“让我想一想”，都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工夫。推理由前提（一个或几个）和结论两部分组成。推理的前提是已知判断，结论是被推出的新判断。我们已知“修正主义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和“勃列日涅夫是修正主义者”这两个判断，经过推理，必然得出“勃列日涅夫上台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的结论。推理依据前提的数目，分为直接推理和间接推理。只有一个前提的推理叫直接推理。有二个以上前提的推理叫间接推理。推理依据前提和结论联系的性质，又分为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演绎推理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推理，如“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归纳推理是从个别到一般的推理，如“希特勒是纸老虎，国民党反动派是纸老虎，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所以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是密切联系、相互转化的。推理是人们在长期实践和认识活动中形成的。实践是推理的基础，是检验推理是否正确的标准。实践和认识活动的加深、扩大，又促进推理的不断发展。

正确的推理都是事物客观联系通过实践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推理中各个判断之间的关系，就是反映了客观事物所固有的个别、特殊、一般之间的辩证关系，这是事物最常见、最普遍的关系，在任何一个简单的事物和判断中都存在着。推理中的各个判断就反映了这种最常见、最普遍的关系。如“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人民的敌人，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者，所以伯恩施坦是人民的敌人”。伯恩施坦有着他自身固有的区别于其他修正主义者的特征，有着一切修正主义者的特征，又有着一切人民敌人的特征。客观事物的这三种特征及其相互关系，就是推理形式的物质基础。推理就是反映了个别、特殊、一般三个客观环节的联系。推理就是用各种不同的形式和方法，把概念、判断所反映的事物内在矛盾，加以揭露和展开。推理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揭露矛盾、分析矛盾的过程，也是实践的过程，思维的过程，调查研究的过程。

推理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前提要真实，即判断要正确反映客观事物；二、前提和结论之间联系要符合客观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这

样才能在推理中得出正确的结论。缺少任何一个基本条件，推理就会是不正确的。运用虚假前提或主观臆造的荒谬论断，是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诡辩的常用手法，也是林彪反党集团制造谣言进行诡辩的惯用手法。

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

也叫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的一致。历史的东西指客观事物和人们的认识的发展过程，逻辑的东西指人们用概念、范畴对历史的东西的概括反映。辩证唯物主义正确地解决了哲学基本问题，从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和物质决定精神、精神反作用于物质的观点出发，认为历史的东西和逻辑的东西虽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但两者实质上是一致的。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122 页）这就是说，历史的东西是逻辑的东西的基础，逻辑的东西是历史的东西的概括。只有逻辑的东西，没有历史的东西，认识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只有历史的东西，没有逻辑的东西，就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

历史的东西的本质和规律，不是赤裸裸地表现的，只有在实践基础上，通过概念、范畴、理论体系等逻辑的东西，才能得到揭示和把握。历史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它常常是跳跃式的、曲折的、发展的，其中交织着次要和主要、现象和本质、偶然和必然等等因素。如果人们在认识过程中处处跟着它转，势必要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受到各种干扰，使工作漫无止境，始终停留在无数现象上。因此唯一适当的方法，就是逻辑的方法，只有它才能抓住事物发展过程中主要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例如，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的发展，是有历史过程及其规律的。列宁从帝国主义的客观实际出发，写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该书在科学地分析大量实际材料后，从资本主义生产集中和垄断、金融资本和金融寡头、资本

输出等特征中得出了帝国主义的概念，反映了历史上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的、垂死的、腐朽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发展。这些逻辑概念出现的顺序，是同历史的东西的发展史一致的。列宁在这本书中，既阐明了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转化及帝国主义产生、发展、灭亡的过程，又阐明了这一过程的逻辑的发展，从而指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给无产阶级指明了革命方向。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历史的和逻辑的一致的原理，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战斗武器。坚持这一原理，就要求我们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必须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理论和实践、思想和现实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致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列宁说：“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357 页）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资本积累、无产阶级贫困化、经济危机等等经济范畴，是同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发展、灭亡的历史辩证法相一致的。《资本论》首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交换。从对商品交换这一最简单现象的分析中，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矛盾。以后又叙述了这些矛盾怎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展开和激化的。这些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是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在逻辑上的反映，同时也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运动从个别到一般、现象到本质、由低到高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

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认识论，也是科学的逻辑。它研究自然界、社会的发展规律及其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研究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生和发展、由不知到知、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的辩证过程，研究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在思维中的反映形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都是探讨自然界、社会和人们思维最一般的规律的。因此三者虽各有所侧重，但实质上却是一致的，有时可以说就是一个东西。

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的一致，是以唯物辩证地解决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为前提的。辩证唯物主义以唯物主义反映论为基础，从存在决定思维、思维反作用于存在的观点出发，认为思维和存在有着同一性，客观物质世界是辩证运动的，人们的认识和思维也是辩证发展的，主观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它同认识论、逻辑一样，都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的反映，三者内容上是一致的。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的一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旧哲学把三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或者把三者统一在唯心主义基础上。都是错误的。

马克思主义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的一致的原理，对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的实践活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普列汉诺夫把反映论同唯心主义的象形文字论混同起来，把人们的认识看作是反映客观事物的文字符号，根本不懂得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一致，不懂得唯物辩证法就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三者割裂开来，最后滚入机会主义泥坑。因此，我们懂得这个原理，就能更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修正主义划清界限，并战胜它们。

规律

也叫法则，指事物发展过程中内部的本质联系和必然趋势。规律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它存在于各个具体事物之中，具有普遍的不断重复出现的特点。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规律是在物质的各种不同形式（机械的、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和社会的形式）基础上起作用的。离开了客观物质，就不存在规律。人们既不能消灭规律，也不能创造规律。规律是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都客观地发生着作用。行星围绕太阳转动的规律，在哥白尼发现之前早已存在。唯心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和一切反动派，都否认规律的客观性。他们违背客观规律，逆历史潮流而动。如刘少奇、林彪之流妄图扭转历史车轮，复辟资本主义，遭到了彻底的失败，都是由于他们违反了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这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社会发展，社会主义要代替资本主义的规律，是一定要实现的。

根据规律所起作用的范围不同，分为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普遍规律也叫一般规律，指一类事物或各种事物都具有的共同规律。特殊规律指某种事物具有的规律。一般说来，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的区分是相对的，在一定场合是普遍规律，在另一场合是特殊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从社会领域来说，是一切社会形态的共同规律，而从整个客观世界来说，又是特殊规律，它只限于人类社会这一领域起作用，不包括自然界。

对立统一规律是最根本的规律。它发生作用的范围最广泛，存在于一切事物、现象之中，在一切时间、地点、条件下都起着作用，任何人的实践都逃不出它的范围。修正主义借口情况变化，否定普遍规律，否定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社会达尔文主义夸大特殊规律的作用范围，把自然界中生物的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规律搬到社会领域，否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规律。它们都是为反动资产阶级效劳的。

根据规律的内容和所属领域的不同，又分为自然规律、社会规律和思维规律。它们除了具有共同的特点外，还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如自然规律是在自然界起作用的，主要特点是自发地盲目地发生着作用；社会规律是在人类社会中起作用的，主要特点是通过人们的实践活动发生作用。在阶级社会中，社会规律要通过阶级斗争的实践来实现的。

认识和掌握规律很重要。毛主席说：“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想的结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实践论》）规律是客观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人们在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规律可以被人们认识和掌握。虽然规律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只要我们在实践中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调查研究，开动脑筋，用心多想想，从大量丰富的感性材料中，透过现象认识本质，通过个别认识一般，是可以认识客观规律的。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客观事物的规律，并以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来武装人们。当人们一旦认识和掌握了客观事物的规律，就能正确地指导行动，能动地改造世界，推动事物发展。

主观能动性

也叫自觉的能动性，是在实践基础上，人们的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行动，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主观能动性有正确与错误之分。从实际出发，使思想和行动符合于客观规律，这是正确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脱离实际，思想和行动不符合客观规律，这是一种主观主义，是错误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在阶级社会里，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阶级性的。革命阶级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它起到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这是一种革命的主观能动性。反动阶级发挥的主观能动性，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只能阻碍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是一种反动的主观能动性。我们要批判反动的主观能动性，充分发扬革命的主观能动性。林彪同一切机会主义路线头子一样，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违背历史规律，错误地估计客观形势，他们发挥的这种反革命的主观能动性，是唯心主义的，是极端反动的，结果都毫无例外地落得自取灭亡的可耻下场。

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科学文化水平、实践经验以及阶级地位的制约。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程度是不同的。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对自然界认识的程度很低、范围很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比较小的。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工人农民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到严重的压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在正确路线的指引下，广大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好多本来认为办不到的事情办到了，使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步伐加快了。如我国国产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广大船员和造船工人，批判了修正主义路线，首次远航欧洲获得成功，为我国造船、航运史增添了光辉一页。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主观能动性的观点是同客观规律性联系在一起的，两者是辩证的统一。要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必须在实践中深刻认识客观规律性。只有建立在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毛主席说：“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我们必须发扬

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45 页）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人类通过实践取得丰富的感性认识，能够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即得到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二、能够用已经获得的理性认识，能动地去指导实践，改造世界，这是主观能动性作用表现的更重要方面。

唯心主义抽象地夸大主观能动性，认为人们可以脱离客观规律，随心所欲，任意行动；机械唯物主义抹杀主观能动性，认为人们只能消极地依从客观规律，而不能利用客观规律，有所作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

实事求是

中国的一句古语。毛主席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作了解释，赋予了新的含义。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说，“实事”指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指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去研究。“实事求是”就是从客观实际情况出发，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进行科学的分析研究，找出事物的规律性，从而指导人们的行动。“实事求是”深入浅出地表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理论和实践、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的辩证关系，是辩证唯物论认识路线的具体体现，是指导人们认识、掌握事物规律性的唯一正确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作风。

实事求是与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是对立的。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防止理论脱离实际，批判只凭主观臆想的盲目行动和无所作为、消极悲观的错误思想。要注意加强调查研究，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形式和情况，这样才能做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毛主席关于实事求是的教导，在我国已深入人心，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指南。他们在掌握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坚持实事求是，不断把握事物的矛盾运动，推动事物的发展。我国工业

和农业战线上的大庆和大寨，就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坚持实事求是，针对实际情况，分析研究和掌握客观事物的具体规律，把革命精神同科学态度、理论同实践结合起来，从而取得了石油和农业生产的丰富经验和辉煌成绩，成为全国工业战绩和农业战绩的红旗。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革命作风，随着三个革命实践的发展，越来越发挥着重大的作用。

科学的预见

根据客观规律对事物发展趋势所作的正确推测和判断。事物的发展都是有规律的，要作出科学的预见，必须深刻了解事物的发展规律，这是科学预见的客观基础。人们通过实践，对客观事物从现象到本质、从偶然到必然、从外部联系到内部联系，逐步得到规律性的认识，就能大体预测事物发展的方向及基本进程。毛主席依据中国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规律，在一九六六年就曾预言：“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反党集团妄图发动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被迅速粉碎，充分证明毛主席英明预见的正确性。

科学预见不是神奇的东西，也不是主观臆断和宗教预言。主观臆断和宗教预言是以主观幻想猜测为依据的。科学预见来源于客观，它是客观存在经过思维反映出来，是以深刻认识客观规律为依据的。列宁说：“神奇的预言是神话，科学的预言却是事实。”（《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 462 页）

科学预见不可能周全地预知事物发展进程的一切细节。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未来的发展和变化，只应该也只能说出个大的方向，不应该也不可能机械地规定时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03 页）科学预见是由于人们实践活动的需要才产生的，它还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科学预见对指导实践有着重要意义，是人们能动地改造世界的重要方面。科学预见不是最终目的，有了科学预见还必须通过革命实践变可能性为现实性。人们根据客观规律制定的行动

计划、方案和远景规划等，其中包括了科学的预见，如果计划、方案等符合客观规律，人们的行动就更能达到预期目的，加速事物的发展进程。马克思、恩格斯根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断定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社会主义的必然胜利。这个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预见，对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起着伟大的指导作用。

科学的预见对正确确定战略方针，夺取革命的胜利，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主席经常以革命战争的规律和事例教导我们：“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估计前途的远景是必要的。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205 页）只有努力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总结经验，深入进行调查研究，我们才能不断提高科学预见的能力。

动机和效果

动机指人们行动的主观愿望，效果指人们实践行动的客观结果。辩证唯物主义认为，动机和效果是辩证统一的。动机是效果的行动指导，效果是动机的行动表现。判断事情既要看动机，又要看效果。有为人民服务的动机和被人民欢迎并对人民有益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为个人和狭隘集团的动机是不好的；有为人民服务的动机，但没有被人民欢迎和对人民有益的效果，也是不好的。唯心主义强调动机否认效果，机械唯物主义强调客观效果否认动机，它们把动机和效果割裂开来，都是错误的。

动机是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正确的动机是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在其指导下的行动，一般会取得好的效果。反之，错误的动机是不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在它指导下的行动是不会取得好的效果的。实践是动机和效果统一的基础。没有实践，既不能反映动机，也不能表现效果。动机见之于效果，是通过实践实现的。检验动机是否正确也离不开实践。毛主席说：“**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25 页）

在阶级社会里，人们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每个人的动机、行

动都受阶级利益的支配。对待动机和效果的问题都有一个立场问题。无产阶级的动机反映着客观规律和人民的利益。无产阶级在实践中必然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并事前顾及事后的效果。如果由于形势变化，缺乏经验，主观和客观发生矛盾，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暂时不一致，即工作中产生了缺点错误，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具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必定能够完全有诚意进行自我批评，欢迎别人批评，并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纠正错误，继续革命，那么在复杂的实践中，就能不断解决矛盾，使主观和客观、动机和效果得到辩证的统一。如果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或者工作中已经出现缺点和错误，即产生坏的效果时，不认真对待，这都不是无产阶级的立场。

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

“自在之物”也叫“物自体”，是德国哲学家康德常用的哲学名词。康德的自在之物指的是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但又是不可认识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有时也用“自在之物”这一术语，指的是客观存在。马克思主义所说的“为我之物”，是指人们认识了自在之物。康德把自在之物和“现象”分为两个不同的世界。认为自在之物是超验的、不可认识的彼岸世界，即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天国；“现象”是主观的、可以认识的此岸世界。这样，康德在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掘了一条鸿沟，脱离本质谈现象，割裂了现象和本质的关系。康德是一个二元论者，当他承认自在之物是离开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时候，他是唯物主义者；当他认为这个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超验的、彼岸的时候，他是唯心主义者。康德的自在之物是调和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的对立，实质上就是抹杀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反对唯物主义，是为巩固唯心主义、信仰主义、宣扬不可知论服务的。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切客观事物都是可以认识的，现在未被认识的，将来一定会被认识。康德的这种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是不存在的。现象同本质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现象是本质的表现，脱离本质的现象是没有的。人们在实践中可以透过现象认识事物的本质。康德把事物的现象同本质割裂开来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列宁说：“在现象和自

在之物之间决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原则的差别。差别只存在于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之间。”（《列宁选集》第二卷 100 页）

“自在之物”是可以认识的，当人们认识它时，就变成“为我之物”了。如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胰岛素，在未被人们认识之前是自在之物，当我国科学工作者第一次用人工的方法合成后，初步揭开了生命起源的秘密，它就由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又如电在未被人们认识之前是自在之物，当人们在实践中把电运用到生产和生活上为人类服务时，就变成为我之物了。实践是把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的决定条件，实践也是对康德的不可认识的自在之物最彻底的驳斥。正象恩格斯所指出的：“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21 页）

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认识世界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改造世界指人们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离不开实践，两者在实践基础上辩证统一，相互作用，相互促进。要改造世界必须认识世界。只有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人们只有通过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项实践活动，才能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在阶级社会里，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都受着阶级性的制约。

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主体。千百万群众的革命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又是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就是广大群众不断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毛主席说：“社会的发展到了今天的时代，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已经历史地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肩上。”（《实践论》）我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掌握客观规律性，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积极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

践活动中，已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是永远存在的，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务也永远不会完结。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认识世界的目的，不仅在于说明世界，更重要的还在于改造世界。这是同一切旧哲学根本区别的。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9 页）这一名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任务和历史使命，指明了无产阶级的斗争方向。旧哲学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割裂开来，根本没有提出改造世界的任务，更不懂得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对认识世界的决定意义。这是一种为少数人垄断和服务的书斋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行动指南，是广大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在阶级社会里，认识和行动都是有阶级性的，因而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始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即使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为了使我们的党和国家沿着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只能依照无产阶级先锋队的面貌改造党，改造世界**”。（《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32 页）

真理

作为科学知识的真理就是人们对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判断一切知识是否为真理，就是要看它们是否反映客观规律。真理是客观的，相对的，又是绝对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观。

真理首先是客观的。所谓客观真理，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我们的知识或概念的内容之唯一来源，再也没有别的来源。只有唯心主义者，才否认客观真理，主张知识或概念是主观自生的，鼓吹自欺欺人的主观真理。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就是因为它正确反映了客观规律；一切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所以是错误的，就是因为它们与客观规律相违背，完全是主观的妄想。列宁说：“**对客观真理的承认是最要紧的。**”（《列宁选集》第二卷 125 页）

客观世界是绝对与相对的辩证统一，因而反映客观世界的科学真理，也是绝对和相对的辩证统一。人类的思维，就它的本性说，能给我们以绝对真理。绝对真理乃由许多相对真理积集而成，只有通过相对真理才能逐步认识绝对真理。每一科学原理的真理界限却总是相对的。毛主席说：“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实践论》）

真理总是具体的，只有具体的真理，而没有抽象的真理。一切主观真理的谬说，归根到底，都是妄想用抽象的真理代替具体的真理。任何真理的本身都是对立统一的，都是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的。没有对立就没有斗争，没有斗争也就没有发展，这是一切事物所具有的辩证性质，也是真理所具有的辩证性质。为了发现、证实和发展真理，既要有实践第一的观点，又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毛主席说：“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实践论》）

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伟大历史使命，就是“**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217 页）每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神圣职责，就是要自觉地为共产主义这一伟大真理奋斗终身。为真理而奋斗，就必须不断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具有自我牺牲精神，敢于反潮流。

真理的客观性

指客观物质世界是人们科学知识内容的唯一来源。真理是客观的，真理的内容包含着不依赖于任何个人、阶级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

不同的阶级在反映同一个社会现象时，由于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会得出两种根本相反的结论。但是对同一对象的真理，只能有一个，只有符合客观规律性的认识才是真理。任何一种知识或概念，如果不反映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就不是科学知识，就不是真理。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革命的科学知识，是真理，就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客观

世界的规律性。毛主席关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著名论断，来源于阶级斗争的客观实际，反映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客观规律性。客观事实证明，路线不正确，即使掌握了政权也会丧失政权。路线正确，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证明，这个真理是客观的。一个认识、思想、理论是不是真理，必须通过客观的社会实践的检验，看它是不是符合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23 页）

唯心主义从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观点出发，走的是从感觉和思想到物的认识路线，认为知识、概念都是主观自生的，不要任何客观的内容，把真理看作是主观的东西，从而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例如波格丹诺夫认为，一般公认的就是客观真理。按照他的看法，一切宗教迷信都成客观真理了。这完全否定了真理的客观性，颠倒了是非，抹杀了真理和谬误的界限，是为他推行机会主义路线服务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指出：“**波格丹诺夫对客观真理的否定，就是不可知论和主观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 122 页）真理是客观的，我们就要反对唯心主义、主观主义，力求使自己的思想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这样才能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达到预想的目的。

真理的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中，真理是有阶级性的。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实践论》）

在阶级社会中，反映社会领域真理的阶级性是十分明显的。这不仅由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人都具有自己的阶级立场、为一定的阶级服务，而且还由于阶级社会的发展规律本身就具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容。列宁说：“**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列宁选集》第二卷 1 页）在历史的进程中，只有先进的、革命的阶级，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代表，才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社会领域中的真理；反动没落阶级是做不到这一点的。随着阶级地位的

变化，真理也会发生变化的。毛主席说：“‘鸡毛不能上天’这个古代的真理，在社会主义时代，它已经不是真理了。穷人要翻身了。旧制度要灭亡，新制度要出世了。鸡毛确实要上天了。”这说明在阶级社会中社会领域的真理始终是阶级的真理。

自然领域的规律本身虽不存在什么阶级内容，但反映自然规律的自然科学，总的说来，同样也是具有阶级性的。因为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也都具有自己的阶级立场，也有一个为谁服务的问题。列宁说：“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列宁选集》第二卷1页）另外，列宁在谈到二十世纪初新物理学陷入唯心主义时还指出：“主要就是因为物理学家不懂得辩证法。”（《列宁选集》第二卷267—268页）他们所以不懂得辩证法，主要是“这些人的整个生活环境，使他们厌弃马克思和恩格斯，使他们投入庸俗的御用哲学的怀抱里去”。（《列宁选集》第二卷269页）这说明自然科学家的世界观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有直接影响的。

刘少奇一伙曾大肆鼓吹“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资产阶级口号，妄图用它来保护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否认真理的阶级性，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反革命舆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彻底揭穿和粉碎了这一反动谬论和反革命阴谋，深刻指出，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关系、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问题上，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平等，也不允许有什么平等；实际存在的只能是革命与反革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例如所谓平等关系、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的和平共处关系、仁义道德关系等等。

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

相对真理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发展的某一阶段具体过程的正确认识，是对客观世界近似的、不完全的、相对正确的反映。绝对真理是由

相对真理构成的，无数相对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真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对立的统一，它们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它们是真理发展过程中统一的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离开相对真理的绝对真理，或者离开绝对真理的相对真理都是不存在的。绝对真理寓于相对真理之中，每一个相对真理都是绝对真理的颗粒。它们好比长河与水滴的关系，长河由无数水滴汇成，而水滴又是长河中的一点。每一个科学理论的发现和发展，都为绝对真理的长河增添新的水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也是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统一。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是反映人们正确认识客观现实的历史过程。客观世界发展总的过程是无限的，而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又是有限的，整个世界就是无限和有限的辩证发展过程。

人们的认识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任何历史时期人们的认识都是相对的、有限的，但通过人类无限发展的认识能力，是能够不断接近绝对真理的。不承认绝对真理，必然导致唯心论和不可知论。

辩证唯物主义关于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既反对相对主义，又反对绝对主义。相对主义把相对性无限夸大，以此否定客观真理，否定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绝对主义把绝对性无限夸大，认为人们可以一下子把握最终的绝对真理，如江湖骗子杜林所虚构的“终极真理论”，就是这类货色。林彪鼓吹的“绝对权威论”，乃是绝对主义的变种。他们都以绝对主义来否定相对真理，否定真理发展的辩证过程，从而达到反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罪恶目的。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都是把相对和绝对割裂开来，对立起来，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正确认识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的辩证关系，对革命实践有着重大意义。如果只承认绝对真理，否认相对真理，就会在走向绝对真理的道路上使思想僵化，固步自封，停滞不前；如果只承认相对真理，否认绝对真理，就会抹杀真理的客观性以及真理和错误之间的原则界限，以致是非不分，真假不辨，陷入相对主义、诡辩论的泥坑。

普遍真理

对客观事物的普遍规律的正确认识。它反映的不是个别具体事物的本质，而是关于某一类事物或各种事物的共同规律。如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学说，反映了各种社会形态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领域是带有普遍性质的科学理论。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是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反映了一切事物的普遍规律。

普遍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它来自实践，不是凭空产生、主观臆造的，而是人们通过对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获得的，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普遍真理对人们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活动起着指导作用。在普遍真理的指导下，人们能更加顺利地正确地认识事物的规律，预见事物发展的方向，并自觉地遵循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因为无论什么人的实践都不能逃出它的范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中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在普遍真理问题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关于普遍真理的观点，才是唯一科学的、正确的。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当成普遍真理，教条主义把普遍真理看作僵死的东西，都是错误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都竭力否认和攻击普遍真理。如列宁关于时代的学说，指出了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策略。列宁逝世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时代没有变，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可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借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荒谬地提出现在是“三无世界”（没有军队、没有武器、没有战争）、“和平过渡”的新时代，否认列宁关于时代的学说是普遍真理，充分暴露了他们无产阶级叛徒的嘴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日益深

入人心，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蓬勃发展，彻底地驳斥了这伙叛徒的无耻谰言。

真理的标准

指检验真理的尺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对客观事物规律性的认识是否正确，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检验才能得到证明。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一般说来，如果人们运用从实践中获得的思想、理论，又通过实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就说明这种思想、理论是正确的，是真理。反之，是错误的。社会实践之所以成为真理的标准，这是由于真理是人们的思想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而要检验人们的反映是否正确，只有通过社会实践，使主观见之于客观，才能得到证明。

社会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既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只有社会实践才能检验人们的认识是不是真理，除此没有别的标准，这是绝对的。但它又是相对的，因为实践是历史的、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的实践都受着一定历史条件的限制，所以社会实践证实某种认识的正确性也是有限度的。有些在今天的实践中不能证明的，在今后的实践中可以得到证明。列宁说：“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至于使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列宁选集》第二卷 142 页）

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以前从来没有人作过科学的解决。一切唯心主义者从精神第一性、物质第二性的观点出发，从精神本身寻找真理的标准，或者以自己的概念作标准，如我国古代的儒家提出“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便是一个典型例子。又如美国反动哲学家詹姆士、杜威及其在中国的忠实信徒胡适认为，对“我”有利就是真理，对“我”不利，就不是真理。这种把对“我”是否有利作为真理的标准，完全是为反动阶级进行剥削、为帝国主义进行侵略效劳的。马赫主义认为多数人承认的道理就是真理。这种以多数承认作为真理

的标准，必然要把一定历史阶段为许多人承认的上帝创造世界的观念也当做真理，显然是很荒谬的。旧唯物主义虽以思想是否符合客观实际作为标准，但不理解社会实践对认识的作用，因此也就不能正确地解决真理的标准问题。

真理的标准是客观的。毛主席指出：“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23 页）既然社会实践是真理的标准，就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我们的认识，坚持真理，修正错误，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我们的认识，使它更好地指导革命实践。

真理和谬误

认识论的一对范畴。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认识。人们通过实践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同真理相对立的是谬误，它是与客观事物不相一致的错误认识。

真理和谬误在一定范围内是绝对对立的，两者的界限不容混淆。如果混淆了界限，就会变成唯心论的相对主义、诡辩论和不可知论。真理和谬误又有着相对性。真理是具体的，是在一定条件下对事物本质的正确认识。如果离开一定条件，真理就会变成谬误。波义耳定律证明，在一定温度和一定压力限度内，气体的容积同它所受的压力成反比，体积愈小，压力愈大。如果超出一定温度和一定压力限度这两个条件，到处运用，那就变成谬误。

真理和谬误同一切矛盾着的事物一样，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联系，相互转化。恩格斯说：“对立的两极都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30 页）列宁说，真理“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列宁选集》第四卷 257 页）真理变成谬误，谬误变成真理，这并不是说真理本身就是谬误，或者谬误本身就是真理，

比如坏事可以变成好事，并不是说坏事本身就是好事。真理同谬误的转化是有条件的，要使谬误转化为真理，就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去批判错误。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通过对错误进行批判斗争，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有比较才有鉴别，才能划清是非界限，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所以说，谬误转化为真理，如同坏事可以变成好事一样，也是离不开一定条件的。

毛主席说：“真理是同谬误对立的”，“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使人们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们普遍地接受时，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就是真理发展的规律。

一元论

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原（物质或精神）的哲学学说。由于对世界本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个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一元论。主张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统一于物质，世界上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各种表现形态，物质是不依赖于精神而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精神是物质的反映，这是唯物论的一元论。如中国先秦唯物论者荀况，认为“气”是构成世界的总根源；法国十八世纪唯物论者拉美特利说，具有广延性和运动的物质实体是一切自然现象（包括意识在内）的基础。主张精神是世界的本原，世界统一于精神，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精神的产物和表现，这是唯心论的一元论。如中国宋朝的朱熹，把精神的“理”说成是世界的本原，认为世界一切事物都是“理”产生的。德国的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出现以前，就存在着绝对精神，它是一切事物产生的根源，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都是绝对精神的表现。这显然是非常荒谬的。俄国的波格丹诺夫鼓吹经验一元论，把纯粹主观的单一“经验”作为他的哲学基础。他把物理世界叫做人们的经验，并且主张心理经验在物理经验之前就存在。这样，他把整个世界都归结为是主观意识的产物。这不过是马赫主义的变种。列宁在批判经验主义一元论时指出：“以为用人

类的意识代替个人的意识，或者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代替一个人的经验，哲学唯心主义便会消失，这等于以为用股份公司代替一个资本家，资本主义便会消失一样。”（《列宁选集》第二卷 235 页）

一元论和二元论是对立的，但一元论中又有唯物论的一元论和唯心论的一元论，这是两条不同的哲学路线。唯物论的一元论同唯心论的一元论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一般说来，唯物论的一元论代表进步阶级、阶层的利益；唯心论的一元论代表反动阶级、阶层的利益。列宁说：“哲学上的一元论和二元论就在于：彻底或不彻底地贯彻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 296 页）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论，由于不能把唯物论的一元论贯彻到底，因此在解释社会历史问题时，都成了历史唯心论，最后背叛了唯物论的一元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一元论，它把辩证唯物论的一元论贯彻到一切领域，正确地说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一切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哲学变成了科学。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

二元论

关于世界有两个本原的哲学学说。二元论同一元论相反，认为世界不是只有一个本原，而是有物质和精神两个本原，这两个本原不分先后，不分主次，互不相关，是平行地存在和发展的。在哲学史上，法国的笛卡尔是一个典型的二元论者。他认为世界存在两个独立的实体，即具有广延性的物质实体和具有思维属性的精神实体，两者是互不依赖的。但他又认为这两种实体，都服从于第三种实体——上帝。笛卡尔的二元论哲学，反映了十七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反封建中的妥协性。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德国康德的二元论哲学，也是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软弱、动摇、妥协的政治态度在哲学上的表现。

二元论表面上动摇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力求调和两者的对立和斗争。但它既然否认了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理，也即否认了精神对物质的依赖关系，把精神同物质割裂开来，又把精神绝对化，所以实质上就是一种唯心主义，是唯心主义的一种特殊形式。二元

论妄图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逃避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抹杀哲学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但事实上它却错误的回答了哲学的基本问题，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对抗唯物主义，对抗辩证法。林彪反党集团鼓吹的“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谬论，就是妄图用二元论掩盖反动的唯心主义英雄史观。

在对待二元论的问题上，从来就存在着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唯物主义者主张排除二元论中的唯心主义成分，即主张精神不是离开肉体而存在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是外部世界的反映；唯心主义者主张排除二元论中的唯物主义成分，即主张精神不是肉体的机能，精神是第一性的，是产生和主宰外部世界的。辩证唯物主义彻底坚持唯物主义的一元论，认为世界的本原只有一个，这就是物质。辩证唯物主义既反对唯心主义的一元论，也反对二元论。

本体论

旧哲学的一个名词，是研究关于存在性质的唯心主义学说。它的特点是脱离客观物质世界，从抽象概念出发来谈论存在的本原及其性质。本体论者认为，本体论和认识论是彼此孤立的。这反映了它把存在和思维的关系问题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把哲学分为本体论、宇宙论等部分的是十八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沃尔夫。本体论的论证法是论证上帝存在的一种方法，由欧洲中世纪大主教经院哲学家安瑟伦所炮制。安瑟伦从上帝这一概念出发，抽象地推论出上帝一定存在的结论。在他看来，美好的首先是存在的，上帝是最美好的，所以上帝是存在的。这种方法只管字面上合乎语法习惯，不管内容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完全是一种诡辩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运动着的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精神（思维）是物质（存在）的反映，对存在有着反作用。旧哲学的本体论离开世界统一于物质这一基本原理，抽象地去谈论什么存在的性质，只能是唯心主义的谬论。

宿命论

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都

是由命运这种神秘莫测力量决定的。宿命论根本否认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可知性和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否认群众、阶级和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否认社会革命。把人看作是“命运”的奴隶，受着“命运”的摆布，在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宿命论思想产生的认识根源，是由于人们对自然规律的无知，其社会根源是由于阶级产生后，反动阶级维护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宿命论是反动阶级麻痹和毒害人民的反动思想工具。古罗马的贵族奴隶主代表斯多葛派，宣扬世界是由命运决定的，要劳动人民服服帖帖地顺从命运，胡说在命运面前，愿意的人由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由命运拖着走。我国春秋时期没落奴隶主阶级代表孔丘鼓吹听天命，说什么“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要“畏天命”。封建地主阶级接过孔丘的天命论，宣扬人的富贵贫贱、吉凶祸福都由天命决定，要人们信八字望走好运。这些都是反动阶级把自己意志假托天命或上帝之命，来统治和压迫劳动人民，要劳动人民乖乖地甘心情愿受苦受难，忍受剥削、压迫。现代资产阶级也大肆宣扬宿命论观点，胡说无产阶级命该忍受剥削、贫困和无权，革命是没有用的。这是为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反动统治服务的。

马克思主义同宿命论是根本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上不存在神秘的“命运”。世界是运动着的物质世界，它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劳动人民在实践中完全可以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并利用它为人类谋福利。劳动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人。革命的阶级、政党、领袖在推动社会发展起着积极的创造性的作用。在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受苦受难，并不是命运决定的，而是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造成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和皇帝。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全靠自己解放自己，只要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有一条正确的路线，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

目的论

一种反科学的唯心主义学说，认为自然界的一切事物都被一定的目的所决定和支配。最早提出目的论的是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

拉底，亚里士多德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主要代表是德国近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沃尔夫。在意大利的托马斯·阿奎那、德国的莱布尼茨、黑格尔和中国的董仲舒等人的哲学中，也都包含有目的论思想。

目的论的基本观点是，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看成是合乎目的的。沃尔夫认为，一切事物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上帝或神有目的地安排和创造的结果。这种赤裸裸地直接抬出上帝来的做法，是一种浅薄的目的论。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是运动的，由于“内在的目的”的作用，绝对观念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转化为自然界，化学反应就转化为生命。这种披着哲学外衣的做法，是一种精巧的目的论。江湖骗子杜林认为，从无机界到有机界的转化，是合乎目的的举动，自然界不但有目的，而且还有意志。他根本不懂得也不重视必然性的问题。这不过是黑格尔的“内在的目的”拙劣的抄袭。汉朝儒家董仲舒说：“天之生物也，以养人。”天创造自然万物的目的是为了养活人类。他还举例说什么，人有小骨节三百六十六，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大骨节十二，天有十二个月；人有五脏，天有五行；人有四肢，天有四时；人有哀乐，天有阴阳；人有伦理，天有天地。他把一切都归结为“天”的有目的的安排，这是一种神学目的论。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对目的论作了深刻的批判和讽刺。他指出，按照这种观点看来，“猫被创造出来是为了吃老鼠，老鼠被创造出来是为了给猫吃，而整个自然界被创造出来是为了证明造物主的智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449 页）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自然界是根本没有目的的，更不是按照上帝或神的目的创造的。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按照自己内部固有的规律运动着。只有人类的行动才具有自觉的目的性，这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人的目的性不能离开客观规律性，否则就会到处碰壁。只有合乎客观规律性的目的，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才能起着积极的主动的支配作用。目的论不仅是科学的死敌，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而且在思想政治上，又以安于现状、听天由命的观念，来麻痹劳动人民的斗志，反对无产阶级革命，这完全是为剥削阶级反动统治服务的。

有神论

同无神论相对立的宗教唯心主义哲学学说。它主张有“神”，神是超自然的、万能的、至高无上的。神创造世界，支配万物，决定人类的命运。有神论的思想早在原始社会中就已产生。由于当时生产力的极端低下，人们知识的极端贫乏，对于风雨雷电、做梦等现象，不能作科学解释，以致把自然的力量神秘化、人格化。在氏族、部落内部形成了人们共同信奉的神，但这个神只是在本氏族、部落内部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一旦离开这个氏族、部落就不起任何作用。

到了阶级社会，随着经济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对立，形成了有神论学说。有神论思想从多神论发展为一神论，氏族神、部族神逐渐被民族神和世界神所代替。那些经济上发达、政治上强大的民族所信奉的神，也被看作是强大有力值得崇拜的。

有神论学说的存在，反映了人们受着自然的压迫和社会的压迫。它是剥削阶级维护和巩固反动统治的工具。恩格斯说：神“**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象，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355 页）反动统治阶级总是竭力散布有神论和宗教迷信，鼓吹“**天上有玉皇，海里有龙王，人间有帝王，阴间有阎王**”。皇帝叫天子，即天的儿子，是受命于天，专来统治人间的；而百姓都应服从天上玉皇、人间帝王的统治。中国汉朝儒家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认为万物都由有意志的“天”产生的，人间的一切都由天的意志安排的，把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串一起，建立起他的王权神授和封建神学体系。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主要代表托马斯·阿奎那，提出整个世界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等级系统，地上的秩序必须服从天上的秩序，地上的封建等级制度是整个等级系统的一部分。帝国主义者也竭力散布有神论，提倡所谓“**以神为中心的人道主义**”，“**一切权力都由上帝而来**”。俄国马赫主义者宣扬造神说。这都是为剥削阶级麻痹人民斗志、维护反动统治服务的。

有神论是一切宗教信仰鬼神迷信的思想基础，是对客观事物的歪曲反映。它是剥削阶级从精神上奴役劳动人民的工具，是麻痹人民的

鸦片。有神论就是唯心主义，是一切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敌人。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彻底消灭剥削制度的战斗中，我们必须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反对有神论和唯心主义。但要牢记列宁的教导：“**不应当根据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来进行反宗教斗争，而应当具体地、根据当前在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提出这个问题。**”（《列宁选集》第二卷 380 页）

无神论

同有神论相对立，一种否定鬼神存在的哲学学说。它反对一切宗教迷信，认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鬼神。无神论的理论基础是哲学唯物主义。它坚持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则，否认有离开物质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否认世界是由神或上帝创造的，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固有的客观规律运动着的物质世界。

无神论的产生和发展是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知识的发展密切联系的，是在同有神论的斗争中产生发展起来的。历史上的无神论者都以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和反对有神论的宗教世界观，从而建立和发展了无神论学说。如公元一世纪时，我国东汉的法家著名代表王充，在同宗教神秘主义斗争中，提出了无鬼论和无神论的思想，驳倒了反动儒家一伙的“天人感应”说（认为万物都由有意志的“天”产生，人间的一切都由天的意志安排），批判了反动阶级的愚民神学。公元五世纪南朝的范缜，是一个著名的无神论战士。他同宗教迷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著有《神灭论》一书，有力地批驳了佛教的灵魂不灭的谬论，揭露了佛教的欺骗性，动摇了佛教的理论基础。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梅叶、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等，都是战斗的无神论者。如梅叶以唯物主义观点、深刻地批判上帝创造世界的谬论。他指出，在世界上根本没有“创造主”的地位，宗教是有势力的人捏造出来欺骗人民的工具，教会和政府是两个互相袒护的强盗。他还号召人民起来斗争，反对世俗压迫者和宗教神秘主义。

无神论是进步阶级反对反动阶级的思想武器。我国先秦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在同没落奴隶主阶级及其思想代表儒家的斗争中，提

出“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即认为迷信鬼神是衰亡的象征。他还说，“乱弱者亡”，“治强者王”，国家兴亡是由于力量强弱的对比，与天命鬼神无关。他的无神论思想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提供了理论根据。历史上的无神论者在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有神论的斗争中，曾经起过重大的进步作用。但由于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无神论者都受着阶级的历史的局限性，虽然揭露和批判了宗教迷信的罪恶、危害，但对宗教和鬼神产生的历史根源和消灭宗教的真正途径，还不能作出科学的阐明。

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建立起了真正科学的战斗的彻底的无神论。它第一次深刻地阐明了宗教有神论的产生、存在、实质及其消灭的途径，并指出宗教是剥削阶级从精神上奴役人民的鸦片，是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在进行革命斗争中，要把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有神论，作为自己一项长期的战斗任务。列宁在《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中指出：“恩格斯早就嘱咐过现代无产阶级的领导者，要把十八世纪末叶战斗的无神论的文献翻译出来，广泛地传播到人民中去。”（《列宁选集》第四卷 605 页）要把各种无神论的宣传材料供给人民群众，“要善于唤起最落后的群众自觉地对待宗教问题，自觉地批判宗教”。（《列宁选集》第四卷 606 页）

泛神论

流行于十六到十八世纪西欧的一种哲学学说。它认为神就是自然界，自然界就是神；神和自然界是等同的，神融化在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之中，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精神力量。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布鲁诺和荷兰的斯宾诺莎。

泛神论不同于有神论。有神论认为，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凌驾于世界之上的神，它创造一切、支配一切。泛神论否认有神论的这些观点。泛神论讲的神，实际上就是自然界。泛神论认为，世界的本原是自然界，而不是超自然的神。因此，泛神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披着泛神外衣的唯物主义。正如费尔巴哈所说的：“泛神论是神学的无神论，是神学的唯物主义，是神学的否定，但是它本身是站在神学的立场上的”。

从历史的分析可以看到，由于当时神学和经院哲学占着统治地位，泛神论表面上在讲神，实际上以泛神论为掩护来宣传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批判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斗争中，泛神论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原因，泛神论不得不带着神学的色彩，这也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软弱性和反对有神论的不彻底性。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日益深入人心，唯心主义的不断破产，现代资产阶级抽掉了历史上泛神论的唯物主义的内容，把泛神论说成是主张世界是存在于神之中的一种学说，这是利用泛神论的形式来调和科学和宗教的对立，宣扬唯心主义与宗教，因此泛神论便成为一种反动的学说了。

自然神论

流行于十六到十八世纪欧洲某些哲学家和神学家中的一种哲学学说。它认为神只是创造世界，创造以后就不管世界了，世界一切就由自然规律来支配，不受神的干涉。主要代表在英国有柯林斯、托兰德；在法国有伏尔泰、卢梭。

自然神论并不否认神的存在、神创造世界。但它不同于有神论。有神论认为神创造世界，又支配世界。而自然神论则否认神支配世界，认为世界是由自然规律支配的。这样，就限制了宗教的作用。自然神论者反对神的启示和奇迹，尖锐地批评封建教会的信条和形式，宣传了自由思想。在当时封建教会的世界观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自然神论在神的外衣掩护下，宣传了唯物主义思想，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对封建正统宗教的一种理论武器，起过进步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自然神论——至少对唯物主义者来说——不过是摆脱宗教的一种简便易行的方法罢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165 页）但自然神论和无神论毕竟不同，自然神论承认神创造世界，它的学说中还有不少神秘色彩。现代资产阶级利用自然神论来抵制无神论，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宣传宗教迷信和唯心主义，为维护 and 巩固资本主义反动统治服务。

神秘主义

宗教唯心主义的一种谬论，认为人和神之间有精神交往，人能够借助于神的“启示”或“灵感”，了解存在的秘密。例如古代罗马帝国衰亡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就是反动的神秘主义哲学派别。它认为不可理解的神，是万物的本原，人只能通过神秘的“出神”状态，才能达到哲学的最高阶段。在“出神”状态中，人以灵魂的神圣部分离开肉体同神接近。我国汉朝儒家董仲舒提出的天人感应说，认为天是有意志的，人和天是相通的，天能够干预人事，人的行为也能感应上天，天不仅可以授意某人作统治者，而且还通过灾害、吉祥等预兆，来表达神对人的惩罚和恩赐。这都是极端神秘的东西。

神秘主义戳穿了也并不神秘。马克思说：“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8 页）神秘主义和宗教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剥削阶级用来麻痹人民斗志、巩固反动统治的手段。一切宗教学说和唯心主义如柏拉图、黑格尔等人的哲学，都充满了神秘主义。现代许多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家，已经公开走上宣传鬼神和神秘主义的道路。林彪鼓吹的反动的天才史观，也都浸透着神秘主义，反映了现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哲学的极端腐朽性和反动性。

信仰主义

也叫僧侣主义，是以信仰来代替科学知识的极反动的唯心主义哲学。信仰主义公开承认上帝创造一切，只相信宗教信条。如西欧中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教权和神学高于一切，地上的秩序必须服从天上的秩序，政治必须服从宗教，现世必须服从来世，哲学必须从属于神学，知识必须让位于信仰。十八世纪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谢林，把上帝看作是世界的来源和归宿，宣扬信仰高于理智，宗教高于科学的神秘主义“天启哲学”。“现代的有修养的信仰主义”，是披着科学外衣的宗教神秘主义。如英国的唯灵论者华德，认为灵魂、精神是唯一实体，自然科学的各种理论是毫无客观内容的，只是精神信仰的产物。这样，使自然科学变成信仰主义的附属

品。一切怀疑论和不可知论贬低理性的作用，贬低知识，是为信仰主义开辟地盘的。信仰主义是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主观唯心主义是圆滑的信仰主义。列宁说：“**主观唯心主义不过是信仰主义的一种精巧圆滑的形态**”。（《列宁选集》第二卷 365 页）

信仰主义是一切剥削阶级愚弄劳动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现代帝国主义宣扬的新托马斯主义，便是极端反动的信仰主义。它胡说只要相信宗教，就可以得到真正的民主自由，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就可以和好相处，公然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修正主义者推崇信仰主义。俄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宣扬“造神说”，赫鲁晓夫要当“世界牧师”，刘少奇、林彪鼓吹尊儒崇孔，都是妄图放纵牛鬼蛇神出笼，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对信仰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展开不调和的斗争。

直觉主义

反动的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学说。它认为一种神秘的不可言说的内心体验的直觉，是认识的唯一源泉。直觉主义否认人们的感觉、经验、理性和实践活动对客观事物的认识作用，认为只有依靠一种神秘的直觉才能认识世界的本质。其主要代表是法国的柏格森。他把整个世界看成是精神性的有生命的过程，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神秘的生命之流，生命的冲动。人们只有依靠直觉，“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说的东西相契合”，这样才能深知“生命的奥妙”，把握世界的本质。直觉主义并不是什么新货色，早在古代罗马，反动的柏拉图主义，就鼓吹人通过直觉作用可以达到与神合而为一。直觉主义不过是柏拉图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

直觉主义所说的直觉，同唯物主义所说的对事物直接反应的直观是根本两码事。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不是什么精神性的有生命的过程。人们对世界本质的认识过程，也决不是什么脱离实践不用脑子思索的一种内心体验的神秘的直觉，而是在实践基础上从感性认识能动地飞跃到理性认识，并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理性认

识的过程。直觉主义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它用主观的神秘的直觉来代替人们的认识和检验真理标准的实践，公开反对实践，反对科学，贬低理性认识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直觉主义在政治上宣扬主观直觉的行动是最“合理”的，胡说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是直觉的行为，是本能的“生命的冲动”，是“合理”的。它是直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是极端反动的理论。

客观主义

资产阶级的一种唯心主义学说。它以“纯客观”、“超阶级”、“超党派”为原则来解释社会现象。它反对对社会历史作阶级分析，而抽象笼统地谈论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否认阶级斗争是这个必然性的根本内容，否认腐朽的资产阶级是阻碍历史发展的反动力量，否认无产阶级是推动社会前进的革命力量。它千方百计地掩盖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歪曲客观的事实真相，颠倒是非，混淆黑白，颂扬资本主义，把资产阶级的利益说成是全民的利益。

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是违背客观事实的。阶级社会的客观实际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根本不存在“超阶级”、“超党派”的“纯客观”的东西。要客观地正确地分析社会现象，首先必须正视这个客观现实。从这出发，才能有科学的分析，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客观主义不过是打着“纯客观”、“超阶级”、“超党派”的幌子，掩饰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和观点，是十足的主观主义。客观主义是资产阶级用来麻痹人民、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维护和巩固资产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有时从主观认识来源于客观存在的意义上运用客观主义这个概念，这和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有着根本的区别。例如，列宁曾经说过：“马克思根据阶级斗争的客观主义异常深刻地正确地了解政治现实”。（《列宁全集》第十八卷 324 页）

自然主义

以自然条件决定历史发展、用自然规律解释社会现象的错误学说。这种学说认为社会生活同自然界一样，都是服从自然规律的，人同动植物都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的心理、文化高低、国家强弱、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听命于气候、地理、土壤等自然条件的支配。历史上十七、十八世纪的自然主义，用自然原因否定上帝意志来说明社会发展的经院哲学时，曾起过反宗教、反封建的进步作用。随着阶级斗争的深入，自然主义日益趋向反动。马尔萨斯主义、社会有机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自然主义的谬种，已公开成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帝国主义侵略掠夺辩护的御用工具。俄国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贩卖反动的自然主义，鼓吹生物社会学和社会唯能论，用生物学的观点解释社会现象，胡说社会发展决定于社会能量（指生产力）的增减，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生存斗争的一种表现，其目的就是抹杀阶级斗争，修正马克思主义。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狠狠地揭露和批判了这种谬论。

自然主义否认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本质区别，用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说明社会发展的原因，这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外因论。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社会的变化发展原因，主要是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才推动了社会的前进。自然条件只是社会变化发展的外部原因，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

自然主义完全否定人类对自然界的能动作用。恩格斯说：“自然主义的历史观……是片面的，它认为只是自然界作用于人，只是自然条件到处在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它忘记了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574 页）

主观主义

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表现。它不根据客观实际，只按照主观

愿望来认识事物、对待事物、毛主席说：“主观主义是一种不正派的学风，它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它是和共产党不能并存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770—771 页）

主观主义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教条主义，脱离具体实践，把理性认识绝对化，认为只有理性的东西靠得住，感性的东西靠不住，把马克思主义不是看作行动的指南，而是当成教条，不分析具体情况，生搬硬套；另一种是经验主义，把感性认识绝对化，认为只有感性的东西靠得住，理性的东西靠不住，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不管客观情况的变化，到处搬用。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毛主席说：“**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两者都是主观主义，是从不同的两极发生的东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777 页）它们都是只看到片面，没有看到全面，把感性和理性任意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各自强调一面，忽视另一面，并加以绝对化。它们把理论和实践相脱离，主观和客观相分裂，强使客观的东西服从主观的东西。

一切阶级敌人都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派，他们同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相违背。他们用以想事的方法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因此他们对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形势发展的估计总是错误的。林彪过高估计他们的反动力量，过低估计人们的革命力量，妄图扭转历史的车轮，结果自取灭亡。革命队伍内部的主观主义是社会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思想的反映和表现，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思想基础，对革命事业有着极大的危害性，是共产党的大敌、是无产阶级的大敌。马克思主义同主观主义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只有打倒了主观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才会抬头，党性才会巩固，革命才会胜利。**”（《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758 页）因此，“**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785 页）

为了反对主观主义，我们必须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宣传唯物辩证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从实

际出发，走群众路线，实事求是，调查研究，按照客观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不断洗刷唯心精神。

教条主义

也叫本本主义，是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毛主席说：“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是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教条主义的主要特点是，脱离实践，空谈理论，轻视感性认识，夸大理性作用，只从抽象定义、概念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拒绝分析具体情况，用千篇一律的公式到处生搬硬套。教条主义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在革命队伍内部的反映和表现。教条主义除社会根源外，还有认识根源。它把主观愿望当成客观实际，主观地片面地看待一切事物，不愿认真分析具体事物的本质，把片面当全面、局部当整体、树木当森林，完全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毛主席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反对本本主义》）

教条主义是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对革命事业有着极大的危害。如我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机会主义路线头子王明一伙，不从实际出发，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拒绝了解中国革命的特点，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以机会主义路线压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致使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革命根据地和红军损失百分之九十，对中国革命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毛主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无疑地，这全部的理论 and 实际都是错了的。这是主观主义。……这是鲁莽家和门外汉的理论和实际，是丝毫也没有马克思主义气味的东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90 页）

坚持马克思主义，不仅要反对修正主义，而且必须反对教条主义。教条主义容易装出马克思主义的面孔，利用马克思主义的个别词句，吓唬工农干部和天真烂漫的青年。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

指南，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它来自实践，又是在实践中获得证明和发展的理论，是同实践紧密相联的。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教条主义者是思想懒汉，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看成是凭空出现的，否认理论的实践性。他们把理性认识绝对化，否认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割裂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他们否认事物矛盾的普遍性存在于矛盾的特殊性之中，抹杀事物的一般和个别的区别，抽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灵魂，使理论和实践相分裂，主观和客观相脱离。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整顿党的作风》等一系列光辉著作，从思想、政治、组织、军事等各方面全面地清算了教条主义，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推进了中国革命。现代修正主义者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刘少奇、林彪等，在口头上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辩证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污蔑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在现在情况下，修正主义比教条主义有着更大的危险性。因此，在批判教条主义的同时，还必须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

烦琐哲学

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一种思想方法。烦琐哲学的主要特点是，严重脱离实际，死钻牛角尖，咬文嚼字，玩弄概念游戏，专搞形式主义。烦琐哲学来源于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由于经院哲学在论证基督教教条时，采用极端烦琐的、形式主义的抽象推理方法，从已定的教条中，推演出烦琐空洞的结论。经院哲学家们还辩论一些极为荒谬无聊的问题，如“一根针尖上究竟能站得住几个天使”、“田鼠有没有眼睛”等，成年累月地争论不休。以后，人们就把空谈玄理、烦琐无聊地谈论或争论问题，统称为“烦琐哲学”或“经院习气”。马克思说：“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6 页）

烦琐哲学是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工具。中国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

统治阶级和反动儒家，鼓吹和推行一套上尊下卑、等级森严、名目繁多的礼节仪式，也是烦琐哲学的一种表现，目的是为了维护反动统治。林彪惯用“最最最最”、“灵魂的灵魂”、“核心的核心”等空洞、烦琐字眼，把烦琐哲学作为他反党篡权的反动工具。

在革命队伍内部烦琐哲学的表现，如写文章、做报告，无的放矢，空话连篇，既不提出问题，也不分析问题，更不解决问题，只是罗列一大堆表面现象，拼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词句，使人得不到要领，这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对革命事业有着极大的危害性。

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反对烦琐哲学，反对一切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对主观主义。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关于党八股第五条罪状（“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的揭露和批判，就是针对烦琐哲学的。毛主席斥责烦琐哲学的这种形式主义方法，“**实在是一种最低级、最幼稚、最庸俗的方法**”。（《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795 页）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揭露和批判烦琐哲学，在工作中要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做报告、写文章，要简明扼要，反映客观实际，作具体分析，抓住实质；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在实践斗争中学习和掌握辩证唯物主义。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唯物辩证法

即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是唯一科学的辩证法。毛主席说：“**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矛盾论》）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经验和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并批判地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创立的。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伟大革命。

黑格尔唯心辩证法认为，客观世界的辩证运动规律是“绝对观

念”的辩证运动规律的体现。唯物辩证法与唯心辩证法相反，认为物质世界本质有着自己的辩证运动规律，人的头脑中的辩证思维只是物质世界辩证法运动规律的自觉反映。马克思曾明确表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217 页）

唯物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相反，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处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任何事物都有它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矛盾既有普遍性，又有特殊性，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有矛盾就有斗争，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统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事物总是要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形而上学就是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反面这样一个真理。

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就是承认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一分为二的。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240 页）毛主席说：“**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规律和范畴，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

唯物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是指导三大革命实践的锐利武器。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主要地就是教导人们要善于去观察和分析各种事物的矛盾运动，并根据这种分析，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法。一分为二是唯物辩证法的根本观点和方法。在阶级社会里，就是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观察和分析一切问题。毛主席指出：“**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运用唯物辩证法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

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指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前进的方向。只有以唯物辩证法指导三大革命实践，才能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斗争中，不断地取得胜利。

唯物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218 页）它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着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因此，它引起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的刻骨仇恨。从伯恩斯坦、考茨基到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以及刘少奇、林彪等叛徒，都竭力攻击、歪曲辩证法。林彪污蔑辩证法是“变化法”，胡说“辩证法就是那么几条”，象“玩积木一样”，可以任意拼凑，妄图用“合二而一”论、“中庸之道”和诡辩来代替一分为二的辩证法，为他们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因此，坚持唯物辩证法，反对形形色色的形而上学和诡辩，对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

唯物辩证法是在斗争中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同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者的形而上学斗争中，写出了《哲学的贫困》、《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阐明了唯物辩证法的性质、对象、任务、规律和范畴，并运用它研究自然界的和社会历史，大大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列宁在同第二国际和俄国修正主义者的形而上学斗争中，写出了《谈谈辩证法问题》、哲学笔记等著作，阐明了对立统一是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并运用它指导当时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在同我国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和国际上帝、修、反的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实践论》、《矛盾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并运用它指导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一万年以后还会存在。唯物辩证法将在同

各种形而上学的斗争中不断地发展。

辩证法

和形而上学对立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在古希腊文中，辩证法一词，是进行谈话和辩论的意思。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法就是发展的学说、矛盾的学说。恩格斯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81页）列宁说：“就本来的意义说，辩证法就是研究对象的本质自身中的矛盾”。（《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278页）不论自然界或人类社会，都是按其本身固有的辩证性质发展着，人们的辩证思维，乃是客观世界的辩证规律的反映。

辩证法的发展观同形而上学的发展观是对立的。列宁指出：“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相互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列宁选集》第二卷712页）这是区别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根本标志。

毛主席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矛盾论》）在中国，先秦法家、兵家、道家、名家的著作中，就包含着许多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例如，商鞅说，“以战去战，以刑去刑”；孙武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名家认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些便是很好的例证。在欧洲，古希腊辩证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赫拉克利特提出了万物皆变、对立统一、相反者相成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对辩证思维的主要形式作了初步探讨。“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矛盾论》）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黑格尔对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马

马克思称赞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恩格斯也称赞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界、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不断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的过程，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多次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在其原有形式上是什么用处也没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改造了它，创立了唯物辩证法。从此，辩证法才真正成为科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

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就是承认自然界、社会和人类的思维都是对立的统一。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一开头就指出：辩证法的实质在于“**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列宁选集》第二卷 711 页）毛主席用“一分为二”来表述辩证法的实质，并在《矛盾论》中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观点，明确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同时他还指出，矛盾的双方在一定条件下既互相联系又互相转化，便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从而得出结论说：“**科学地反映现实变化的同一性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辩证法的发展经历了三种形态，即朴素的、神秘的、科学的形态。古希腊哲学、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便是这三种形态的典型代表。在人类认识史上，辩证法是同形而上学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斯大林说：“**辩证法是在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中成熟的**”。（《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279 页）一般说来，辩证法是反映进步的革命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形而上学是代表没落的反动的阶级、阶层的利益和要求。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实质上是社会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

恩格斯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482 页）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反动的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蔑视辩证法，结果都被辩证法所否定。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比资产阶级高明，他们懂得事物的生存和发展，他们懂得辩证法，他们看得远些。我们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觉地和形而上学作斗争，

积极投入三大革命实践，才能逐步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一锐利武器，去正确观察、分析和解决各种矛盾。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

恩格斯说：“所谓客观辩证法是支配着整个自然界的，而所谓主观辩证法，即辩证的思维，不过是自然界中到处盛行的对立中的运动的反映而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34 页）这就是说，客观辩证法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所固有的辩证运动规律；主观辩证法是人的思维的辩证运动规律，它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辩证运动规律在人的思维中的反映。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的最根本的规律都是对立统一的规律。所不同的是，客观辩证法是自发地起作用，而主观辩证法是人们自觉地把辩证运动规律应用于思维。

恩格斯说：“头脑的辩证法只是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的运动形式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31 页）毛主席说：“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应把它看作是客观矛盾的反映。客观矛盾反映入主观的思想，组成了概念的矛盾运动，推动了思想的发展，不断地解决了人们的思想问题。”（《矛盾论》）客观过程的发展充满着矛盾和斗争，人的认识运动的发展也是充满着矛盾和斗争。社会实践中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是无穷的，人的认识的发生、发展和消灭的过程也是无穷的。客观现实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的实践和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一切客观世界的辩证法的运动，都或先或后地能够反映到人的认识中来。”（《实践论》）这就是由客观辩证法向主观辩证法的转化。

要使客观辩证法转化为主观辩证法，重要的条件就是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要积极地参加革命实践，对客观事物作周密的调查和研究；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

从客观辩证法转化为主观辩证法，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

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的多次反复才能完成。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往往要经过许多片面的或错误的认识，逐步克服这些片面或错误，才归于正确。人们掌握了主观辩证法，在三大革命实践中就有了主动权，就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客观辩证法和主观辩证法的辩证关系原理告诉我们：人们要尊重客观辩证法，就必须使自己的思想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毛主席说：“人们的思想必须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情况。”（《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序言）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基础。能不能使思想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是关系到能不能实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党的正确路线和政策，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尖锐、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过对我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变化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经过对各个不同时期的形势进行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来的，是完全符合实际情况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人民群众利益的。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是完全违背事物发展客观规律和人民群众利益的，因而是完全错误的。

客观的规律、历史的潮流是不可抗拒的。从孔丘到林彪都是违抗客观辩证法、历史辩证法，妄图开历史倒车，结果都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古代辩证法

指古代社会产生的一种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法。它是辩证法的最初形态。毛主席说：“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就产生了。但是古代的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矛盾论》）

古代辩证法就其总的成就来说，已经笼统地认识到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一切事物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对立面可以互相转化，由于对立面的斗争而产生万物。例如在中国，先秦法家主要代表韩非认为，“夫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谓常。”事物是不断变化的，没有什么永恒不

变的東西。他还把矛盾的概念引入哲学，以朴素的形式表达了矛盾双方是互相排斥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此外，法家商鞅提出的“以刑去刑”、“以战去战”，法家荀况提出的“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思想，都是以朴素的形式表达了通过斗争促使事物向反面转化的思想。名家、唯物主义者惠施认为，“物方生方死”、“日方中方睨”、“天与地卑”、“山与泽平”，说明事物都是运动变化的。名家还认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以朴素的形式表达了事物的无限可分性。兵家孙武、孙臆论述了许多战争的辩证法思想。孙武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孙臆说：“故善战者，见敌之所长，则知其所短；见敌之所不足，则知其所有余。”都是说明要全面地看问题。道家老子的哲学也包含着许多辩证因素。

他说：“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认为有无、难易、长短等都是互相依存的，失去一方，另一方就不存在。他又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认为坏事（祸）和好事（福）可以互相转化。但是，他的辩证法基本上是消极的。

在欧洲，古希腊唯物主义者赫拉克利特认为，“一切皆流，无物常住”，“同一事物既存在又不存在”。他有一句名言，“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他认为“统一物是由两个对立面组成的”，“宇宙中的各个部分都可分为相互对立的兩半：地分为高山和平原；水分为淡水和咸水……同样，气候分冬和夏，春和秋”，“互相排斥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不同的音调造成最美的和谐；一切都是斗争所产生的的。”列宁称他为“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390 页）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辩证思想的杰出代表，他对辩证思维形式作了认真的研究。在他的《形而上学》一书中，充满了“辩证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416 页）

古代辩证法的特点是，它直观地猜测到客观世界辩证发展的总的轮廓，但不能具体说明客观世界各个部分的辩证发展，因为对世界的认识是不完备的。这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毛主席说：“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因而不能完全解释

宇宙，后来就被形而上学所代替。”（《矛盾论》）

古代辩证法是在同古代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的。在中国，法家、名家的辩证法思想是在同儒家“无变古，毋易常”、“中庸之道”等形而上学的斗争中发展的；在欧洲，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思想是在同毕达哥拉斯学派、埃利亚学派等形而上学思想作斗争中发展的。古代辩证法和古代形而上学的斗争，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在哲学上的反映。有的是反映奴隶主民主派和奴隶主贵族的斗争，有的是反映新兴地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的斗争。

黑格尔辩证法

黑格尔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最重要的成果之一。毛主席说：“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矛盾论》）

黑格尔对辩证法的重要贡献是，他批判了形而上学，第一个系统地表达了辩证法的基本特征。

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思想是概念的自我发展。他认为，绝对观念是不断地运动发展的，而绝对观念的运动就是概念本身的自我发展。“概念的发展在哲学里是必然的，同样概念发展的历史也是必然的。”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只是概念的自己的运动的翻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38—239 页）黑格尔关于运动发展的观点是值得重视的，但他把客观世界的辩证发展看成是概念辩证发展的体现，完全颠倒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

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叙述了辩证法的三个规律。第一个规律是质量互变规律。他说：“‘有’的变化从来都不仅是从一个大小到另一个大小的过渡，而且是从质到量和从量到质的过渡，是变为他物，即渐进过程之中断以及与先前实有物有质的不同的他物。”第二个规律是对立的相互渗透规律。他说：“一切事物在其自身中都是矛盾

的”，“矛盾却是一切运动和生命力的根源”。“说它们既对立而又统一，这就是矛盾。但是谁如果要求一切事物都不带有对立面的统一那种矛盾，谁就是要求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不应存在。”第三个规律是否定之否定规律。他认为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二者可以互相转化。他指出：如果某物被规定为肯定的东西，那末，从这个基础出发继续前进，它立刻就会直接转化为否定的东西；反过来，被规定为否定的东西也会直接转化为肯定的东西。他把这一规律归结为正、反、合的公式，即正题、反题、合题。黑格尔辩证法，特别是矛盾的学说，是马克思以前辩证法的最高成果，包含着合理的内核。

黑格尔辩证法强调逻辑和认识论、历史是一致的。他说：“精神的运动就是概念的内在发展：它乃是认识的绝对方法，同时也是内容本身的内在灵魂。”概念的自我发展，既是认识的绝对方法，又是一切事物的内在灵魂。“在哲学历史上所表现的思想进展的历程与在哲学系统里所发挥的思想进展的历程，原是相同的”。历史的发展和哲学思想的发展是一致的。列宁指出，按照黑格尔的理解，“**逻辑学是和认识论一致的。这就是极重要的问题**”。（《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186 页）但黑格尔认为，“**在概念与实在的统一里，概念仍是统治的因素**”，一切都统一于绝对观念，这显然是唯心的。

总之，黑格尔辩证法是神秘的、头足倒置的辩证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第二章中，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特点作了精辟的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说：“**黑格尔认为，世界上过去发生的一切和现在还在发生的一切，就是他自己的思维中发生的一切。因此，历史的哲学仅仅是哲学的历史，即他自己的哲学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085 页）黑格尔辩证法在其原有的神秘形式上是毫无用处的。只有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批判和改造后，才把他的辩证法思想从唯心主义的体系中拯救出来。黑格尔辩证法也不可能是彻底的，他认为矛盾最后要被调和，“矛盾并不是究竟至极的，矛盾会扬弃它自己”。在他所谓“绝对观念”的最高境界里就不会再有任何矛盾了。他认为发展是有顶峰的，哲学发展到黑格尔哲学就到顶了，历史发展到普鲁士君主立宪政体也到顶了。他认为自然界没有时间上的历

史，这也是形而上学的。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25、214 页）

黑格尔辩证法是总结了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成就，吸取了德国古典哲学另一些代表人物的辩证法思想，并在同十七世纪的莱布尼茨及其后继者沃尔夫的形而上学，以及十七、十八世纪的机械论和康德的不可知论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黑格尔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体系的矛盾，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两重性在哲学上的反映。他的辩证法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进步要求。他的唯心主义以及辩证法的不彻底性，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向封建势力妥协和对人民革命的恐惧和憎恨。

对立统一规律

也叫矛盾法则、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和核心。列宁说：“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面的统一的学说。这样就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说明和发展。”（《列宁选集》第二卷 608 页）毛主席第一次明确指出：“事物的矛盾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矛盾论》）这是因为，它揭示了客观事物所固有的辩证性质；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最根本的原因；揭示了唯物辩证法的总的特征。对立统一规律是唯物辩证法其他规律和范畴的基础。例如量变和质变、肯定和否定、本质和现象、必然和偶然等等，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它象一条红线贯穿于唯物辩证法的一切方面。掌握了对立统一规律，也就从根本上懂得了唯物辩证法。

对立统一规律告诉我们，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内部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凡是对立统一，都是说不同性质的内容、对立的東西来统一。矛盾双方一方面互相作对、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具有斗争性；另一方面又互相联结、互相依赖、互相转化，具有统一性。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矛盾双方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使一事物

变为他事物。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动力。

对立统一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自然界中，机械运动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运动中的阳电和阴电、化学运动中的化合和分解、生物运动中的同化和异化，以及大至天体运动中的吸引和排斥、小至原子核中的质子和中子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在人类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先进和落后、新和旧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在人们思想中，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正确和错误等等，也是对立的统一。毛主席曾经用很通俗的例子深刻地阐明对立统一规律的普遍性。他说：“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这四个指头和大拇指也是对立的统一。又说世界上“不纯是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总之，“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

对立统一规律先是由黑格尔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加以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总结了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经验和科学新成就，批判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这一学说，创立了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等光辉著作中对这一规律进一步提出了许多论述。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研究了中国社会复杂的矛盾，总结了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在《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中，又进一步发展了对立统一规律的学说，特别是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明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重大贡献。

掌握对立统一规律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具有重大的意义。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有阶级就有阶级斗争，有政党就有党内路

线斗争。有尊孔就必有反孔。前进性和曲折性的对立统一，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也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学会运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问题，处理问题，指导工作，推动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就能使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认清方向，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去夺取革命的新胜利。

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由于他们代表反动阶级的利益，总是竭力攻击、否认和歪曲对立统一规律。特别是苏修的御用学者，胡说什么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立统一规律“已经过时了”，鼓吹“对立向差别转化而以差别的融合结束”，宣称“统一”、“一致”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可以“逐渐成长为共产主义”，叫嚷苏联现在“已经没有阶级对立”、“没有阶级矛盾”等等。他们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发展的根本规律，宣扬“矛盾融合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是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专政制造理论根据。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也玩弄诡辩术，否认辩证法，宣扬“希望没有矛盾”，污蔑我们党“制造矛盾”，胡说我国“社会主义在各个方面基本上战胜了资本主义”等等。其罪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

一分为二

即对立统一规律。一分为二极其深刻、简明而又通俗地表达了对立统一规律，表达了唯物辩证法的实质。列宁曾经指出：“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列宁选集》第二卷 711 页）毛主席进一步发展了列宁的思想，指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贡献。

一分为二是指一切事物内部包含着两个互相对立而又互相联系的方面；其中一方是主要的，另一方是次要的；这两个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各向其相反的方面转化，使一事物变为他事物；对立的统一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一分为二的核心在于“分”，就是承认矛盾，承认斗争，承认转化。

一分为二是宇宙最根本的规律，是事物固有的辩证法性质，从自

自然界、社会到人们的思想都是可分的。一分为二是普遍的，只是不同的事物“分”的内容不同罢了。在自然界，机械运动中的作用和反作用；物理运动中的吸引和排斥；化学运动中的化合和分解；生物运动中的同化和异化、遗传和变异，都是一分为二的。在阶级社会中，奴隶社会的奴隶和奴隶主，封建社会的农民和地主，资本主义社会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也是一分为二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既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是一分为二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一分为二的。在我们党内，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是一分为二的。在人们思想中，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也是一分为二的。总之，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由对立着的两个方面组成的。事物总是作为一个过程而向前发展的，而任何一个过程，都是由矛盾着的两个侧面互相联系又互相斗争而得到发展的。

事物的一分为二是无限的，没有穷尽的。由原子论到“基本粒子”理论的发展史，有力地证明了这个真理。不但原子可分为原子核和电子，原子核又可分为质子和中子，质子又可分为质子和反质子，而且还可以无限地分解下去。我国战国时期的名家认为：“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这是以朴素的形式表达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因此人们对物质的认识也是无穷无尽的。

一分为二是斗争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矛盾不断发生，不断斗争，不断解决。一万年也是如此。毛主席说：“**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这样，如果没有对立两个方面的斗争，事物就不能发展，人类就会灭亡。在阶级社会里，资本家讲：你们工人做工，我发给你们工资，不是蛮好。工人就给他一分为二，资本家是剥削工人为生的，我们工人是受剥削的，这样工人不愿受剥削，起来斗争，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社会就前进了。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的社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始终。社会主义社会就是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曲折地

向前发展的。坚持一分为二，就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就要看到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长期性，看到反修防修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长期性；同时还要看到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不同特点。

一分为二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锐利武器，是无产阶级分析和对待一切事物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按照一分为二的观点，就必须善于具体地分析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并且要看到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阶级社会中，就是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去分析一切，这样才能分清是非，继续革命。工农兵说得好：“一分为二无价宝，继续革命离不了，大是大非分得清，革命到底不动摇。”掌握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这是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各项政策的重要保证。对自己，对同志，都要一分为二。这样，才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基础上团结对敌。

一切阶级敌人对一分为二都怕得要死，恨得要命。他们从反动阶级的本性出发，疯狂地反对一分为二。苏修叛徒集团的御用学者恶毒攻击一分为二是“假辩证法”、“分裂哲学”，是“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胡说一分为二是“统一没有了，只存下一味的斗争”。刘少奇在哲学界的代理人、叛徒杨献珍，公开抛出“合二而一”来反对一分为二。林彪也鼓吹“二合为一”来与“一分为二”相对抗。千百万群众的实践证明，一分为二是普遍真理，而形形色色的矛盾调和论、“合二而一”论都是地地道道的叛徒哲学、分裂哲学和假辩证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就是一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不断地一分为二的历史，这是铁的事实，任何谎言和诡辩都是抹杀不了的。苏修叛徒集团和刘少奇、林彪反对一分为二，鼓吹“矛盾调和”论、“合二而一”论，其反动目的都是为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分裂党，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复辟资本主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同以苏修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必将得到新的发展。

两重性

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互相矛盾的两种属性。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而且永远会有。只是由于事物的性质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形式罢了。列宁指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有两面。”（《列宁全集》第六卷 111 页）毛主席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088 页）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真老虎。后来，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成为反动派、纸老虎。乱子也有两重性。乱子是坏事，但坏事经过正确处理，经过批判和总结，可以锻炼、教育干部和群众，又成为好事。革命斗争中出现的反复和曲折，也有两重性。它给革命带来了一时的困难，但经过正确地总结经验教训，又为革命事业的更大成功准备了条件。世界战争也有两重性，它有破坏的一面，同时也能使人民觉悟起来，可以引起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也有两重性，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二是可以当革命人民的反面教员。革命的同志也有两重性，就是有正确和错误。总之，没有两重性的事物是不存在的。

由于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因此我们必须运用两点论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一切事物，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不但要看到事物的现状，也要看到矛盾双方经过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要看到事物的两重性，要学会用一分为二的辩证方法去分析和处理各种问题。

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否认事物具有两重性。苏修叛徒集团不仅否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而且否认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具有两重性。他们恶毒攻击毛主席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叫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真老虎，不是纸老虎。其目的是为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压制世界人民反对两霸的革命斗争制造反动舆论。无数事实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帝国主义和一切

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两点论

即一分为二，也是毛主席对唯物辩证法实质的简明而生动的概括。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都有两点；一点里面又有两点；一万年都有两点。两点论是事物矛盾的正确反映。

两点论是唯物辩证法分析一切事物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因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因此必须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分析一切事物。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告诉我们，在认识事物、分析矛盾的时候，都要看到它的两个方面，而且要严格地把它分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两个方面，要用全面的、发展的观点去分析和对待事物。既要看到事物的正面，又要看到事物的反面；既要看到事物的个性，又要看到事物的共性；既要看到事物的本质、主流，又要看到事物的非本质、支流；既要注意一种主要倾向，又要注意可能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既要看到事物的现在，又要看到事物的将来。比如看形势，既要看到在正确路线指引下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又要看到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既要看到革命发展过程中反复和曲折的必然性，又要从反复和曲折的发展中看到革命胜利的必然性；既要看到斗争后的胜利，又要看到胜利后还有斗争；在敌人猖狂进攻时，既要看到他们真老虎的一面，又要看到他们纸老虎的虚弱本质；在表面的“平静”中要看到不平静，如此等等。又如对一个单位的工作，不仅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要看到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成绩总是主要的。这就是用两点论来观察和指导革命工作。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看问题要从各方面去看，不能只从单方面看。”（《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055 页）只有运用两点论去分析事物，才能克服思想上的主观性和片面性，正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认清事物发展的方向，并在实践中取得胜利。

叛徒林彪胡说“辩证法两点论（两个组成部分），又是一点论”，

别有用心地把辩证法污蔑为一点论，把两点论和一点论混为一谈，这是对辩证法和两点论的恣意歪曲和恶毒攻击。两点论同“一点论”是根本对立的。“一点论”认为事物只有一点，没有两点。它只看到事物的一面，看不到事物的另一面；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现象和支流，看不到本质和主流；只看到一种倾向，看不到另一种倾向；只知道斗争，不知道斗争过程中有起有伏、有张有弛；或者只知道联合，不知道联合过程中包含着对反动事物、分裂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斗争；只看到事物的现状，看不到事物的变化和发展。看工作，不是否定一切，看不到成绩和光明，就是肯定一切，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能赞扬，不能批评。看后进单位，只看到落后，看不到进步，看不到后进变先进的可能性。“一点论”是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主观地片面地静止地看问题，是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完全违背客观事物固有的辩证性质。用它来指导工作，必然使工作遭受损失。

苏修叛徒集团恶毒攻击“两点论”是“折衷主义”，完全是别有用心。两点论跟折衷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折衷主义所谓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并不是事物内部所固有的内在联系，而是任意地把两个方面凑合在一起；或者把矛盾的两个方面平列起来，不看主要、次要，不分主流、支流，结果掩盖了事物的真象，模糊了事物的性质。折衷主义貌似全面地看问题，实际上是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是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它表现在政治上就是阶级调和论，完全是反动的理论。

重点论

指在分析事物矛盾的两方面时，要分清主要和次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马克思主义所以要坚持重点论，是因为事物“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

重点论要求人们在分析问题和处理工作时，要分清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从而抓住重点，抓住主流和本质，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毛主席说：“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

的，什么是次要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34 页）在政治与军事、政治与经济、政治与业务、政治与技术的关系中，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是统帅，是统率军事、统率经济、统率业务、统率技术的。因此在一切工作中，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并且为各项具体工作规定了具体的路线和政策。我们在工作中，不但要重视党的具体的工作路线和政策，而且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党委要注意抓大事，抓路线，抓整治思想工作。如果大事不讨论，埋头抓小事，这样发展下去，势必要搞修正主义。

坚持重点论，还必须注意分析重点和一般、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变化。例如苏联，无产阶级由统治地位转化为被统治、被奴役的地位，社会的性质就由社会主义国家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

懂得重点论的道理，对搞好革命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只有坚持重点论，才能认清事物的本质，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列宁在谈到马克思恩格斯善于抓住重点时指出：“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唯物辩证法的典范，看到善于针对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的具体特点，把问题的不同重点和不同方面提到首位并加以强调的本领。”（《列宁全集》第十二卷 345 页）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历次运动中，都明确提出了重点和相应的政策，指引着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重点论跟折衷主义是根本对立的。折衷主义把事物矛盾的两方面平列起来，不分主要和次要、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结果掩盖了事物的真象，模糊了事物的本质。林彪反党集团在政治与业务的关系上，一会儿鼓吹“业务挂帅”、“技术第一”，否认无产阶级政治的统帅地位；一会儿鼓吹“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把政治的统帅作用歪曲为“冲击”作用，实际上是用地主资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政治。他们还胡说什么，讲政治时“革命第一”，讲生产时“生产第一”，

“要照顾两头”，这就是用折衷主义来偷换唯物辩证法，把两点论中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修正主义，其目的是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

矛盾

毛主席说：“一切矛盾着的方面都因一定条件具备着不同一性，所以称为矛盾。然而又具备着同一性，所以互相联结。”（《矛盾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过程和人们的思想，都包含着这样带矛盾性的方面，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例如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和奴役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为了反对剥削和奴役，就要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它们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的。但是，它们又互相联系、互相依赖。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它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由原来的被统治地位转化为统治地位；资产阶级由原来的统治地位转化为被统治地位。这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又如工业和农业、红与专以及战争中的进攻和防御等等，都是矛盾，都是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的。如果割裂矛盾双方的这种辩证关系，势必陷入形而上学的泥坑。

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你承认它，它存在着；你不承认它，它还是存在着。矛盾又是普遍的、绝对的。毛主席指出：“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穿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认了一切。”“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论》）

有矛盾就有斗争。矛盾和矛盾的斗争是事物发展的动力。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辩证法的死敌。苏修御用学者胡说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本身并不是好事”，矛盾多半只起“显示缺点的信号作用，正如疼痛是疾病的信号一样”；林彪也叫嚷“我们当然希望没

有矛盾”，“矛盾一方面是坏事”。他们所以要在哲学上否认矛盾，都是为了在政治上取消无产阶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学说，就是要学会分析矛盾，解决矛盾，不断革命，永远革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两点论，反对一点论，特别是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要“听到矛盾就发愁，碰到矛盾绕道走，解决矛盾不敢斗”。只有敢于承认矛盾，大胆地揭露矛盾，认真地分析矛盾，积极地解决矛盾，推动革命不断前进，才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做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矛盾的普遍性即矛盾的共性。毛主席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说，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其二是说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论》）无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或人们的思想中，都充满着矛盾。每一个事物从其产生到灭亡的全过程，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都始终存在矛盾。矛盾处处在，矛盾时时有，旧的矛盾解决了，又出现新的矛盾。矛盾是一切事物发展的动力，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的普遍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

矛盾的特殊性即矛盾的个性，是指“矛盾着的事物及其每一个侧面各有其特点”。（《矛盾论》）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事物的特殊矛盾决定事物的特殊本质，这是世界上各种事物所以有千差万别的内在原因或根据。认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是人们科学地认识事物的基础。矛盾的特殊性有各种情形，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各个发展过程、各个发展阶段的矛盾以及各个过程、阶段上的矛盾的各方面，都有其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

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就是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每一事物内部不但包含了矛盾的特殊性，而且包

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特殊性包含了普遍性。无论是自然界、社会或是人们的思想中的任何一对矛盾，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例如，每一个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这是矛盾的共性；但是，在每一个社会里，它的基本矛盾又有各自的表现、特点，这是矛盾的个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在一定场合为普遍性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特殊性；反之，在一定场合为特殊性的东西，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普遍性。例如，阶级矛盾是一切阶级社会共有的，是矛盾的普遍性，但阶级社会只是人类社会的特定阶段，因而它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来说则是特殊的。

正确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是正确认识矛盾和解决矛盾的关键。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就能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普遍原因，找到解决矛盾的总的方向。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就能发现事物运动发展的特殊原因，找出解决矛盾的具体方法。我们认识事物，必须以矛盾普遍性原理为指导，又必须从事物的矛盾特殊性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说，总是先认识个别的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是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联结原理的体现，是各国人民革命胜利的根本保证。毛主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这是为各国人民的无数革命斗争实践所证明了的。修正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却任意割裂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从不同方面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毛主席指出：“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主义，把它看成僵死的东西，这是教条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所以，关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原理，是我们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主要矛盾就是在许多矛盾中起着领导和决定作用的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次要矛盾就是处于从属和服从地位的矛盾。在复杂事物中，都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分，它表明了各种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毛主席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矛盾论》）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是辩证的统一。二者既互相依存又互相作用。主要矛盾对次要矛盾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解决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就可迎刃而解；但是次要矛盾的存在和解决，也影响着主要矛盾的发展和解决。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互相转化，次要矛盾可以上升为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可以下降为次要矛盾。

毛主席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不论对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以及日常的工作和学习，都是如此。“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抓纲也就是抓住主要矛盾。在一切革命斗争中，全力抓住路线这个纲，就可以推动各项工作向前发展。

在主要矛盾问题上，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始终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抓住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主要依据。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正确地分析了我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主要矛盾，制定了民主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而使我国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一切修正主义者为了推行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和篡改各个革命阶段的主要矛盾。例如，一九五六年，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刘少奇伙同陈伯达抛出了所谓“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的

谬论，偷偷塞进“八大”的决议。一九六四年，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刘少奇又抛出所谓“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等奇谈怪论，来掩盖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的政治报告，认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鼓吹唯生产力论，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恩格斯说：“为了达到伟大的目标和团结，为此所必需的千百万大军应当时刻牢记主要的东西，不因那些无谓的吹毛求疵而迷失方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八卷 270 页）因此我们在工作中，一定要“牢记主要的东西”，“牵牛要牵牛鼻子”，“力气用在刀口上”，而决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或者“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唯物辩证法强调抓主要矛盾，并不是忽视次要矛盾，次要矛盾也必须逐一加以解决。要“学会‘弹钢琴’”，“**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32 页）这样，才能有节奏地把工作推向前进。由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善于掌握和预见主要矛盾的转化，及时提出新的任务和口号，自觉地有准备地把革命斗争从一个阶段推进到另一个阶段。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

毛主席指出：“矛盾着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矛盾论》）矛盾的主要方面就是在一对矛盾的对立双方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矛盾的次要方面就是处于被支配地位的方面。任何一对矛盾，都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它表明了矛盾双方力量的不平衡性。例如，战争的目的，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又如，从战争的全体来看，作为消灭敌人之主要手段的进攻是主要的，而作为消灭敌人之辅助手段和作为保存自己之一种手段的防御，是第二位的。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是辩证的统一，二者既互相依存又互相转化。没有主要，就没有次要；没有次要，也无所谓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支配次要方面；矛盾的次要方面也影响主要方面。在政治和经济、业务、军事的关系中，政治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反过来，经济、业务、军事的发展，也影响着政治的发展。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换位置，主要方面由大变小，变为非主导方面，次要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主导方面。这是依据矛盾双方斗争的力量增减来决定的。有人认为，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实践和理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些矛盾，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是主要的，它们的地位并不互相转化。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作用。然而，在一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

毛主席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论》）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随着矛盾主要方面的转化，事物的性质也就发生变化。例如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这就决定了旧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由于无产阶级领导广大人民进行民主革命，打倒了三大敌人，使国内的反动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原理告诉我们，在认识事物、分析和处理问题时，一定要分清主要和次要、主流和支流、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和重点论。无论看形势，搞群众运动，指导战争，分析一个单位、一个人的工作，都要善于抓住本质和主流。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的景象，认清事物的本质，明确事物发展的方向；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指导革命的胜利发展；才能在工作中突出重点、抓住关键，促进事物向有利于革命的方面发展。如果不分主次，把矛盾两方面并列、等同起来，就会犯折衷主义的错误，在政治上可能走向机会主义。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

矛盾的同一性，也叫统一性、一致性。毛主席指出：“一切矛盾着的东西，互相联系着，不但在一定条件之下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互相转化，这就是矛盾的同一性的全部意义。”（《矛盾论》）例如，生和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等等，都是在一定条件下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系和互相转化。生转化为死，死物转化为生物，这是科学的事实。原来是被统治的无产阶级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转化为统治者，原来是统治者的资产阶级却转化为被统治者，中国已经是这样做了，全世界也将要这样做。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这是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只有机会主义和形而上学，才否认这些转化。

矛盾的斗争性，是指矛盾双方互相排斥、互相对立、互相斗争。有矛盾就有斗争，没有斗争就不成其为矛盾。“一切过程中矛盾着的各方面，本来是互相排斥、互相斗争、互相对立的。”（《矛盾论》）矛盾的斗争是普遍的，它贯穿于一切过程和每一过程的始终，并使一过程向着他过程转化。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矛盾的斗争是一切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马列主义同修正主义，真理同谬误，新生事物同腐朽事物，前进同倒退，革命同复辟，都是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旧毒，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和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和努力。”（《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251 页）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否认矛盾的斗争性，宣扬矛盾调和论，是一切反动阶级的腐朽哲学，是一切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共同特点。孔孟鼓吹“执其两端，用其中”、“和为贵”、“无所争”。叛徒刘少奇胡说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矛盾”，攻击党内斗争是“故意去寻找‘斗争对象’，作为‘机会主义的代表者’来开展斗争”。叛徒、卖国贼林彪胡说“中庸之道……合理”，鼓吹“两斗皆仇，两和皆友”，攻击我党反修斗争是“做绝了”、“骂绝了”、“斗绝了”，咒骂斗争哲学是“整人哲学”。这些谬论，都是否认对立面的斗争，否认矛盾转化，反对革命变革，反

对社会的前进运动，力图保持旧事物使它免于死亡，为复辟倒退路线制造反动舆论。他们的反动阶级本性和反革命野心决定他们对革命人民的斗争和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怕得要死，恨得要命。

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恩格斯说：“**真实的具体的同一性包含着差异和变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538页）我们常说“相反相成”，就是说相反的东西有同一性。矛盾的斗争性寓于同一性之中，在同一性中存在着斗争性。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有条件的相对的同一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论》）

掌握同一性和斗争性相互关系的原理，对于正确制定和领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党制定的在统一战线中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就是以同一性和斗争性相结合的原理为依据的。一切修正主义者从形而上学世界观出发，总是从不同方面割裂同一性和斗争性的关系，或者借口同一，否认斗争，或者借口斗争，否认同一。在统一战线中，他们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他们根本不懂得联合和斗争的辩证关系。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十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及时发现，及时纠正”。否认人民内部存在矛盾，只讲团结，不讲斗争，就会危害革命事业；而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只讲斗争，否认团结，看不到革命团结的极端重要性，也会危害革命事业。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事物的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而矛盾的性质和斗争的形式却是多种多样的。矛盾的性质基本上可分为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两类，矛盾斗争的形式也可分为对抗和非对抗两种。

对抗性矛盾是指最后要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的矛盾。在阶级社会里，是指阶级利益根本对立的矛盾。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都是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才能解决。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同本国人民群众的矛盾，也是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也必须通过本国人民群众的暴力革命去解决。马克思指出：“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104 页）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矛盾必须用无产阶级专政的方法去解决。在党内，广大党员同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的矛盾是对抗性矛盾，对这些人必须清除出党，并不准重新入党。

非对抗性矛盾是指不需要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去解决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是指阶级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例如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只能用无产阶级民主的方法，即说服、教育、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加以解决。毛主席指出：“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民内部在某些问题上看法不一致，应当通过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提高认识、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逐步地统一起来。即使某些认识一时统一不了，也应当从革命大局的利益出发，求大同，存小异，共同团结对敌。

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根据事物的具体发展，有些矛盾是由原来非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对抗性的；也有些矛盾则由原来是对抗性的，而发展成为非对抗性的。”（《矛盾论》）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

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民族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我党十次路线斗争的事实证明，党内正确思想和错误思想的矛盾，在开始的时候，或在个别的问题上，并不一定马上表现为对抗性的。但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就可能发展为对抗性的了。随着矛盾性质的转化，斗争的形式也要相应地加以改变。

正确区别和处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内容。阶级敌人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总是竭力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因此，我们必须在斗争中努力提高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识别能力，按照毛主席提出的区别香花和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严格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并采取正确的方针和斗争方法，以团结真正的朋友，打击真正的敌人，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

基本矛盾

也叫根本矛盾，它规定事物发展全过程的本质，并规定和影响这个过程中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毛主席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过程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矛盾论》）基本矛盾没有解决，事物的发展过程也就没有完结。例如，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这种基本矛盾没有解决，整个过程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又如当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没有过时，仍然是我们今天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这是因为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还没有解决，因此它所规定的时代的性质也不会改变。只有当基本矛盾解决了，整个过程才会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

事物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事物发展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例如，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虽然整个过程中根本矛盾的性质，即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性质，并没有变化，但是却经过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几个发展阶段。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会区分出很多阶段来。

掌握事物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毛主席根据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正确地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指引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林彪反党集团歪曲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胡说党的“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是刘少奇、陈伯达塞进党的“八大”决议中的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林彪反党集团还反对毛主席对当代世界基本矛盾的分析，歪曲时代的性质，胡说我们的时代“和列宁时代不同”。其目的就是妄图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复辟资本主义。

统一体

指在一定条件下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的整体。毛主席说：“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矛盾论》）

毛主席说：“在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统一体总要分解为不同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具体条件下，内容不同，形式不同罢了。”（《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不同的事物，由于矛盾性质不同，有着不同的矛盾统一体。没

有矛盾的绝对统一体是不存在的。在统一体中，矛盾双方存在主次之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和富有是两个对立面。它们本本身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二者都是由私有制世界产生的。问题在于这两个方面中的每一个方面在对立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确定的地位。只宣布它们是统一整体的两个方面是不够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43 页）

在统一体内，矛盾双方有同一性，又有斗争性。同一性是相对的，斗争性是绝对的。在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在一定条件下建立了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体中，中国共产党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联合是相对的，斗争是绝对的。在联合时，就是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而在统一战线破裂，被迫同资产阶级分裂时，就转为武装斗争。中国共产党就是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中发展和锻炼出来的。

统一体都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暂时的。在一定条件下，矛盾着的东西能够统一起来，又能够转化；无此一定条件，就不能成为矛盾，不能共居，也不能转化。任何一种统一体都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发展和灭亡的。

由于统一体内部矛盾双方斗争的结果，使旧的统一体破裂，新的统一体产生。如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矛盾统一体，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这个统一体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就使旧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统一体转化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统一体。又如红与专这一矛盾统一体也是可变动的。只专不红或只红不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变为又红又专；而一定程度的又红又专，如果不继续努力，也可以变为不红不专。因此，任何一种统一体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从一种统一体转化为另一种统一体的变动性则是绝对的。

机会主义者都不懂得统一体是矛盾的统一体。在统一战线问题上，他们不懂得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只要联合，不要斗争；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只要斗争，不要联合，都是否认矛盾的统一体的表现。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会出现。因此，正确理解统一体的原理，对革命斗争有着重要的意义。

差异

差异就是矛盾。毛主席在批判德波林时指出：“**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盾，差异就是矛盾。**”（《矛盾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矛盾学说的重要发展。

所谓差异，不是任何两个不相干的东西，而是指统一体内部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矛盾。例如，劳资之间，从两个阶级发生的时候起，就是互相矛盾的，仅仅还没有激化而已。又如工农业生产上先进与落后的差异，这种差异就是矛盾。人的概念的每一差异，都是客观矛盾的反映，概念之间的差异也就是矛盾。因此，差异问题，是矛盾的差别性问题，不是矛盾的有无问题。矛盾是贯穿于一切事物发展过程的始终，矛盾处处有，矛盾时时在，矛盾是普遍的、绝对的。

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却否认差异就是矛盾，从而否认矛盾的普遍性。德波林鼓吹事物的发展是先有差异和对立，后有矛盾，否认差异就是矛盾，否认事物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由此出发，他认为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为布哈林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反对消灭富农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辩护。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哲学界批判了德波林的错误。现在，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当时德波林学派的一些批判者却变成了德波林学派的继承者。他们大肆宣扬差异不是矛盾，鼓吹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是由“矛盾转变为差别，差别融合为统一”，胡说“差别不能认为是矛盾的表现”，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不能看作是矛盾”，等等。这完全是重弹德波林的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老调。事实上，社会主义社会的整个历史阶段自始至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工农、城乡、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也就是矛盾。他们否认差异就是矛盾，否认社会主义社会

自始至终存在着矛盾，其目的就是为苏修叛徒集团推行“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叛徒刘少奇也鼓吹什么“差别的东西是没有形成的矛盾，是矛盾的萌芽”，与德波林、苏修御用学者唱一个调子，其目的也还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内因和外因

内因是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指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从整个物质世界来说，其变化发展的原因完全在于物质世界本身的矛盾性，不存在外因的问题。从物质世界的具体事物来说，事物与事物之间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的。每一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其内因和外因。

内因和外因是辩证的统一。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内因和外因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事物内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矛盾论》）事物的内部矛盾决定事物的性质，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源泉。只有承认事物的内部矛盾，才能理解世界上各种事物在性质上千差万别及其互相转化的根本原因，才能理解事物的内在联系和运动、变化、发展。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是事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外因作用的大小依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都要通过内因才能实现。外因总是通过增强事物内部矛盾的一方，去反对另一方，从而影响事物的发展。正如毛主席所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

掌握内因和外因辩证关系的原理，对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具有重大的意义。毛主席运用内因和外因的辩证法观点，总结了国内外和党内外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经验，指出：“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矛盾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强调一个政党的成败是内因决定的，是由它执行

的路线决定的。毛主席还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这条路线是以内因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这一原理为理论根据的。我们分析矛盾，处理问题，一定要从事物的内部矛盾去找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这样才能正确掌握解决矛盾的方向；同时也要注意事物的外在条件，充分利用有利的外在因素，防止和克服不利的外在因素，以促进事物的发展。

根据和条件

根据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内因；条件指同这一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影响着的其他事物，是事物发展的外因。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内部根据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毛主席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矛盾论》）自然界的改变，主要地是由于自然界内部矛盾的发展。社会的改变，主要地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

条件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毛主席指出：“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则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矛盾论》）并且还指出：“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矛盾论》）例如，鸡蛋是孵出小鸡的根据，适当的温度则是它的条件，没有一定温度鸡蛋便孵不出小鸡；但一定温度不能使石头孵出小鸡来，因为石头没有孵出小鸡的根据。又如，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这都说明，事物的发展决定于根据（内因），但条件（外因）也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条件（外因）只有通过根据（内因）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这就是根据和

条件的辩证关系。

实际生活中的矛盾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因而根据和条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一种范围内、一个问题上是“根据”，在另一种范围内、另一个问题上又会变成“条件”；反过来，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新老修正主义者都是外因论者和唯条件论者，他们片面夸大外部条件的作用，抹杀事物的内部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刘少奇在经济建设中大肆鼓吹洋奴哲学和爬行主义，林彪借口“雷厉风行作风”推行命令主义和使用强制手段，都是企图用形而上学的外因论来破坏无产阶级革命事业。

唯物辩证法关于根据和条件的辩证统一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的内因论，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方针；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必须坚持民主讨论和说服教育的方法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自觉地改造主观世界。这样，才能真正和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划清界限。

共性和个性

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个性是指各个事物的特殊点，共性是指事物间的共同点。个性和共性同个别和一般、普遍和特殊是同类范畴，只是在不同场合用法不同罢了。

事物的个性和共性是客观存在的，是对立的统一。个性和共性是互相联结的，每一个具体事物都包含着个性和共性。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同样的，没有共性，也无所谓个性。例如，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共性；但这种普遍性、共性是通过各条战线、各个部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殊性、个性表现出来的；各条战线、各个部门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殊性、个性，又不是孤立的，它是和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普遍性、共性联结在一起的。又如，我们党内出现的各次机会主义路

线，都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这是共性；但每次机会主义路线又各有不同的特点，这是个性；而它们的共同的反动阶级本质，总是通过各次路线斗争不同的特点表现出来。

毛主席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矛盾论》）事物的矛盾问题，如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矛盾的不同性质和矛盾斗争的不同形式等等，都离不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辩证关系，它贯穿于矛盾问题的一切方面，是我们研究矛盾问题各个方面的关键所在。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事物，既要注意各个事物的共性，又要注意各个事物的个性，从共性和个性的相互联结上去把握事物。

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坚持运用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毛主席依据这个根本的思想原则，先后制定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基本路线，引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从反动阶级的需要出发，总是割裂共性和个性的辩证关系，玩弄诡辩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各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林彪叫嚷马克思列宁主义“离我们太远”，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普遍真理，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既否认共性，又歪曲个性。林彪还从割裂共性和个性出发，通过割裂理论和实践、主观和客观、领导和群众、政治和业务等辩证关系进行诡辩，散步各种谬论来骗人。我们坚持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就能彻底揭穿修正主义的诡辩。

在实际工作中，学会运用共性和个性的辩证法，我们就能够自觉地处理好党的基本路线同各项具体工作路线的关系，处理好纲和目的关系；就能够自觉运用个别和一般、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科学工作方法。特别要注意在一般的指导下深入研究矛盾的特点，找出解决矛盾的正确方法。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要把斗争矛头始终

对准一小撮阶级敌人。这样，才能不迷失或偏离方向，少犯错误，做好工作。

绝对和相对

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绝对是指无条件的、永恒的意思，相对是指有条件的、暂时的意思。列宁说：“**绝对和相对，有限和无限=同一个世界的部分、阶段。**”（《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107 页）任何事物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例如物质和意识的对立，只是在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即物质和精神何者是第一性）的范围内才有绝对意义，超出这个范围无疑是相对的了。所以绝对和相对的区别本身也是相对的。

绝对和相对的关系，同共性和个性的关系一样，是辩证的统一。绝对和相对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没有绝对，就没有相对；没有相对，也就无所谓绝对。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并通过无数相对来体现；在相对中有绝对，离开绝对的相对也是没有的。例如，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绝对的运动表现于它的反面，即相对的静止中。绝对的运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化出相对的静止，相对静止又是事物运动的一种状态，并且在一定条件下又转化为显著的变动。又如，矛盾的斗争性是绝对的，矛盾的同一性是相对的。绝对的斗争性寓于相对的同一性之中，相对的同一性中包含着绝对的斗争性。再如，真理是绝对的，又是相对的。绝对真理存在于相对真理之中，相对真理中包含着绝对真理的颗粒，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构成绝对真理，等等。毛主席指出：“**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矛盾论》）

形而上学者否认绝对和相对的辩证统一，把绝对和相对机械地割裂开来，或者认为绝对就是绝对，是脱离相对的，从而走上绝对主义；或者认为相对就是相对，是排斥绝对的，从而陷入相对主义。列宁说：“**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来说，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408 页）林彪一伙搞诡辩，往往就是用割裂相对和绝对的辩证关系来骗人的。他们借口形势的变化，片面地夸大真理的相对性，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的普遍真理，从而陷入相对主义。他们鼓吹大树特树所谓“绝对权威”，否认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要继续发展，从而陷入绝对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任何问题上绝对和相对都是辩证统一的。关于权威问题也是一样。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

对立面的转化

指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地位的转化。毛主席说：“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因为一定的条件而各向着和自己相反的方面转化了去，向着它的对立方面所处的地位转化了去。”又说：“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变化。”（《矛盾论》）例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由开始时起进步作用到后来转化为起反动作用，以致最后被无产阶级所推翻。无产阶级由初期的附属于资产阶级的地位，逐步壮大起来，成为独立的和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阶级，最后夺取政权成为统治阶级。由于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社会的性质就由旧的资本主义社会转化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一转化过程中，虽然存在着许多曲折和反复，然而这毕竟是一切国家必须要走的道路。

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转化，是矛盾同一性的一种重要表现。任何矛盾双方的转化都必须通过斗争来实现。没有矛盾的斗争性，就没有矛盾的同一性，也就没有矛盾的转化。毛主席指出：“有条件的相对的同性和无条件的绝对的斗争性相结合，构成了一切事物的矛盾运动。”（《矛盾论》）如果没有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就不会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地位转化，以及随之而发生的由资本主义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性质的转化。同时，一切转化又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毛主席说：“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例如，水害变水利，低产变高产，废物变珍宝，不治之症

变为可治之症，诸如此类的转化，没有一样不是在具备一定的条件之后才实现的。再如，新事物与旧事物，战争与和平，生与死，得与失，祸与福，顺利与困难，好事与坏事，盲目与自觉……等等，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革命者的任务就在于“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为此，必须不断研究事物转化的必要条件，在客观情况许可的范围内积极创造条件，促使事物向着对革命有利的方向转化。

一切反动阶级都竭力反对革命的转化论。苏修的御用学者，顽固地否认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战争与和平、生与死等矛盾可以互相转化，恶毒的把革命转化的理论污蔑为“孟什维克唯心论”；杨献珍恶毒攻击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胡说它是“马赫主义的等同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毛主席关于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要原理；叛徒刘少奇、林彪则鼓吹转化是思想上的“一念之差”，以此来否定转化的具体条件，从而达到取消革命转化的反动目的。我们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者反对革命转化论的种种谬论，必须彻底批判。

物极必反

这是中国的一句古话，意思是说，事物发展到一定的极限之后，就必定要走向自己的反面。这是以朴素的形式表达了辩证法的转化思想，是和形而上学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观点相对立的。

中国的古书中还有“盛极则衰”、“否极泰来”等提法。农民革命领袖洪秀全在《原道醒世训》中说：“乱极则治，暗极则光”。这些都是物极必反的意思。

毛主席批判地继承了古代辩证法的珍贵遗产，对于物极必反作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阐述。毛主席指出：“一切矛盾都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着。”（《矛盾论》）人们为了促成矛盾的转化，就必须在客观情况容许的范围内积极创设条件，“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

主席教导说：“共产党人的任务就在于揭露反动派和形而上学的错误思想，宣传事物的本来的辩证法，促成事物的转化，达到革命的目的。”（《矛盾论》）

物极必反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一切事物都是遵循这一规律而发展的。一切反动派都是无法逃脱物极必反这一规律的。他们的下场和他们的愿望总是相反的。他们总是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历史一再证明，凡是反动派越嚣张的地方，他们失败就越惨，革命人民的斗争就越猛烈。叛徒、卖国贼林彪妄想“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结果是一切不能指挥，一切不能调动，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一九六三年，毛主席在《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美帝国主义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的声明》中极其深刻地指出：“万恶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是随着奴役和贩卖黑人而兴盛起来的，它也必将随着黑色人种的彻底解放而告终。”这说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一定逃脱不了物极必反这一规律的惩罚。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毛主席的这一预言是千真万确的真理。

波浪式前进

也叫螺旋式上升，是事物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的一种规律性。这里所说的波浪式或螺旋式是对事物发展的前进性与曲折性的一种譬喻。

波浪式前进，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的认识发展的普遍规律。恩格斯指出：“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39 页）在自然界，如声波、光波、电波等；在人们的活动中，如走路、开会、唱戏、说话、写字等，无不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发展。经济建设也是有起有伏的，从不平衡到平衡，从平衡到不平衡。阶级斗争更是如此，奴隶和奴隶主的斗争，农民和地主的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都是高一阵低一阵地发展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仍然是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是波浪式的、螺旋式的向前发展。列宁指出：“发展是

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列宁选集》第二卷 584 页）毛主席也指出：“事物是往返曲折的，不是径情直遂的，……只有形式主义者想不通这个道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76 页）

波浪式前进，是由矛盾引起的前进性和曲折性的辩证统一。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之所以必然是向前进，是由于新陈代谢这种普遍规律所决定的。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它们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斗争，经过反复斗争，最终必定是新的战胜旧的。这就决定了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一定是向前进的。毛主席说：“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061 页）另一方面，事物前进的道路又是曲折的，这是由于矛盾斗争的曲折性所决定的。新事物要战胜旧事物，就必不可免地要遭到旧事物的顽强反抗；而且新事物本身起初总是比较弱小，只有在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才能逐渐由小变大、由弱转强，直至强大到足以战胜旧事物的程度。因此，事物的前进道路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必然是曲折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41 页）

“循环论”把发展曲解为走马灯式的团团转，这是反动派用来愚弄人民，妄图阻止历史车轮前进的反动谬论。“直线式”发展的谬论则把革命道路说成是“笔直又笔直”的，这是机会主义者的形而上学的幻想。这在革命史上曾起过极大的破坏作用。

毛主席多次指出：“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是总结无数历史经验所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对于波浪式前进这个辩证法观点的最清楚而深刻的阐明。革命过程中出现一些反复、曲折、苦难，是不足为奇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从历史的全过程来看，前进、上升总是事物的主流和本质，而反复、曲折、困难则是事物的支流和暂时现象。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这是符合于历史发展总趋势的必然结果。只有真正懂得了这种辩证法的道理，我们才能既看到革命发展进程中出现反复曲折的必

然性，又看到曲折发展中包含着胜利的必然性；才能在尖锐复杂的斗争中认清方向，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因势利导，去夺取胜利。

新陈代谢

指一切事物由于内部矛盾的斗争必然引起除旧布新或推陈出新的规律。

毛主席说：“**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矛盾论》）任何事物内部都存在着新旧两个方面的斗争，经过斗争，新的方面由小变大，上升为支配的东西，旧的方面由大变小，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旧事物的性质就转化为新事物的性质。世界上的新事物，例如自然界的新物种或社会上的新制度，都是经过旧事物内部新旧双方的斗争，新的方面战胜了旧的方面以后产生出来的。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进行了长期曲折地斗争，直到获得了胜利才诞生出来的。世界上各种事物，由于本身性质和周围条件不同，因而新陈代谢的形式和特点也不相同。但是不论采取何种形式，其中都包含着由于新旧之间的矛盾斗争而达到除旧布新的质变这个共同的内容。所以唯物辩证法认为，新陈代谢是一切事物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共同规律。这个规律也就是对立统一这个宇宙根本规律的一种表现。

新陈代谢的规律表明，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新生事物在开始时虽然比较弱小，但它在斗争中必然会成长壮大，战胜并代替旧事物。谁压抑新事物的发展，违抗新陈代谢规律，谁就没有好结果。

十九世纪末叶以来，资产阶级的庸俗进化论者竭力歪曲生物进化中的新陈代谢规律，利用达尔文学说中的缺点，说生物进化中只有量变，没有质变，并进而抹煞一切事物的除旧布新的质变，尤其是反对社会制度的除旧布新的革命变革。这种谬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理论基础，也是新老修正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鼓吹“和平过渡”谬论的理论基础。

在生物学和生理学中，新陈代谢这个词，是指生物有机体从外界摄取营养和从体内排出废料的吐故纳新过程，以及细胞的不断新生和不断死亡相更替的矛盾运动。它是生命存在的基本条件。恩格斯指出：“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个存在方式的基本因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地新陈代谢，而且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结果便是蛋白质的分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646 页）

吐故纳新

毛主席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谈到整党建党时说：“一个人有动脉、静脉，通过心脏进行血液循环，还要通过肺部进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进新鲜氧气，这就是吐故纳新。一个无产阶级的党也要吐故纳新，才能朝气蓬勃。不清除废料，不吸收新鲜血液，党就没有朝气。”

毛主席的这个生动比喻，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宇宙间一切事物无不是新旧两方面的对立的统一。这两方面互相依赖，又互相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新的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最后战胜旧的，事物便发生质的变化。新事物出现后，其内部又产生新旧矛盾的斗争，继续不断地前进。事物发展的过程，就是这样不断发生新旧斗争、不断进行吐故纳新的过程。

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在吐故纳新中不断发展的。毛主席指出：“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这是社会的阶级矛盾和新旧事物的矛盾在党内的反映。党内如果没有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思想斗争，党的生命也就停止了。”（《矛盾论》）中国共产党所以能够成为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党，正是由于它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积极开展党内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斗争，不断吐故纳新，“清除废料”，“吸收新鲜血液”的结果。

组织上的吐故纳新，就是一方面把证据确凿的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蜕化变质分子、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党。斯大林说：“党是靠清洗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而巩固起来的。”（《斯大林全集》

第六卷 160 页) 这句话指明了组织上清洗的重大意义。在党员中, 如有革命意志衰退的, 经多次教育仍无转变, 则劝其退党。另一方面, 则不断吸收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 首先是产业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 并选拔优秀共产党员参加各级党组织的领导工作。

思想上同样需要吐故纳新。这就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它是自我教育、自我改造、吐故纳新的基本方法, 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毛主席说: “**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 保持优良作风。**”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29 页)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战士只有不断经受三个革命实践的锻炼和考验, 努力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在斗争中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不但“**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而且“**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71-272 页) 只有在思想上不断进行吐故纳新, 才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为解放全人类, 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到底。

新事物和旧事物

新事物是正在产生、正在发展、富有生命力的东西。旧事物是在发展过程中日趋衰老、逐渐丧失其生存能力的东西。

新事物必然要代替旧事物, 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所决定的。“**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其新旧两个方面的矛盾, 形成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斗争的结果, 新的方面由小变大, 上升为支配的东西; 旧的方面则由大变小, 变成逐步归于灭亡的东西。而一当新的方面对于旧的方面取得支配地位的时候, 旧事物的性质就变为新事物的性质。**” “**新陈代谢是宇宙间普遍的永远不可抵抗的规律。**” (《矛盾论》) 新事物之所以不可战胜, 是由于它具备了发展的物质条件, “应运而生”, 合乎客观规律, 代表真理, 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新事物在开始时虽然弱小, 但它在斗争中逐渐成长、壮大, 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这句成语深刻地说明了这个道理。旧事物之所以必然要灭亡, 是由于它不符合客观规律的要求, 丧失了继续存在的条件。在人类社会中, 腐朽、

没落的阶级，不管它在现实中显得怎样“强大”，由于它已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归根到底是要失败的。中国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用飞机大炮装备起来的蒋介石反动派。“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091 页）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是因为矛盾着的对立面，必须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一系列的曲折的斗争才能转化。“**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55 页）例如在社会上，革命的新事物的发展总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抗和旧习惯势力的阻挠。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斯大林说：“**生长着的东西也不是轻易地生长起来的，它们叫着，喊着，坚持自己生存的权利。**”（《斯大林全集》第十卷 284 页）

新事物有一个成长过程，在开始的时候总是弱小的、不完善的，甚至可能有许多缺点、错误。我们要善于鉴别新事物，在它萌芽的时候就发现它，满腔热情地保护它，积极地扶植它，使它尽快地成长起来。毛主席最善于发现并爱护、支持新事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涌现出的诸如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领导机构的老中青三结合、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教育卫生革命、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理论队伍、亿万人民共同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等，这许多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都得到毛主席的关怀和支持。同旧社会比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新事物的成长条件要好得多，但是公开反对和变相压抑新事物的事还是有的。列宁说：“**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 14-15 页）当前，支持还是反对新事物，实际上是肯定还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是前进与倒退、革命与复辟的斗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

主流和支流

任何事物都有主要的一面，也有次要的一面，有主流，也有支流。主流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它反映事物的本质，规定事物发展的趋势和命运；支流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它不反映事物的本质，不能规定事物的发展趋势和命运，只能影响事物的发展速度。主流和支流的关系，从哲学上说，也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的关系。

分清主流和支流，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形势和分析问题所必须遵循的原则。只有分清主流和支流，才能正确认识矛盾的性质。毛主席指出：“在革命的队伍中，要划清正确和错误、成绩和缺点的界限，还要弄清它们中间什么是主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34 页）这也就是要我们注意分清主流和支流。过去和现今的事实都证明，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成绩总是主要的，形势总是大好的。前进、上升总是事物的主流，而曲折、倒退则是事物的支流，是暂时的现象。在国际上，当前国际形势的特点是天下大乱，而且是越来越乱了。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是这一大乱中的主流，它反映了时代的本质和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捣乱是支流，不反映时代的本质，不能决定历史发展的趋势。认清这一点，可以鼓舞革命斗志，坚定革命信心。毛主席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质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问题，必须逐一地将他们解决。但是，不应当将这些看成为本质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要分清主流和支流，首先必须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毛主席说：“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05 页）这是我们观察一切问题的根本立足点。其次，必须经过细致的研究和分析。毛主席说：“我们对于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都应该采取分析研究的态度。”（《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34 页）这是我们观察一切问题应有的科学态度。我们必须在革命实践中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自觉地改造世界观，把自己的

无产阶级立场锻炼得更坚定；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养成一分为二的分析习惯，克服形而上学，这样才能善于抓住主流，同时也不忽视解决支流的问题。

正面和反面

指事物内部互相联系、互相斗争的两个方面。处于支配地位、决定事物性质的一面叫正面；处于被支配地位、作为否定因素的一面叫反面。例如，任何事物，从生命形成时起，就存在着生与死的斗争，生是正面，死是反面。哲学上所说的正面与反面跟通常所说的好与坏不是一回事。

毛主席说：“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这是因为事物内部矛盾着的两方面通过斗争，总是依一定条件向它们的反面转化。当原来的否定因素由被支配地位转化为支配地位时，事物的性质就发生变化，原有的事物走向了反面，变成另一事物。矛盾的转化是具体的、多样的，但总的说来，不外乎两种：向前进的方面转化；向倒退的方面转化。例如，先进者如果骄傲自满，就会走向反面——落后；落后者如果总结教训、克服了缺点，又会走向其反面——先进。

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事物不断地走向自己的反面，表现为旧事物不断衰落、消亡，新事物不断成长、壮大。如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专政，由于无产阶级的不断斗争，迟早要走向其反面——无产阶级专政。这种转化一旦实现，社会就由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社会主义阶段。随着社会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专政又会走向自己的反面——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到那时候，人类便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毛主席说：“**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57 页）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唯物辩证法的无限生命力就在于它承认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这一真理。但是，事物在发展过程中由于条件的变化，有时也可能出现倒退，例如，自然界某些物种的退化；社会中反动阶级的复辟，等等，呈现出事物发展的曲折性和复杂性。然而，任何倒退终究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

上升的、前进的。

事物走向反面，是在一定条件下实现的。“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例如，我国是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还是被资本主义复辟，关键在于路线。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牢记党的基本路线，要反修、防修，不然的话，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当然即使某些地方暂时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领导权，也没有什么要紧，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因为人民总是要革命的，是不会容忍复辟和倒退的。

事物的正面与反面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成绩和胜利的面前，要经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遇到挫折或犯了错误时，要自觉地接受教训，纠正错误，使坏事引出好的结果。在观察国际形势时，不但要看到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捣乱和破坏，尤其要看到“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061 页）这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平衡和不平衡

事物运动的两种状态。平衡是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势均力敌，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不平衡则是指平衡状态被矛盾斗争所打破，出现了矛盾双方力量的悬殊。平衡和不平衡，都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的表现。

平衡和不平衡是对立的统一。平衡是由不平衡发展而来，平衡中就包含着不平衡。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中，平衡都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则是经常的、绝对的。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不平衡的规律是宇宙发展的普遍规律。

平衡和不平衡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平衡在一定条件下变为不平衡；不平衡在一定条件下又变为平衡。无论是平衡还是不平衡

都贯穿着矛盾和斗争，并通过斗争实现互相转化。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新的不平衡，如此循环不已，而每一循环都进到高一级的程度。这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事物就是这样波浪式地前进的。

正确认识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关系，能够使我们在三个革命运动中掌握主动权，及时发现矛盾，解决矛盾，夺取新的胜利。我们掌握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发展规律，就能够自觉地及时地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推动社会不断进步。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与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平衡。但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平衡变成不平衡，又需作第二年的平衡。事实上每月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需要作局部的调整。总之，在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运动中，“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各项工作中，我们要根据平衡和不平衡的辩证规律，积极地创造条件，使新生力量、新生事物尽快地成长，不断打破旧的平衡。同时，又要针对出现的不平衡现象，去组织和建立新的平衡，把各项工作不断地提高到新的水平。

批判和继承

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遗产的原则是批判地继承。“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84 页）

马克思主义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反对否定历史的虚无主义。马克思的学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科学，它不同于历史上任何思想体系，但是它并没有割断历史。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列宁选集》第二卷 441-442 页）毛主席一再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许多珍贵品，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地总结。从乌龟壳到共产党都应该给以总结。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总结儒

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就是批判地继承我国的历史遗产，用来为现实的阶级斗争服务，为反修防修服务，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

对历史遗产绝不能无批判地“全盘接收”，必须进行分析，将反动、腐朽的东西和具有民主性、革命性的东西区分开来，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我们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但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等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的是批判地继承的原则，他们仅仅吸收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摒弃了它的唯心主义外壳；仅仅吸收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而摒弃了它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和宗教伦理学的杂质。他们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成果，尤其是总结了现实斗争的实践经验，从而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破不立，不批判旧思想，新思想无从产生；破字当头，立在其中，新事物总是在和旧事物作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叛徒刘少奇及其在文艺界的代理人周扬之流，借口“抢救历史遗产”，大搞复古活动，这是地主、资产阶级复辟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千万不能放松警惕。

对历史遗产中有利用价值的东西，也不应该拿来就用。“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12 页）可见一要改造，二要加进新的内容。没有这两条，旧形式决不会变成为人民服务的东西。即使是最有利用价值的东西，用来表现现实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生活，也是远远不够的。无产阶级应该创造自己的文化，而要创造自己的文化，就必须到唯一的最丰富的泉——现实社会生活中去吸取丰富材料。批判地吸收历史遗产中有益的东西是必要的，但这仅仅是作为创造新文化的借鉴。如果脱离了现实斗争，到故纸堆里讨生活，用继承来代替自己的创造，甚至颂古非今，那就走到斜路上去了。我国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出现的一批革命样板戏，“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在批判继承和创新方面作出了榜样。这不仅是戏剧、舞蹈等文学艺术的革命样板，而且也是批判地继承历史遗产

的革命样板。

破与立

毛主席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破与立的辩证法。

破就是革命，就是批判，就是否定旧事物，促使旧事物灭亡。立就是讲道理，就是肯定新事物，让新事物代替旧事物。

破与立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是对立的统一。破中有立，立中有破，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是，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环节。“**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55 页）破是立的前提，立是破的结果。要立新，就必须破旧。不破旧，不扫除障碍，就不可能立新；而新的不立起来，不日益发展壮大，也不可能把旧的彻底消灭干净。破旧立新的过程，也就是新陈代谢的过程，必须通过斗争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在破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体系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砸碎资本主义的旧制度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新的规章制度，就是在破除陈旧的规章制度的斗争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毛主席说：“**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从破到立是一个飞跃。不断地破与立，不断地飞跃，事物就不断地发展。

新兴的、革命的阶级，总是拥护破旧立新。没落的反动的阶级，总是反对破旧立新，而且要搞复辟。在无产阶级专政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往往打着“先立后破”的幌子来反对破旧立新，反对革命。“先立后破”的谬论，实际上是不立不破，就是不准无产阶级破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体系，不准立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一句话，就是不准无产阶级革命。林彪也竭力反对破旧立新，一再叫嚷要“克己复礼”，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

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我们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必须继续把批林批孔运动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彻底批判旧制度和旧思想，同国内外敌人的破坏活动作斗争。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事物发展过程中，一个时期有一种主要倾向，同时又存在着非主要倾向。主要倾向和非主要倾向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主要倾向实质上就是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另一种倾向实质上就是次要矛盾或矛盾的次要方面。当主要倾向突出时，就可能使另一种倾向被掩盖着。因此，在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中，往往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情况。

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的时候，也要注意可能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这是我们认识事物所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我们党的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在我党的历史上，反对陈独秀的“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机会主义时，掩盖着“一切斗争，否认联合”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纠正王明的“左”倾路线时，又掩盖着王明的右倾路线。反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时，掩盖着林彪的修正主义。每次都是毛主席及时洞察一切，拨正航向，领导全党用正确路线战胜错误路线，使党的事业更加兴旺发达起来。

事物是复杂的，我们看问题决不可简单化。如果只注意一种倾向，忽视可能出现或已经出现的另一种倾向，这样，在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就会受骗上当，犯错误，以致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我们要学会全面地看问题，既看到它的正面，也看到它的反面，既看到主要方面，也看到次要方面。这样，在注意到一种主要倾向时，才能自觉地注意到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醒我们：“今天，在国际国内斗争中，类似过去同资产阶级讲联合，忘掉了必不可少的斗争；同资产阶级决裂了，又忘掉了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联合的倾向，仍然可能出现。”我们一定要注意反对和防止这两种

片面性。

毛主席指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例如：军队在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左’倾；在打败仗或者未能多打胜仗的时候，必须防止右倾。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163页）要掌握情况，弄清什么是主要倾向，什么是被掩盖着的倾向，就必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作深入地调查研究，善于透过现象看本质。马克思主义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党的正确路线也是在斗争中产生和发展的。只有不断地同右的或“左”的有害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克服它们，才能不断地由胜利走向胜利。“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心，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注意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坚持反对错误倾向，从根本上说来，就是因为它不仅是做一个自觉的、完全的、清醒的革命者不可缺少的条件，而且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重要保证。

务虚和务实

虚是指人们对事物内在规律性的认识，务虚就是研究和讨论政治、思想、理论、路线等问题，以提高认识；实是指人们的实践活动，务实就是从事三大革命实践活动，贯彻路线、执行政策、抓具体工作。所以务虚与务实的关系，从认识论上说，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从方法论上说就是一般和个别的关系。表现在工作上便是政治与业务的关系。

虚和实是辩证的统一，把务虚和务实紧密地结合起来，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之一。“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务实要以务虚为指导，在各项工作中，我们不仅要注意掌握有关的具体路线和政策，而且更重要的是时刻不忘党的基本路线。务虚必须从实际出发，注意“就实论虚”，深入了解各方面的情况，分析研究各种具体问题。在务实的基础上务虚，在务虚的指导下务

实，我们就能方向明、决心大、方法对、干劲足。工农业战线上的两面红旗——大庆和大寨，便是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虚实并举”、“以虚带实”、“就实论虚”的最好榜样。

把务虚和务实辩证地结合起来，是尊重唯物论、尊重辩证法。反之，把两者机械地割裂开来，就会滑到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方面去，就会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如果只务实，不务虚，不注意思想和路线的大事，一头钻到业务中去，就会成为迷失方向的实际家、经验主义者，在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面前，很容易受骗上当，甚至走错了路还不知错；如果只务虚不务实，对实际情况不了解，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就是空谈家。所以，从事任何实际工作都要关心政治、思想、理论和路线。

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投入革命实践，认真总结经验，是使务虚和务实密切地结合起来的决定条件。只有不断提高政治思想水平，及时从实践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根据实际情况和革命斗争的需要制定一个时期的和长期的计划，具体加强领导，才能不断提高务虚与务实的能力，更自觉的遵循唯物辩证法，克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才能端正思想，做好工作。

具体事物具体分析

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毛主席说：“我们必须时刻记得列宁的话，对于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矛盾论》）

“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分析社会的阶级矛盾。在具体分析中，首先必须抓住主要矛盾。“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矛盾论》）同时还要了解矛盾的各个方面，找出主要的矛盾方面，弄清事物的性质。所谓看本质、看主流，就是指要从事物的主要矛盾方面去看。对社会矛盾，只

有分清革命和反革命、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才能有正确的认识和处理。对我们的工作，只有分清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才能有正确的估价。

在具体分析中，还必须分析矛盾在各个过程、各个阶段的发展和特点。列宁说：“**马克思辩证法要求对每一特殊的历史情况进行具体的分析。**”（《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 310 页）任何矛盾都有其产生、发展和转化的过程。同一矛盾在不同时间、地点和条件下，也有不同的特点。例如，从先秦到西汉初期和中期的儒法斗争，同西汉以后的儒法斗争，有着不同的特点。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必须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评价，才能作出正确的结论。又如，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矛盾是不变的，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只有具体分析了各种矛盾的特点，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掌握斗争的主动权，因势利导，夺取胜利。

分析矛盾的过程，是一个反复地进行调查研究的过程。毛主席说：“**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只有客观地、全面地、深入地研究事物的矛盾，才能如实地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分析矛盾，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特别要坚持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一切，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是十分重要的。毛主席说：“**离开具体的分析，就不能认识任何矛盾的特性。**”（《矛盾论》）只有对矛盾双方各占何等特定的地位，双方的依赖关系、斗争情况，双方各自的特点、发展及其与外界事物的联系进行具体分析，才能了解矛盾的特性，认识事物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把握事物本来的辩证法，从而正确地制定和执行路线、方针和政策，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如果拒绝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不从具体情况中间找出具体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具体办法，用这样的态度去指导工作，就会把工作做坏；去指导战争，就一定会打败仗。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要经常了解国际国内阶级斗

争的动态，及时研究各阶级的发展和变化，善于作基本阶级关系的分析，正确地估量阶级力量的对比和政治形势。这样，才能在革命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分清敌友；分清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分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修正主义。

从而在正确的路线指引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敌人营垒内部的一切矛盾和斗争，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毛主席指出：“**必须教育干部善于分析具体情况，从不同地区、不同历史条件的具体情况出发，决定当地当时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226 页）有些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的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这是错误的。

范畴

范畴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列宁说：“**自然界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形式，这种形式就是概念、规律、范畴等等。**”（《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194 页）各门具体科学的范畴，如经济学中的商品、价值、货币等，物理学中的电、热、功等，都是某一领域中客观事物本质的反映，只适用于一定的范围。哲学范畴如物质、意识、矛盾、规律、本质、现象等，是客观世界最普遍的本质的反映，它适用于一切科学领域。

范畴的内容是客观的，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反过来又成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人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不同方面揭示了事物的本质，从而概括出各种不同的范畴，以指导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客观世界的联系好像一张网，人们认识到网上一个纽结，就用一个范畴来标志它。一定的范畴标志着人类认识发展的一定阶段。列宁说：“**在人面前是自然现象之网。本能的人，即野蛮人没有把自己同自然界区分开来，自觉的人则区分开来了。范畴是区分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90 页）这段话通俗地说明了范畴的起源和作用。

范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永恒的，而是历史的、变动的。它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在实践过程中，有些范畴的内容丰富了、神话了，有些范畴被淘汰了，一些新范畴产生了。范畴的不断产生、丰富和变化，是人类对客观世界本质的认识日益广泛、深入的标志，也为人类进一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新的工具。

唯心主义把范畴看作是先天得来或主观自生的。在中国哲学史上，朱熹主张“理”这个范畴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王阳明则把“理”看作心的产物。在外国哲学史上，康德认为，范畴是人的思维中先天就有的认识形式。黑格尔认为，范畴是“绝对观念”自身发展的产物。马赫主义者认为，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等哲学范畴是“人心的产物”，“从主观意向中产生的”。不论客观唯心主义者还是主观唯心主义者，都把范畴看作是离开客观世界而独立存在的，这就颠倒了本末，是十分荒谬的。形而上学者则把范畴看成是孤立的、一成不变的、僵死的，这也是错误的。辩证唯物主义坚决反对唯心主义的和形而上学的范畴论。

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如本质和现象、内容和形式、必然和偶然、必然和自由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这些范畴从不同方面揭示了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每一对范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转化，都是对立统一规律的表现。因此，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范畴，对于弄通马克思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提高我们的认识能力，改进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有着重要的意义。

质和量

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不具有质和量这两个方面的规定性。

质的规定性，也叫质量，指事物的特质，即一类事物之所以区别于另一类事物的特殊性质。这是由事物内部所固有的矛盾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例如：金、银、铜、铁，虽然都是金属，但各有不同的特质，表现为各有其特殊的元素成分、特殊的分子结构、特殊的比重、熔点、硬度、光泽等等。又如，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都是革命，

但属于不同性质的两种革命，表现为各有其不同的阶级性质、不同的革命任务、不同的对象、动力等等。

量的规定性，也叫数量，指一定质的事物在规模、程度、水平及运动速度上的大小、高低、多少的数量。毛主席指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32 页）

质和量是事物的内在联系的两个方面。它们既互相排斥，又互相依存，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必须全面地看待质和量这两个方面，而不可忽视任何一个方面。例如，在生产中，“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耐穿耐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21 页）如果不保证质量，单纯追求数量，那就不仅没有完成生产任务，而且会造成返工和浪费；同样，如果只保证质量合乎规格，而忽视数量上的一定指标，那么生产任务同样也没有完成。毛主席教导我们：“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其中就包括要求我们既保证有好的质量，又达到尽可能多的数量。

关于量和质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问题，也就是量变质变的规律，参见“量变和质变”。

规定性

指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性，是规定事物的本质及其数量的界限。

规定性有质和量两个方面。质的规定性是规定事物的性质以及其他事物的区别。质的规定性变了，事物的性质也就随之改变。量的规定性是规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指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规模、程度、水平、速度等。事物超出一定数量界限，质就发生变化。恩格斯说：“**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403 页）

任何事物都是质和量的规定性的统一。马克思说：“每一种有用

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48 页）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总是和一定量的规定性联系在一起的。只有质的规定性而无量的规定性，或者只有量的规定性而无质的规定性，都是不存在的。不同的质都有不同的数量界限，并且“每一种质都有无限多的量的等级，例如颜色深浅、硬和软、生命的长短等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575 页）同样，事物的量的规定性也总是和一定的质的规定性联系在一起。即使研究事物的量的规律的数学，也仍然有质的规定性。如正数和负数、乘方和开方等等，充满了质的差异。恩格斯在批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时指出，认为物质只在量上可以规定而在质上则自古以来都相同的观点，可说是倒退到毕达哥拉斯那里去了。

毕达哥拉斯就曾经把数，即量的规定性，理解为事物的本质。总之，把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机械地割裂开来，或用量的规定性来代替、抹煞事物质的区别，这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完全错误的。

掌握事物质的规定性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例如，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阶级利益根本冲突的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必须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才能正确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政策，夺取革命的胜利。如果界限不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会对革命事业带来损害。

由于任何事物都有一定的数量界限，因此我们在一切工作中必须“胸中有‘数’”，把握事物的量的规定性，对情况和问题一定要注意它们的数量方面，要有基本的数量分析，要掌握主要的百分比，这样才能确定事物的性质，制定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否则，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

量变和质变

也叫质量互变，是由矛盾引起的量变和质变以及二者互变的规律。

它是自然界、社会和人的思想发展的普遍规律，是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的一种具体表现。

马克思说：“单纯的量的变化到一定点时就转化为质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342 页）恩格斯也说：“在自然界中，质的变化——以对于每一个别场合都是严格地确定的方式进行——只有通过物质或运动（所谓能）的量的增加或减少才能发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485 页）

事物的发展都是从量变开始的，量的增加或减少到达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的变化，然后又开始在新质基础上的量变，使事物不断地发展前进。例如，在自然界里，水的温度的升降在一定程度内，仍保持水的状态，这是量变；而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则沸腾而转化为水蒸气，降低到一定程度则急剧地转化为固体的冰，这就是质变。水蒸气和冰又开始新的量变，到了一定程度又有新的质变。在阶级社会发展中，革命战胜反革命，也是由一定的量变而引起质变的。革命造成社会制度质的变革后，必然会发生新的量变到质变，向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发展。人们的认识也是如此，接触外界，搜集材料，对事物的感性认识阶段是量变；经过思考分析，由感性认识飞跃到理性认识就是质变。质变造成新的量变，然后又是新的质变，事物就是这样不断发展的。毛主席指出：“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采取两种状态，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两种状态的运动都是由事物内部包含的两个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所引起的。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一种状态的时候，它只有数量的变化，没有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当着事物的运动在第二种状态的时候，它已由第一种状态中的数量的变化达到了某一个最高点，引起了统一物的分解，发生了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显著地变化的面貌。”（《矛盾论》）

量变和质变的规律反映了事物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它是马列主义关于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理论基础。

由于矛盾运动的复杂性，在事物根本性质未变之前，即在总的量变过程中，往往会发生部分质变。有的因局部问题解决而发生局部质

变，有的因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发生部分质变。部分质变可以进一步影响总的量变，并为根本性质的变化准备条件。

任何质变都是飞跃式的发展，“渐进过程的中断”。事物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飞跃形式的多样性。基本上有两种飞跃形式：爆发式与非爆发式。自然界的火山爆发、炸弹爆炸是爆发式的飞跃；生物的进化，则属于非爆发式飞跃。社会发展中的暴力革命是爆发式的飞跃；而人民内部矛盾的解决，则属于非爆发式的飞跃。这告诉我们，对于不同性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杰出地运用和发展了量变和质变的辩证规律。比如，在分析到抗日战争第一阶段敌我双方力量变化时指出，我方和敌方各自都有“向上”和“向下”的两种不同的量变和质变，我方“向下的东西是旧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量上。向上的东西是新的量和质，主要地表现在质上。”敌方除了向下的变化外，虽然也有向上的变化，但必须估计到这种向上的变化的“暂时性和局部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35 页）毛主席的这一科学分析表明，为了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趋势，要善于把握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特别是要善于把握“向上”和“向下”两种质量变化的内在联系以及何者占主导地位。这样才不致因受现象的迷惑而作出错误的判断。

渐变

指事物逐渐的、不显著的变化，即量变。事物处于量变状态，只有数量的增加或减少，没有根本性质的变化，所以显出好似静止的面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看见的统一、团结、联合、调和、均势、相持、僵局、静止、有常、平衡、凝聚、吸引等等，都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矛盾论》）

渐变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引起的。在斗争中，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逐渐的变化，在一定限度内，不会引起矛盾双方地位的转化。事物的变化发展总是从渐变开始。渐变到一定程度，就会转化为突变，也就是渐进过程的中断，事物就由旧质转化为新质。事物总是不

断地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到质变，这是客观的普遍的规律。只是不同的事物表现的形式不同而已。例如，从猿到人，由于生活条件和劳动的作用，先使类人猿的手、脚、脑等身体器官发生渐变，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突变、飞跃，即用工具进行劳动，实现向人的转变。一个社会的变化，也是由于社会内部的矛盾斗争，使矛盾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渐变，到一定阶段矛盾激化了，才引起暴力革命，实现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过渡。人们思想的变化，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由渐变到突变，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事物经过突变，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又在新质的基础上产生新的渐变。

渐变是突变的必要准备，没有渐变，就不可能有突变。渐变是事物发展的不可缺少的一环。否认渐变，就会使突变失去依据，理论上就会陷入激变论，政治上就会走上冒险主义；夸大渐变，就会否认突变，理论上就会陷入庸俗进化论，政治上就会陷入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泥坑。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就是以庸俗进化论作为理论基础的。他们“用‘简单的’（和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和革命的）辩证法。”（《列宁选集》第二卷3页）他们鼓吹“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维护帝国主义的统治。苏修叛徒集团也夸大渐变，否认质变，胡说消灭资本主义可以“通过渐进方式来实现”，宣扬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是“渐进性”的发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以维护社会帝国主义的统治。斯大林早就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工人阶级摆脱资本主义压迫，不可能通过缓慢的变化，通过改良来实现，而只能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质变，通过革命来实现。”（《列宁主义问题》635页）工人阶级只有彻底批判修正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才能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飞跃（突变）

飞跃即突变，是事物性质的变化。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量变到一定程度，必然转化为质变，出现由一种质向另一种质的飞跃。飞跃是旧事物的逐渐的量变过程的中断，所以又称为“渐进过程的中断”。

飞跃是宇宙发展的普遍状态。任何旧事物的死亡和新事物的产生都要经过飞跃。恩格斯说：事物“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变到另一种运动形式，总是一种飞跃，一种决定性的转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72 页）从机械运动到物理运动再到化学运动的转变是通过决定性的飞跃完成的，从化学运动到生物运动再到人类社会运动的转变也是如此。人类社会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过渡，也只有通过飞跃来实现。列宁指出：“资本主义自己替自己造成了掘墓人，自己造成了新制度的因素，但是，如果没有‘飞跃’，这些单个的因素便丝毫不能改变事物的总的状况，不能触动资本的统治。”（《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347 页）物质世界是通过不断地飞跃，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向高级发展。人们的认识也是通过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不断的飞跃，向前推移和发展的。离开飞跃，就不可能真正理解事物的发展。列宁说：“渐进性没有飞跃是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127 页）

由于事物的性质和条件不同，飞跃的形式也不同。毛主席说：“依事物本身的性质和条件，经过不同的飞跃形式，一事物转化为他事物”。（《矛盾论》）矛盾的性质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之分，相应地也存在两种基本的飞跃形式：爆发式的和非爆发式的。爆发式的飞跃通常是解决对抗性矛盾的形式，是通过激烈的外部冲突，使新事物战胜旧事物。如火山爆发、炸弹爆炸、暴力革命等。非爆发式的飞跃通常是解决非对抗性矛盾的形式，它不是通过激烈的外部冲突来实现。如物种的进化、从猿到人的转变、生产工具的革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理性认识到革命实践的飞跃。矛盾的性质可以转化，因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即飞跃形式，也会随着改变。

认识事物所固有的飞跃形式，对于促成事物的革命转化有重大的意义。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矛盾论》）国际和国内的革命实践证明：当事物本身要求采取爆发式的飞跃而不采取这种形式，就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当事物本身要求采取非爆发式的飞跃却采取爆发式的飞跃，则会

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部分质变

指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局部特性的质变。因为事物的矛盾运动是复杂的，量变和质变不但互相推移，而且互相交错，所以在质变中含有量变，在量变中含有质变。包含在量变过程中的质变，就是部分质变。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就是由部分质变引起的。从整体说来，事物尚未发生性质的根本变化，还在量变进程之中；但从某一局部说来，已经发生质的变化，因而使事物走上了新的阶段。

在自然界中，普遍地存在着部分质变。如蚕的一生，在它死亡之前，就经历了蚕卵、蚕、蛹、飞蛾这四个阶段。从蚕卵到蚕、到蛹，到飞蛾的发展中，显然也不单是量变，而且包含着几次部分质变。又如人的一生，经过了童年、少年、青年、壮年和老年这样一些不同的阶段。人的一生是一个量变的长过程，同时也是不断地进行着部分质变的过程。

在人类社会中，也普遍地存在着部分质变。例如在解放战争中，我们打垮蒋介石，这是一个质变。这个质变是通过量变完成的，是经过三年多的时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蒋介石的军队和政权。而这个量变中间，也有部分质变，即解放战争经历过的几个不同的阶段，每一个新的阶段和旧的阶段比较起来，都有若干性质上的区别。又如，从个体经济转变到集体经济，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我国是通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这样一些不同阶段的部分质变来完成的。

事物的量变和质变都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的斗争而产生的，部分质变也是这样的。经过一定程度的量变，事物发生部分质变，这时虽未达到整体上的旧质死亡和新质诞生的根本质变，然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阶段。毛主席指出：“这是因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的性质和过程的本质虽然没有变化，但是根本矛盾在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上采取了逐渐激化的形式。并且，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影响的许多大

小矛盾中，有些是激化了，有些是暂时地或局部地解决了，或者缓和了，又有些是发生了，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矛盾论》）

关于部分质变的理论，是毛主席对于唯物辩证法的量变和质变学说的重大发展。它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和政策的理论基础之一。毛主席于一九六七年就指出：“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一九六九年又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弄清部分质变的理论，可以使我们对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的领会，进一步提高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肯定和否定

任何事物都包含着肯定和否定这两个互相对立的环节。肯定方面是指在矛盾双方中占主要地位、支配地位的方面，是事物保持其存在的方面。否定方面是指占次要地位、被支配地位的方面，是促使旧事物灭亡的方面。

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统一规律在肯定和否定关系上的具体表现。肯定和否定是互相依存的。事物发展过程的每一环节，既是肯定，又是否定，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218 页）肯定和否定经过矛盾斗争，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互相转化，肯定转化为否定，否定转化为肯定。例如，资产阶级是作为否定方面存在于封建社会之中，当资产阶级否定了封建社会，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它就转化为新的肯定方面；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资产阶级相对立的否定方面是无产阶级，经过不断的斗争，又否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无产阶级也就转化为新的肯定方面。

事物的发展总是在肯定、否定、肯定、否定……这样不断的交替过

程中前进的。一般说来，每经过一次否定，事物就进入一个更高的阶段。马克思说：“一切发展，不管其内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以一个否定另一个的方式彼此联系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09 页）无论是自然界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以及人类认识的发展，都是如此。事物经过不断的否定，实现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体现了发展的前进性；同时，这个过程有时还会出现反复，否定方面要战胜肯定方面不是一次较量能够完成，而是有起有伏，有张有弛，有高潮有低潮、前进和倒退、扩大和缩小等等，体现了斗争的曲折性。例如革命人民总是沿着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这样一条反复、曲折的道路而达到胜利的。

辩证法的否定，即否定方面战胜肯定方面。但它不是简单地抛弃肯定方面，而是辩证的扬弃过程，即抛弃旧事物中的糟粕，保存其中的精华。例如，对于中国和外国文化遗产“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84 页）

掌握辩证法的肯定否定规律，对于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它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养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去观察和分析问题的习惯，尽量避免在工作中犯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的错误；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自觉地掌握历史发展的规律，懂得斗争的复杂性、曲折性和胜利的必然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进道路上，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反复和曲折，都能坚决依靠人民群众，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

否定之否定

黑格尔首先提出了这个哲学概念，并把它作为概念运动的辩证法规律之一。黑格尔认为，先于客观世界而存在的“绝对观念”是不断发展的，其发展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肯定和否定的对立统一，肯定之中有否定，否定之中有肯定；发展的过程总是按照正题、反题、合题的“三段式”进行的。否定之否定贯穿在黑格尔整个逻辑学里，他的哲学体系就是建筑在否定之否定的基础上。

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是唯心主义的，但又含有一定的辩证法。他所说的否定之否定，是十分神秘的，完全是唯心的、纯粹理性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和对他的整个辩证法一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扬弃了它的唯心主义的“神秘垃圾”，吸收了它的“合理内核”。马克思谈到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时指出：“纯理性的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它安置自己，把自己跟自己对置，自相结合，就是它把自己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07 页）黑格尔的整个概念辩证法就是这样推演出来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的发展并不是按正题、反题、合题这样“三段式”进行的，而是按螺旋式或波浪式发展的。

本质和现象

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本质是指“事情的性质及此一事情和其他事情的内部联系”（《实践论》）它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特别是由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现象是指事物的外部形态和外部联系，是本质的外部表现，能被我们的感官直接感觉到的。任何事物都是本质和现象的统一体。

事物的本质和现象是对立的统一。没有无本质的现象，也没有无现象的本质。本质是隐藏在现象之中，是同类现象中一般的共同的东西。本质一定要通过各种现象表现出来，任何现象都不能脱离本质，总是本质的某个方面的表现。本质比较单一、稳定；现象则比较丰富、多变。同一本质往往要通过许多现象表现出来。正由于本质是通过现象来表现，人们就可以透过现象，认识本质。所以世界是可知的，不可知论是根本错误的。

人的认识是从现象到本质的过程，认识的任务就在于透过现象达到本质。列宁指出：“人对事物、现象、过程等等的认识从现象到本质、从不甚深刻的本质到更深刻的本质的深化的无限过程。”（《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239 页）现象并不直接就是本质，人们触到了现象并不等于认识了本质。所以，马克思指出：“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

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五卷 923 页）只有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才能真正地认识事物，深刻地理解各种现象。如果只停留在现象的认识，否认要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就要犯经验论的错误；反之，如果离开现象的认识，去谈认识事物的本质，就要犯先验论的错误。

毛主席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6 页）要把握事物的本质，必须深入实际，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取得全面的合乎实际的丰富材料，并用正确的立场观点对这些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才能从现象中找出反复出现的规律性即本质的东西。林彪恶毒攻击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胡说什么“要全面看问题，就看不到本质”。林彪玩弄这种诡辩显然是想否认从现象到本质的认识规律，以便兜售其唯心论先验论的黑货。事物的本质是通过许多现象的总和才完整地表现出来的，只有全面地分析这些现象，才能真正地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是最普遍的哲学常识。

对事物本质的认识有一个过程，不可能一次完成。这是由于人们的认识要受到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事物本质的暴露有一个过程，人们在实践中对本质的认识也有一个过程。例如林彪这个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在我们党内经营了几十年，他有一个发展过程和暴露过程。我们对他的认识和斗争也有一个过程，这是合乎认识规律的。

假象

假象也是一种现象，是歪曲地表现事物本质的现象。本质一般是通过真象来表现，但有时也通过假象来表现。假象也是事物的本质在运动变化过程中的一种表现形态。归根结底，假象也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列宁说：“假象的东西是本质的一个规定，本质的一个方面，本质的一个环节。本质具有某种假象。”（《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137 页）例如，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本性是好战的，但他们口头上却

大讲和平，这种假“和平”的表现是由他们极端虚伪的本质决定的。

假象往往掩盖着事物的本质，给人一种与事物本质完全相反的印象，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但是假象所隐蔽的本质终究是要暴露的。毛主席指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象荫蔽着。但是他们既要反革命，就不可能将其真象荫蔽得十分彻底。”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序言）纸包不住火，假象掩盖不了本质。人们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各种现象进行过细地鉴别，就能分清真伪，揭露假象背后的本质。比如有些暗藏的敌人表面上装得“老实”、“听话”，但是，阶级敌人的一言一行，总是有朕兆可寻，有端倪可察，有前因后果可供思索的。再经过发动群众内查外调，就可以弄清其反动历史和当前的反动活动，戳穿假象，识破其真面目。

假象是很容易迷惑人的。在战争中，人们常常有意制造假象（如声东击西、以强示弱、以弱示强、以退为进等等）来迷惑对方，使对方看不清自己的真实意图，以便达到自己的目的。新老修正主义者也都是故意以假象骗人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二卷439页）苏修叛徒集团挂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招牌，搞的是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勾当；说的是“友谊”、“援助”、“和平”，干的是侵略、颠覆、控制；喊的是“裁军”，做的是“扩军”等等。林彪反党集团更是制造种种假象来掩盖其反革命真面目。他们在革命的重要关头，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来欺骗党，欺骗人民。林彪及其死党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反革命阴谋集团。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抵制国内外一切修正主义，彻底揭穿他们的种种阴谋诡计。

全局和局部

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全局和局部这两方面。全局是指事物的整体及其发展的全过程，带有照顾各方面和各阶段的性质。局部是指组成事物

整体的一部分及其发展的某个阶段。全局和局部的区分是相对的。在一定场合为全局，而在另一场合则变为局部，反之亦然。

全局和局部是对立的统一。“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59 页）在全局和局部的关系中，全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处于决定的地位。全局统率局部，局部隶属全局。全局的变化一定会引起各个局部的变化。毛主席说：“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路线是全局，各项具体工作则是局部，二者的关系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但是，每一个全局都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局部也影响着全局的发展。在一定情况下某一局部也能起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棋艺上所谓“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这一着就是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拿战争来说，如果组成战争全局的多数战役失败了，或有决定意义的某一二个战役失败了，全局就立即起变化。这里说的多数战役和某一二个战役，就是有决定意义的。毛主席提出：“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的思想，深刻地反映了全局和局部的辩证观点。

在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中，必须牢固树立照顾全局的观点。对于指挥全局的人来说，尤其要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全局的问题上。毛主席说：“共产党员必须懂得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需要这一个道理。如果某项意见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就应以局部服从全局。反之也是一样，在局部的情形看来是不可行的，而在全局的情形看来是可行的，也应以局部服从全局。这就是照顾全局的观点。”（《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91 页）识大体、顾大局，使局部服从全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小原则服从大原则，这是共产党员应有的品质。只顾局部不顾全局，只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把局部、眼前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则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表现。

强调局部服从全局，并不排斥发挥局部的积极性，而是为了更好地发挥这种积极性。毛主席指出：“懂得了全局性的东西，就更会使用局部性的东西，因为局部性的东西是隶属于全局性的东西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59 页）只有全局在胸，才能避免或减少片面性，更好

地做好各项工作。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强调要有“全国一盘棋”的观点，地方要服从中央，这也是为了更好地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只有在中央的高度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才能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凡带有全局性的指导规律，是看不见、摸不到的，只有用心地去想一想才能懂得。因此，我们必须善于思索，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分析问题。

个别和一般

个别是指单个事物，即事物的特殊现象和特殊本质。一般是指同类单个事物中存在的共同性，即事物的共同本质和共同特性。

个别和一般是对立的统一。它们是互相联结、互相依赖的。任何一个具体事物既是个别的又是一般的。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例如，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分别来说，都是个别；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剥削制度则是它们的一般。这个一般是从上述三种个别的社会制度中抽出来的共同性，没有这三种个别的社会制度，也就没有剥削制度这个一般；而其中每一种制度（个别）中都包含了剥削制度（一般）这一共性。

但是，个别和一般又是有差别的、对立的。从个别体现着一般来看，“个别就是一般”。但“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列宁选集》第二卷 713 页）因为任何个别既有和其他事物相联系的共性，又有和其他事物相区别的个性。一般是概括了个别事物的共同本质，而撇开了个别事物的一些具体特性，所以一般不能完全包括个别的一切特性。

个别和一般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个别和一般可以互换位置，在一定场合是个别的东西，而在另一一定场合则变为一般的东西；反之亦然。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对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说来是一般的東西，而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说来又是个别的东西。在事物发展过程中，

原来是个别的东西可以转变为一般的东西；反之亦然。例如，商品交换在原始公社是个别现象；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却变成普遍现象；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又会消失。所以，在特定的场合或关系中，个别和一般的区别是确定的，但在普遍联系中，它们的区别又是相对的。总之，个别和一般是对立的统一，它们既相互联结又相互转化。

毛主席把个别和一般的辩证法贯彻运用于认识论，指出：“就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说来，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找出其特殊的本质，这样才可以补充、丰富和发展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而使这种共同的本质的认识不致变成枯燥的和僵死的东西。”（《矛盾论》）毛主席还运用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关系，为我们制定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方法。毛主席说：“一定要抓好典型”，“面上的工作要先抓好三分之一。”典型是个别，但包含了一般。要从个别的事物入手，总结典型经验，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又以此指导全面，先做好面上三分之一的工作。这种由个别到一般、又由一般到个别的方法，是一项科学的领导艺术。掌握了它，就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唯心论和形而上学都割裂个别和一般的辩证关系。有的夸大个别，否认一般；有的夸大一般，否认个别，这都是错误的。林彪玩弄诡辩术，篡改个别和一般的辩证法，胡说“一般，是上头的东西；个别，是广大连队、基层的东西”。既否认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又否认个别之中包含着一般。这完全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谬论。其目的就是反对从个别到一般，再从一般到个别这一条唯物论反映论的认识路线。

内容和形式

内容是指事物的内部矛盾和过程，形式是指事物矛盾运动的表现形态。

事物的内容和形式是对立的统一。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内容，也有它的形式。没有无形式的内容，也没有无内容的形式。例如水，氢氧是内容，液态是形式；一部文艺作品，主体、人物、思想是内容，而作品的结构、体裁、风格、语言则是形式。在复杂事物中，同一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形式。例如无产阶级专政，有巴黎公社的形式，也有人民代表大会的形式等。同一形式也可以表达不同的内容。例如电影、戏剧、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可以表达无产阶级的思想内容，也可以表达资产阶级的思想内容。

在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中，内容是主要的决定的方面，内容决定形式，形式服从内容。但是，形式并不是消极地依赖内容，而是对内容有着重大的反作用。适合内容发展的形式能够促进内容的发展；不适合内容发展的形式则阻碍内容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形式对内容的发展也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毛主席在领导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找到了“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的形式，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非常及时地，完全必要的。

内容和形式是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地发展的。内容是发展的主导方面，形式的变化是随着内容的变化而引起的。在发展过程中，形式由适应内容的发展逐步变为阻碍内容的发展，经过内容和形式的矛盾斗争，终于以新形式代替了旧形式，以适应内容的发展。然后内容和形式又在新的基础上相适应和相斗争，促进事物的发展。世界上万事万物就是这样不断地变化发展着。

新内容的发展，不但需要新形式，而且也要利用旧形式来为自己服务。利用旧形式，不是同旧事物、旧内容相妥协，而是彻底地抛弃旧内容，批判地改造旧形式，使它适应新内容的需要。

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告诉我们，观察问题时，首先要注意事物的内容，但也要恰如其分地估计形式的作用。我们既反对只注重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式主义，也反对只顾内容而忽视形式的机械论。要善于运用一定的形式，为内容的发展开辟道路。毛主席在谈到评价文学艺术作品

的标准时曾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26 页）这段话深刻地阐明了内容和形式必须是统一的。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阶级敌人会不断变更同无产阶级作斗争的形式，并千方百计地利用某些新生的形式向无产阶级进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陈旧的东西总是力图在新生的形式中得到恢复和巩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三卷 332 页）这是我们必须特别警惕的。

原因和结果

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原因和结果反映了客观事物之间的互相联系和互相作用。原因是指引起一定结果的事物，结果是指由原因的作用而必然产生的事物。例如种子是产生果实的原因，果实是种子发展的结果。列宁说：“原因和结果只是各种事件的世界性的相互依存、（普遍）联系和相互联结的环节，只是物质发展这一链条上的一环。”（《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168 页）只有从普遍联系中抽出特定的联系，才能确定事物的原因和结果。

因果联系的特点之一，是原因在先，结果在后。但并不是先后相继的现象都构成因果联系，如白天和黑夜是先后相继的，但无因果关系，它们都是由于地球的自转所引起的结果。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因果联系是客观的、普遍的。任何事物的产生、发展和灭亡，都有它的原因，任何原因都必然引起一定的结果。在自然界中，阳光、水分、土壤是原因，种子发芽、作物生长是结果。在社会领域中，阶级斗争是原因，阶级社会发展是结果；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是原因，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是结果。在思想上，知识分子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是原因，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提高是结果。这些因果联系都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人们的因果观念，是在实践中对客观事物因果联系的反映。

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者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康德断言，人的因果观念是先天就有的，自然界的因果联系是人外加给它的，不是自然界本身固有的。休谟认为客观世界是不可知的，因果性无非是感觉、知觉的习惯性联系，是纯主观的。孔丘、孟轲认为，富贵贫贱、生死祸福等等都是来自“天命”；“天”的意志是世界上所出现的种种现象的根本原因。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胡说电子具有“自由意志”，没有因果制约性等等。说法不同，实质一样，都是否认因果联系的客观性，宣扬唯心主义。他们散布这些谬论，目的在于愚弄和麻痹人民群众，以维护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

唯物辩证法认为，原因和结果是对立的统一。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不存在无因之果，也不存在无果之因。原因和结果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表现在互换位置和相互作用上。同一事物在一种因果联系中是结果，而在另一种因果联系中又可以是原因；反之亦然。例如，肥多既是多养猪的结果，又是农作物丰产的原因。

由于客观事物联系的复杂性，因而因果联系也是非常复杂的。一种原因可以造成多种结果，在一定条件下还会产生不同的、甚至完全相反的结果。一个结果往往不是由一种原因，而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在多种原因中，又存在着内因和外因、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等等。我们必须善于具体分析，从中找出主要原因，抓住主要环节，促进事物发展。

只有正确认识事物的因果联系，我们才能在实践中依据客观规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夺取革命的胜利。在总结工作时，只有正确地找出取得成绩和产生错误的原因，才能更好地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必然和偶然

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必然是客观事物本质的、合乎规律性的联系，是不可避免的、确定不移的趋势。偶然是客观事物非本质的、暂时的联系，没有确定不移的秩序。它可能出现，也可能不出现，

可以这样发生，也可以那样发生，这要看条件。例如，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的，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的；但社会主义革命在哪一国家何时出现、何时胜利，则是偶然的，是受革命的主客观条件制约的。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在必然和偶然问题上虽存在着激烈的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但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都未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认为：“偶然性只是相互依存性的一极，它的另一极叫做必然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71 页）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既包含着必然性的方面，也包含着偶然性的方面，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对立的统一。必然性是偶然性的基础，偶然性是必然性的补充和表现形式。现象要比本质丰富得多，因此必然性需要丰富多样的偶然性来补充。必然性只有通过无数偶然性才能充分表现出来，所以必然性需要偶然性为自己开辟道路。脱离偶然性的必然性，或者脱离必然性的偶然性，都是不存在的。恩格斯指出：“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東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40 页）在一定条件下，必然性和偶然性可以互相转化，偶然可以转化为必然，必然也可以转化为偶然。

必然性和偶然性都是客观的东西，都是有原因的。一切唯心主义者都把必然性说成是先天的或者是主观自生的。形而上学者则把必然性和偶然性完全割裂开来，认为必然就是必然，偶然就是偶然，不能既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这些观点都是违背事实的、错误的。

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必然性和偶然性的作用不是相同的。必然性是居支配的地位，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前途和方向，而偶然性对事物的发展只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从历史发展来看，虽然偶然因素在历史发展中也起作用，但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由必然性决定的，是任何人都改变不了的。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马列主义战胜修正主义，革命战胜反革命，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谁要逆历史潮流而动，必然会碰得粉身碎骨。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否认和违背客观必然性，反对辩

证法，结果都没有好下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目伯恩斯坦宣称：“我反对……根据客观的历史必然性来论证社会主义”，根本否认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最后堕落成无耻的叛徒。林彪反党集团逆历史潮流而动，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结果自取灭亡。

我们认识事物，就是要透过各种偶然性，找到客观必然性，把握客观事物发展的趋势，同时又恰当地估计和注意到各种偶然性可能造成的影响。这样，才能在实践中明确方向，坚定信心，争得主动，夺取胜利。

必然和自由

唯物辩证法的一对重要范畴。必然是客观规律。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人们仅仅认识了客观规律还不是自由，只有进一步在实践中正确地运用客观规律，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才是真正的自由。恩格斯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53 页）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中发挥了恩格斯这一思想，毛主席在许多论述中又进一步发展了必然和自由的学说。毛主席指出：“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对客观世界的改造。”

必然和自由是对立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必然可以转化为自由，自由也可以转化为必然。人们对客观世界的不断认识和改造，就是在必然和自由不断互相转化中实现的。人们在认识客观规律之前，只能盲目地行动，成为必然性的奴隶；一旦认识了客观规律，并利用它来为人类的目的服务，就能得到自由。例如，人们在认识洪水的规律之前，洪水常常泛滥成灾。一旦了解了洪水的特性，就可以筑水坝，修水库，建电站，变水害为水利。这说明人们在必然规律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盲目的必然性和自觉掌握的必然性之间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304 页）今天，虽然还有许多未被人们认识的盲

目必然性，但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终究要转化为被人们自觉掌握的必然性。

必然与自由的互相转化，决定的条件是社会实践。实践不仅是认识客观规律的唯一途径，而且是改造世界中取得自由的动力和源泉。人们取得炼钢、织布、种田、养猪的自由，控制地面沉降的自由，以及断肢再植、使哑巴说话等等自由，都是来自实践。毛主席指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只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认识世界，进行实践，才能在改造自然和社会中不断取得和扩大自由。对认识和改造复杂事物的自由不是一次实践就能获得的，而是要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多次的反复才能得到。自由是历史的产物。“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客观世界的矛盾运动是不会停止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也永远不会完结。

可能和现实

可能是指事物所具有的发展因素，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成为现实。现实是已经实现了的可能，亦即实际存在着的東西。例如，一粒种子就包含着成长为植物的可能性，如果具备了适当的土壤、水分、阳光等条件，这种可能就会变为现实。

可能和现实是对立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双方可以互相转化。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决定着一个事物总要转化为他事物。当对立双方的斗争还没有达到转化的程度时，他事物的出现还只是一种可能性；在一定的条件下，对立双方通过斗争，一方克服了另一方时，这种可能就转化为现实；而在这现实的事物中又包含着新的可能性。可能与现实不断转化的过程，就是事物的发展过程。

世界是复杂的，在同一时间内事物发展的可能性往往有多种。然而归根到底，只有两种可能性，即继续前进或暂时后退这两种根本对

立的可能性。这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及其斗争的曲折性所决定的。在同一时间内到底哪一种可能性是主要的，能变为现实，这要看矛盾双方的力量对比。因此，在斗争中要经常注意了解和分析客观情况。一九二九年冬，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林彪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毛主席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严肃地批判了这种悲观论调，并根据对当时我国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具体分析，得出结论说：“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性”，革命力量“在中国的环境里不仅是具备了发展的可能性，简直是具备了发展的必然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4、96 页）

可能转化为现实，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例如，从煤中提炼石油，从开始有煤起就存在这种可能性。可是只有在生产和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它才由可能变为现实。离开一定的条件，任何可能性都不会成为现实。以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正像斯大林所指出的：“苏维埃制度提供了社会主义完全胜利的巨大可能性。但是，可能性还不是现实。要把可能性变成现实，就必须具备许多条件，其中党的路线和正确执行这条路线起着远非次要的作用。”（《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 295 页）所以，当客观的必要条件已具备时，“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54-455 页）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和资本主义复辟的两种可能性，我们的责任就在于，自觉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反复辟、反倒退的斗争，积极地创造条件，使我国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迅速前进。

有限和无限

有限是指有条件、有界限、有始有终的意思；无限是指无条件、无界限、无始无终的意思。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有限和无限的对立统一，这是物质世界的普遍现象。

恩格斯说：“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无限纯粹

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56 页）无限存在于有限之中，通过有限来表现，有限之中包含着无限。脱离无限的有限，或者离开有限的无限，都是不存在的。例如，从宇宙来说宇宙总体是无限的，宇宙间每一个具体事物却是有限的。每一个有限的具体事物，都是无限宇宙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无限的宇宙总体是由这一个个有限的具体事物所组成，是存在于有限的具体事物之中，是通过有限的具体事物表现出来。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来说，人民群众智慧和力量是无穷无尽的，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是无限的；但一定历史阶段的人类与个人的智慧和力量却是有限的。前者是由后者构成的，是通过后者来实现的。从历史来说，历史的长河是无限的，个别的历史时代、历史阶段是有限的。无限的历史长河是由有限的历史时代、历史阶段构成的，是通过有限的历史时代、历史阶段来开辟道路的，等等。

有限和无限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有限可以转化为无限，无限可以转化为有限。宇宙间任何具体的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正因为万事万物都有生有灭，有始有终，才汇成了整个宇宙的永无休止的发展。这就是有限转化为无限。无始无终的宇宙总体总是划分成具体的部分，通过无数的有始有终的具体事物表现出来。这就是无限转化为有限。

无限存在于有限之中，因而人们的认识总是“从有限中找到无限，从暂时中找到永久”。“对自然界的一切真实的认识，都是对永恒的东西、对无限的东西的认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577 页）人们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有限的认识，就会逐步接近对无限的认识。人类的认识发展史，是一个不断从有限接近无限的过程。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形而上学者把有限和无限绝对地割裂开来，否认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有的离开有限去寻找纯粹抽象的无限，结果陷入唯心论的先验论。有的则把有限当作无限，宣称无限的宇宙已被认识完毕，结果陷入形而上学的“顶峰论”。恩格斯尖锐指出：“如果在人类发展的某

一时期，这种包括世界所有联系……的最终完成的体系建立起来了，那末，人的认识的领域就从此完结”，“这是荒唐的想法，是纯粹的胡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76 页）我们要学会关于有限和无限的辩证法，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并把它应用到我们的革命斗争中去。我们对待任何事情，一方面要看到事物发展的无限性，永不满足，永不停步，不断革命；另一方面又要注意到事物的有限性，科学地分析每一项工作的具体条件，根据现实的可能，发挥最大的积极性，力求做出更大的成绩。

间断性和不间断性

间断性和不间断性是反映物质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间断性是指物质运动过程的不连续性，是物质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中有限性的表现。不间断性是指物质运动过程的连续性，是物质运动在时间和空间中无限性的表现。

间断性和不间断性的根源是物质内部的矛盾运动。物质世界的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产生；新的矛盾解决了，更新的矛盾又产生。正是由于物质世界的内部矛盾，使世界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引起事物从一种质转化为另一种质，从一种质的过程推移到另一种质的过程，出现“渐进过程的中断”。所以物质运动就表现出间断性和不间断性这两种状态。

间断性和不间断性是辩证的统一。没有脱离间断性的不间断性，也没有离开不间断性的间断性。黑格尔说过：不间断性和间断性“这两个规定，如果单独来看，没有一个是真的，只有二者的统一才是真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录了这段话，认为这是“真正的辩证法”。（《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119 页）一切物质运动形式都是既间断又不间断地向前发展。在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无机界、有机界等等不同的阶段，显示出它的相对的间断性；但自然界始终在继续地向前发展，显示出它的绝对的连续性。自然界是既间断又不间断地向前发展。同样，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不同的历史阶段，显示出

它的相对的间断性；但人类社会一直在向前发展，这又显示出它的不间断性。人类社会是既间断又不间断地向前发展。不仅物质运动形式是既间断又不间断地向前发展，就是物质运动的每一具体发展过程和发展阶段，也是既间断又不间断地向前发展。我国农村土改以后，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这些不同的发展阶段，显示出农业发展的间断性；但这些相对的间断性，又构成了它的连续性。今后人民公社还要不间断地向前发展。间断性和不间断性又是互相转化的。间断性在一定条件下向不间断性转化，不间断性在一定条件下又分化出间断性来，如此反复无穷，汇集成整个宇宙的无限发展的长流。

间断性和不间断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辩证统一的哲学基础。间断性决定革命发展要有阶段性，波浪式前进；不间断性决定革命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推进，不断革命。毛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理论，正确地解决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和革命发展阶段问题，特别是亲自动手和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

思维的至上性，是指人类认识的绝对性、无限性；思维的非至上性，是指人类认识的相对性、有限性。人类的思维是一分为二的，是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对立统一。恩格斯说：“人的思维是至上的，同样又是不至上的，它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同样又是有限的。按它的本性、使命、可能和历史的终极目的来说，是至上的和无限的；按它的个别实现和每次的现实来说，又是不至上的和有限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26 页）人类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认识能力、认识使命和目标，是无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的思维，包括“无数亿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人的个人思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25 页），是至上的。但个别人或某一历史发展阶段上的人类，他们的认识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又是有限的。从这个意义

上说，他们的思维又是非至上的。

但是，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并不是绝对分割的，而是互相联结、互相转化的。思维的至上性存在于非至上性之中，非至上性包含着至上性，无数非至上性的总和就是至上性。“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的谬误中实现的；二者都只有通过人类生活的无限延续才能完全实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25-126 页）这里的重要条件是实践。人的认识能力是在实践中产生，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人类经过长期的实践与认识，经过真理和谬误的反复斗争，使认识的能力无限地发展，对客观绝对真理的认识一步步接近。今天没有认识的问题，明天可以认识；这一代没有解决的问题，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可以解决。从自然科学到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史，有力地证明了人类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

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者总是割裂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统一。他们或者片面地夸大至上性，否认非至上性，走上先验论和绝对主义；或者片面地夸大非至上性，否认至上性，走上不可知论和相对主义。江湖骗子杜林标榜他的思维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的真理权”，实际上是歪曲思维的至上性，否认思维的非至上性，把个人思维绝对化、神秘化，企图为他建立唯心论的哲学体系和假社会主义制造根据。林彪鼓吹“顶峰论”，离开认识的相对性讲认识的绝对性，把他的思维绝对化、神秘化，目的是妄图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我们掌握思维的至上性和非至上性的辩证法，就能有力地批判各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

在欧洲哲学史上，围绕因果性、必然性、规律性等问题存在着的两种根本对立观点。凡是主张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有因果联系，具有必然性和规律性的，就是决定论。决定论一般是唯物主义者的主张。其主要代表有德谟克利特、斯宾诺莎、霍尔巴赫等。机械决定论承认自然界的因果性、必然性，却否认偶然性。例如霍尔巴赫说：“我们所见

的一切都是‘必然的’”，“在这个自然之中，没有偶然，没有属于意外的事物”。机械决定论者在反对神学目的论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作用。但他们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他们否认偶然性，势必陷入宿命论。

凡是主张世界上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偶然的，没有因果联系，没有必然性和规律性，人们的意志是绝对自由的，就是非决定论。非决定论是一些唯心主义者为了反对决定论而抛出的，是科学的敌人，是宗教和僧侣主义的支柱。例如马赫说：“在自然界中，既没有原因，也没有结果”，“因果律的一切形式都是从主观意向中产生的”。“在理论上拥护极端的决定论的人，在实践上必定仍旧是一个非决定论者……”。列宁尖锐地指出：“瞧，分配得多好；理论是教授们的事，实践是神学家们的事！”（《列宁选集》第二卷 193 页）一针见血地揭穿了马赫企图调和科学与宗教，为神学家服务的反动实质。现代资产阶级则大肆宣扬非决定论。有些资产阶级物理学家，借口电子运动的特殊性，宣扬电子具有“自由意志”，没有因果性可言。有些资产阶级哲学家，例如新托马斯主义者，叫嚷什么因果原则没有普遍性，必须用宗教的非决定论加以补充。他们的反动目的，就是要否认科学，否认资本主义终将被社会主义代替的必然性。

辩证唯物主义坚持决定论的原则，坚决反对非决定论，但又不同于机械决定论。辩证唯物主义既承认因果性、必然性，又承认偶然性；既承认客观规律性，又承认主观能动性。同时，科学地阐明了必然和偶然、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列宁说：“决定论思想确定人类行为的必然性，推翻所谓意志自由的荒唐的神话，但丝毫不消灭人的理性、人的良心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评价。恰巧相反，只有根据决定论的观点，才能做出严格正确的评价，而不致把一切都任意推到自由意志的身上。同样，历史必然性的思想也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列宁选集》第一卷 26 页）

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

客观世界是有机联系着的统一整体。在客观世界的普遍联系中，存在着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本质联系是事物内在的、必然的、规律

性的联系，是指事物内部矛盾两个方面的联系，以及这一事物和那一事物、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之间的内在联系。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161页）非本质联系是事物以及事物之间外部的、现象的联系。例如在阶级社会里，阶级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联系是本质联系，而地理环境、人口与社会的联系则是非本质的联系。

事物的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是辩证统一。本质联系制约着非本质联系；非本质联系也影响着本质联系。本质联系对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非本质联系对事物的发展只起影响的作用。例如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对中国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决定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这对于中国革命的发生及其发展趋势来说，是本质联系，是起决定作用的根本原因。美帝国主义的发言人曾把“人口太多”、“饭少了”说成是中国革命的原因，这不仅说明他站在唯心史观的反动立场上，并且也说明他的历史知识等于零。

辩证唯物主义要求人们善于从各种联系中区分出本质联系和非本质联系。只有找出事物的本质联系，才能弄清事物的性质，掌握事物发展的必然性，提出正确的解决办法，推动事物的发展。在阶级社会里，就是要对各种社会联系进行阶级分析，从中找出本质的联系即阶级关系。列宁曾经指出“**必须牢牢把握住社会阶级划分的事实，阶级统治形式改变的事实，把它作为基本的指导线索，并用这个观点去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即经济、政治、精神和宗教等等问题。**”（《列宁选集》第四卷47页）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和学派，都是与一定的阶级有本质联系，都是反应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并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只有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找出各种思潮和学派与一定阶级的联系，才能认清各种思潮和学派的实质，并正确地加以识别和对待。否则，离开了阶级分析，就不能找出本质联系，甚至把本质联系当作非本质联系或把非本质联系当作本质联系，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就会犯大错误。

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

内部联系是事物本质的、规律性的联系，是指事物内部矛盾两个方面的联系，以及这一事物和那一事物、这一过程和那一过程之间的内在的、本质的、规律性联系。外部联系是事物外表的、现象的、非本质的联系，是指事物或事物之间外部现象的联系。

内部联系和外部联系是辩证的统一。二者既互相联系又互相转化。人们的认识总是先认识事物的现象，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从对事物外部联系的认识进到事物内部联系的认识，也就是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这是认识上的一个飞跃。只有真正地认识了事物的内部联系，才能把握事物的规律性，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取得自由。

毛主席说：“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759 页）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收集丰富的和合于实际的材料，然后经过思考，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功夫，才能把握事物的内部联系，造成正确的概念、判断和推理，即到达于论理的认识。

对复杂事物内部联系的认识，要有一个过程，即由实践到认识，再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一次完成论是错误的。

属性

事物固有的性质、特点。例如，运动是物质的属性，导电是金属的属性等等。事物的属性是由该事物内部矛盾所决定的。无产阶级具有彻底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等阶级属性，这是由无产阶级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资产阶级具有保守性、反动性以及唯利是图等阶级属性，也是由于资产阶级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物的属性决定物的

用途。马克思指出：“每一种这样的物都是许多属性的总和，因此可以在不同方面有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48 页）

任何事物的属性都是多方面的，而在事物的许多属性中，有本质属性与非本质属性的区别。本质属性体现该事物的基本特征，并以此与其他事物相区别。例如，生产集中和垄断是帝国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一点体现了它的基本特征，并与自由竞争时期的资本主义相区别。非本质属性虽然也是该事物的特征之一，是该事物的一个方面，但不体现该事物的基本特征。例如，道义上的虚伪性，生活方式上的腐朽性等等，虽然也是帝国主义的属性，但这些是一切反动阶级所共有的，不能体现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

弄清事物的属性，对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着重要意义。例如，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一般说来，对抗性是敌我矛盾的属性，非对抗性是人民内部矛盾的属性。要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首先必须弄清哪些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属于人民，哪些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属于敌人。而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又有着不同的内容。所以必须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弄清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团体的属性。只有弄清它们的属性，分清人民和敌人，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赢得革命的胜利。

度

也叫限度，指事物的质和量的对比关系，是事物的质和量的辩证统一。度表示在一定的界限之内，数量的增减不会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如果超出了一定界限，就必然引起事物性质的变化。如在标准大气压下，液体的水的度是 0°C - 100°C ，水的温度增减在 0°C - 100°C 界限之间时，水仍然保持着相对稳定的液体状态。当温度超过 100°C ，水就沸腾化为蒸汽，冷却超过 0°C ，水就凝结为冰。自然界每一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有一定的度，在不同的事物之间又有着不同的度。社会上的事物虽然更为复杂，但也各有不同的度。例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对富裕中农和富农，就是根据他们剥削收入的不同限度来划分开来的。毛主席指

出：“有剥削收入的农民，其剥削收入占总收入百分之二十五（四分之一）以下者，应订为中农，以上者为富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164 页）

注意和掌握事物的度，对革命实践有重要意义。既了解事物的性质，又了解“**决定事物质量的数量界限**”（《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32 页），做到“胸中有数”。经常重视数量方面的统计和分析，这对做好革命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如果不懂得度，就不能真正理解党的政策界限的客观依据，就不能掌握革命运动中的一些的转折点，就很难跟上客观发展的形势。

革命者研究事物的度，是为了促进革命和建设的发展，而反动派和修正主义者在限度上大做文章，并竭力进行歪曲，则是为了反对革命。两千多年来，孔丘及其徒子徒孙不断叫嚷“过犹不及”；叛徒林彪胡说什么“防止对立超过了限度，它就会破坏统一。”他们都是妄图诱骗人们死守“中庸之道”，以便实现他们复辟旧制度的迷梦。

把度作为质和量辩证统一的想法，在哲学史上首先是黑格尔在《逻辑学》中提出的，其中包含有辩证因素。但他为了创立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硬把度说成是绝对精神的一个环节，这是神秘的。

度量关系交错线

也叫从量变到质变的转折点，就是由量变引起质变的分界线，即在量变的一定点上突然发生质变。最初是由黑格尔提出的，他用这一术语来比喻由量变而引起质变的突变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时，也采用了这个术语。

拿自然界的情况来说，各种液体都有其在一定大气压力下的一定的冰点和沸点；各种金属在与温度的关系上都有其一定的熔点。诸如此类的一定的点或线，就是度量关系交错线。拿社会上的事物来说，例如在土地改革运动中，剥削收入在一定限度（即占总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五）以内的为中农，超过这个限度的就是富农；又如，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历史转折点。这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打退了美蒋反动派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由战略防御转入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扭转了敌人的反革命车轮，使之走向灭亡；推进了自己的革命车轮，使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这里所说的限度和转折点也就是度量关系交错线。

毛主席指出：“任何质量都表现为一定的数量，没有数量也就没有质量。”如果“一切都是胸中无‘数’，结果就不能不犯错误”。（《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32 页）因此，我们在实践中，对各种情况一定要做基本的数量分析，研究各种事物的数量界限，掌握度量关系的交错线，这样才能做到胸中有“数”，才能切实地完成革命任务。

扬弃

即辩证法的否定，包含抛弃和保存的意思。这个哲学用语最初是由黑格尔提出的，用来表达思辨哲学的“否定”的意思。黑格尔的所谓“扬弃”是唯心主义的，但在一定程度上猜测到了事物新陈代谢过程中的辩证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借用过这个词。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19 页）恩格斯这段话指出了“扬弃”一词的意义和应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遗产的科学态度。

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领域都充满了新与旧的斗争，新事物必然要代替旧事物，但对于旧事物不是简单地抛弃，而是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吸取旧事物中某些积极的东西，从而使新事物提高到新的发展阶段。例如，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本主义制度是被永远地抛弃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更是彻底地被抛弃了。然而前一个历史

时代所造成的生产力的成果，以及文化科学上的一些积极成果，经过批判改造，还可以使其从旧制度的牢笼中解放出来，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

异化

也叫外化，类似转化或表现的意思。它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一个术语，不同于生物学上的异化。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便“异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然后在精神中再返回到自身。他还认为，人的本质就是“自我意识”，“人的自我异化”就是“自我意识”的异化。这完全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异化观，指出宗教的秘密在于人，人借助于幻想把自己的本质和自然界异化为上帝，然后又受它支配，并向它膜拜。但费尔巴哈根本不懂得人的阶级性，他的异化观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人性论。

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曾沿用“异化”这个术语，例如在《经济学—哲学手稿》、《神圣的家族》中曾讲过“劳动的异化”、“人的自我异化”。但是，这根本不同于黑格尔和费尔巴哈所说的“异化”。马克思所说的“劳动的异化”，是指在私有制社会里广大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被别人所占有，成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人的自我异化”则包含有阶级分化的意思。他阐述异化的目的在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反动本质。

现代修正主义者竭力利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异化”概念，来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并攻击社会主义社会造成了所谓“人性的异化”，叫嚷要摆脱任何社会制约，使“永恒的人性”得到复归。这不仅是企图把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丑化成资产阶级人性论者，而且还企图利用这种资产阶级人性论来污蔑社会主义制度，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这就充分暴露了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叛徒嘴脸。

辩证逻辑

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逻辑，它是关于思维的辩证发展规律的科学。它反映事物内在的矛盾运动，反映事物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转化。它坚持思维内容和思维形式的辩证统一。它不仅研究思维的形式，而且研究思维的内容。列宁指出：“逻辑不是关于思维的外在形式的学说，而是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即关于世界的全部具体内容及对它的认识的发展规律的学说。换句话说，逻辑是对世界的认识的历史的总计、总和、结论。”（《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89-90 页）列宁这里所说的逻辑即辩证逻辑。

辩证逻辑和唯物辩证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列宁曾经说过，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同一个方面”。辩证逻辑的规律，也就是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其中最根本的是对立统一规律。毛主席说：“事物矛盾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法则，是自然和社会的根本法则，因而也是思维的根本法则。”（《矛盾论》）当然，辩证法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而辩证逻辑侧重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思维领域，是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来思维。

辩证逻辑要求我们观察事物时要有全面的观点，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事物的反面，分清主流和支流、本质和现象；要有发展的观点，要从事物的内在联系和发展看问题；要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从特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把握事物的特殊本质；要承认社会实践是逻辑的概念、范畴的唯一来源，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等。一句话，要按照事物固有的辩证性质来认识事物。

辩证逻辑和形式逻辑都是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科学。但是，辩证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它研究的是思维的高级形式和辩证运动规律，所涉及的问题更广泛、更丰富、更深入。恩格斯指出：“辩证逻辑和旧的纯粹的形式逻辑相反，不像后者满足于把各种思维运动形式，即各种不同的判断和推理的形式列举出来和毫无关联地排列起来。相反地，辩证逻辑由此及彼地推出这些形式，不把它们互相平列起来，而使它们互相隶属，从低级形式发展出高级形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45-546 页）把形式逻辑看作“唯一”的逻辑，是资产阶级的传统偏见；

而企图用辩证逻辑代替形式逻辑，也是错误的。

辩证逻辑是科学认识的强大武器。学习和掌握辩证逻辑，对于用辩证方法来观察问题，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具有重要意义。

形式逻辑

研究思维形式的结构及其规律的科学。它要求思维过程中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时，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和规则，做到概念要明确，判断要恰当，推理应当具有逻辑性。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主要有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同一律的公式是：甲是甲；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思想要保持自身同一。矛盾律的公式是：甲不是非甲；要求在同一思维过程中，对同一现象不能做出两个矛盾的判断，不能同时既肯定它又否定它，思想必须保持前后一贯，无矛盾。排中律的公式是：或者是甲，或者是非甲；要求对两个互相矛盾的判断，承认其中之一是真的，做出非此即彼的明确选择，不能两者都否定，也不能模棱两可。

形式逻辑对大前提是不管的，而且也管不了。它是从大前提出发，按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进行推论。例如，“凡金属都可燃烧，镁是金属，所以镁可以燃烧。”或者说：“凡金属都不可燃烧，镁是金属，所以镁不可以燃烧。”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推论都是合乎形式逻辑的。

用形式逻辑是得不出多少新知识的。按照形式逻辑的公式进行推论，其结论实际上已包括在大前提里面。大前提错了，其结论必然是错的。

形式逻辑这门科学早在古代就产生了。它是从实践中产生和形成的。列宁指出：“人的实践经过千百万次的重复，它在人的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233 页）中国先秦的名家就研究过名实关系以及“名”的性质和分类等问题，对中国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在法家韩非、王充等人的著作中，通过对儒家的揭露和批判，也具体涉及到形式逻辑问题，并有所发展。在欧洲，形式逻辑首先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确立的。中世纪经院哲学曾

对它极力歪曲，抓住它的糟粕，抛弃它的精华，把它变成诡辩的工具。因此，列宁认为传统的形式逻辑，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下加以修正，才可以在学校里讲解。

恩格斯指出：“形式逻辑本身从亚里士多德直到今天都是一个激烈争论的场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465-466 页）在形式逻辑的科学中，一直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条路线的斗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总是把形式逻辑的思维形式和规则，歪曲成先验的或固定不变的、纯粹形式主义的东西。这显然是错误的。

形式逻辑和形而上学不是一回事，它虽然不研究事物的内在联系和相互转化，但它的思维形式和规则，在一定范围内还是有用的，不可违背的。违背了它，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列宁说：“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216 页）学一点形式逻辑，有助于我们正确地严密地思维，使我们的思维具有确定的、前后一贯的、有条理的性质，更准确的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还有助于我们从逻辑上揭穿阶级敌人的谣言和诡辩。

具体和抽象

认识论上的具体和抽象，在不同的场合具有不同的含义。当我们说从具体概括为抽象时，这里的“具体”是指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抽象”是对具体事物的本质的概括。例如橘子、苹果、梨子是“具体”，水果是“抽象”。当我们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时，这里的“抽象”是指对事物的简单概念和局部的理性认识；“具体”是指许多规定的综合，即经过认识的深化而形成的深刻、完整的理性认识。例如，马克思从分析商品这个简单概念开始，进而对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等等作出具体分析，并加以全面的综合，达到对资本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完整的认识，这就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

认识来源于实践，没有具体事物，就不可能有对具体事物的概括（抽象）。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

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74 页）这说明抽象决不能脱离客观具体事物，否则就变成空洞的抽象。但是从具体事物出发，还只是获得科学认识的第一步。要真正获得科学认识，还必须运用抽象思维能力，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即进行科学抽象的工作。列宁说：“物质的抽象，自然规律的抽象，价值的抽象及其他等等，一句话，那一切科学的（正确的、郑重的、不是荒唐的）抽象，都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着自然。”（《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181 页）

认识有一个深化的过程。事物的发展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认识也是如此。马克思所说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科学方法，就是根据事物和认识的发展规律而总结出来的。马克思说：“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做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但绝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和黑格尔是完全对立的。黑格尔把从抽象到具体的认识过程，当做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即认为具体事物是由抽象思维产生的，从而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模范地唯物主义地应用了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和全体。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必须应用的方法。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学会这个方法，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和现状，并推断革命的将来。”（《矛盾论》）

分析和综合

既是客观事物的一种辩证关系，又是人们认识的辩证方法。客观事物的分析指统一体分裂为两个方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客观事物的综合指通过对立面的斗争，一方“吃掉”另一方。任何事物都存在着分析和综合的辩证关系，两者既不可分，又可分，是一分为二的。如吃螃蟹，吃掉螃蟹这是综合，只吃肉不吃壳，这是分析；胃肠吸收营养，排泄糟粕，综合中有分析，分析中有综合。再以我国解放战争为

例，分析就是敌我双方存在的不同特点及其矛盾斗争。起初，国民党军队的特点是，统治地区大，人口多，有大城市，有帝国主义支持，军队多，武器强；但是最根本的是反对革命，镇压群众，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利，矛盾重重。人民解放军的特点是，土地少，人口多，没有大城市，没有外援，军队少，武器差（小米加步枪）；但是最根本的是有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一心一意为革命、为人民，受到群众的拥护、支持。而综合就是经过斗争，人民解放军“吃掉”敌人，把敌人的东西拿来改造，用缴获的武器、粮秣各种器材装备自己，俘虏的士兵不杀掉，一部分放走，自愿的留下充实部队。客观事物分析和综合的过程，就是一个矛盾斗争、新事物代替旧事物的过程。分析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存在着矛盾的两个方面，使统一体分解为二；综合之所以可能，是由于事物中的矛盾双方都经过斗争必然一方战胜一方，结束旧的矛盾过程，开始新的矛盾过程。

认识上的分析指认识事物的各个矛盾、矛盾的各个方面及其斗争情况；认识上的综合指把分析的情况统一起来思索，从整体和对立面的斗争上把握事物的本质。人们认识事物先通过分析，了解事物的各个部分，然后进行综合，得到事物的完整概念。没有分析，综合就不可能。而分析又是建立在对整个事物认识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分析时有综合，在综合时有分析。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过程，就是一个分析和综合的辩证统一过程。如水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化合构成，对氢和氧只作孤立的分析，不作综合，就不能从总体上把握氢和氧的相互关系、相互作用，就不能对水有正确的认识。

人们思想上分析和综合的辩证认识方法，是客观事物分析和综合辩证规律的反映，它要求人们按照分析和综合的辩证关系去认识事物。脱离客观事物的分析和综合，或者把分析和综合割裂开来，就会陷入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杨献珍胡说分析是一分为二，综合是合二而一，把分析和综合割裂开来，为“合二而一”论辩护，反对一分为二，完全是反动的。

归纳和演绎

也叫归纳法和演绎法，是两种不同的推理和认识的方法。归纳是人们由个别到一般，即从许多个别事物的特点中找出普遍特点的方法。人们在革命实践中，总结了许多人和单位的经验，得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结论，这是从个别到一般的归纳法。演绎是人们由一般到个别，即根据一般原理引出对个别事物结论的方法。人们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结论，作为一般原则用来观察某一个人、某一个单位的表现，得出相应的结论，这是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法。恩格斯说：“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的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摔到天上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571 页）归纳和演绎是对立的统一，两者是相互联系、相辅相成、相互转化的。当人们运用推理方法，从个别得出一般结论的归纳过程中，同时也包含了从一般到个别的演绎过程。

归纳和演绎是人们在长期实践和认识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实践是归纳和演绎的基础，又是检验归纳和演绎是否正确的标准。归纳和演绎中的前提和结论，即从个别到一般或从一般到个别的关系，就是反映了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辩证关系。人们认识事物要经过两个过程。毛主席说：“一个是由特殊到一般，一个是由一般到特殊。人类的认识总是这样循环往复地进行的，而每一次的循环（只要是严格地按照科学的方法）都可能使人类的认识提高一步，使人类的认识不断地深化。”（《矛盾论》）因而，人们在实践中要得到正确的认识，必须把归纳和演绎结合起来。形而上学把归纳和演绎人为地加以分割和对立，甚至夸大归纳作用，否认演绎作用，得出归纳万能的结论，把认识变成一种僵死的、孤立的过程，这是错误的。

形而上学

在中国亦译作玄学，是指与辩证法根本对立的宇宙观和方法论。所谓形而上学，“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矛盾论》）形而上学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彼此孤立的，不相联系的；一切事物都是永远不变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没有质变，没有飞跃；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不在事

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是由于外力的推动，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形而上学宇宙观的要害就是反辩证法。它否认事物的对立统一，对立斗争，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走向它们的反面这样一个真理。因而它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他种质的现象，最后势必导向唯心主义。

在人类认识史中，从来就有形而上学和辩证法这两种根本对立的宇宙观。有辩证法，就有形而上学。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在古代就产生了。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和辩证法的发展，形而上学也不断变换它的形式。

古代的形而上学是笼统地否认事物的变化，否认事物的内在矛盾。在我国，春秋战国时的儒家，为了维护和复辟奴隶制，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变革，鼓吹“无变古，毋易常”，认为古代奴隶制是永恒不变的；孔丘还把“中庸之道”说成是最高的道德，宣扬折衷主义调和论。道家庄周从相对主义出发，得出“万物皆一也”、“莫得有偶”（没有对立）的荒谬结论，否认事物内部的矛盾，充当儒家的同盟军。在欧洲，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派认为，对立的東西是固定不变的，不能互相转化。埃利亚派认为，唯一真实的东西是存在，它是永恒的、不生不灭的、不变的。他们在政治上都是为奴隶主贵族统治辩护。

中世纪的形而上学，“无论在中国，在欧洲，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间内，是属于唯心论的宇宙观，并在人们的思想中占了统治的地位。”（《矛盾论》）在中国，西汉儒家董仲舒，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认为“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主张“奉天而法古”；他还认为矛盾双方的地位是固定不变的，阳永远是主导，阴永远是服从，因此臣要服从君，妻要服从夫，子要服从父，永远不能改变。董仲舒的形而上学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后来的儒家，从东汉《白虎通义》的编纂者到近现代的张之洞、曾国藩、蒋介石等，为了搞复辟倒退，无不宣扬这一思想。在欧洲，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大多数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

在近代，欧洲的形而上学成为系统的思维方法，这是跟资本主义

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相联系的。从十五世纪下半页开始，自然科学家在分门别类地积累材料过程中，逐渐形成一种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考察问题的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在十七世纪被英国哲学家培根、洛克从自然科学移植到哲学领域中来，形成了一种系统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恩格斯在揭露形而上学的特征时指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24 页）欧洲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机械唯物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庸俗进化论，都属于这种形而上学。在中国，近百年来输入了欧洲的机械唯物论和庸俗进化论，则为资产阶级所拥护。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拥护庸俗进化论。帝国主义走狗、买办资产阶级奴才胡适也拥护庸俗进化论。

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把形而上学作为推行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苏修叛徒集团大肆鼓吹“矛盾融合论”，为社会帝国主义的法西斯专政效劳。叛徒杨献珍抛出“合二而一”论，为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宣扬“顶峰论”、“合二而一”论、“中庸之道”，玩弄诡辩术，为其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指出：“只有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反动的统治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形而上学，不是把对立的事物当作生动的、有条件的、可变动的、互相转化的东西去看，而是当作死的、凝固的东西去看，并且把这种错误的看法到处宣传，迷惑人民群众，以达其继续统治的目的。”（《矛盾论》）

形而上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在革命队伍中也有影响。有些同志看问题主观片面，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见局部，不见全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现象，不看本质；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骄傲自满，固步自封等等，都是形而上学的表现。有形而上学观点的人，看不到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不懂得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沿着螺旋式的道路向前发展，不懂得在正确路线指引下，成绩总是主要的，形势总是大好的，缺点和困难是局部的、暂时的，不难克服

的。他们在团结和斗争的问题上，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就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不知道斗争过程中有起有伏、有张有弛；不知道联合过程中包含着对反动事物、分裂倾向和错误思想的斗争等。这些都是执行和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障碍，是继续革命的障碍，对革命事业的危害极大，必须注意克服。

毛主席总是教导我们要重视学习和宣传唯物辩证法，反对和批判形而上学。他指出：“不论是用肯定一切的观点或者否定一切的观点来看我们的工作，都是错误的。对于这些片面地看问题的人，应该进行批评”。“我们要求把辩证法逐步推广，要求大家逐步地学会使用辩证法这个科学方法。”（《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我们必须遵循毛主席的教导，努力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彻底批判和克服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一词，起源于古希腊对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称呼，从字义上，即“物理学之后”的意思。我国在翻译这一词时，根据古代《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把“物理学之后”译为形而上学。在十八世纪末叶以前，形而上学是指研究经验以外的对象（如上帝、灵魂、意志自由等）的哲学。

庸俗进化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于欧洲的一种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想。主要代表是英国的斯宾塞。

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欧洲各国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阶级斗争和自然科学也都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使发展的思想更加的深入人心。“于是，在资产阶级那里，除了公开的极端露骨的反动的唯心论之外，还出现了庸俗的进化论，出来对抗唯物辩证法。”（《矛盾论》）

毛主席指出：“所谓形而上学的或庸俗进化论的宇宙观，就是用孤立的、静止的和片面的观点去看世界。”（《矛盾论》）庸俗进化论歪曲地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把进化、

发展的观点庸俗化。它口头上承认世界和事物是变化发展的，但它所谓的发展只是渐进的量变，而没有飞跃、质变；认为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否认事物内部矛盾是发展的根本原因。它认为人类社会也是逐渐地进化的，是通过种族之间的斗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或社会外部的地理、气候等条件的作用，否认社会内部对立阶级的矛盾、斗争是社会进步的主要原因，否认社会革命。如斯宾塞说，发展是“通过完全不可觉察的阶段”而进行的量的加密和增大，物体粒子的重新排列、组合就构成新的物体。他用“力的平衡”来解释一切，胡说革命是对社会“均衡的破坏”，其目的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庸俗进化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和机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反动的资产阶级从庸俗进化论出发，竭力宣扬阶级合作、社会“改良”，妄图采取一些不触及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改革，来掩盖阶级矛盾，愚弄和麻痹人民，以维护帝国主义统治。新老修正主义者也都以庸俗进化论来反对革命的辩证法，鼓吹阶级调和与阶级斗争熄灭等谬论，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康有为最早将庸俗进化论和儒家的今文经学结合起来，提出“三世说”进化历史观，作为改良主义的思想基础。它强调社会发展必须“循序而行”，不能“骤变”，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严重软弱性和妥协性。帝国主义文化买办胡适，更是拼命地鼓吹庸俗进化论，叫嚷“世界是一点一滴一毫一分成长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映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极端反动性。

外因论

一种形而上学谬论，认为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不在事物内部的矛盾性，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作用。资产阶级的机械唯物论者和庸俗进化论者都宣扬这种外因论。

有些机械论者把自然界变化运动的原因，归结为自然界之外的超

自然的力量。例如牛顿认为，宇宙太阳系的运动，是由于上帝的“第一次推动”后才开始的，“第一次推动”使行星永远按一定的方向和确定的方式运动。德国物理学家克劳胥斯认为，宇宙间热是由热体向冷体自发地转移，是不可逆转的，最后整个宇宙达到温度均衡，如果没有外界的作用，就不能再产生温度差，宇宙就会“热死”。恩格斯在讽刺这种外因论时指出：“宇宙钟必须上紧发条，然后才走动起来，一直达到平衡状态，而要使它从平衡状态再走动起来，那只有奇迹才行。上紧发条时所耗费的能消失了，至少是在质上消失了，而且只有靠外来的推动才能恢复。因此，外来的推动在一开始就是必需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629 页）英国庸俗进化论者斯宾塞认为，任何物体的集合体都没有稳定性，只要受到足够强大和长久的外力影响，就会发生变化。例如生物集合体的变化过程，就是按外力抵抗最小的方向进行的。

有些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把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地理、气候等外部原因，认为地理、气候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和更迭。英国地理学派德伯雷宣称：“坐落东西方的国家，要比由北向南延伸的国家强盛得多”。英国地理学派布克尔，也用地理条件来解释英帝国主义的“强大”。他们否认社会内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阶级斗争、新旧斗争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

毛主席彻底批驳了外因论，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事物的外部，而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外因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的原因。“事实上，即使是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也要通过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植物和动物的单纯的增长，数量的发展，主要地也是由于内部矛盾所引起的。同样，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许多国家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它们发展的差异性和不平衡性，非常之大。同一个国家吧，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矛盾论》）外因论不能解释事物的质的多样性，不能解释一种质变为他种质的现象，最后把事物变化运动的原因归结到某种精神或上帝，导向唯心主义。外因论在政治上是为资本主义掠夺殖民地辩护，为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政策辩护，完全是反动的。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小国要依赖大国、弱国要依赖强国、贫

国要依赖富国等等，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说成是只有依靠两个超级大国才能过日子。这种外因论显然是为美苏两霸主宰世界制造反动论据的。

在革命工作中，外因论的危害是很大的，它是懒汉思想、保守思想的掩护体。一个革命者如果沾染上外因论，就不可能有革命的雄心壮志，就会丧失革命责任感，放松主观应有的努力，给革命事业造成损失。因此，一切革命同志都要自觉与外因论作斗争。

矛盾调和论

一种形而上学谬论，认为矛盾可以通过调和得到解决，阶级矛盾也可以调和，根本否认阶级斗争，这是地地道道的阶级调和论和历史唯心论。

矛盾调和论由来已久。历代反动阶级出于他们阶级的需要，都宣扬矛盾调和论。中国反动的奴隶主贵族代言人孔丘、孟轲之流，鼓吹折衷调和的“中庸之道”，胡说“中庸”是一种最高的“德”，叫嚷“礼之用，和为贵”，妄图以此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维护和复辟奴隶主的统治。西汉儒家董仲舒，宣扬“凡物必有合”，把事物说成是合一的；南宋儒家朱熹，鼓吹“中和”，把对立面说成是调和的，都是为镇压农民反抗、维护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利益效劳。有些革命阶级由于它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也宣扬矛盾调和思想。例如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黑格尔，认为“绝对观念”发展到顶点，矛盾最终就完全被调和了，这是为德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向封建阶级妥协制造理论根据。

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是矛盾调和论的吹鼓手。蒲鲁东宣称要“找出一个调和的原理”来调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并企图寻求真正的中庸之道，即奴隶制和自由的平衡，以维护资本主义的统治。考茨基宣扬“一个社会里没有两个毫无共同利益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确有共同利益”。毛主席指出：“**第二国际的劳资合作论，把一个阶级一个革命都让掉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503 页）苏修叛徒集团更是拼命鼓吹矛盾调和论。赫鲁晓夫叫嚷：“面对着热核

灾难的威胁，世界只有一个，而且是不可分割的。在这里我们都是人”。为了反对战争，“不同种族和民族、不同阶级和社会集团、不同党派和政治信仰的人们、各种宗教的拥护者和无神论者，都抛弃了一切分裂他们的东西”。勃列日涅夫大喊：“社会主义大家庭”要把“共同利益置于首位”，一切都要融合到社会帝国主义殖民统治这个“整体”之中。苏修御用学者为适应社会帝国主义的政治需要，应声而起，胡说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矛盾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从对立向差别转化而以差别的融合结束”，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通过对立面的结合（融合）以克服对立面”，发展是由“矛盾的协调”到“更为完善的协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动力不是增长的矛盾，而是协调和绝对统一的力量”等等。他们根本反对唯物辩证法，目的是为苏修叛徒集团的法西斯专政制造理论根据。

在中国，叛徒刘少奇胡说非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调和的矛盾”，“这种矛盾的解决可以用改良的方法解决”。林彪一类骗子也大肆鼓吹矛盾调和论，胡说孔孟的“中庸之道”是“合理”的，“是我民族伟大的德性之一”，宣扬“两斗皆仇，两和皆友”，主张路线斗争应该“休战”，胡诌有“全人类的普遍利益”，鼓吹“各阶级的联合”等。所有这些谬论，都是反对唯物辩证法，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他们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矛盾调和论不论在政治上、理论上都是反动的。马克思主义者尖锐地批判了矛盾调和论。恩格斯在批判勃鲁姆时指出：“他不偏不倚地站在更高的‘中庸’立场上，那就不对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 400 页）列宁指出：“‘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 5 页），深刻地揭穿了“中庸”的本质。列宁还指出：“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列宁选集》第三卷 175 页）毛主席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矛盾论》）就矛盾斗争的性质而言，只有对抗与非对抗之分，没有可调和与不可调和之别。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可以调和的矛盾。任何矛盾都不会调和，也不可能调和。“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

地。”矛盾只能通过斗争才能解决。在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绝不会调和。只有通过社会的阶级斗争，才能解决阶级矛盾。

合二而一

叛徒刘少奇及其在哲学界的代理人杨献珍抛出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谬论。“合二而一”论于一九六四年出笼，完全是为了反对毛主席的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反对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我们党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的。同“合二而一”的斗争，是哲学上的一场大论战，是一场严重的政治斗争。

“合二而一”一词，出自明末地主阶级思想家方以智著的《东西均》（一六五二年）一书。方以智说：“尽天地古今皆二也。民间无不交，则无不二而一者”，“交也者，合二而一也。”方以智说的事物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是调和的，合一的。这种调和矛盾、取消斗争的观点，是为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

杨献珍捡起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这种封建糟粕加以发挥，用来概括刘少奇一伙的反革命哲学，并且用它冒充辩证法，到处兜售。

杨献珍把“合二而一”说成是事物的根本规律，胡说“任何事物是‘合二而一’的”，从而否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事物的根本规律；认为“矛盾的两个侧面是不可分地联系的”，对立面统一就是“共同点”、“共同要求”。在这种“合二而一”的观点里，事物的内部矛盾不见了，事物内部对立面的斗争不见了，矛盾的一方必然要克服另一方，新事物代替旧事物，也不见了。这种否认矛盾、取消斗争、抹煞转化的谬论，是地地道道的矛盾调和论。其实质就是妄图用“合二而一”代替一分为二，在政治上就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 and 变化。”“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

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主席的一分为二思想，是对合二而一的谬论的最有力的批判。

杨献珍声称，“合二而一”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他公开宣扬：“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把两个对立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本事”，“在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的时候，要把对立着的两个方面联系起来，结合起来”，“我们执行它的时候，也必须遵照辩证法的方法，把对立的方面联系起来，‘合二而一’。”这是对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的肆意歪曲，是妄图用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按照“合二而一”去观察社会，必然抹煞阶级界限，取消阶级斗争，导致阶级调和论。按照“合二而一”去制定和执行党的路线和政策，只能是投降主义的路线和政策。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分为二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无产阶级政党制定和执行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学习辩证法，就是要学会运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处理各种问题，承认矛盾，开展斗争，促进转化，不断革命，而决不搞什么合二而一。

杨献珍还胡说，“分析是一分为二，综合是合二而一。”企图用割裂、歪曲分析和综合来兜售其合二而一的黑货。唯物辩证法认为，分析是一分为二的，是统一体分裂为两个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斗争；综合也是一分为二的，是通过对立面的斗争，矛盾的一方“吃掉”另一方。分析和综合既不可分，又可分，也是一分为二的。

“合二而一”论的要害，就是“合”字，就是调和矛盾，取消斗争，否认转化，反对革命，妄图把无产阶级合到资产阶级那里去，把社会主义合到资本主义那里去，把马列主义合到修正主义那里去，把革命合到反革命那里去。苏修的一篇反华文章喝彩道：“刘少奇建议重新恢复同苏联（应该读作苏修）的友好关系……这一路线的捍卫者试图从理论上为这一方针提出根据，他提出‘合二而一’论……”。可见，“合二而一”论就是阶级投降论，资本主义复辟论，是地地道道的

反动哲学。

叛徒林彪也鼓吹“合二为一”的反动谬论，胡说“没有合二为一就没有统一观念”，歪曲矛盾的同一性，对抗一分为二的革命辩证法，其罪恶目的同叛徒刘少奇一样，就是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合二而一”论曾经渗透到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政治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史学领域中的“让步政策论”，文艺领域中的“时代精神汇合论”、“无冲突论”、“中间人物论”，经济学中的“综合经济基础论”等等，都是“合二而一论”的具体表现。

无冲突论

一种形而上学谬论，认为世界没有矛盾冲突，或者有矛盾而无冲突；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阶级矛盾、阶级冲突；矛盾不必通过冲突斗争，可以通过调和得到解决。“无冲突论”根本否认矛盾、否认斗争、否认革命，实质上是矛盾取消论、矛盾调和论、阶级调和论。

在苏联，苏修叛徒集团胡说：“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利益并不冲突”；“苏联和美国之间并没有领土的纠纷。没有互相敌对，更没有发生冲突的原因”，“客观上就不存在矛盾”；经济上的强国援助弱国，就能“不仅把战争、而且把其他所有的冲突从人类生活中排除出去”；只要美苏两家达成什么协议，整个国际局势就会缓和下来，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的“历史新阶段”就要来临。这都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特别是两个超级大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都在进一步激化。没有矛盾冲突的世界是根本不存在的。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就存在着战争的危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缓和，也不可能有什么“持久和平”。他们还宣扬什么“社会主义条件下对立面的‘斗争’不表现为各阶级及其政党的冲突”，社会主义社会“不是由于构成它的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阶级冲突和斗争而是由于它们的共同努力、同志式的合作和互助向前发展的”，把社会主义社会说成是没有矛盾冲突的世外桃源。这也是荒谬的。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

矛盾，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正是这些矛盾和斗争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这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矛盾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解决，只是由于矛盾的性质不同，斗争的形式不同罢了。矛盾不会调和，也不可能通过调和来解决。苏修叛徒集团鼓吹“无冲突论”，对外是为了反对世界人民革命，为其霸权主义服务；对内是为了反对本国人民革命，为其法西斯主义服务。

在我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抛出所谓“无差别境界”论，胡说“问题或矛盾解决了，生活上必有无差别的境界出现”，也就是“没有问题或矛盾”，“主观客观云云，完全统于一体。”这也是“无冲突论”。毛主席指出：“**矛盾和斗争是普遍的、绝对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矛盾论》）在旧过程完结和新过程开始之间，绝对不存在所谓的“无差别境界”。在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始终存在着矛盾，存在着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马克思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也是互相排斥、互相对抗的。可见，“无冲突论”完全是臆造的，其目的就是抹煞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根据。

“无冲突论”反映在文艺上，就是主张文艺作品不应当表现矛盾冲突和阶级冲突，不应当表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或者只能反映人和自然的冲突等等。例如，苏联文艺界的修正主义者把所谓“好的”与“更好的”之间的冲突，说成是“现实生活中唯一的冲突”，提出在文艺创作中应当歌颂太平，或者只能表现所谓“好的”与“更好的”之间的冲突。在我国，刘少奇、周扬一伙鼓吹文艺作品要有“人情味”，要写“家务事，儿女情”，追求所谓“轻松愉快”的文艺，拼命反对革命的“火药味”；或者提倡单纯描写人与自然的斗争，用人造的“误会”和偶然的“巧合”来构成戏剧冲突，从而抽掉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文艺上的“无冲突论”，是为政治上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服务，是为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造反革命舆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客观现实的反映。无产阶级文艺作品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反映现实的矛盾冲突和阶级冲突，反映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突出无产阶级的英雄人

物。这样，才能贯彻党的革命政治路线，使文艺真正成为革命斗争的有力武器。

诡辩论

是以虚假的、片面的、表面相似的论据，用主观推论等手法，作出似是而非的结论，以达到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目的。其特点是貌似辩证法，而其实质是歪曲和反对辩证法的。其手法往往是用谣言、谎言代替或掩盖事实；以假乱真，倒打一耙；偷换概念，转移命题；主观推论，机械类比；折衷调和，冒充全面；混淆界限，抹煞本质等等。其哲学根源主要是主观主义、折衷主义和相对主义。

诡辩论和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列宁说：概念的对立面同一的灵活性，“如果加以主观的应用=折衷主义与诡辩。客观地应用的灵活性，即反映物质过程的全面性及其统一的灵活性，就是辩证法，就是世界的永恒发展正确反映。”（《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112 页）辩证法承认事物的内在矛盾，认为概念的矛盾是客观事物矛盾的反映；诡辩论则根本否认事物的内在矛盾，他们或者用抽象的一般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否认概念中的矛盾，或者任意地抓住一个“论据”、矛盾的一个侧面，加以夸大，否定另一个侧面。辩证法承认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系着，认为对立双方有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之分，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诡辩论也讲“全面性”，但却把矛盾两方面平列，不分主要和次要，掩盖了事物的本质，或者抓住事物表面相似之处，把不同的事物混同起来。辩证法承认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但事物在一定条件下有其确定性，相对之中包含着绝对；诡辩论抹煞转化的条件性，把一切都说成是相对的，认为相对只是相对，是排斥绝对的，否认事物的确定性和质的差别。

诡辩论是反动阶级在灭亡之前进行垂死挣扎在理论上的表现，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辩护工具。用诡辩论冒充辩证法是一切修正主义者反对马克思主义、贩卖修正主义的惯用伎俩，他们总是“用诡辩来阉割它的内容，使马克思主义变为对资产阶级没有害处的神圣的‘偶像’”。（《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 199 页）叛徒考茨基玩弄诡辩

术，胡说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的一种政策，以掩盖帝国主义的内在矛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效劳。苏修叛徒集团玩弄诡辩术，说什么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美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为他们宣扬“和平过渡”的谬论辩解，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在批判考茨基时指出：“借口马克思在 70 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第一、就在当时马克思也认为这种可能是一个例外。第二、当时还没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第三、英国和美国当时没有（现在有了）军阀制度——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主要机构。”（《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 91 页）他们还玩弄诡辩术，为他们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负别国的政策辩护。叛徒林彪和陈伯达也用谣言和诡辩的手法，抛出唯心论的“天才论”，作为他们反革命政变的理论纲领，等等。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自以为得计，自以为很聪明，其实都是最蠢的，都是没有好结果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780 页）

折衷主义

把矛盾双方平列起来或把各种根本对立的立场、观点和理论无原则地混合起来，就是折衷主义。折衷主义有种种表现：

其一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把两点论中间的重点论偷偷地抽去，把矛盾双方平列起来，不分主要和次要、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结果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例如，布哈林胡说“从经济上看问题和从政治上看问题有同等价值”；林彪一类骗子鼓吹“政治重要，经济也重要”、“政治和业务轮流突出”等等，都是把矛盾两个方面平列起来，都是折衷主义。列宁在批判布哈林时曾经指出：“‘又是这个，又是那个’，‘一方面，另一方面’——这就是布哈林在理论上的立场。这就是折衷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 449 页）马克思主义认为，矛盾双方是不平衡的，不能并列；只有分清主次，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认清事物的性质，工作才有正确的方向。

其二是用混合论、调和论来代替唯物辩证法的结合论，把水火不相容的东西无原则地结合在一起。在哲学上，就是企图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混合起来，建立一种超乎二者之上的哲学体系。例如，考茨基宣扬“唯物主义历史观不仅可以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合得拢，而且可以与许多别的哲学合得拢。”波格丹诺夫一伙鼓吹马克思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结合”，他们从马赫那里取出一点不可知论和唯心主义，再从马克思那里取出一点辩证唯物主义，把它们混合起来；林彪胡说“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等等，都是把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混合起来，都是折衷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对立面不能混合，矛盾不能调和。无产阶级世界观绝不能同资产阶级世界观结合，只能通过斗争，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折衷主义混合论不分阶级，不分敌我，不分是非，不要斗争，不要革命，就是修正主义。

其三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代替唯物辩证法，总是这也对，那也对，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列宁说：“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企图找出一种合力，在两种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回旋，力图既‘同意’这一观点，又‘同意’另一观点”。（《列宁全集》第七卷 399 页）折衷主义貌似公正，不偏不倚，实际上倒向错误一边。马克思主义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必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表示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决不能模棱两可，调和折中。毛主席在分析一九二七年以后国际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时指出：“中国不站在这方面，就要站在那方面，这是必然的趋势。难道不可以不偏不倚吗？这是梦想。”“‘中立’只是骗人的名词。”（《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51 页）

哲学上的折衷主义，必然导致政治上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新老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篡改马克思主义的惯用伎俩。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篡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毛主席指出，对于那些“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

相对主义

一种形而上学观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它把相对和绝对完全割裂开来，片面地夸大相对，夸大认识的相对性，否认绝对，否认绝对真理。

相对主义由来已久。我国战国时的庄周就是相对主义的代表。他不承认相对之中包含着绝对，不承认事物质的规定性，因而得出了“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的错误结论。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的学生克拉底路也是相对主义者。他认为一切都在运动，对任何东西都不可能说出什么来。马赫主义者公然宣称：“我们是相对主义者”，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把一切知识都说成是相对的，否认绝对真理，否认真理的客观标准。按照这种相对主义的观点，事物根本没有确定的性质，事物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好与坏、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也根本不存在任何原则的界限，这是十分荒谬的。

列宁指出：“把相对主义作为认识论的基础，就必然使自己不是陷入绝对怀疑论、不可知论和诡辩，就是陷入诡辩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 136 页）“物理学”唯心主义的根源之一，就是由相对主义走向唯心主义。既然一切都是相对的，没有质的区别，真理没有客观标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有各的是非，就必然要陷入诡辩。列宁说：“从赤裸裸的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可以证明任何诡辩都是正确的”。（《列宁选集》第二卷 136 页）

辩证法和相对主义是根本对立的。辩证法认为，相对和绝对是对立的统一。相对之中有绝对，没有脱离绝对的相对。辩证法并不否认认识的相对性，但反对相对主义。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无疑地包含着相对主义，可是它并不归结为相对主义，这就是说，它不是在否定客观真理的意义上，而是在我们的知识向客观真理接近的界限受历史条件制约的意义上，承认我们一切知识的相对性。”（《列宁选集》第二卷 136 页）

相对主义是一切反动阶级的哲学工具。刘少奇胡说“绝对还是有条件的”，这是妄图用相对主义来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从而兜售其修正主义黑货，其用心非常恶毒，必须彻底揭露和批判。

在革命队伍中，有形而上学观点的人，也会犯相对主义的错误。他们对问题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采取相对主义态度。毛主席在批评有人用战争的流动性来否定一定时间内的相对固定性时指出：“否认了这点，战争就无从着手，成为毫无定见，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或者这也是、那也是的战争相对主义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64 页）这种相对主义的错误思想，对革命事业是有害的，必须加以克服。

绝对主义

一种形而上学观点，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绝对的。它把绝对和相对完全割裂开来，片面地夸大绝对，夸大认识的绝对性，否认相对，否认相对真理。

绝对主义也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江湖骗子杜林在世界上宣扬宇宙的原始状态是“物质的自身等同的状态”，是绝对静止、绝对平衡的，把相对的静止、平衡绝对化；在认识论上，他鼓吹认识的“绝对可靠性”和“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夸大思维的无限性和真理的绝对性，否认思维的有限性，否认相对真理。他用这种绝对主义来制造唯心论的哲学体系和假社会主义的反动理论。叛徒陈独秀鼓吹“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卖国贼王明先是鼓吹“一切斗争，否认联合”，后又贩卖“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推行“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林彪鼓吹“绝对权威”、“顶峰论”，否认相对，夸大绝对，使绝对脱离相对。他们的世界观都是绝对主义，都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

在革命队伍中，有形而上学观点的人，也会犯绝对主义的错误。毛主席在批评战争问题上脱离政治的倾向时指出：“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47 页）毛主席还批评有些同志“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做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93 页）绝对主义往往从这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好，就绝对的好；坏，就绝对的坏。这种绝对主义的错

误思想，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障碍，是继续革命的障碍，必须加以纠正。我们要学会分析问题的方法，养成分析的习惯。

辩证法和绝对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辩证法认为，绝对和相对是对立的统一。绝对存在于相对之中，没有脱离相对的所谓绝对。马克思主义承认绝对真理，但坚决否认有离开相对真理的所谓绝对真理、永恒真理。真理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发展的，所谓“终极的、最后的真理”是根本不存在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实践论》）

机械论

一种形而上学发展观，它用机械力学的观点去解释一切现象，用位置移动来说明一切变化，用量的差异来说明一切质的差异，用外力推动来说明一切运动。

机械论形成于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西欧。十七世纪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法国的笛卡尔，十八世纪法国的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都是机械论者。拉美特利所著的《人是机器》是机械论的一篇代表作。机械论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由于当时只有力学比较发展，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在人们的头脑中占了统治地位以及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所决定的。

十九世纪的庸俗唯物主义者和机械论的自然科学家，也把一切运动归结为机械运动，也是机械论者。庸俗唯物主义者毕希纳断言，自然界是“任何地方都不可断开的同类现象的链条”，它的作用是“纯粹机械的”。英国物理学家格罗夫（1811-1896年）认为，“物质的其他状态是运动的变形或者最终会归结为这些变形”，把其他运动形式的特殊性抹煞了。德国物理学家耐格里（1817-1891年）认为，一切质的差异只有在能够归结为同一的最小粒子的结合所造成的纯粹量的差异。恩格斯指出：“因为除现在流行在德国各大学中的最平凡的庸俗哲学外，我们今天的自然科学家对别的哲学一无所知，所以他们才这样应用诸如

‘机械论’一类的术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597 页）

机械论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同唯物辩证法是根本对立的。唯物辩证法认为，物质运动有高级形式和低级形式，机械运动是物质运动的低级形式。高级运动形式包含低级运动的形式，但不能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各种运动形式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从一种运动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运动形式都是质变、飞跃，都是由于事物内部矛盾引起的。因此，用机械力学的观点去解释一切现象，是根本错误的。

机械论者抓住事物的某一侧面加以绝对化，否认对立面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例如，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和实践、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矛盾，只承认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的主要的决定作用，不承认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作用，这是机械唯物论的见解，是片面的、错误的。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指出：“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矛盾论》）

此外，不从具体情况出发，把一种原理呆板地到处搬用，这也是机械论的一种表现。例如，把适合于一定时间、地域和性质的战争指导规律，呆板地移用于不同的时间、地域和性质的战争，这是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也是错误的。毛主席针对这种错误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67 页）

均衡论

一种形而上学谬论，也叫平衡论。它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平衡或静止是无条件的、绝对的；绝对平衡是物质的一般状态或原始状态；

各种对立力量的发展总是趋向平衡、稳定；事物只有渐变、进化，没有质变、飞跃；平衡、稳定是正常的状态，不平衡、斗争、革命是不正常的状态。

均衡论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斯宾塞。他用“力的平衡”来解释整个宇宙，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或者已经平衡，或者正在走向平衡。一切运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均衡状态。“我们到处都发现趋于平衡的意向”。有机体的进化是“内在的情况同外部世界趋于平衡”的结果；“人类心灵与环境将逐渐谐和”；社会政治生活也是趋向平衡，即各种对立的共存。“完善”或“力的平衡”是发展的极限。社会组织的理想状态是一种静力学的静止状态，即个人和环境达到了尽善尽美的平衡状态。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社会发展的最后阶段，一切都达到平衡。他把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说成是“均衡的破坏”。马赫主义者也鼓吹均衡论，马赫胡说什么：“我们可以按照我们本身的肉体均衡和精神均衡，推论出自然界一切过程的均衡……”。

均衡论是资产阶级反对唯物辩证法的反动工具。它把相对平衡绝对化，否认了各种矛盾和矛盾各方面力量的不平衡性。事实上，“一切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和暂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590 页）不平衡则是绝对的、经常的。任何复杂过程，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之间的力量对比是不平衡的。任何一对矛盾，矛盾双方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矛盾论》）

均衡论也是机会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在苏联消灭富农实行农业集体化的关键时刻，布哈林鼓吹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成分和社会主义成分应当均衡地发展，主张资本主义、富农经济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斯大林指出：“这种理论的目的是要保持个体农民经济的阵地，用‘新的’理论武器把富农分子武装起来反对集体农庄，破坏集体农庄的阵

地。”（《斯大林全集》第十二卷 128 页）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所谓“均衡裁军”，使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保持“均势”。这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世界霸权，展开了疯狂地军备竞赛，一方竭力追赶和力图压倒另一方，它们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既谈不上什么“均衡裁军”，也谈不上什么“均势”。现代修正主义者宣扬这套谬论，是为社会帝国主义推行霸权主义服务的。

循环论

一种形而上学发展观，认为事物是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而不是前进的上升运动。在循环论者看来，世界上各种不同的事物，从一开始就是如此，经历了千万个春秋之后仍然如此，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有量变，而没有质变。循环论者往往抓住每年总是春、夏、秋、冬的循环往复，每天总是白天到黑夜、黑夜到白天的循环往复等现象，力图证明他们的循环论是正确的。其实，这不过是把事物运动形式上的反复循环，用来掩盖事物内容上的发展。

把这种周而复始的形而上学谬论，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中，就是历史循环论。它把社会历史看成是走马灯式的绝对的循环，没有质的飞跃，没有任何进步。我国战国末年的邹衍，把原来属于朴素唯物主义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学说，硬套到社会历史的发展上去，创立了所谓“五德终始”说，把朝代的变换看成是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的相继更替，循环往复。西汉儒家董仲舒提出了“三统”说，把夏、商、周等朝代的兴亡说成是什么“黑统”、“白统”和“赤统”的“周而复始”的循环更替。德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尼采，用历史循环论来反对发展的历史观，认为历史不是在前进，而是不断地向经历过的阶段倒退。某些现代资产阶级思想家宣扬人类必将退回到以前的时代，提出要“回到中世纪去”、“回到原始时代去”等反动口号，这实质上也是历史循环论，只是花样有所不同罢了。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线式进行的”（《列宁选集》第二卷 584 页）其中虽有某些特征重复出现，但绝不是简单的循环，而是由旧到新、由新到更新的质变。例如，在阶

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每经过一次重大斗争，战胜了阶级敌人的进攻，革命和建设事业就朝前迈进一大步。人的认识的发展也不是直线的。正如列宁指出：“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411 页）这说明人们的认识过程虽然像圆圈，但并不是“老驴推磨，原地打转”那样机械地重复，而是螺旋式发展，波浪式前进，每一次循环往复，都使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虚无主义

一种对事物不作具体分析，无原则地、任意地否定一切的资产阶级思想。

虚无主义在政治上表现为无政府主义。它否定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反对国家权力，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以及一切组织性和纪律性。列宁在《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一文中，曾把无政府主义和知识分子的虚无主义相提并论。另外，在批判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的虚无主义时，列宁说：“表现出这种虚无主义的人，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资产阶级自由派！”（《列宁全集》第四卷 241 页）

在文化艺术上，虚无主义对历史的遗产、民族的文化不作具体分析而一概否定。例如，在我国，曾有人盲目崇拜西方医学、艺术等，甚至主张“全盘西化”，否认祖国的宝贵遗产及民族特点，不愿意去研究和发展的东西，这就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在毛主席提出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导下，我国革命样板戏创作的成功，中西医结合，针刺麻醉及中药全身麻醉的研究成功等，都是对崇洋思想和虚无主义的有力批判。

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虚无主义是垄断资产阶级腐朽、没落、颓废思想的反映。反动统治者利用它来腐蚀人民的斗志，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因而必须彻底批判。

虚无主义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流行于俄国。当时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年青的激进分子，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压迫，对当时的封建

关系、社会秩序、道德观念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自称为“虚无主义者”。这种虚无主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作用，它同后来机会主义者的虚无主义是有区别的。

形式主义

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和恶劣作风。

形式主义者割裂形式和内容的内在联系，认为形式是决定一切的，内容是无足轻重的，片面地夸大形式的作用，抹煞了内容对形式的决定作用。例如，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形式主义者抹煞了内容的作用，根本不懂得事物的内部规律性，总是在片面性、表面性和主观性上打圈子，并力图哗众取宠，所以是一种华而不实、自欺欺人的恶劣作风。

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报告中，深刻地批判了叛徒王明之流所传播的形式主义，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形式主义方法，“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789 页）毛主席还指出这种作风是害人害己、极不利于革命，甚至是祸国殃民的，因而号召大家，要像“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那样，来肃清这种恶劣作风。

一切反革命两面派总是竭力玩弄形式主义。叛徒、卖国贼林彪卑鄙地利用形式主义来歪曲和反对毛泽东思想，并借以掩盖其极右实质。在形式上，他打着“高举”、“紧跟”的幌子，并高喊“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装出一副“跟得最紧”的样子，实际上却千方百计地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在革命队伍内部，形式主义对工作的危害也是很大的。毛主席早在一九三〇年就严肃地指出：“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讨论和审察，一味盲目执行，这种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是很不对的。为什么党的策略路线总是不能深入群众，就是这种形式主义

在那里作怪。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的指示，这不是真正在执行上级的指示，这是反对上级指示或者对上级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反对本本主义》）我们要深刻领会毛主席这一指示的重要意义，在三大革命斗争中自觉地克服和防止形式主义。只有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识别能力，才不致为反革命两面派的形式主义所蒙蔽和欺骗。

【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是无产阶级的历史观，也叫唯物史观。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欧洲许多国家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都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把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历史领域，根据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经验，深刻地研究了人类全部历史，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空前的大革命。恩格斯说：“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41 页）列宁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列宁选集》第二卷 443 页）

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正确地解决了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关系问题，揭示了阶级斗争规律，找到了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和根本动力。恩格斯说：“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

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602 页）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生产方式是社会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社会制度变化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历史的发展，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势必引起社会革命，而经济基础的变更，迟早要导致上层建筑的变革。自有阶级以来，人类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理解阶级社会全部历史的钥匙。毛主席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的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76 页）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正确地回答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这个历史学家和哲学史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它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32 页）

历史唯物主义是在同历史唯心主义的长期斗争中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费尔巴哈，以及蒲鲁东、巴枯宁和拉萨尔等机会主义者的唯心史观，作了全面、深刻的批判。这就引起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猖狂攻击。他们诽谤历史唯物主义是几个“天才的煽动家”所捏造的“幻想”，胡说它只肯定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而否认思想、道德的动力，“只是一半真理”。列宁和斯大林根据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深刻地批判了这些谬论，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毛主席在反对党内的机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特别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全面地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鲜经验，对历史唯物主义作出了重大的发展。毛主席深刻地阐明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阐明了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斗争决定历史发展总趋势的观点；并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全面地论证了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

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反复强调上层建筑领域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意义；从理论和实践上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作出了重大贡献。

历史唯物主义像光芒万丈的灯塔，照亮了人类解放的道路。它是无产阶级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制定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理论基础；是全世界人民在无产阶级领导下，打倒帝、修、反，消灭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武器。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对于我们深刻领会和贯彻执行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加强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把反修防修的斗争进行到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

社会存在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主要是指社会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社会意识是政治、法律、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道德和宗教等观点。思想感情、风俗习惯等，也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

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种完全对立的观点，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是历史唯心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第一性的，是产生社会意识的根源；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生产方式的发展和变革，迟早要引起社会意识的变化和革命。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82 页）

在阶级社会里，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包括民族斗争）是最重要的社会存在。任何社会意识都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的反映，并

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存在决定意识，就是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客观现实决定我们的思想感情。”（《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09 页）在每一个时代，统治阶级的社会意识都起着支配作用。马克思说：“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52 页）马克思所说的物质关系，就是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就是阶级关系。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的思想也必然占统治地位。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的思想就上升为统治的思想。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矛盾的存在，决定了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有着重大的反作用。违背社会发展要求的反动阶级的社会意识，极力麻醉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破坏群众的革命斗志，维护或复辟旧制度，反对新制度，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我国历史上二千多年来，以孔丘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就起着阻碍和破坏社会变革的极其反动的作用。而反映社会发展要求的先进阶级的社会意识，能够教育群众，推动群众起来革命，对于变革旧制度，建立和巩固新制度，发展社会生产力，起着重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先进的社会意识对推动社会前进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毛主席说：“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矛盾论》）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思想，对于消灭奴隶制度和建立封建制度就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路线，对于我国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因此，在四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确规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它包括三个内容：（一）自然地理环境；（二）人口及其密度；（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但生产方式是主要的。为了进行社会生产，当然需要有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和一定密度的人口。但是这两个条件，都是社会发展的外部条件，它们只能促进或延缓社会发展的进程，而不能决定社会制度的性质，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马克思主义认为，这三个条件中，只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才是“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32 页）

人们为了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就必须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正是人们的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践，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开始了人类历史。而且只有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才能决定社会的面貌，只有生产方式内部矛盾的运动，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才是引起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使一种社会制度过渡到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制度的根本动力。正如马克思所说：一个社会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5 页）恩格斯也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477 页）

儒家鼓吹“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天命论，认为神是人类社会的主宰，把人的思想、观念当作社会的出发点，否认物质生产是人们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否认社会物质生活的客观条件，这是彻头彻尾的唯心史观。资产阶级学者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和“人口论”片面夸大地理环境和人口密度的作用，抹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决定作用，特别是抹杀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在解决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决定作用，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

生产方式

人类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方式，也叫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它是社会生活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们为了生存，就必须有食品、衣服、住房等生活资料；为了获得这些生活资料，就必须劳动，必须生产。马克思曾经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就是停止劳动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真理。因此，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生活的起点，也是任何一个社会生存的基础。所以，“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481 页）

人们为了生产物质生活资料，必须有一定的生产力和一定的生产关系。这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就构成一定的生产方式。其中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则是它的社会形式。生产方式的性质是由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例如奴隶社会的生产方式是由奴隶制的生产关系所决定；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是由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所决定。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也是生产方式发展和变革的根源。在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地说，生产力起着决定作用，它引起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而生产关系也反作用于生产力，它加速或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当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时候，只有变革生产关系，才能打破旧的生产方式，建立新的生产方式，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唯生产力论者看不到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片面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否定生产关系在生产过程中的重大的反作用，否认变革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因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每一个社会都是建立在一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的。生产方式归根到底决定着社会的基本制度，决定着社会的全部面貌。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社会制度和思想体系，是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的。既然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面貌，那么，生产方式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关系、社会制度、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变化。一种生产方式向另一种更高级的生产方式的过渡，必然相应地使一种社会形态过渡到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

会、社会主义社会之所以依次更替，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所以必然到来，这个历史前进的总趋势，归根到底，是由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决定的。这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生产力

人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能力，也叫社会生产力。它是由人（劳动者）和物（生产资料）这两个因素构成的。

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是生产力的首要因素。劳动者是生产力的主体，具有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主观能动性，是活的生产力。劳动工具是人类劳动器官的延长，需要人们去掌握和运用。任何一种劳动工具都是人类劳动的产物。从古代的粗石器工具到今天的自动化精密机床等，都是劳动人民创造出来的。人永远是劳动工具的创造者、使用者和改进者。“**全人类的第一个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 327 页）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见物不见人，不能抹杀生产力中人的决定作用。

生产力中物的因素是社会生产的物质技术基础，也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离开了生产工具、劳动对象等物的因素，人们就不可能进行生产。只有掌握和运用一定的劳动工具，才能向大自然开战；只有不断地革新技术，改进工具，才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生产资料，特别是劳动工具的状况，还标志着生产力的性质和水平，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尺度。劳动工具的改进和变革，是人类生产斗争经验的结晶，体现着人在改造自然界中的主导作用。

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物质根源，社会制度的变革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所以生产力的发展是“**全部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321 页）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321 页）因而也不能自由选择社会制度。每一个时代的生产力，都是以往人们实践的结果，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每一代人都只能在前人已经造成的物质基础上去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社会制度。随着生产力

的不断发展，社会也必然不断前进。一切开历史倒车的反动派是必然要失败的。

生产力总是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力的各个要素，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结合起来，并与生产关系一起运动发展的。在阶级社会里，生产力是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发展的。例如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和物的结合服从于资本家追求利润的需要，是物支配着人，而不是人支配着物；人的作用受到极大的压制，人和物的结合经常遭到严重地阻碍和破坏。这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中表现得最明显、最集中。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人，不再是物支配着人，而是人支配着物。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劳动人民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抓革命，促生产”，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群众运动，使生产力得到高速度的发展。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无比生动的事例表明：社会主义革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最大的生产力；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能被创造出来。

生产关系

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叫社会生产关系。它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基础上必然产生的物质关系。

生产从来都是社会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不但发生人同自然界的关系，而且人们相互之间也发生一定的生产关系。只有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人们才能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才会有社会生产。毛主席指出：“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实践论》）生产关系是人们一切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关系，是建立政治法律制度和各种思想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在阶级社会里，它表现为阶级关系，每个人都处在一定的阶级关系中。生

产关系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第二，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它们的相互关系；第三，产品分配形式。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主要方面，它决定生产关系的性质。生产关系的状况主要说明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由谁支配的问题。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及产品分配形式，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方面，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巩固和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生产关系有两种互相对立的基本类型。一种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原始公社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生产关系，都属于这种类型。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以不同的形式为社会所公有。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原始公社是简单的劳动协作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劳动人民之间是相互合作、相互促进的同志关系，劳动人民同剥削阶级之间是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自觉的共产主义协作关系。在产品分配方面，由于生产力水平和公有制发展程度不同，因而分配形式也不相同。在原始社会是平均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社会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另一种是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以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为特征的生产关系。奴隶制度、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关系，都属于这一类型。在这种生产关系下，生产资料为少数人的剥削阶级所占有，而多数人的被剥削阶级则没有生产资料或只有很少的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是少数人统治、压迫和剥削多数人的关系。在分配关系反面，占有生产资料并处于统治地位的阶级，能够用各种形式（如封建制度下的地租，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利润等）不劳而获地占有绝大部分产品；而不占有生产资料和处于被剥削、被压迫地位的劳动人民，则只能得到很少的生活资料。这种分配关系是一种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这种类型的生产关系具有对抗的性质，它必然表现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的极残酷的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最后一种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对抗性的生产关系，它必然要被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代替。

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革为生产力所决定，同时它又反作用于生产力。旧的、腐朽的生产关系阻碍和破坏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关系能够解放劳动者和生产资料，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生产关系的新陈代谢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必须注意解决生产关系方面的问题，注意抓好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从伯恩斯坦到林彪等新老修正主义者都竭力鼓吹唯生产力论，抹杀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反作用，否认变革生产关系的必要性，其目的就是妄图保护或复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历史倒车。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

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运动的规律，是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普遍规律。这个规律使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有机地联系起来，决定了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客观必然性，支配着整个人类社会历史的前进运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是一种客观必然性。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的社会形式。形式必须适合内容，生产关系也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在社会生产发展的总过程中，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它对生产关系起着决定作用。

“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34 页）生产力的发展迟早会引起生产关系的变革，使一种生产关系为另一种更高级的生产关系所代替。马克思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83 页）这就是说，旧的生产关系的灭亡和新的生产关系的产生，都是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而不是由人们的意志所决定的。

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发展也起着重大的反作用。在每一个新的生产关系建立起来以后的一定时期内，这种生产关系基本上和生产力的性质相适应，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力量。**“当着不变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不能发展的时候，生产**

关系的变更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矛盾论》）只有生产关系的大变革，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大发展。在生产关系的根本变革实现之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基本不适合又转化为基本适合，开始了它们之间的新的矛盾运动。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社会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决不是和平地实现的，而是通过进步阶级用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反动统治阶级所维护的落后的生产关系来实现的。历史事实证明：没有奴隶暴动，就不能冲垮奴隶制度；没有农民起义，就不能摧毁封建制度；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能够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及时调整生产关系和克服生产关系的不完善方面，使生产关系不断适合生产力的性质。但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和条件，因此，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必然要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经验证明：只有通过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断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战胜国内外阶级敌人和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抵抗和破坏，才能为实现这个规律扫清道路。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表明，人类历史是螺旋式发展的，通向共产主义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实现这个规律的力量源泉。人民群众的力量是无敌的，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经济基础是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即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其中生产资料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基础）的总和。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政治法律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构成社会形态。历史上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统一。

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中，一般说来，经济基础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产物，经济基础的性质决定上层建筑的性质。在阶级社会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有阶级性，经济基础里的阶级对抗决定着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对抗。建立在封建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是地主阶级专政和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是资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如恩格斯所说：“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66 页）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化。旧的经济基础为新的经济基础所代替，旧的上层建筑也迟早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为新的上层建筑所代替。上层建筑必须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一样，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

马克思主义肯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也肯定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能动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能起主要的决定作用。在阶级社会里，一定的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阶级服务的，决不会对各个阶级“一视同仁”。在先进的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的上层建筑，能够促进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积极力量。而当经济基础已经腐朽不适合生产力时，为这种经济基础服务的旧上层建筑，也就成了阻碍经济基础变革的反动力量。只有通过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大造革命舆论，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建立革命阶级专政，才能彻底变革经济基础。即使在经济基础的变革实现以后，也还要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以扫除反动阶级的政治势力和思想影响。不然的话，旧的经济基础就会复辟。在这种情况下，上层建筑的革命对于经济基础的变革，对于旧制度的灭亡和新制度的产生、巩固和发展，就起着决定作用。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矛盾论》）

在社会主义革命中，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尤为突出。无产阶级如果不彻底摧毁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根本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之后，如果不继续进行上层建筑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就要瓦解，资本主义经济就要复辟。就拿我国的国营经济来说，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的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许多阵地，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占领。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一场政治革命和思想革命。这场革命是对封、资、修的宣战，是对帝、修、反的沉重打击，对于加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32 页）毛主席这句名言科学地阐明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伟大作用。

劳动人民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60 页）人民群众的生产活动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恩格斯说：“无论不从事生产的社会上层发生什么变化，没有一个生产者阶级，社会就不能生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315 页）劳动人民是工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科学技术的真正主人。例如我国古代雄伟的万里长城、规模宏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等等，都是劳动人民修筑和开掘的。没有劳动人民，就没有工农业生产，就没有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就没有人类的历史。

劳动人民不但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且也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指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马克思恩格全集》第二卷 103 页）存在决定意识，知识来源于实践。劳动人民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实践是一切科学文化的唯一

源泉。离开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就不可能有文学艺术和真正科学的理论。一切文学艺术形式（包括诗歌、绘画、雕刻、音乐、舞蹈、戏曲、小说等等），最初都是人民群众在劳动斗争中集体创造出来的，而不是文学艺术家的头脑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任何科学理论和文学艺术，只有为广大群众所掌握，才能变成伟大的物质力量。

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伟大作用，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社会革命中。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人民群众与反动统治阶级斗争的历史。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是革命力量的唯一源泉。劳动人民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基本力量，是旧制度和旧事物的掘墓人，也是新制度和新事物的创造者。只有劳动人民才能进行惊天动地的伟大革命斗争，去推翻旧世界，开创新世界。历史事实充分证明，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代替资本主义社会，并不是少数“英雄”、“圣人”的创造和恩赐，而是奴隶造反，农民起义，工人革命的结果。

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创造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扩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比以往整个人类所创造的要多得多，但他们的创造性受到了资产阶级的严重压制和摧残。只有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创造作用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才能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出现空前的大变革和大跃进。我国有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是人民群众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的伟大创举，它极大地振奋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精神，使蕴藏在人民群众中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性得到高度发扬。正如毛主席所说：“社会的财富是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自己创造的。只要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又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不是回避问题，而是用积极的态度去解决问题，任何人间的困难总是可以解决的。”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一切蔑视群众，镇压群众，妄图违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开历史倒车的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历史唯物主义肯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这个前提下，也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进步阶级的人们对历史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反动阶级的人们起着阻碍历史发展的消极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先进阶级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实践中，必然会产生出一些杰出的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人民群众和进步的阶级，都需要有自己的领袖和代表人物。而人民群众的斗争烈火也一定会锻炼和造就出这样的人物。马克思说：“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450 页）例如，我国历史上柳下跖等奴隶起义领袖，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领袖，和秦始皇、刘邦等著名法家代表，就是在当时人民群众反对奴隶制复辟的伟大斗争中产生的。因此任何英雄，任何杰出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决不是天生的。

杰出人物不能创造历史，不能决定和改变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但只要他们能正确了解社会发展的趋势和条件，正确反映人民群众斗争的需要，就能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去解决历史提出的任务，对历史的发展起重大的作用。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一个杰出人物都是一定阶级的代表。杰出人物的作用决定于他所代表的阶级的作用，并为他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制约。只有对社会发展起进步作用的先进阶级，才能产生推动历史前进的杰出人物；反动阶级的首领是腐朽的社会势力的代表，必然违背社会发展的潮流和人民群众的要求，对社会发展只能起阻碍作用，迟早会被人民群众所打倒。只有无产阶级的领袖和杰出人物，才能全面地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创立或发展科学的革命理论，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指出彻底解放的道路，并与人民群众建立最密切的联系，因而能够领导和发动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去进行革命和建设。

杰出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是不能抹杀的，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是错误的。但是，杰出人物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是人民群众中一定阶级的优秀代表，他们在历史上的作用正是群众创造历史的集中表现。因此马克思主义把个人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一卷 389 页）离开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过分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低估人民群众和阶级的作用，甚至认为历史是杰出人物创造的，那就是“英雄史观”，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社会

社会是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马克思说：“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363 页）每一个具体的社会，都是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

生产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也是区分人类社会与一般动物界的根本标志。人类既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结果，又是自然界的改造者。恩格斯说：“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17 页）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劳动创造了世界，劳动创造了人类社会。

为了进行生产，人们必须结成一定形式的生产关系，并由此而形成人们的政治、法律、道德以及其它意识形态方面的社会关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它是物质的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各种精神关系如政治、法律、道德和其它意识形态方面的关系，归根到底都是作为基础的物质关系的反映。

社会变化发展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马克思说，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马克思恩格

斯选集》第二卷 83 页) 人类历史已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 现在部分国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整个人类都将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通过无产阶级专政而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毛主席说: “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 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 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两大基本矛盾贯穿于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社会领域一切其它矛盾之中。社会上新事物和旧事物的矛盾和斗争, 各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 都受这两大基本矛盾的规定和影响。这两大基本矛盾又贯穿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始终, 推动社会新陈代谢, 使社会形态从低级向高级转化。正是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和发展, 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总过程和总趋势, 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必然死亡和共产主义的必然胜利。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同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 是密切联系, 相互作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是生产方式发展和变革的根本动力。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 决定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发展。生产关系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 它产生并制约着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变化, 迟早会引起上层建筑的变革。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经济基础又反作用于生产力。社会革命就是由于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及其相互作用而引起的。正如恩格斯所说: 历史的“**整个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487 页)

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 社会基本矛盾表现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剧烈的阶级斗争, 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在新旧社会交替的时代, 社会基本矛盾特别尖锐, 是天下大乱的根源。这些矛盾不可能靠旧制度本身来解决, 而只有先进阶级通过暴力革命, 才能够加以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基本的**

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但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刘少奇、陈伯达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来偷换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林彪一伙鼓吹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这也是唯生产力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抹杀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抹杀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党的基本路线，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理论根据。

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必然导致私有制和阶级的消灭，但社会基本矛盾本身决不会消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反映这些矛盾的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仍然会存在。没有矛盾，没有斗争的社会，是永远不会出现。

原始公社制度

人类最早的社会制度。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力水平极低，发展极为缓慢。最初的生产工具是木棍和粗笨的石器，后来发明了用火和弓箭，使打猎成为获得生活资料的基本方式，并逐步出现了动物的驯养和原始畜牧业。随着石器工具进到金属工具，原始农业也发展起来。在这样的生产条件下，人们不可能单独与自然界作斗争。无论打猎或耕种，都得结成集体，共同协作，才能保证自己的生存。马克思说：“这种原始类型的合作生产或集体生产显然是单个人的力量太小的结果，而不是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434 页）在原始公社中，除了某些为个人使用的生产工具（同时也是防御的武器）归个人所有外，其它一切生产资料（土地、房屋、船只、木犁等）和全部产品，都是共产财产。产品平均分配。

原始社会的最初阶段，人们结群而居，人数不多，叫原始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逐步形成了氏族社会组织。先是母权制氏族，妇女从事

农业、饲养家畜和家务劳动，男子出外打猎，妇女在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氏族由女子率领。当农业和畜牧业进一步发展，男子成为主要生产力，母权制就为父权制所代替。氏族首领由全体成员在氏族会议上选举产生，可以随时免职。恩格斯说：“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性，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54-155 页）根据考古学的发现，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从“北京猿人”（距今约五十万年）到进入奴隶社会，经历了原始群、母系氏族公社、父系氏族公社的历史阶段，一直过着没有阶级压迫、没有剥削，共同劳动、共同消费的原始社会生活。毛主席说：“中华民族的发展（这里说的主要地是汉族的发展），和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曾经经过了若干万年的无阶级的原始公社的生活。”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585 页）剥削阶级的思想家把私有制和阶级说成是从来就有的“自然现象”，妄图永远保存私有制和阶级压迫。原始公社的历史事实戳穿了这种谎言。

原始公社的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内是同生产力的状况相适应的。但是随着新的生产力，特别是新的生产工具的出现和生产方法的普遍改进，

为家庭个体经营和剥削剩余劳动创造了物质条件。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的出现和随之而来的商品交换，使公社的财产日益转化为私有财产。战争中的俘虏首先成为奴隶，终于导致原始公社的崩溃和奴隶制的产生。恩格斯说：“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65 页）从此，人类就进入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阶级社会。直到现在为止，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原始公社制为奴隶制所代替，古代埃及约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中国约在公元前二千年左右的夏代，古希腊和罗马约在公元前七百年左右。

奴隶制度

以奴隶主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和生产者（奴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剥削制度。它是在原始社会瓦解时期，伴随着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从农业分离出来）和出现私有制而产生的。奴隶制生产关系在刚建立起来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状况，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农业和手工业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奴隶制还使原来被杀掉甚至被吃掉的战俘成为奴隶，保存了劳动力。因此，恩格斯说：“**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220 页）

在奴隶制度下，社会分裂为两大基本阶级：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此外还有属于中间阶层的自由民（即小私有者的农民、手工业者和破产的流氓无产者），这个阶层不断分化，大部分成为奴隶，小部分成为奴隶主。奴隶制是最露骨、最野蛮的剥削形式。奴隶主把奴隶当成是“会说话的工具”，可以当作牲畜来使用、买卖、赏赐和屠杀，也作为奴隶主的殉葬品。奴隶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没有任何权利。正如列宁所说：在奴隶社会里，“**基本的事实是不把奴隶当人看待；奴隶不仅不算是公民，而且不算是人。**”（《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 436 页）

斯大林指出：“**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享有完全权利的人和毫无权利的人，他们彼此间的残酷的阶级斗争，——这就是奴隶占有制度的情景。**”（《列宁主义问题》650 页）随着奴隶制度的出现，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就产生了。奴隶主阶级建立了镇压奴隶反抗的军队、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国王（天子）是最大的奴隶主，最高的统治者。

我国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就进入了奴隶制社会。夏、商、周和春秋时期都是奴隶制社会。我国奴隶制的主要内容是井田制、分封制、等级制和世卿世禄制。这种制度的实质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奴隶主贵族集体占有土地和奴隶，对奴隶和贫民实行极残酷的剥削和专政。这也就是儒家所鼓吹的“礼治”。

随着奴隶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的发展，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阶级斗争便日益尖锐起来。奴隶主对奴隶的惨无人道的剥削和压迫，

造成大批奴隶逃亡和死亡，严重地破坏了劳动力。城乡人口不断减少，农业手工业日趋衰落，奴隶制度便陷入了绝境，从而引起无数次的奴隶起义。我国春秋战国时代，不断发生奴隶反对奴隶主的革命战争，著名的有春秋末年齐鲁一带柳下跖领导的九千人的奴隶起义。古罗马最大的一次是斯巴达克领导的十二万人的奴隶起义。奴隶暴动从根本上动摇了奴隶制度的基础，加速了奴隶制度的瓦解和灭亡，为封建主义制度代替奴隶制度扫清了道路。

从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发展到奴制社会，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苏联的托派及其在中国的门徒陈独秀、陈伯达之流，否认中国古代曾经有过奴隶社会，胡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原始公社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这是妄图借口中国“国情特殊”，否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否认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极为反动的。

封建制度

以封建地主阶级占有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剥削农民（或农奴）的剩余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它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奴隶社会内部产生的。在奴隶制度的瓦解过程中，由于奴隶起义的推动，一些奴隶主被迫改变剥削方式，把土地分租给奴隶，使他们束缚在一定的土地上，对他们进行剥削和奴役，就产生了封建生产关系，出现了新的阶级——地主和农民（农奴）。封建制度代替奴隶制是一场社会制度的大革命。在封建制度下，农民不是地主的直接的私有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有自己的生产资料，有一定的劳动兴趣，推动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因此，封建制“大大胜过于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53 页）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588 页）地主阶级（地主、贵族和皇帝）拥有最大部分的土地和其它生产资料，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居于统治地位。农民没有或只有很少的土地和生产工具。他们用自己的工具去耕种地主、贵族和皇室的土地，并将收获的大部分或绝大部分奉献给地主、贵族和皇室享用。“中国历代的农民，就在这种封建的经济剥削和

封建的政治压迫之下，过着贫穷困苦的奴隶式的生活。农民被束缚于封建制度之下，没有人身自由。”（《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587 页）封建地租是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形式。地租有三种形式，即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这三种地租形式是随着生产的发展而依次更替的，一种比一种更有利于地主对农民剩余劳动的剥削。除地租外，农民还受到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残酷盘剥。在封建城市中，基本群众是手工业者，他们受到城市贵族（商人、房东和高利贷者）的压榨，并且互相竞争，因而不得不组织行会来自保。在手工业作坊中，分为师傅（即行东或老板）、帮工和学徒三个等级，帮工和学徒受到师傅的剥削。在封建社会，虽然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

以封建等级制为特点的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镇压农民阶级，保护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我国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秦以前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但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特点，是封建的宗法制度和思想体系。毛主席指出：“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31 页）

在封建社会中，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封建社会末期，由于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旧的封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性质发生了严重冲突。一次比一次更猛烈的农民起义，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封建制度就为资本主义制度所代替。中国的封建制度延续了三千年左右，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的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又经过伟大的土地制度改革运动，才消灭了封建制度。史的集中表现。因此马克

思主义把个人的活动“归结为阶级的活动，而这些阶级的斗争决定着社会的发展”。（《列宁全集》第一卷 389 页）离开群众观点和阶级观点，过分夸大杰出人物的作用，低估人民群众和阶级的作用，甚至认为历史是杰出人物创造的，那就是“英雄史观”，是反马克思主义的。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侵入封建落后国家，促使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因素发展，把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同时又残酷地统治这些国家，把独立国变为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国自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一步一步地从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我国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是：（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虽被破坏，但封建剥削制度与买办资本相结合，在社会经济中仍占优势地位；（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没有成为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三）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代替了封建专制政权；（四）国家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政治和军事力量都被帝国主义所操纵；（五）在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下，中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极端不平衡；（六）广大人民，尤其是农民，受到极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生活陷于绝境。

帝国主义同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毛主席指出：“**这些矛盾的斗争及其尖锐化，就不能不造成日益发展的革命运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594 页）所有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都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人民，只有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通过武装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才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终于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用人民革命战争打倒了国内反动派，赶走了

帝国主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后来又经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主义革命，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和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我国人民奋发图强，战胜种种艰难险阻，只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就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如毛主席所预见的那样：“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56 页）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猖狂攻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恶毒污蔑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叫嚷什么要使“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真正解放”。他们所说的“真正解放”，就是要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颠覆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把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使中国重新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世界去，这完全是他们的痴心妄想。

资本主义制度

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最后一个人剥削人的制度。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在封建制度瓦解时期，在小商品经济两极分化的基础上自发地产生的。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和平地”形成的。资产阶级不仅利用无数次农民起义，才从封建地主阶级手里夺得政权；并且用最残酷的暴力手段，强制剥夺了大批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才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说：“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829 页）资本的产生“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783 页）

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是在十四、十五世纪地中海沿岸若干城市中首先产生的。西欧在十六世纪开始形成资本主义制度。十七、十八世纪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经过了长期的斗争，才巩固了资

本主义的统治，战胜了封建制复辟的危险。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自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在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下，中国逐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产生了民族资本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统治一切。商品生产成为普遍形式，劳动力也成为商品。资本家占有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取得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标。马克思指出：“**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679 页）资本家通过延长劳动日、加强劳动强度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像狼一样吮吸着工人的血汗，夺去无数工人的生命，使无产阶级日益贫困化。资产阶级国家是保护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的暴力工具。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民主”和“自由”，掩盖不了资本主义制度就是雇佣奴隶制度的实质。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65 页）

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性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在各别企业中的生产的有组织性和全社会中的生产的无组织性之间的矛盾。其阶级表现则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最明显地表现在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中。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它给无产阶级带来极大的灾难，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和斗争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动摇着资产阶级的整个统治。

资本主义制度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主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的社会化。但它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与社会化了的生产力相冲突，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就表现为特别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特别剧烈的阶级斗争。这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了自己灭

亡的经济条件，也造成了自己的掘墓人——在大工业基础上团结起来的革命无产阶级。因此，早在一百多年以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全世界庄严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63 页）

当前，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在作垂死挣扎，拼命维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制度，妄图拉住历史车轮。但是，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摧毁了以刘少奇和林彪为头子的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但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依然存在，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将要长期进行下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马克思主义就一定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就一定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一定战胜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制度

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不可能在旧社会内部自发产生，只有在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过程中，才能建立和发展起来。

社会主义制度的产生，是人类历史的伟大飞跃，它开始了劳动人民自觉创造历史的新时代。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共产党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指导思想。社会主义国家对敌人实

行无产阶级专政，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纪律约束自己。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利润，不是为少数剥削者服务，而是为了满足国家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需要。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它反对一切形式的剥削，反对不劳而获，反对特殊化。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它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逐步得到满足。我国新旧社会的对比证明：“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社会主义社会是从有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时期，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仍然存在着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制度有一个从产生、巩固到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同时，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但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的势力和影响将长期存在。小生产的残余还存在，商品经济还起着作用，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还会不断产生。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以及反映这些差别的资产阶级法权也将继续存在。正如马克思所说，社会主义社会“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0 页）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 84 页）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毛主席还指出：关于资产阶级法权，“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林彪贩卖孔孟之道，散布修正主义谬论，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对尚存在的那部分资产阶级法权应该加以必要的限制，恶毒攻击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鼓吹要搞什么“真正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他要搞的是苏修式的假社会主义，真资本主义。勃列日涅夫吹嘘苏联已经建成了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其实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即社会帝国主义。

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侵略和颠覆的危险也将长期存在。这就决定了资产阶级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斗争，是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中心。它决定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前途：或者走向共产主义，或者复辟为资本主义。因此，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要经过长期、曲折的斗争。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像初升的太阳，还很年轻。它是在斗争中诞生的，也只能在斗争中成长。但是，社会总是向前发展的，历史的潮流总是不可抗拒的。只要我们坚持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不断开展反修防修的革命斗争，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阵地，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那么无产阶级就必定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必定战胜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就必定战胜修正主义。

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共产主义社会是以单一的全民所有制为基础的，没有剥削、没有阶级、没有国家的社会；是绝大多数人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的社会；是生产力高度发展和社会产品极其丰富的社会；是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社会。马克思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

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2 页）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和最高理想。

实现共产主义是一场极其深刻的社会革命，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方面都将出现根本性质的变革，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71-272 页）毛主席也指出：“**世界到了全人类都自觉地改造自己和改造世界的时候，那就是世界的共产主义时代。**”（《实践论》）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在实现共产主义以前，无产阶级一天也不能放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能放弃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放弃继续革命。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阶级消灭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仍然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仍然会存在。

实现共产主义要靠全世界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的共同努力，要靠世界革命的胜利，一国不能单独建成共产主义。毛主席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苏修叛徒集团胡诌苏联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的胜利”，已经是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了。他们大肆鼓吹要在苏联建成一个“和谐一致”的、人人过“美好生活”的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土豆烧牛肉”的假共产主义。刘少奇胡说共产主义就是“擦胭脂，抹口红，讲生活”。林彪鼓吹共产主义要“拿‘产’字作旗帜”，共产主义就是“大家发财”。这实际上是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资本主义。

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一百多年以前，当共

产主义在欧洲被一切旧势力当作幽灵来驱逐的时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公开宣布：“**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85-286 页）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历史证明了这个科学真理。现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而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则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只要全世界革命人民团结起来，经过长期的斗争，彻底打倒帝、修、反，那么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共产主义新世界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来。

国家消亡

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国家消亡只是指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而言的。资产阶级国家决不能自行消亡，而只能被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所消灭。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才会丧失其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消亡下去。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只有社会生产力已经大大提高，社会产品已经极大的丰富，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本质差别已经消失；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已经大大提高，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社会实现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同时在国际范围内消灭了剥削制度，国家才会消亡。“**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列宁选集》第三卷 253 页）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很长历史时期内，国家不能消亡。因为帝国主义还存在，国内反动派还存在，国内阶级还存在。无产阶级必须强化自己的国家机器，实行对资产阶级专政，镇压国内阶级敌人的复辟活动和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侵略。恩格斯说：“**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以过渡到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

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527 页）毛主席说：“**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权力，消灭党，全人类都要走这一条路的，问题只是时间和条件。**”（《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57 页）强化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正是为国家消亡创造条件。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消亡问题的辩证法。

国家消亡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组成部分。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阶段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21 页）苏修叛徒集团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历史唯心主义

用唯心主义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哲学思想，也叫唯心史观。

历史唯心主义同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它认为社会意识是第一性的，社会存在是第二性的。它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出发，把人们的思想动机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把全部历史的发展归结为少数英雄人物的历史。他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否认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

历史唯心主义不是把人们的观念、精神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本原（主观唯心主义），就是把某种超人类、超自然的精神力量即上帝，看作是人类社会的主宰（客观唯心主义）。在我国，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鼓吹的天命论，就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典型。孔丘鼓吹人类的命运是由“老天爷”安排的，“圣人”和帝王将相是受“天命”来统治人民，主宰一切的，他们可以使奴隶制永世长存。孟轲宣扬“万物皆备于我”，认为只有“良知良能”的“圣王”，才能平治天下，左右历史。十九世纪德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虽然承认历史是发展的，并且有它的内在联系，但他又把历史看成是一种非常神秘的“绝对观念”（上帝）的反映，是“概念的前进运动”。江湖骗子杜林认为现实世界和人类社会，是按照世界形成之前就已存在的“模式”构成和运动的。所有这些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用人们

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恩格斯指出：“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66 页）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唯心史观在社会历史领域中占统治地位。在我国历史上，以荀况、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反对儒家的天命论和形而上学，认为社会历史是发展的、进步的，主张适应历史潮流，变革社会制度，发展物质生产，具有朴素的历史辩证法观点。但是由于受到阶级和时代的局限，他们强调帝王的作用而蔑视人民群众，更看不到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他们的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的。欧洲的旧唯物主义者，包括费尔巴哈在内，他们的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他们的历史观却是唯心主义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44 页）

唯心史观之所以根深蒂固，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为了欺骗人民，维护剥削特权，经常歪曲历史，宣扬唯心史观；另一方面是由于生产规模狭小，社会联系不广，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不可能深入研究历史的因果联系和找出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只有到出现了大工业生产和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人们才能够对社会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产生，宣告了唯心史观的破产。

唯心史观归根到底是为了证明“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是剥削阶级愚弄人民，扼杀革命，维护反动统治的思想工具。一切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为了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都要用唯心史观来歪曲历史。从伯恩施坦、考茨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到刘少奇和林彪等修正主义路线头子鼓吹的“唯生产力论”、“人性论”、“天才论”、“英雄史观”等等谬论，都是唯心史观的表现。林彪用剥削阶级的“政变”史代替阶级斗争的历史，把孔孟之道奉为“中国文化之来源”，把儒家的“德”、“仁义”、“忠恕”一类反动说教，说成是“历史唯物主义”，妄图为历史唯心主义翻案，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理论根据。林彪的灭亡，宣告了他鼓吹的唯心史观的破产。但是，无产阶级革

命的经验表明，反映政治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斗争，将会长期存在。“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404 页）我们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两条路线斗争中，分清什么是唯物史观，什么是唯心史观，学会用唯物史观分析和解决阶级斗争、路线斗争问题，彻底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不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英雄史观

也叫天才史观，主张英雄创造历史，是历史唯心主义。

英雄史观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认为英雄人物是天生的“圣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从而把人民群众创造的历史，歪曲为帝王将相的历史，英雄伟人的历史。这是对历史的颠倒。

英雄史观是剥削制度的产物，由来已久。我国春秋战国时代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孔丘和孟轲，为了挽救和复辟奴隶制，曾大肆鼓吹这种谬论。他们把“圣人”说成是“生而知之”的上等人，胡说“无君子莫治野人”，“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人们认为只有那些“前知千岁，后知万世”的“圣王”，才能平治天下。这种反动谬论，为中国历代反动统治者所继承和提倡。曾国藩和蒋介石都嚎叫要“效法圣哲”，“崇拜英雄”，妄图以此阻挠历史前进。在西方，古希腊奴隶主贵族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最有智慧的哲学家是天生的统治者，应该做王。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家黑格尔，胡说历史是体现“世界精神”的伟人创造的，人民是“一群无定形的东西”，只能追随这些“灵魂领导者”前进。十九世纪末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的“超人”哲学，更是极端反动的英雄史观，成为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的反动理论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英雄史观无非是要证明“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马

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307 页) 林彪把反动的“天才论”作为反党的理论纲领。他鼓吹历史是“天才”、“英雄”们创造的,污蔑人民群众是“马大哈”、“糊涂虫”。毛主席针锋相对地批判了这个谬论,并明确地提出了“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这个区别两种历史观、两条思想路线的根本问题。以后,林彪又提出了“英雄和奴隶共同创造历史”的诡辩。他把“英雄”同群众并列和对立起来,实质上是要否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实,他所谓的“英雄”,就是他那一伙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革命小丑。他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狂叫“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而对人民的伟大领袖却怀着刻骨的仇恨,进行恶毒的攻击和污蔑,充分暴露了他阴谋篡党夺权,妄图复辟资本主义,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反革命野心。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32 页)这是对奴隶们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的最精辟的概括。人民群众创造自己的历史,也创造了自己的英雄。任何英雄人物,只有依靠人民群众,依靠集体智慧,才能对历史的发展起重大的促进作用。

多元论历史观

认为社会发展是多种因素决定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它把政治思想、宗教、文化、教育、道德等社会精神现象,同社会生产方式一起,都看成是决定社会面貌和社会发展的根源。它否认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反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等科学论断。美国实用主义者詹姆士、杜威及其中国门徒胡适,都是多元论历史观的狂热吹鼓手。他们胡说社会发展是文化和人性“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多元论历史观又是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唯心史观。

他们鼓吹多元论历史观的目的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杜威公开叫嚣要用多元论历史观来“挖掉”社会经济规律,“摧毁”阶级斗争观念,“证明”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胡适从多元论历史观出发,大肆宣扬旧中国是“五鬼(贫穷、疾病、愚昧、

贪污、扰乱)闹中华”，否认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总根源。他妄图用“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来代替“根本解决”的政治革命。这就彻底暴露了多元论历史观为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效劳的反动本质。

唯生产力论

一种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它认为社会发展只是生产力发展的自然结果，只要单纯发展生产力，就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唯生产力论从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出发，歪曲和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基本矛盾和社会革命的原理，歪曲政治和经济、革命和生产的辩证关系，片面夸大生产力（生产技术）的作用，根本抹杀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力量，根本抹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唯生产力论历来是修正主义者用来进攻无产阶级的反革命思想武器。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他们用唯生产力论来反对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又用这套谬论来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倒车制造理论根据。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世界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斯坦适应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反革命需要，首先抛出了唯生产力论。他鼓吹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宫殿”会“自然而然地崩溃”，反对无产阶级进行暴力革命。叛徒考茨基、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都以唯生产力论为依据，叫嚣“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猖狂反对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上台后，更大肆宣扬唯生产力论，鼓吹什么“社会主义成长为共产主义的道路就是生产力的不断增长”，认为只要生产力高度发展了，共产主义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唯生产力论成为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残酷剥削和压迫苏联人民，把社会主义国家变为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思想工具。

在我国，陈独秀、刘少奇、林彪这些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也都是唯生产力论的狂热鼓吹者。他们的矛头始终指向我国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革命时期，陈独秀、刘少奇一伙借口“中国生产力水平低”，反对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社会主义改造到来的时候，刘少奇以发展生产力为名，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革命口号，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他又鼓吹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套谬论，并伙同陈伯达背着毛主席，把这一修正主义谬论塞进党的八大决议。在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林彪又鼓吹“历史是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并提出九大以后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完全是刘少奇那个修正主义谬论的翻版。林彪一伙鼓吹唯生产力论的目的，并不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而是为了彻底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阴谋颠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实行封建买办法西斯专政。

唯生产力论同历史唯物主义是根本对立的。历史唯物主义肯定生产力的变化必然会引起生产关系和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但是，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必须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才能变革旧制度，建立新制度，使生产力得到解放和迅速发展。马克思指出：“革命之所以必需”，“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推翻统治阶级”。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77 页）而生产力本身，是由于“**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104 页）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阶级斗争仍然是发展生产的根本动力。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实践证明：只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深入开展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才能更好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革命统帅下，努力增加生产，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毛主席关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的方针，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必须遵守的原则。唯生产力论“**撇开阶级对抗，颠倒整个历史的发展过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104 页），归根到底是一种唯心主义的

历史观。

综合经济基础论

一种鼓吹阶级合作的修正主义谬论。它认为我国工人阶级取得全国政权以后的经济基础，是由多种经济成分“综合”而成的。

一九五三年，毛主席提出了我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的任务，使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强大的经济基础。毛主席痛斥了叛徒刘少奇抛出的所谓“五种经济（指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合作，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发展资本主义的黑纲领。就在这个时候，杨献珍按照刘少奇的黑旨意，炮制出一个反动的唯生产力论的“综合经济基础论”，明目张胆地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这套谬论一出笼，立即受到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的迎头痛击。这就是建国以来哲学战线上的第一次大论战。

杨献珍荒谬地宣称：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是“综合性的”，“既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也包括个体农民经济成分”，它们“能够平衡地互相衔接地发展”；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要一视同仁地为包括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经济基础服务”，“也要为资产阶级服务”。杨献珍这套谬论的反革命实质是十分明显的。

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一定的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只能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只能以社会主义经济为基础。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决不能成为同一个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在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中，占支配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争。

“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列宁选集》第四卷 84 页）因此，这两种根本对立的经济成分，决不可能构成一个所谓“综合性”的经济基础。“综合经济基础论”完全抹杀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区别，抹杀我国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限制与反限制、改造与反改造的激烈斗争，显然是为保持和发展资本主义效劳的。

“综合经济基础论”否认过渡时期上层建筑的阶级性，抹杀上层建筑领域内的阶级斗争，充分暴露了它的阶级投降主义的反动实质。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是为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的。它的历史使命就是要保证社会主义经济战胜资本主义经济，保证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最后达到完全消灭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目的。

“综合经济基础论”要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一视同仁”地为资产阶级服务，就是要从根本上改变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妄图使资本主义经济战胜社会主义经济，用资产阶级专政代替无产阶级专政，把历史拉向倒退。

社会达尔文主义

一种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流派，它利用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的缺点和错误来解释社会现象。主要代表有德国的朗格、魏斯曼、阿蒙等人。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在长期科学实践中，发现所有的动植物为了自身的生存，都必须和周围的一切进行斗争。在斗争过程中，能够获得食物并适应周围环境的，就保存下来，反之，就被淘汰。他认为这种“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是生物发展的规律，从而创立了进化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这一重要贡献，给予很高评价，同时也指出他学说中的缺点和错误，如过分夸大“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在物种进化中的作用，而没有看到物种进化的内因。

一些资产阶级的反动社会学家，利用和扩大达尔文进化论上的弱

点，胡说“生存斗争”也是社会的固有规律，人类也是“强者”、“适者”生存，“弱者”灭亡，社会不平等和社会阶级的存在，只是个人天赋不平等的结果；甚至公开宣称资本家是“适应能力最高者”，是“超人”，而劳动人民是生存竞争中的失败者，是“劣等人”。这显然是“弱肉强食”、“剥削有理”的强盗逻辑，赤裸裸地为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辩护。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这种谬论流行于资本主义国家，以后与反动的马尔萨斯主义结合起来，被帝国主义分子大肆宣传，并成了法西斯头子希特勒侵略行动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就有力地批判了这一谬论。马克思讽刺这种不去分析社会中具体的阶级斗争，而把全部历史仅仅归纳为“生存斗争”这么一句空话的做法，是“华而不实、假冒科学、高傲无知和思想懒惰的人”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 672 页）恩格斯也说：“只要把迄今的历史看作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就足以看出，把这种历史理解为‘生存斗争’的稍加改变的翻版，是如何的肤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四卷 164 页）

我国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严复，通过翻译和讲述赫胥黎的《天演论》，传播过社会达尔文主义。他从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认为中国如不改革，势必被“优胜劣败之公例”所淘汰而“亡国灭种”，想以此来激励人们奋发图强。他的愿望是好的，但是他所依据的理论却是极端错误的。这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和理论上的缺乏性。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救中国。

社会有机论

一种把人类社会比作动物有机体，运用生物规律来说明社会现象的资产阶级反动社会学说。主要代表是英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斯宾塞。

斯宾塞认为社会是一个特殊的有机体，它和动物机体一样成长和发展着。社会中的人像细胞一样，在有机体中起着作用，并消费他所应得的养料。他从动物机体有营养系统（消化器官）、分配系统（血液循

环)和支配全身的调节系统(大脑、神经),推论出社会中也必然存在着“有机的”分工:担任“营养职能”的工人、农民,为社会生产财富;担任“分配职能”的商人和交通运输业,为社会交换商品;而工业资本家则是调节生产,起指导作用的社会“大脑”。他宣称,资产阶级占统治地位,工人阶级处于被统治地位,是必然的阶级“协作”与“和谐”。他竭力把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说成是“天然的”、合乎生物规律的表现,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则是“违反自然”的“瓦解”行为。

这种反动谬论,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十分流行。德国的反动社会学家谢夫莱(1831—1902年)还把各种社会集团也比作人体的各种器官;法国的反动社会学家沃姆斯(1869—1926年)曾著书拥护这个谬论,用它为德国殖民主义辩护。法国的福叶、英国的德雷伯、美国的温斯顿等人,也都是社会有机论的宣传者。社会达尔文主义、种族主义等谬论,可说是社会有机论的变种。

斯大林在《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一文中,揭露了这一谬论的阶级本质和反动作用,他说:“那种认为被剥削者离不开剥削者正如头部和躯体的其他各部离不开胃部一样的陈旧‘理论’,……是妨害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化的最大障碍之一。十月革命最重要的结果之一就是它给这种骗人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斯大林全集》第十卷 205 页)

地理环境决定论

一种认为地理环境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的资产阶级社会学说。主要代表人物是十八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十九世纪英国的布克尔等人。他们认为地理环境(包括气候、土壤、地形、水源等)直接决定人类的体质、心理和道德,决定人口的分布,种族的优劣,文化的高低,经济的盛衰,国家的强弱,并由此决定各国社会制度的性质和更替。普列汉诺夫也认为社会制度“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陷入了反马克思主义的地理环境决定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毛主席说：“**社会的变化，主要的**是由于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阶级之间的矛盾，新旧之间的矛盾，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推动了新旧社会的代谢。”（《矛盾论》）地理环境既不能决定社会的性质和面貌，更不能决定一种社会制度转变为另一种更高级的社会制度。地理环境决定论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差不多一样的地理和气候的条件下，一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却有根本的区别；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在同一个国家里，在地理和气候并没有很大变化的情形下，社会的变化却是很大的。例如，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地理和气候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却发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为社会主义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马克思主义并不否认地理环境的作用。马克思指出：“**人们所遇到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是物质资料生产的“**自然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4 页），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自然条件的好坏，对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却起着极不相同的作用。在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条件不能得到合理的利用，甚至遭到严重的破坏，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人民成为大自然的主人，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可以移山填海，变沙漠为绿洲，变海滩为良田，创造出人间的奇迹。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观。在资本主义上升期，它虽然对摆脱封建神道主义的束缚，起过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却要使人们成为自然界的奴隶。它妄图使人们相信：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地理环境决定的，是永远不能改变的。随着资本主义的没落，它就变成了用地理原因来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侵略辩护的“地理政治论”。

地理政治论

一种认为地理决定政治的帝国主义理论。它宣扬地理环境直接决定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政策，是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实行殖民政策，发动侵略战争，争夺世界霸权的思想武器。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被德国法西斯分子吹捧为“地理政治之父”的拉采尔，系统地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政治生活”的反动论点，鼓吹“优秀”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必须扩张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瑞典资产阶级地理学家哲伦，首先使用“政治地理”这个名词，鼓吹帝国主义大国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必然要和弱小国家结成“综合体”。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希特勒的顾问豪斯霍费尔更露骨地宣扬：地理政治是“分配地球空间的强有力的战斗手段”。地理政治论被希特勒匪帮宣布为“国社党的世界观”。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也把地理政治作为鼓吹“亚洲共荣圈”的理论依据。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与美帝争夺世界霸权，大肆鼓吹要从“最有利的自然条件”出发，来确定“国际分工”和实行“生产专业化”，把一些东欧国家变成苏修的果菜园、畜牧场和附属加工厂。它借口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了国家”，提出“取消边界”的“经济一体化”计划，鼓吹建立什么“国家间的经济综合体”，妄图把其他国家的领土“综合”到苏修大帝国的版图中去。这同当年希特勒分子鼓吹的“经济综合体”和“大国统一小国”是何等一致！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而政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和殖民政策，帝国主义之间争夺霸权的斗争，其深刻的根源在于追求超额利润的帝国主义垄断制度，而绝不是地理环境。今天苏修统治集团对内实行民族压迫和法西斯统治，对外进行侵略扩张，当然不是由于苏联的气候、河流或西伯利亚的沙漠有了变化，而是由于苏修在国内复辟了资本主义，产生了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变成社会帝国主义的结果。

阶级和阶层

由于人们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所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也不同，而分成不同的社会集团，即是阶级。

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是划分阶级的主要依据，它决定了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列宁选集》第四卷 10 页）

阶级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原始社会中，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们生产的东西，除了自己消费之外，没有剩余，人人都必须劳动，没有产生阶级的可能。随着生产的发展，有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社会分工、生产资料和产品私人占有制以及商品交换，在这样的条件下，就逐渐出现了自己不劳动，靠占有他人剩余产品而生活的剥削阶级。奴隶主阶级便是最早出现的剥削阶级。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的产生、发展和消灭，都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归根到底是由生产所决定的。恩格斯指出，阶级的“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321 页）随着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对生产资料的阶级占有，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社会划分为阶级，将“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322 页）这时必然导致阶级的最后消灭。

阶级对立不仅表现于经济领域，同时还表现于政治、思想等上层建筑领域中，其根源则深植于经济领域之中。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借助于国家政权在政治上也占统治地位。不同的阶级地位，决定着人们的不同的政治态度和精神面貌。各个阶级社会，都存在着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在奴隶社会中是奴隶主和奴隶；在封建社会中是地主和农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资本家和工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基本的对立阶级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并不等于消灭了阶级。苏修叛徒集团否认苏联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是

为了掩盖他们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和苏联广大劳动人民之间阶级对立的真相。

阶层是阶级的一部分。同一个阶级中，由于阶级地位和政治态度的不同而分成若干阶层。如地主阶级可分为大、中、小三个阶层；资产阶级可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两个阶层等等。

一切革命同志，尤其是担负领导责任的同志，都要通过调查，明了社会各阶级的经济、政治状况和各阶级的相互关系，才能“**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反对本本主义》）只有采取正确的政策，对待各个阶级和阶层，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促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孤立和战胜一小撮最顽固的阶级敌人。

阶级斗争

指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由于各对立阶级之间存在着根本利益的冲突，因而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恩格斯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32 页）毛主席也指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76 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如果没有奴隶反对奴隶主、农民反对地主、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也就没有人类历史的发展。特别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更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

无产阶级采取三种基本形式向资产阶级展开斗争，即经济斗争、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其中政治斗争是最主要的斗争形式。“**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60 页）一切阶级斗争都必然要发展成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斗争。列宁强调指出，只有抓住了政治斗争中最本质的东西即国家政权机构时，才是充分发展的阶级斗争。经济斗争、思想斗争都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无产阶级反

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332 页），这是阶级斗争发展的规律。

列宁说，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列宁选集》第三卷 199 页）

机会主义者只要议会斗争、合法斗争，反对暴力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叛徒考茨基胡说：“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不是破坏国家政权”，而是“引起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他力图把阶级斗争限制在确保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之内，不许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之后宣称：“社会主义解决了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消灭剥削阶级以及产生人剥削人的原因”，公开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所谓“全民国家”，实际上是大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他们代表一小撮新型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对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苏联人民反对苏修叛徒集团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对抗性的阶级斗争。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国以来，我国人民在毛主席领导下，同国内外敌人，进行了反复、激烈的斗争，特别是粉碎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斗争，深刻地教育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否则，就会走到斜路上去。

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

自在阶级指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和斗争处于初期状态，“只认识资本主义各个现象的片面及其外部的联系”（《实践论》），还只限于和直接剥削自己的资本家作斗争，还没有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反对，斗争是自发性的。自为阶级指无产阶级已“理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理解了社会阶级的剥削关系，理解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实践论》），意识到本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关系，能够对资产阶级开展有组织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

无产阶级从自在阶级进到自为阶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是破坏机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组织工会，进行罢工斗争。至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发展成为政治斗争，直至举行武装起义。如一八三一年、一八三四年法国里昂工人的起义，一八三六年开始的英国工人的宪章运动，一八四四年德国西里西亚工人的起义等等。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用以教育广大无产者，使无产者逐步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和自己的历史使命，进而建立起自己的政党，这时就成为自为阶级。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转化为自为阶级。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对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和发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列宁说：“马克思与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用一句话来表示：他们教工人阶级认识到和意识到自己的作用，用科学代替了梦想。”（《列宁全集》第二卷 2 页）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总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同时又批判地吸取了人类历史上全部文化的精华而创立起来的。有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无产阶级革命才走上正确的道路。

自从无产阶级成为自为阶级以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在曲折的道路上蓬勃发展，世界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即“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41 页）觉醒了的无产阶级一定能够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完成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命运。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国工人阶级“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充分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为了更好地发挥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取得更大的胜利，我们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工人阶级要在阶级斗争中和向自然界的斗争中改造整个社会，同时也就改造自己。工人阶级必须在工作中不断学习，逐步克服自己的缺点，永远也不能停止。”（《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阶级分析方法

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和分析一切社会现象，就是阶级分析方法。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法。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二卷 587 页）

无产阶级政党，只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研究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才能分清敌友，制定正确的路线和政策。毛主席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3 页）毛主席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社会的各个阶级，作过详尽的具体分析，深刻地揭示了各个阶级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从而制定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又对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指出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仍然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从而制定出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这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光辉范例。

只有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才能使我们正确地估计革命形势，保持清醒的头脑。毛主席指出要“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

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0 页）这样，当敌人暂时居于优势时，就不会被它的表面强大的现象所迷惑；当敌人濒于灭亡时，就不会被它伪装的可怜相所欺骗。毛主席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愚公移山》、《关于重庆谈判》、《将革命进行到底》、《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著作，都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分析形势、指明方向、提出任务、鼓舞斗志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是一致的。我们在对问题作阶级分析时，既要有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又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点，运用一分为二的方法，去观察、分析问题，才能从事物的内在联系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

每个革命者都必须学会阶级分析方法，划清敌我界限，坚定地站在人民群众一边，绝不能站到人民的敌人那一边去，这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根本立场问题。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对于在革命斗争中出现的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分清本质与非本质，主流和非主流，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这样才不致于迷失方向，滑到斜路上去。

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8 页）在阶级社会中，一切社会关系本质上都是阶级关系，人的本质就是阶级本质。这就是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

人与其他动物的区别主要在于劳动（即生产）。“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08 页）人类的生产，从来都是社会的生产。因此，每个人都不是脱离社会生产关系的纯生物学上的人或纯个人。毛主席说：“在没有阶级的社会中，

每个人以社会一员的资格，同其他社会成员协力，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在各种阶级的社会中，各阶级的社会成员，则又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从事生产活动，以解决人类物质生活问题。”（《实践论》）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人，而是作为一定阶级的成员，处于一定的阶级关系之中。人的思想感情和言行，都是受他所属的阶级利害关系所制约的。因此，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资产阶级的人性（即阶级性）是唯利是图、损人利己、尔虞我诈。无产阶级的人性（即阶级性）是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

懂得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对加强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观念，加强无产阶级的党性，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正确制定和执行党的政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只有根据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来分析历史和现实斗争，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一切剥削阶级都大肆宣扬超阶级的“人性”。苏修叛徒集团大讲什么“真正人性”，“人类的共同感情”；林彪胡说什么“人的社会性就是团结协作”等等，都是为了掩盖他们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本性，以利于欺骗和镇压劳动人民。实际上他们主张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口头上不这样说罢了。

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敌我矛盾是由于敌对阶级根本利益冲突而产生的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基础上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在不同的国家机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我国人民和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之间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人民与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及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都是敌我矛盾。“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我们一定要严格加以区分，不能混淆。由于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相同。敌我矛盾采取专政的方法来解决，即运用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去压迫阶级敌人，在一定时期内依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同时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守法的自食其力的公民。并注意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须依照“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民主的方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选集》一卷本3页）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首要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在一般情况下，大量出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只有认真解决好人民内部矛盾，才能把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敌我矛盾可能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也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

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是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客观需要。只有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才能分清敌我，才能团结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和群众，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去战胜敌人，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分子，长期以来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制造谣言、挑拨离间、混淆和颠倒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妄图分裂党，分裂干部，分裂群众，其罪恶目的就是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

政，复辟资本主义。

毛主席关于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学说，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学说和政策，对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国家

国家是实行阶级压迫的工具，是一个阶级镇压敌对阶级的暴力机器。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关。“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65 页）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在原始社会里，没有阶级，也就谈不上有阶级压迫工具的国家，那时只有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氏族组织。当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以后，剥削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和特权地位，就要镇压被剥削阶级的反抗，于是就建立起专门从事阶级压迫的机关，即国家。表面看来，国家似乎是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机构，实际上它只代表统治阶级的利益。恩格斯说：“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305 页）

国家随着阶级的产生而产生，也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毛主席说：“阶级消灭了，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的一切东西，政党和国家机器，将因其丧失作用，没有需要，逐步地衰亡下去，完结自己的历史使命，而走到更高级的人类社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57 页）为了给国家消亡创造条件，必须加强无产阶级专政。

国家按其阶级性质，可分为奴隶主国家、封建主国家、资产阶级国

家、无产阶级国家，也有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所采取的过渡的国家形式）。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一切国家都有对内对外两方面的职能：剥削阶级的国家对内是镇压广大劳动人民，对外是防御别国侵略或侵略别国，保护和发展剥削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国家则与此相反，它的职能：一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二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

一切剥削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总是力图隐瞒或歪曲国家的实质，把国家说成是超阶级的或者是调和阶级矛盾的机关。列宁驳斥这类谬论时指出：“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列宁选集》第三卷 175 页）“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列宁选集》第三卷 176 页）孔丘、孟轲鼓吹的“仁政”，以及苏修叛徒集团鼓吹的“全民国家”，统统都是骗人的鬼话。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从来只有残酷镇压，根本不讲“仁慈”；只要国家还存在，它始终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全民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已经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活动，都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可耻的失败，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巩固。

政权

也称国家政权。是统治阶级实行统治的权力机构，由军队、警察、法庭及其他专政机关组成。它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和工具，具有强烈的阶级性。

任何国家政权都有镇压和保护两方面的任务。区别政权的性质主

要看它镇压谁、保护谁。对广大劳动人民是保护还是镇压，这是无产阶级政权和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根本区别。

全部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人们，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权在哪个阶级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 357 页）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274 页）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中国人民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512 页）和“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75 页）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懂得“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学会掌握武器，获得武器，那它只配被人当作奴隶使唤。”（《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 77 页）

对于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夺取政权仅仅是革命的开始，“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28 页），更艰巨、更光荣的革命任务还在后头。古今中外，一切先进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总要经历长期反复的斗争，才能逐步巩固他们的政权。无产阶级革命不同于一个剥削阶级取代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它要逐步地达到彻底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直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因此，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斗争，势必更加激烈。二十多年来，我国人民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和国内外反动派进行了反复的较量，经历了极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妄图对内复辟资本主义、对外投降卖国的阴谋，从而不断巩固和加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无论中国革命的经验，还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都是如此。毛主席为我们党制定的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我们必须坚持这条基本路线，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才能使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更加巩固，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更加强大。

国体和政体

国体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即谁是统治阶级，谁是被统治阶级，表明国家的阶级性质。政体是指政权的组织形式，即一定阶级用何种形式去组织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权机关。任何国体都有与之相适应的政体。例如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体一般是资产阶级共和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体则有人民代表大会制等。

对于政体来说，国体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方面。同一国体可以采取几种不同形式的政体，例如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政体，除了共和民主之外，外有君主立宪制、法西斯制。这主要取决于社会各阶级力量的对比状况和统治阶级中各阶层力量的对比状况。资产阶级共和民主制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独揽政权的统治形式。君主立宪制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妥协，实行联合统治的形式。资产阶级总是隐瞒其统治阶级的地位，故意把政体与国体混为一谈，使用“国民”、“民主”之类的名词来掩盖其一个阶级专政之实质。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摧毁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满足于政体的改变。

政体又反作用于国体。“**没有适当形式的政权机关，就不能代表国家。**”（《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38 页）对于已经取得政权的无产阶级来说，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主要是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同时又必须使自己的政体不断完善，不让阶级敌人有可乘之机，将无产阶级专政蜕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苏修叛徒集团利用原有国家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窃取国家最高权力，复辟资产阶级专政，这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林彪念念不忘“克己复礼”，也是妄图利用政体问题来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我国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为了加强无产阶级对国家机构的领导，新宪法明确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以工农兵为主体，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等等，这必将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

人民民主专政

对人民实行民主和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实行专政，二者的结合，就是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说：“**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联盟。这两个阶级占了我国人口的绝大多数，是革命和建设的主力军；要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实行专政，必须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毛主席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69 页）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和国际革命力量是团结一致的，我们的斗争得到人民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绝不施仁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65 页）只要他们不造反，不破坏，不捣乱，也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自己，成为新人。他们如果不愿意劳动，就要强迫他们劳动，同时也对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这种对于反动阶级的改造工作，只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才能做到。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只有在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以后，劳动人民才成了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才能管理国家大事。也只有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人民才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

（这个影响现在还是很大的，并将在长时期内存在着，不能很快地消灭），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道路上去，并继续前进，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专政是革命的专政，它和反革命的专政，性质是相反的。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的人民必须学会这一项对待反革命阶级的统治方法，否则就不能维持政权，革命的政权就会被内外反动派所推翻，内外反动派就会在中国复辟，革命人民就会遭殃。

资产阶级民主

是资产阶级享有的民主，又是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和制度。

毛主席指出，世界上只有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民主。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的范畴。民主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阶级社会里，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也不可能有超阶级的民主。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封建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个进步，但它始终是虚伪的、骗人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资产阶级的法律规定私有财产是享有选举权的基本条件，这就剥夺了千百万无产者的选举权。资产阶级所谓的普选，实际上就是几年解决一次统治阶级中什么人在国会和政府里充当压迫无产者和劳动人民的代表；资产阶级所谓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信仰各种宗教的自由而已；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恰恰是要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资产阶级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夺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列宁选集》第三卷 630 页）每当资产阶级制度的奴隶们起来反对主子、威胁到主子的统治时，这种民主，就表现为对无产阶级的野蛮镇压。巴黎公社的遭遇，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已。如果说，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也利用了资产阶级民主制的话，那仅仅是为了“**战胜资产阶级和推翻资**

产阶级做好准备。”（《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 15 页）今天，在号称最“民主”的美国，黑人不能同白人同校读书，同桌吃饭，同乘公共汽车或者火车旅行。美国各级政府、三 K 党等经常任意逮捕、拷打和残杀黑人。帝国主义的法西斯暴行清楚地告诉人们，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一块遮羞布。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伯恩斯坦、考茨基等吹捧资产阶级的民主是“纯粹的”民主，给“无产阶级提供了和平取得政权的充分机会”，极力掩盖资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苏修叛徒集团重复什么资产阶级议会是“全民的代表机构”，“现在工人阶级有可能利用议会民主的机构夺取政权”等滥调。这充分说明新老机会主义者都是资产阶级的忠实奴才。

自由、平等、博爱

“自由、平等、博爱”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提出的口号和纲领，写入当时的《人权宣言》，是资产阶级世界观在政治上的体现。

“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体现了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以人权反对王权，以人道反对神道，以人类理性反对宗教迷信，以普遍平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等思想。它对批判封建制度，启发人民革命意识，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它毕竟是资产阶级用来维护他们阶级私利的虚伪口号。当资产阶级进行民主革命时，他们用这一口号欺骗劳动人民，向封建地主阶级夺权，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又用这一口号麻痹劳动人民，掩饰他们的血腥统治，以巩固资产阶级专政。在资产阶级政权被无产阶级革命推翻之后，他们还企图用这一口号，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产阶级专政。

对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来说，“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始终是一个骗局。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不过是要有剥削雇佣劳动的自由，有掠夺殖民地的自由；而在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劳动者只有被剥削的自由，就是殖民地人民只有被掠夺的自由。资产阶级的所谓平等，不

过是要求他们有剥削雇佣劳动的平等；而对劳动人民来说，只有在被剥削这一点上是平等的。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不过是要更多的人爱他们的剥削，受他们的奴役；而对于劳动人民来说，则是要求他们向资产阶级的剥削感恩戴德。

几十年以来的老社会民主党人和现代修正主义者，包括中国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拿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纲领来冒充社会主义。实际上他们坚持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和资本主义制度，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是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列宁指出：“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的平等这类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像考茨基、马尔托夫和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其他英雄们那样），谁就只是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资产者、庸人和市侩的天性。”（《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 383 页）苏修叛徒集团一面公然把这一资产阶级的口号写进它的假共产主义纲领，叫嚷什么“一切人的博爱万岁”，一面却对苏联广大人民实行残酷的法西斯专政，同时疯狂地向外侵略和扩张，这充分表明他们是无产阶级最凶恶的敌人。

宗教改革运动

欧洲资本主义形成时期新兴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天主教罗马教皇封建统治的改革运动。

欧洲封建社会中，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势力十分强大，它与封建国王既争夺又勾结，完全垄断了社会的文化和精神生活。所以，早期反封建的斗争首先指向教会，是以宗教改革的形式进行的。

宗教改革的活动早在十二至十四世纪的意大利、法、英、德等国就已发生。十五世纪初，捷克的胡斯战争（反对德国封建主压迫和教会统治，后爆发为农民起义）是近代宗教改革运动的先声。十六世纪德国的宗教改革运动规模最大，影响最广。起初，以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神学教授马丁·路德为领导，反对罗马教皇的控制和压榨，强调人们凭自

己的信仰就可“升天”，无需向教会捐献赎罪，主张没收教会财产，取消烦琐的仪式，建立一个适合资产阶级利益的“廉价教会”。由路德发起的宗教改革，点燃了农民战争的熊熊烈火。但在猛烈的革命群众运动面前，路德由于害怕群众而倒向封建贵族，成为镇压人民革命的帮凶。农民和平民的代表、神甫闵采尔，起来反对路德，继续领导了这场革命运动。他主张在现实世界中建立起“天国”，反映了农民和早期无产阶级对没有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的社会向往。十六世纪三十一—四十年代，法国人加尔文在瑞士领导的宗教改革，比路德激进得多。他对教会组织进行了重大改革，不仅简化了许多宗教仪式，而且使教会采取民主和共和的政教组织形式：教会是“选民”的组织，教职由选举产生，整个教会由定期召开的高级宗教会议领导。这一改革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激进部分的要求，因而获得了胜利。恩格斯说：“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52 页）

宗教改革运动，前后延续二百多年，遍及欧洲各国。它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最初形式。由宗教改革而发展起来的农民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制度和罗马教皇的势力，成为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和广大人民反对封建制度的第一次大决战。由于宗教改革，在德、法、瑞士、荷兰和苏格兰等国都先后建立起具有新教义的新教派，成为新兴资产阶级夺取和巩固政治统治的工具。

社会革命

指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在阶级社会里，就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去代替落后的社会制度的斗争。它是阶级斗争的必然产物和最高表现。

“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474 页）只有通过先进阶级的革命，才能变革社会制度，把社会推向前进。毛主席指出：“在阶级社会中，革命和革命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

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不能推翻反动的统治阶级，而使人民获得政权。”（《矛盾论》）从历史发展来看，社会革命有几种不同的情况：第一种是以奴隶制代替原始公社制的革命；第二种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如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第三种是“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革命”（《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也还要从一个阶段转变到另一个更高阶段，这种转变，也是飞跃，也是社会革命，只是内容和形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革命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根本变革经济制度，解放生产力，把社会推向前进。变革经济制度的斗争必然要发展为夺取国家政权的斗争。马克思指出：“**每一次革命都破坏旧社会，所以它是社会的。每一次革命都推翻旧政府，所以它具有政治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 488 页）国家政权是上层建筑的整体，不推翻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新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完成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因此列宁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列宁全集》第二十四卷 18 页）国家政权从反动阶级手里转到革命阶级手里，是社会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如果是反革命阶级从革命阶级手里夺取政权，那就是反革命政变和复辟行为。

暴力革命是社会革命的必由之路。被压迫阶级要夺取政权，完成革命任务，必须用革命暴力去消灭反革命暴力。马克思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819 页）历史上每次伟大的革命无不经过你死我活的国内战争。现代修正主义者否认这个真理，鼓吹什么“和平过渡”，就是背叛革命。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061 页）几千年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社会革命是沿着曲折道路、螺旋式向前发展的。以往的革命，无论是封建制代替奴隶制，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围绕着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都经历了几十年或

几百年反复、曲折的斗争。以最后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社会主义革命，较之以往的任何革命，必然要经历更加曲折、更加激烈的斗争。

革命能否胜利，关键在于路线。无产阶级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只有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路线，反对修正主义路线才能实现。否则，即使有了革命形势，也不能夺得政权；即使夺得了政权，也还会重新丧失。人民是历史的主人，人民总是要革命的，任何反复和曲折都不能阻挡革命的前进。

暴力革命

即进步阶级用武装斗争反对和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

暴力革命的理论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反动阶级的政权，是维护他们反革命统治的暴力机器。被压迫阶级只有用暴力去摧毁反动阶级的国家机器，才能夺取政权。毛主席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的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506 页）“**舍此不能完成社会发展的飞跃。**”（《矛盾论》）

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从历史上看，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经历了几次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每一次斗争都使用了暴力。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一个剥削阶级推翻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尚且不能不经过国内战争。那么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无产阶级革命，不经过国内战争，更是不可能的。巴黎公社正是在武装的革命同武装的反革命激烈搏斗中诞生的。它所经历的七十二天，是武装起义、武装斗争、武装自己的七十二天。它所犯的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在于对反革命过于宽大，没有立即向凡尔赛进军，消灭反动派，而给敌人以喘息之机，使他们能够反扑过来，屠杀革命人民。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就

是武装斗争的历史。毛主席说：“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573 页》）中国人民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解放战争，消灭了蒋介石八百万反动军队，才取得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的。历史证明，一切反动阶级的本性决定他们不会自动交出政权。每当革命的紧要关头，反动阶级总是首先使用暴力，发动内战，用刺刀来对付革命。因此列宁说：“历史上还没有过一次不经过国内战争的大革命，并且也没有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会认为，不经过国内战争就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列宁选集》第三卷 578 页）

赞成还是反对暴力革命，是区分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放弃暴力革命，搞什么“和平过渡”，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背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陶里亚蒂、多列士等修正主义头子，交出了人民的武装，以暂时换取资产阶级政府里的一官半职，结果使无产阶级已经取得的革命成果全部丧失。苏修叛徒集团一面反对暴力革命，重弹“和平过渡”的滥调，一面却用暴力镇压国内人民革命和世界人民革命，充分暴露出社会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叛徒、卖国贼林彪一面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叫嚷“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用儒家的反动语言恶毒攻击革命暴力，一面却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这表明一切修正主义者都是一丘之貉。

资产阶级革命

即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种革命通常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成熟的条件下发生的，其基本任务是推翻封建制度，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发展资本主义扫清道路。

十七世纪中叶的英国和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仅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而且打击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统治，推动了其它地区国家的反封建革命运动。马克思肯定一六四八年英国革命和一七八九年法国革命的历史作用时指出：“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

上反映了当时整个世界的要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 125 页）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特别是十月革命的胜利，结束了这种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开始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在帝国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最大压迫是民族压迫，这些国家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必然要反对帝国主义，从而不可避免地要遭到帝国主义的镇压，可是却得到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因此，不管参加这一革命的阶级、党派、个人是否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这种革命都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而成为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是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强大力量，更是当代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所以，对待亚、非、拉各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对外政策中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标志。

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但却经历了长期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一六四〇年，在推翻了国王后，接着就出现了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一六六〇年又出现旧王朝复辟，直到一六六八年，资产阶级专政才稳定下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从一七八九年爆发到一八七五年第三共和国成立，经历了八十六年，中间交织着进步与反动，共和与帝制，革命的恐怖与反革命的恐怖，征服外国与投降外国等十分复杂的斗争。这说明任何一次真正的革命，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曲折的道路，才能取得胜利。

产业革命

亦称工业革命。包括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两个方面。技术变革指由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变革指生产关系的改变，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取得统治地位。

产业革命开始于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的英国。十七到十八世纪，英、

法等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生产力的发展扫清了道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向机器大工业的过渡准备好了条件。十八世纪八十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给英国整个工业部门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加速了技术革新和英国的产业革命，使它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恩格斯曾指出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机器的大量制造和采用，又推动了采掘、冶炼和化学工业以及运输技术的变革。到十九世纪中期，继英国之后，法、德、美、日等国也先后完成了产业革命。

产业革命的结果是机器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生产力获得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制度战胜封建主义制度奠定了物质基础。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52 页）

产业革命最重要的社会后果，是阶级对立的简单化，社会日益迅速地分裂为两个明显对立的阶级，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恩格斯指出：“新生的工业能够这样成长起来，只是因为它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了作坊，从而把中等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它排挤了小资产阶级，并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296 页）

产业革命带来了大工业的发展，而大工业的发展必然使社会化的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日益加深，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必然愈来愈激烈。正是资产阶级自己产生了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都是不可避免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和十月革命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殖民地、

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许多著作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系统的论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其社会性质来说，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但和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原则的区别。十月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世界历史的时代。帝国主义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主要压迫者。列宁所领导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宣布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运动。在这个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都不再是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路线的同盟军，而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了，它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这种“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14 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第一步，是改变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经过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段紧密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顽固地坚持民主革命应由资产阶级领导，建立资产阶级专政，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搞“第二次革命”，结果导致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左”倾盲动主义者，走到另一个极端，提出所谓“一次革命论”，妄想使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结果使革命遭到新的失败。他们都不懂得或不愿意懂得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和区别。

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区别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五四运动以前，资产阶级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属于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五四运动以后，无产阶级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他们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的革命性。但由于他们在经济上、政治上异常软弱，对于革命的敌人有妥

协性，所以即使在革命时，也不能彻底反帝反封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彻底性。“整个革命历史证明，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有了工人阶级的领导，革命就胜利了。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国家的任何别的阶级，都不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达到胜利。”（《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68 页）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表明，必须有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无产阶级政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说：“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69 页）

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

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理论，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革命策略的理论基础。

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根据社会基本矛盾和阶级矛盾发展的客观情况，经过一系列互相连续又互相区别的革命发展阶段。无产阶级政党指导革命，一定要明确区别革命阶段的性质，不能把不同阶段的革命任务混淆起来，“毕其功于一役”。同时又要使革命的前后两个阶段紧密地连接起来，以便在一个革命阶段的任务基本实现以后，使革命不停顿地发展到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直到完全实现共产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这个革命理论符合社会发展的规律，是完全正确的。按照这个理论办事，革命就前进，就胜利；违反这个理论，就会犯右倾或“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必然导致革命的失败。

一八五〇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392 页）他们指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之后，决不能结束革命，而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达到消灭

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479—480 页）

以伯恩斯坦为首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提出了“革命间歇论”，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他们否认民主革命可以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主张民主革命以后有一个“间歇阶段”。叛徒托洛茨基则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抛出反革命的“不断革命论”。他抹杀农民的革命作用，否定工农联盟，否定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权，主张抛开农民，跳过民主革命阶段，“向空一跃”，“一次”实现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要“一次”断送无产阶级革命。后来托洛茨基又抛出所谓“世界革命论”，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取得胜利的革命理论。列宁痛斥了这些反革命谬论，并明确指出：“**我们主张不断革命。我们决不半途而废。**”（《列宁全集》第九卷 221 页）

毛主席在领导我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路线。在民主革命时期，毛主席既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陈独秀一伙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割裂开来的“二次革命论”，又反对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瞿秋白、李立三和王明把两个革命阶段混淆起来的“一次革命论”，明确指出：“**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44 页）“**两个革命阶段中，第一个为第二个准备条件，而两个阶段必须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46 页）

抗日战争胜利后，毛主席坚决反对叛徒刘少奇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投降主义路线，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后来又批判了刘少奇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反动纲领，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主席全面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刻，毛主席又提出了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问题。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粉碎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复辟资本主义的阴谋活动，并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热潮，保证了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这是毛主席在理论和实践上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杰出贡献。

政变

代表一定阶级、阶层利益的政治集团，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用政治或军事手段夺取政权，就是政变。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这是常见的现象。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如果丧失警惕，也会发生政变。

对政变必须作具体的阶级的分析。一种是剥削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再分配，如我国封建社会中出现的统治集团中争夺皇位的政变。其中有的是统治集团中的革新派反对顽固派的政变，有的是顽固派打击革新派的政变。另一种是被推翻了的反动阶级实行反革命复辟的政变。

任何政变的出现，都不是由于政变人物的“癖好”，而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马克思在论述路易·波拿巴政变时指出，正是法国当时的阶级斗争“造成了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599 页）叛徒、卖国贼林彪从反动的英雄史观出发，把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说成是政变“英雄”的历史。他根本否认“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588 页）；根本否认几千年的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他起劲地大讲政变，正是为了搞反革命政变。

一切反革命的政变即使得逞，至多是造成局部历史的暂时倒退，既阻止不了历史的前进，也改变不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卖国贼袁世凯

篡夺辛亥革命的果实，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封建余孽张勋只演了十二天的复辟丑剧，就被人民轰下了台。蒋介石算是最长的了，人民一造反，他就倒了。林彪集古今中外反革命政变经验之大成，迫不及待地跳出来和无产阶级较量，结果落得粉身碎骨，死无葬身之地。正如毛主席所断言的那样：“中国如发生反共的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无产阶级政党

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和无产阶级意志的集中者。毛主席指出：“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无产阶级在政治上成熟的标志。一八四七年，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指导下建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雏形。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这一组织起草的《共产党宣言》，是无产阶级政党第一个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纲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最重要的经验是：无产阶级要取得革命事业的胜利，必须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的党。毛主席说：“没有一个革命的党，没有一个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和革命风格建立起来的革命党，就不可能领导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249 页）

无产阶级政党以实现共产主义为最终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列宁说：“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列宁全集》第五卷 337 页）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

主义。”

无产阶级政党是在反对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以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这一切胜利，归根结底，都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胜利。毛主席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经验时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深刻地概括为“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三项基本原则。每个共产党员都要根据这三项原则，坚持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把列宁亲手缔造的布尔什维克党变为所谓“全民党”，即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深刻的教训。

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员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各级党组织都要在中央正确路线的领导下，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全党都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在国际事务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坚持国际主义，反对形形色色的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坚决同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组织团结在一切，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团结在一起，为打倒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为在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而共同奋斗。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号召我们：“全党同

志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一百年也不要骄傲，二十一世纪以后也不能翘尾巴”，“努力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

为了保证党的事业永远沿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前进，无产阶级政党还必须在革命斗争中不断进行“吐故纳新”，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路线斗争

在阶级社会中，两个敌对阶级之间，或一个阶级中不同集团之间的重大思想政治斗争，都是路线斗争。共产党内的阶级斗争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思想路线斗争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路线斗争，是紧密相联的。

路线斗争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一个阶级能否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决定于路线是否正确。毛主席说：“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历史上的新兴阶级能够顺应历史潮流，提出并推行一条解决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路线，而一切没落阶级总是顽固地坚持阻挡历史前进的反动路线。在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时，法家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革新路线，儒家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复辟路线。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正是依靠了这条法家路线。秦始皇死后，赵高发动沙丘反革命政变，代表奴隶主贵族篡夺了政权，中断了法家路线，代之以儒家路线，这是秦王朝迅速灭亡的主要原因。无产阶级要夺取革命的胜利，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为指导。一九二七年我国大革命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所造成的。后来，革命重新发展起来直至取得全国的胜利，主要是因为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指导。路线正确，没有军队也会有军队，没有政权也会有政权；路线不正确，即使有了军队，掌握了政权，也会垮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

正确的路线不是自然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我国，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经过了新兴地主阶级和

没落奴隶主阶级长期激烈的斗争，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几度夺得政权，又几度失去政权。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就长达一百三十多年之久。新兴地主阶级在长期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一条成熟的法家路线，终于战胜了儒家的反动路线，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了奴隶主阶级专政。半个世纪以来，在我们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是在和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等人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长期斗争中发展起来的。粉碎林彪反党集团是我党在九大以后取得的最大的胜利，但是我们党内路线斗争并未结束。毛主席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十次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时，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三项原则是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每个共产党员都要遵守这三项原则，坚持这三项原则，敢于反潮流，和一切错误路线作坚决的斗争。

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决定了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反映这些矛盾的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必将长期存在，还会出现十次、二十次、三十次，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将来阶级消灭了，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存在。反映这些矛盾的先进和落后、正确和错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仍然存在。

党的基本路线

即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提高警惕。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要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不然的话，我们

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会走向反面，就会变质，就会出现复辟。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这是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于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为我们党制定的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九大、十大，都再次肯定了这条基本路线。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实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都证明了党的基本路线是完全正确的。它是我们党和国家的生命线。

党的基本路线是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它揭示了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的客观规律，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主要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方法，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战略任务，制定了正确区别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总政策。这条基本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总纲，是照耀我们前进的灯塔。一切具体工作的路线和政策，都是由党的基本路线决定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忘记了党的基本路线，“我们就将是一个盲目的不完全的不清醒的革命者，在我们执行具体工作路线和具体政策的时候，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左右摇摆，就会贻误我们的工作。”（《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211 页）党的基本路线是在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的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同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建国以来，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在经济、政治、思想战线上开展了一系列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力地反击了刘少奇鼓吹的资产阶级“剥削得越多功劳越大”、“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反动谬论。一九五六年，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毛主席及时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光辉著作，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有力地批判了刘少奇一伙宣扬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唯生产力论”等谬论。毛主席还领导了一九五七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特

别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并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有力地捍卫和发展了党的这条基本路线。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复辟资本主义，这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建国以来党内四次大的路线斗争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林彪反党集团推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就是妄图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复辟资本主义，把中国变为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毛主席总结了党内路线斗争的经验，特别是粉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经验，号召全党：“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这就为我们指出了划分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标准，指出了在路线斗争中必须遵守的三项基本原则，这对捍卫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大的政治报告向全党指出：“要特别重视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这是我们党取得更大胜利的基本保证。”只要我们坚持这条基本路线，正确地进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党就会更加兴旺发达，更加团结巩固，更加富有战斗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战胜国内外敌人，夺取更大的胜利。

反潮流

指敢于以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去战胜各种反动逆流、反动思潮。毛主席说：“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反潮流就是要敢于造旧世界的反，敢于彻底批判剥削阶级的传统观念。当资本主义统治全世界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以压倒敌人的伟大气魄，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85——286 页）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就是批判的、革命的，就是反潮流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都是敢于反潮流的典范。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也只能在和各种机会主义路线斗争中才能发展。毛主席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必须坚持斗争哲学，敢于反潮流。当一种错误倾向像潮水般涌来时，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挺身而出，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顶住反动逆流，战胜反动逆流。当第二国际大多数领袖都背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列宁不怕孤立，坚决顶住这股反动逆流，无情地揭露和批判了修正主义，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样，毛主席在我党十次路线斗争和反对国际上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中，始终坚定地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修正主义的进攻，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要善于识别各种反动的逆流。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是极为复杂的。当一种倾向被另一种倾向掩盖着的时候，往往不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加上阶级敌人搞阴谋诡计，故意制造假象，更增加了识别反动逆流的困难。但是，只要我们刻苦攻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认真研究和总结历史上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经验，积极参加革命斗争实践，努力改造世界观，就一定能够不断提高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能力，击退反动逆流。

群众路线

依靠群众，相信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

党的群众路线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观点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革命事业是千百万群众的事业，革命一定要依靠人民群众。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共产党人一切都要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把亿万群众充分发动

起来，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就能克服一切困难，做好一切工作，战胜一切敌人，不断夺取革命的胜利。列宁指出：“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胜利最深的泉源。”（《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 68 页）毛主席说：“共产党基本的一条，就是直接依靠广大革命人民群众。”

党的群众路线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路线完全一致的。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是以群众的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人的正确认识，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而人民群众是社会实践的主体，只有通过人民群众的斗争实践，才能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也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毛主席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54 页）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这是群众路线的根本方法，也是党的基本的领导方法。毛主席指出，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用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领导人员必须从许多个别指导中形成一般意见（一般号召），又拿这一般意见到许多个别单位中去考验，然后集中新的经验（总结经验），做成新的指示去普遍地指导群众，并把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到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这个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正确地处理了物质和精神、实践和认识、感性和理性、个别和一般、个性和共性、领导和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辩证关系。它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是无产阶级在三大革命实践中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也是反对官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要武器。

实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几十年来，我们党天天做群众工作，天天讲群众路线，每一次革命斗争的胜利，都是在正确的政治路线指引下，坚持群众路线的结果。人民群众创造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是社会主义革命的新形式，也是群众路线的新发展。我们要依靠人民群众运用“四大”武器，“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巩固中国共产党对国家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断推向前进。

群众、阶级、政党、领袖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这个问题的基本原理是：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被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

机会主义者总是歪曲群众、阶级、政党、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从实用主义出发，时而攻击革命领袖，一笔抹杀革命领袖推动历史的伟大功绩；时而标榜自己是主宰历史的“英雄”，根本无视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性作用。他们的“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毫无相同之处。

马克思主义认为，党是阶级的先锋队，它领导阶级进行战斗。无产阶级要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党。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只有组成“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455 页）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对群众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的；离开了党的领导，革命就要失败。而无产阶级的政党，要真正成为自己阶级的先锋队，领导群众进行革命，就必须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这个核心，要由一批久经考验的、善于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领袖们组成。无产阶级一定要培养一批自己的有经验的、有极

高威信的领导。列宁说：“不这样做，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列宁全集》第三十二卷 505 页）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鼓吹自发论，宣扬“群众运动天然合理”，否定党和领导的作用，甚至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充分暴露了他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

无产阶级的领导和群众的关系是“鱼水关系”。无产阶级的领导不是自封的，不是人为地树立起来的，而是在革命群众运动中产生的，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成长起来的。他们立党为公，不谋私利，和群众有血肉联系，善于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他们领导群众，团结群众，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是群众的真正代表；群众则是革命领导力量的源泉。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也不行。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

权威

权威是在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中产生的最有威望（或最有强制力）、最有支配作用的力量。恩格斯在著名的《论权威》一文中，深刻地阐明了权威的重要性和产生权威的社会根源，有力地批判了反权威主义。

权威的产生是有它的物质基础和客观必然性的。一定的经济关系和社会生活，需要一定的权威。在现代化的工厂、铁路、邮政、轮船等企业中，许多人在一起工作，彼此在时间上需要统一步调，技术上需要互相配合，业务上需要协同合作，如果没有一个权威的统一指挥，就不能组织起来，进行正常的活动。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反权威主义的错误时说：“没有一个作最后决定的意志，没有统一的领导，人们究竟怎样开动工厂，管理铁路，驾驶轮船，这一点他们当然没有告诉我们。”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401 页）反权威主义者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不懂得如果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消灭大工业本身。历史上一切革命阶级都要推选出自己的有权威的领袖人物，按照一定的权威思想，组成有权威的集团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

争，以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

“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554 页）无产阶级需要有自己的革命权威，才能把整个阶级团结成统一的战斗力量，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不仅要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权威力量去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而且需要有自己的权威，领导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恩格斯指出：**“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554 页）其实，反权威主义者不是不要权威，只是要他们自己的“权威”。现代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借口“反对个人崇拜”，丑化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斯大林，竭力抬高自己的地位，自封为“权威”，实际上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

权威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权威，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权威。为了夺取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必须坚定的捍卫无产阶级权威，打倒资产阶级权威。一切权威都是相对的，从来没有无条件的绝对权威。权威不是自封的，而是在革命斗争中自然地形成的，自封的权威一定要垮台。林彪妄图“大树特树”自己的“绝对权威”，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结果落得粉身碎骨的可耻下场，这就是最好的明证。

爱国主义

爱国主义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毛主席说：**“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86 页）有时帝国主义者为了发动侵略战争，也打起“爱国主义”的旗号，这种所谓“爱国主义”完全是为了诱骗群众为他们的侵略去卖命，必须坚决反对，揭穿它的反动实质。

各个剥削阶级在上升时期都有自己的爱国主义，如地主阶级的爱

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它们虽然在历史上也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都有自己的阶级局限性，都是不彻底的。如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在反对国内外封建复辟势力的斗争中，曾高喊“祖国在危险中”的爱国主义口号，动员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起来“保卫祖国”。但是，当民族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发生冲突时，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就变成卖国主义。在普法战争中，当工人自动武装起来保卫巴黎时，梯也尔的资产阶级“国防政府”就毫不犹豫地向日耳曼投降，联合入侵之敌，共同镇压工人的爱国行动。

无产阶级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中国的统治。解放以后，中国无产阶级又和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侵略和颠覆活动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以极大的爱国热情，奋发图强，在短短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就把贫穷落后的旧中国变成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对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毛主席曾指出：“**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37 页）如我国的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朝鲜、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都既是反侵略的爱国战争，又是对别国人民革命的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来都是相互支援的。当前，第三世界各国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侮的斗争，既是正义的爱国斗争，同时又是对整个世界革命的有力支持。

国际主义

各国无产阶级在反对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在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中，必须互相支援，才能达到胜利。“**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86 页）这就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坚持整个无**

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64 页）既然资本主义把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置于它的奴役之下，因而也就把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特别是“自从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世之后，世界的事情就联成一气了，要想割开也不可能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47 页）因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坚决反对本国政府的侵略、压迫政策。恩格斯说：“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 577 页）同样，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

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从来都是相互支援的。“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62—1363 页）对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国家的无产阶级来说，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反对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别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这既是爱国主义又是国际主义，这种爱国主义就是国际主义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实施。

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因此，一切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把他们的斗争看作是对自己最有力的支持，把他们的胜利看作是自己的胜利。毛主席特别强调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永远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一边。苏修叛徒集团却在“国际主义”的旗号下，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干着帝国主义的罪恶勾当，这充分证明它是地地道道的社会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号召我国人民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加强同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团结，加强同一切受帝国主义侵略、颠覆、干涉、控制和欺侮的国家的团

结，组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特别要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此，就必须把我们中国的事情办好，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便更好地完成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对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

第三世界

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的国家。它包括一百多个国家，约有三十亿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第三世界的国家，过去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经济上大多比较落后。现在，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在经济上也开始站起来了，但都面临着反对霸权主义，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

第三世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上各种政治力量经过长期的较量和斗争，发生急剧分化和改组后形成的。起初，美国取代了德、意、日法西斯的地位，妄图独霸世界。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被称为第一世界；由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被称为第二世界；广大亚、非、拉地区的民族独立国家和正在争取独立的国家被称为第三世界。从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方帝国主义集团已四分五裂；由于苏联蜕变为社会帝国主义，使战后一个时期曾经存在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特别是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一系列亚、非、拉国家纷纷取得独立，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愈来愈大的作用。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和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

第三世界的觉醒和壮大是当代国家关系中的一件大事。第三世界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过去受的剥削与压迫最深，今天仍然面临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干涉、颠覆、控制和掠夺。因此，他们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为强烈。他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

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和全世界人民互相支援，互相鼓励，团结战斗，沉重地打击了两个超级大国妄图称霸世界的野心。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历史潮流奔腾向前。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成为反对两霸的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我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都叫做第三世界，是发展中国家。”我国政府和人民，一贯遵循毛主席的教导，把支持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反帝、反霸，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护本国资源，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看成是我们应尽的国际主义义务。只要第三世界和全世界人民团结一致，并且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坚持长期斗争，就一定能够取得反帝、反殖、反霸斗争的更大胜利。

民族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斯大林全集》第二卷 294 页）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受社会生产和社会制度所制约。

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悠久的历史，都经历了各个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进一步发展起来，形成了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民族是建立在资本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资产阶级是民族压迫的主角，资本主义剥削是民族灾难的根源。在帝国主义时代，民族压迫成了普遍现象，形成了帝国主义压迫民族和殖民地被压迫民族的尖锐对立。民族矛盾是阶级矛盾的产物。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我们中华民族是一个由多民族结合而成的民族。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

下解放出来，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国内各民族的真正平等和革命大团结。我国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得到解放和发展，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都受到保护和尊重。四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各兄弟民族的权利，规定了国家机关要“积极支持各少数民族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对这个原则采取什么态度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和真假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苏修叛徒集团上台以后，宣扬极端反动的种族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拾起老沙皇民族压迫的棍子，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以民族压迫代替了民族平等，以资产阶级的“弱肉强食”代替了各民族之间的互助友爱；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掠夺别国领土和资源，反对民族解放运动，彻底暴露了他们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同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一切被压迫民族只有加强团结，坚持斗争，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才能获得解放。而“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86 页）只有一切被压迫民族得到完全解放，在全世界实现了共产主义，各民族才能融为一体。

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形势的主流。亚、非、拉各族人民日益觉醒，第三世界各国掀起了维护国家主权、掌握民族资源、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剥削和掠夺的巨大浪潮，新老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正在衰亡。我们一定要高举“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伟大革命旗帜，坚决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把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斗争进行到底。

毛主席一贯教导我们，要加强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光辉著作中，把“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作

为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判断是非的六条标准的第一条。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我们要遵循毛主席的教导，不断加强全国各大民族的大团结，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更大胜利。

民族主义

资产阶级关于民族问题的政治主张，即打着维护民族利益的旗号，来维护和扩大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

民族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资产阶级利用本民族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居住区域等方面具有共同性的特点，以“全民利益”的代表自居，要求本民族的一切阶级和阶层，去反对别的民族，以维护和扩大它的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改良派和修正主义者往往利用民族主义，使无产阶级漠视阶级矛盾，从而破坏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斯大林说：“民族主义倾向就是使工人阶级的国际主义政策迁就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政策。”（《列宁主义问题》563页）

毛主席说：“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在阶级社会里，一切民族的人们都是划分为阶级的，而工农和其他劳动人民总是占大多数的。民族压迫者是各国的反动统治阶级，而不是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也受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恩格斯曾经指出：“只要俄国士兵还侵占着波兰，俄国人民就既不能获得政治解放，也不能获得社会解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577—578页）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和被压迫民族的人民联合起来，推翻本国的反动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消除民族之间的对立。“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270页）

无产阶级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民族主义应作阶级的具体的分析，区别对待。列宁说：“必须把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把大民族的民族主义和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区别开来。”（《列宁全集》第三十六卷631页）压迫民族、大民族的民族主

义适应资产阶级扩张政策的需要，完全是反动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总是在“民族利益”的掩饰下，侵略、压迫和掠夺其他国家和民族。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就是这样，它对外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对内推行歧视和压迫各小民族的大俄罗斯主义。被压迫民族、弱小民族的民族主义具有两重性。它主张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反抗帝国主义和大民族的侵略和压迫，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它的反抗仅以符合本民族统治阶级的利益为限，对其他民族的一切阶级都表现为仇视或不信任。同时由于这些民族主义者不敢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参加反帝斗争，因而不可能彻底解决民族独立的问题，有时甚至会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而牺牲本民族的利益。

在民族问题上，无产阶级政党的世界观是国际主义，不是民族主义。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政党支持进步的民族主义，反对反动的民族主义。在任何时候，无产阶级政党都必须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划清界限，不做它的俘虏。无产阶级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反对一切民族压迫，主张解放世界一切被压迫的民族。因为“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86 页）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一切社会的基本矛盾，也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这两大基本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仍然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仍然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前进的。即使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这两大基本矛盾仍然存在。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式也不同，但任何社会的发展，总是在这一基本矛盾运动中实现的。

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就是否认辩证法。社会主义制度比较资本主义制度要优胜得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性质。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相适应

的（这是基本的方面），又是相矛盾的。因为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不能很快就巩固，要有一个巩固和发展的过程。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无产阶级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影响，国家机构中某些不正之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矛盾的。一个矛盾解决之后，又会出现另一个矛盾，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推动着社会主义社会不断向前发展。总之，必须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要看到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继续存在，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和分配方面，资本主义的东西不可能完全或很快就消失。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仍然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坚定不移地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不断地变革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部分，变革上层建筑中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以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新老资产阶级及其在党内的代理人，则拼死反抗这种变革，力图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存在，阶级斗争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与旧社会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且随着正确地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就不断巩固、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

毛主席从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科学地论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制定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

革命的重大课题。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及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都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根本上战胜资产阶级，达到反修防修的目的。为此，就必须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直至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

马克思和列宁都从原则上指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毛主席科学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正反两面的实践经验，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基本上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重大发展。

列宁说：“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次行动，不是一条战线上的一次战斗，而是充满了剧烈的阶级冲突的整整一个时代。”（《列宁选集》第二卷 717 页）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剥削阶级虽然已被推翻，但这些人还在，这些阶级还存在，他们决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千方百计地要恢复被夺去的“天堂”；在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还没有提高到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以前，私有经济的残余尚未消失以前，仍然保留着资本主义生长的土壤，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列宁选集》第四卷 181 页）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和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除了在小生产中会产生资本主义之外，在一部分党员中，在一部分工人中，在一部分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中，也会产生出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毛主席科学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实践经验，指出：“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

激烈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同时，国际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也决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必然要和我们作拼死的斗争。因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的篡党夺权，社会主义就蜕变成社会帝国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一个最有力的证明。

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阶级斗争采取了新的形式。被推翻的剥削阶级除了公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以外，往往打着拥护马克思主义，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的旗号，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阴谋活动。在政治上，他们千方百计地钻进党和国家机关，篡夺各部门的领导权，一旦时机成熟，就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他们用经济主义冒充社会主义，扶植和复辟资本主义势力，破坏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思想文化上，他们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等腐朽的东西冒充和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腐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不管采取什么形式，斗争的中心始终是围绕着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复辟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

在我国，在基本上实现了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后，先后经历了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重大的阶级斗争，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都取得了伟大胜利。一个群众性的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运动，又正在全国兴起。总之，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它时起时伏，高一阵低一阵，波浪式地前进，低是高的继续，高是低的发展。在政治、经济和思想领域中，每过若干年就有一次重大的斗争，这种斗争需要进行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解决。因此，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实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简称“走资派”，是社会主义国家中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

人。他们披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打着共产党员的旗号，混在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教育界里，窃据领导地位，一旦时机成熟，就夺取政权，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危险的敌人。

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内出现走资派是不奇怪的，这是社会上两个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道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在共产党内的反映。国内外的阶级敌人都懂得，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地主和资本家的名声很臭，由混进党内的走资派出来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要比他们自己亲自出马好的多，他们一定要在共产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这是一条规律。在苏联，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社会主义国家变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刘少奇和林彪是长期隐藏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走资派的总头目。刘少奇在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一贯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特别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历史时期以后，他变本加厉的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重新变中国为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林彪在历次革命的重要关头，总是犯右倾错误，又总是耍两面派，用假象欺骗党和人民。随着革命的深入，他再也隐藏不住了，自己跳了出来，妄图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这种疯狂性，反映了丧失政权和生产资料的反动派，为夺回他们失去的剥削阶级的阵地，必然要用尽一切他们所能采取的手段。他们像亡命的赌徒，孤注一掷，失败后，就叛国投敌。他们不仅代表已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愿望，而且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分子篡权的愿望。这充分表明走资派是我们国家和党内的隐患。正如毛主席所说的那样，一旦他们上台，“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走资派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革命的主要对象，他们和无产阶级

以及广大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的集中表现。发动无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夺权，是毛主席解决这个矛盾的重大战略措施。无产阶级必须从走资派手中夺回被篡夺去的权力，才能从根本上打败他们。对于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只要他们不坚持错误，认真改正，并取得广大革命群众谅解后，仍然可以站起来继续革命。

毛主席十分重视和“走资派”作斗争，早在一九六二年就提出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一九六五年，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中指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又在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中，提醒全党注意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指出：“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接着，毛主席又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气魄，亲自发动和领导了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防止了资本主义复辟。这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且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专政

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的专政，同时，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历史上最进步的也是最后的专政。它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使命，是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首次提出了这一思想。一八五二年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对关于什么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概括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332 页）这一科学论述，

完整地表达了无产阶级专政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全过程，包括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全部任务和实际内容。

列宁指出：“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在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行动。”（《列宁选集》第三卷 640 页）他还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存在着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土壤，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列宁选集》第四卷 181 页）事实证明，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必须依靠自己的政治统治，建立、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就建立不起来，即使建立了，也不能巩固和发展。毛主席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对于胜利了的人民，这是如同布帛菽粟一样地不可以须臾离开的东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91 页）苏联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蜕变为法西斯专政的社会帝国主义国家，我们必须牢记这一深刻的历史教训。

我国现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个作用，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镇压一切叛国的和反革命的活动，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其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解决对外的敌我之间的矛盾。它是我国人民战胜敌人，保护自己的法宝。只有依靠无产阶级专政，并不断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和精神的条件。

一切机会主义的要害，就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毛主席强调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叛徒、卖国贼林彪大骂代表新兴地主阶级镇压奴隶主阶级反抗的秦始皇，恶毒地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执秦始皇之法”，就是妄图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苏修叛徒集团与林彪遥相呼应，也在那

里咒骂秦始皇，攻击和诋毁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其实，“骂我们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外国反动派，就是实行独裁或极权主义的人们。”（《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67 页）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的反动派，他们取消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大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专政。

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必须进行长期的斗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专政代替地主阶级专政，都经历了复辟和反复辟的长期斗争。以消灭任何剥削制度和任何阶级为目标的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较以往任何一次革命都要深刻彻底，因此，不可避免地要经历更长期、更艰苦的斗争。历史经验表明，无产阶级能否战胜资产阶级，关键在于能否在一切领域、在革命发展的一切阶段始终坚持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主席总结了列宁以后无产阶级专政的新经验，系统地回答了所有制改变以后出现的各种问题，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和政策，奠定了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基础。他强调：“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一切阵地，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和一切基层单位。

无产阶级民主

又叫“社会主义民主”。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又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手段和制度。

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广大人民有权参加国家管理，有权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干部，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列宁说：“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不允许他们参加民主生活，——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民主制。”（《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 448 页）我国人民享有言论、通讯、出版、集会、

结社、旅行、示威、罢工的自由，有信仰宗教的自由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等广泛民主权利。同时，国家还保障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形式来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维护社会主义民主。毛主席说：“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和对阶级敌人的专政，是相反相成的两个方面。只有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并和高度的集中结合起来，才能团结绝大多数人，对阶级敌人实行强有力的专政。同时，只有对阶级敌人实行强有力的专政，才能保障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民主。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考茨基胡说什么“专政就是取消民主”，并恶毒的攻击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林彪及其一小撮死党恶毒地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暴政”，叫嚷要重新解放已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妄图实现孔丘所没有实现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反动纲领。这充分证明一切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无论如何是要经由它们的反革命政党、集团或某些个人出来反抗的。已经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团结起来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将这些反动势力镇压下去，决不允许他们乱说乱动。

无产阶级民主与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化是完全不相容的，它只能促进团结，加强纪律性和战斗力，绝不能破坏纪律性，破坏团结，削弱战斗力。我国人民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始终坚持“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公式，不断加强革命的大团结，才一次又一次地粉碎了国内外阶级敌人妄图破坏我国人民团结的阴谋。

民主集中制

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在民主基础上实行集中，在集中指导下实行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它是无产阶级政党、国家机关和一切群众团体的组织原则。

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它们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不应片面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而要坚持民主和集中、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只有充分发扬民主，通过大家讨论，才能把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做到统一认识，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同时，只有实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实行有领导的自由，才不致于陷入无政府状态。毛主席指出：“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在党和国家生活中的应用。它要求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虚心倾听群众的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决不允许压制批评，打击报复，提倡“群言堂”，反对“一言堂”。凡属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必须依据具体情况，领导群众，加以实现。同时实行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无产阶级纪律。对人民群众中出现的错误意见，要坚持原则，教育群众，加以改正，决不能放任自流。

毛主席十分重视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既要充分发扬民主，又要实行高度的集中，以便在人民内部“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民主集中制的生动体现，它对加强党的领导和人民内部的团结，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民主集中制是贯彻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防止和粉碎混入党内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党篡权阴谋活动的组织保证。因此，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总要千方百计地破坏这一制度。半个世纪来，中国共产党内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以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一类骗子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长期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粉

碎了他们破坏民主集中制，妄图分裂党、搞垮党的阴谋，使我们的党不断巩固和壮大。

社会主义革命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广大劳动人民，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革命。毛主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制度，这是一个不以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不管反动派怎样企图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革命或迟或早总会发生，并且将必然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最彻底的革命，它和资产阶级革命及以往的一切革命都有着根本的区别。资产阶级革命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形式已经具备时发生的，社会主义革命则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形式没有具备时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就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夺取政权只是开始，还要依靠政权来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资产阶级革命只是一个剥削阶级代替另一个剥削阶级的革命，它无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社会主义革命是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的革命，必须摧毁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革命是为少数剥削者谋利益的革命，因此资产阶级不能和广大劳动群众保持长期的联盟；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是要消灭任何阶级，解放全人类，因此无产阶级必须而且能够永远团结广大劳动群众，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决定，必须用暴力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用剥夺或赎买、改造的办法变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通过合作化的道路变个体劳动者所有制为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并在条件具备时，再由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发展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要坚持把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

上层建筑，以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这一革命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曲折地向前发展的。在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阶段，我国开展了“肃反”、“三反”、“五反”等运动，同时揭露和粉碎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取得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胜利。但资产阶级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特别是资产阶级右派利用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的机会，向党发起猖狂的进攻，全党和全国人民打退了他们的进攻，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迅猛发展。接着，彭德怀反党集团跳出来疯狂地攻击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妄图阻止社会主义的潮流奔腾向前，他们的阴谋又及时被全党和全国人民粉碎了。随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刘少奇修正主义集团，从政治、经济、思想各个领域，继续大搞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活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粉碎了以刘少奇为头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斗争并不从此结束，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又跳出来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社会主义新事物，并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又及时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揭露和粉碎了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阴谋。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进一步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指明了道路。事实证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每一个胜利都要经过反复的斗争。过去如此，今后仍将如此。

毛主席指出：“我们已经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是，失败的阶级还要挣扎，这些人还在，这个阶级还在。所以，我们不能说最后的胜利，几十年都不能说这个话。不能丧失警惕。按照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

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主席全面地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是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大发展。

马克思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曾提出：“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479 页）并强调无产阶级革命要进行“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 605 页）列宁认为：“夺得了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并不因此停止自己的阶级斗争，而是用另外一种形式、另外一种方法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利用国家政权这个工具所进行的阶级斗争”。（《列宁选集》第四卷 133 页）毛主席坚持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与此同时，国际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夺取政权，对无产阶级来说，还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无产阶级不仅要把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同时还要把政治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我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在经济战线，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并没有因为所有制的基本改变而结束。在农村，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并没有停止破坏活动，一部分农民还在不同程度上保持着小生产者的习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经常抬头。在工矿企业中，有些单位，形式上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实际领导权并不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广大工人手里。同时，社会主义社会还实行商品制度，还存在着货币交换和三大差别，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法权。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各个领域中的资产阶

级思想还会长期存在，它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制造复辟资本主义舆论的主要手段。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毛主席指出：“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根本问题，仍然是政权问题，即资产阶级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无产阶级要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就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阶级斗争的焦点。毛主席强调指出：“无产阶级必须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中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必须建设一支宏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用马克思主义占领上层建筑领域的一切阵地。这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必须加倍警惕，及时识破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形式是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放手发动群众，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坚决夺回被走资派篡夺了的部分权力，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而且要多次的进行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夺取社会主义事业的新胜利。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任务，就是不断铲除滋生修正主义的土壤，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社会观念，像列宁所说的那样，“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列宁选集》第三卷 498 页）

决不能半途而废。这个任务是重大无比的，决不是一代两代人所能完成的。为此，就必须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保证无产阶级革命始终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继续前进，直至实现共产主义。

刘少奇、林彪以及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都是无产阶级的叛徒，都是复辟狂，因而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千方百计地加以歪曲和污蔑，这充分暴露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有力地证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深刻地教育我们，如果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问题，在思想上是糊涂的，在行动上就不可能是有力的，甚至是错误的。不把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它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同时，也是国际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大搏斗在我国的尖锐反映；是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伟大发展。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下进行的。一九六五年毛主席开始发动对大毒草《海瑞罢官》的批判，一九六六年亲自主持制定中共中央五月十六日的《通知》，八月亲自写信热烈支持红卫兵运动，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并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一纲领性文献。一九六七年，毛主席及时总结了上海一月革命风暴的经验，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的夺权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各个时期，毛主席发出了一系列的指示，正确地分析了这场大革命的性质、形势、任务，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

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反对修正主义，夺回被资产阶级篡夺了的那一部分权力，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实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保证我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大踏步地前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直接发动亿万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武器，进行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列宁说：“革命把旧地基掘得愈深，旧制度复辟就愈困难。”（《列宁全集》第十三卷 304 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为铲除滋长剥削制度的土壤而进行的深刻革命。马克思主义从来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更是如此。广泛深入地发动亿万群众进行反修防修斗争，是由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所决定的，因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绝大多数人对少数剥削者的专政。广大工农兵群众是将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主力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反对修正主义上台的一次大练兵，也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演习。有些人对发动亿万人民群众直接参加反修防修的路线斗争很不理解，这是因为他们的世界观是唯心主义的，不懂得和不承认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垮了刘少奇、林彪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粉碎了他们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阴谋，清除了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隐患，加强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革命大团结，进一步巩固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保证我国坚定地站在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一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教育了干部，锻炼了群众，使大家深刻地懂得路线的重要性，懂得了“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这个真理，这对继续开展反修防修斗争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改革了上层建筑中若干不适应于经济基础的部分，进一步解放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深入

批判了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加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促使社会主义新生事物蓬勃地向前发展，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批林批孔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只有把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毒根——腐朽、反动的孔孟之道一起批深批透，才能进一步搞好反修防修的伟大斗争。从叛徒、卖国贼林彪到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从地、富、反、坏、右倒蒋介石卖国集团，都恶毒地咒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诋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成果，就是因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粉碎了他们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迷梦，这充分说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和正确。

我们时刻都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还必然要进行多次。……不要以为有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太平无事了。千万注意，决不可丧失警惕。”

资产阶级法权

资产阶级法权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法律表现（即法定权利）。资产阶级所谓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过是以虚伪的词句来掩饰实际上的不平等。资产阶级法权的实质，就在于维护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和等级制度。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了资产阶级专政。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10页）拿我国来说，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在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有些方面实际上仍然被资产

阶级把持着，资产阶级还占着优势，有些正在改革，改革的成果也并不巩固，旧思想、旧习惯势力还顽强地阻碍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生长。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虽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分配原则的一次深刻革命，但是由于劳动者的体力有强弱，子女有多少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2 页）这种富裕程度的不同，就是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是不可避免的。苏修叛徒集团通过扩大资产阶级法权，在苏联实现了资本主义复辟，林彪反党集团用以煽动或挑拨各个阶级中某些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也正是利用资产阶级法权。毛主席指出：“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原理，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一方面要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规律，承认上述这种“不可避免的不平等”（《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 453 页），同时又必须限制它。要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防止在这方面已被取消的资产阶级法权复辟，并继续完成所有制改造方面尚未完成的那一部分任务；要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方面，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不断削弱产生资本主义的基础；要坚持上层建筑领域中的革命，深入批判修正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和一切旧思想，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

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本来是结合在一起的。它们的分离和对立，是从奴隶制形成过程中开始的。由于奴隶劳动的大量应用，社会剩余产品的显著增加，有些奴隶主便可以专门管理国家事务，或者从事政

治、科学和艺术活动。从此就产生了脱离劳动，鄙视劳动人民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形成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这种对立也就是阶级对立。它使劳动者终身从事体力劳动并不得受剥削者的统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家机构、科学文化和技术知识完全为资产阶级所垄断和控制。因此，科学与技术的进步，不但不能减轻工人的劳动，反而强化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和剥削，加深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

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都力图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巩固起来，胡说这种对立是天然合理和永世长存的。我国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代表孔丘，为了“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度，极力鼓吹“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丘的继承者孟轲也叫嚷“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林彪之流继承孔孟之道，大肆鼓吹“读书做官”，“智育第一”和“天才史观”，归根到底，是为了反对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使劳动人民永远做他们的牛马。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才能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证明了这个真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登上了政治舞台，成为国家的主人。由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胜利，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对立的经济基础已经被消灭。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改造之中，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正在茁壮成长。但是，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矛盾，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因此在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问题上，还存在着尖锐的斗争。同时，由于生产水平的限制和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重大差别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只有积极创造条件，才能逐步缩小和最后消灭这种差别。

毛主席关于“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以及一九六六年提出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五·七”指示，为逐步缩小和消灭

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指出了根本途径。实现这个任务是一场极为广泛和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各族人民广泛开展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运动，领导机构的老中青三结合、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教育革命、广大干部和工农兵学商坚持五七道路、赤脚医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农兵理论队伍、亿万人民共同研究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等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不断涌现，使劳动人民和知识分子的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为缩小我国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和差别

城乡对立是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和阶级的产生而形成的。从城市的出现，即开始存在着城乡之间的对立和差别。乡村养活着城市，城市统治着乡村。这种城乡对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最为尖锐和普遍。在旧中国，帝国主义国家通过侵略战争和不平等条约，把中国许多城市开为“商埠”，建立“租界”，实行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帝国主义和中国买办大资产阶级一起统治这些城市，残酷地剥削和掠夺中国广大乡村，造成城乡严重对立，使农业凋敝，农民日益贫困破产。他们把城市变成了剥削阶级冒险家的乐园，把乡村变成了劳动人民的地狱。正如毛主席所说：“经济上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那里资产阶级统治的城市残酷地掠夺乡村），在中国的国民党统治区域里面（那里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买办大资产阶级所统治的城市极野蛮地掠夺乡村），那是极其对抗的矛盾。”（《矛盾论》）

我国解放后，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经济，便消灭了城市对乡村的剥削和统治，消灭了城乡之间的对立。代替这种对立的，是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城乡关系。这里城市领导着乡村，乡村支持着城市，相互支援，相互促进，使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但是，由于城乡实行着两种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城市主要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乡村主要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因而在生产方式、经济收入和生活条件等方

面，还存在着重大差别。同时历史上城乡对立所造成的的后果，如城市人口的高度集中，乡村的分散，交通不便，以及工业的分布不合理等，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因此，我们既要承认这种差别的存在，又要逐步缩小和最后消灭这种差别。

毛主席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17 页）这是正确处理城乡关系，缩小城乡差别的根本方针。为了实现这一方针，解放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如积极发展地方工业，建立和发展中小城市，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农、林、牧、副、渔，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农业学大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医务人员到农村去等等）。这对加强社会主义城乡联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消灭城乡差别，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

工业和农业之间的对立和差别

工业和农业是两个最基本的物质生产部门，它们的状况如何，对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在原始社会，原始的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是原始公社能够独立存在和不断再生产的基本经济条件。在出现了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工农业的社会大分工以后，手工业逐渐集中于城市，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主要为统治阶级服务。但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广大农村中，农业和手工业仍然在小私有制的基础上紧密结合着，成为小农经济得以独立存在的条件。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工农业结合的自然状态被彻底破坏，工农业的分离和对立达到了顶点。列宁说：“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除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反而扩大了这种矛盾，使矛盾更加尖锐。”（《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 84 页）

马克思主义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灭工农业之间的对立。在旧中国，主要的轻工业和重工业为帝国主义列强所经营，它们直接利用中国的农产品原料和从广大农村雇佣廉价的劳动力。从中国的通商都市直至穷乡僻壤，造成了一个买办的和商业高利贷的剥削网，剥削广大的

中国农民和其他人民大众。同时又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工业品市场，使中国的农业生产服从于帝国主义的需要。这样就造成了旧中国工业和农业的对立。我国解放后，由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并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工业和农业建立在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因而消除了工农业的对立。

但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业之间仍然存在着重大差别。除了旧社会造成的生产技术条件和生活水平等方面的差别外，主要表现在：工业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农业中占主要地位的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制。这就决定了这两个生产部门中人们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也不相同。这种差别不是一下子就能消除的，我们的任务是积极创造条件，逐步缩小和最后消灭这种差别。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以社会主义农业为基础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正在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毛主席提出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路线和“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是实现工农业结合，逐步缩小直到消灭工农差别的根本保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加强工农联盟，加强国营经济对集体经济的领导，加强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加强政治思想教育，进一步搞好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群众运动，使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的发展。

帝国主义

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是寄生的、腐朽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也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基本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到了顶峰，开始向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垄断资本主义最后形成，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有五个基本经济特征：（一）在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的基础上产生的垄断组织，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这是帝国主义最根本的经济特征；（二）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溶合成“金融资本”，造成了金融寡头；（三）和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四）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五）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中指出：“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 808 页）

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追求垄断资本的高额利润是帝国主义的根本目的。为了这个目的，它对内加强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剥削，实行法西斯专政；对外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残酷地奴役、掠夺殖民地和附属国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列宁选集》第二卷 810 页）在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的支配下，为了重新瓜分世界，争夺世界霸权，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帝国主义已经彻底腐朽了，它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三大矛盾，即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帝国主义宗主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扩大和尖锐。这表明“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列宁选集》第二十一卷 324 页）“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已经开始了。”（《列宁全集》第二十七卷 120 页）

当前，我们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时代没有变，帝国主义的本性也没有变。世界上各种基本矛盾，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两个超级大国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都在进一步激化。一次比一次更严重的经济危机正在动摇着帝

国主义统治的基础。世界各国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毛主席指出：“可以肯定，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彻底崩溃，世界上一切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彻底翻身，已经为期不远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帝国主义既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又必然要转化成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我们必须在战略上藐视它，在战术上重视它。毛主席这个科学论断，是我们战胜帝国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当前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已经成为反对两霸的主力军。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我们对此必须有所准备。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但是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帝国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世界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

社会帝国主义

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1914—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第二国际的叛徒伯恩施坦、考茨基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之流，无耻地美化帝国主义，否认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公开为帝国主义的殖民战争和野蛮掠夺辩护。列宁愤怒地斥责他们是一伙社会帝国主义者，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即机会主义变成了帝国主义。**”（《列宁全集》第二十九卷 458 页）

苏修叛徒集团继承老修正主义者的衣钵，把社会主义的苏联蜕变为一个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他们篡夺了苏联党政大权，资产阶级特权阶层大大膨胀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在党、政、军和经济、文化领域占据了统治地位，并且从中形成了一个掌握全部国家机器和支配整个社会财富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即新型的大资产阶级。这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利用被他们所控制的国家政权，把社会主义所有制变为资本主义所有制，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残酷地剥削和掠夺苏联人民，

过着骄奢淫逸的腐朽生活，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新沙皇贵族。列宁指出：“保持和巩固自己小市民‘上层’或工人阶级贵族（和官僚）的特权地位”，“这就是现代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 219 页）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阶级基础。

在政治上，这个新型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苏联人民实行极其残暴的法西斯统治，奴役各民族人民，使政治、经济、民族矛盾日益深化。这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这就激起了苏联劳动人民越来越强烈的不满和反抗。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对外进行侵略扩张，与美帝国主义又勾结又斗争，妄图称霸世界。社会帝国主义和一切帝国主义一样具有侵略性和冒险性，但它的欺骗性和危险性更大。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以“国际主义”为名，剥削、奴役和控制各个所谓“兄弟国家”，并在那里驻扎重兵，用刺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以“援助”为名，对亚、非、拉国家实行殖民主义政策，帮助各国反动派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它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陈兵中国边境，出兵蒙古，支持朗诺集团卖国，镇压波兰工人造反，干涉埃及，肢解巴基斯坦，在许多亚、非国家进行颠覆活动。它口头上声称“缓和”、“裁军”、“限制战略武器”，实际上和美国进行更大、更激烈的争夺，展开空前激烈的军备竞赛，进行军事冒险。这一系列事实，充分暴露了它“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是意大利语的音译。法西斯主义的创始人是墨索里尼。这是一种最反动的资产阶级专政形式和思想体系。法西斯制度首先于 1922 年出现于意大利，随后在德、日、西班牙等国相继出现，蒋介石王朝和苏修叛徒集团的反动统治，也都是法西斯专政。

法西斯主义的主要特征是：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的外衣，公开

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用暴力摧残一切进步群众组织，残酷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和一切进步运动，叫嚣“优等种族”有权统治“劣等种族”，发动侵略战争。法西斯主义就是资产阶级向劳动群众施行的最残酷的进攻，就是横行无忌的民族侵略主义和强盗的战争，就是疯狂地反对革命。法西斯主义者是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死敌。

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矛盾空前激化的产物。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出现并不是表明资产阶级的强大，而恰恰证明了它的虚弱和走向灭亡。斯大林说：“法西斯主义在好战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中间现在成了最时髦的商品”，但“应当把它看做资产阶级软弱的表现。”（《斯大林全集》第十三卷 260 页）毛主席也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实际上是“敌人快要消灭。”（《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40 页）曾经不可一世的德、意、日法西斯专政，最终还是被全世界人民打倒。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彻底背叛了马列主义的苏修叛徒集团，步老法西斯主义者的后尘，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法西斯专政，奴役各族人民，残酷地镇压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一切反对他们的人，对外推行“有限主权论”等法西斯强权政治，直至公开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凡此一切，充分证明了他们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法西斯主义。

现代军国主义

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鼓吹并推行侵略战争政策的帝国主义，就是军国主义。它是帝国主义各种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产物和集中表现。列宁在分析现代军国主义的对内对外两种形式时指出：“一种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发生外部冲突时所使用的的军事力量……，一种是统治阶级用来镇压无产阶级各种（经济的和政治的）运动的武器。”（《列宁全集》第十五卷 166 页）

在军国主义统治下的国家，必然要拼命发展军需工业，无限制地增

加军事预算，不断加强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剥削，并实行野蛮的军事独裁政治，疯狂地鼓吹和发动侵略战争等。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几个帝国主义国家推行军国主义政策的结果，它给世界人民造成极大的灾难。

美帝、苏修两个超级大国，是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军国主义国家。美帝自侵朝战争失败后开始走下坡路，不得不承认自己日益衰落；在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打击下和全世界人民的反对下，它不得不从越南撤退。但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加紧国民经济军事化，推行希特勒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政策和核讹诈政策，疯狂地向全世界扩张侵略。它公然侵犯我国的领土珍宝岛，并采取颠倒事实真相的拙劣手段，煽动苏联人民“不要吝惜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祖国”，大搞所谓“军事爱国主义教育”。它还狂妄地吹嘘自己在“全球对抗的整个战线上”处于“历史性的攻势”，等等。毛主席指出：“一切反动势力在他们行将灭亡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垂死挣扎的。他们必然要采取军事冒险和政治欺骗的种种手段，来挽救自己的灭亡。”正像当年希特勒和东条英机曾经猖獗一时一样，他们的猖獗正是为自己的灭亡准备条件。

霸权主义

几个帝国主义（包括社会帝国主义）强国瓜分世界、主宰世界的反动思想和政策。列宁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 26 页）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以富压穷，从实力地位出发，骑在别国人民头上称王称霸，这是帝国主义的本性。由于帝国主义时代，一切矛盾都极端尖锐化，一些国家后来居上，超过另一些国家，把另一些国家从世界市场上排挤出去，这一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必然导致几个帝国主义强国争夺世界霸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是英、法、德、日等帝国主义争霸世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日、意法西斯主义被打败了，英、法两国也衰落下去，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成为当前世界的两霸。但是，它们一个把手伸得太长，顾此失彼，进退维谷；另一个的处境更加不妙，野

心很大，力量不足，困难很多。它们都已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继承老沙皇的衣钵，怀着比老沙皇更加狂妄的野心，同美帝争霸，妄图建立一个社会帝国主义的世界霸权。它高唱“和平”、“安全”和“裁军”，实际上是加紧扩军备战，变本加厉地推行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它标榜“国际主义”，鼓吹“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实际上是把它的小伙伴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它叫嚷“援助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在亚、非、拉各国搞新殖民主义，从政治、经济、军事上控制这些国家；它宣扬“支持各国人民革命”，实际上是玩弄反革命两手，勾结世界上一切最反动的势力，出卖各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正如马克思揭露老沙皇的反动本质时所指出的：“这一帮人有多大本领就能干出多大的伤天害理的事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17页）为了推行霸权主义，苏修抛出“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国际分工论”，“利益有关论”等无耻谰言，妄图使人相信别人的主权是有限的，它的主权是无限的，别人的利益必须服从它的利益，最后一切都得统一到它的大帝国里去。这充分暴露出新沙皇“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霸权主义者是决不会有好结局的。西班牙帝国称霸不到一世纪，在拉丁美洲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和国内人民革命烈火中倒了下去；号称“海上霸王”的大英帝国，十九世纪曾霸占了比本国领土大一百多倍的殖民地，现在已经大大衰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神气十足的美帝国主义，在侵朝战争、侵越战争中接连失败，正在一步步地走向没落，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当前，资本主义世界面临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而且越来越激烈。马克思指出：“奴役其他民族的民族是在为自身锻造镣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312页）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矛盾着的对立面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超级大国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国家之间的侵略和反侵略、称霸和反霸的斗争，必定要引起

双方各自朝着相反的方向转化。霸权主义者的逻辑，就是不断侵略扩张和自取灭亡的逻辑。毛主席说：“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40 页）不管美苏两霸如何猖獗，它们既阻挡不了历史前进的潮流，也挽救不了自身的灭亡。

沙文主义

一种反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因法国士兵沙文狂热地拥护拿破仑一世的侵略扩张政策而得名。

资产阶级常常利用“保卫祖国”、“民族利益”等口号，推行侵略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反动政策。民族压迫政策是资产阶级在本民族内实行阶级压迫政策的继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一种虚假的装饰，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 427 页）这就是沙文主义的反动本质。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平时偷偷地在工人阶级内部做着资产阶级的的工作，危机时期，立即公开与资产阶级结成同盟，支持本国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为了掩盖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本质，他们号召无产阶级“保卫祖国”。列宁指出：“社会沙文主义者实行的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政策。”（《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 286 页）资本家用超额利润中的一小部分收买工人中上层分子，是产生社会沙文主义经济的根源。

苏修叛徒集团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对内推行大俄罗斯主义，对非俄罗斯民族政治上严格控制、经济上残酷掠夺、文化上强行摧残，把苏联重新变成“各族人民的监狱”（《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 392 页）；对外在“国际主义”的幌子下，对东欧各国实行超经济的剥削，把它们变成自己的附属国与殖民地，又在“援助”的幌子下，对亚、非、拉地区国家进行渗透和掠夺，把它们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地地道道的社会沙文主义。

种族主义

种族主义把人类不同种族的差别视为种族不平等的根源，并认为这种不平等是天然合理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反动阶级的统治地位。

种族主义把人类分成“高等种族”和“低等种族”，认为“高等种族”有创造文化和物质财富的能力，注定要做“低等种族”的统治者；“低等种族”没有任何创造能力，生来就应该做“高等种族”的奴隶，并胡说这是“永恒不变的规律”。

种族主义者宣扬血统“纯洁”，则意志统一，社会安定；血统“混杂”，则思想混杂，社会动乱，甚至造成现存社会制度崩溃。他们主张用禁止异族通婚的办法防止这种危害，有的主张“改良人种”，即淘汰“劣种”，繁殖“优种”，名曰“优生学”。目的都是为了保证所谓“高等种族”的统治地位。现代种族主义的鼻祖是法国反动社会学家戈比诺（1816—1882年），他在《论人类各种族的不平等》一书中，得出“高等种族”必定战胜“低等种族”的荒谬结论。后来种族主义和马尔萨斯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反动学说结合起来，成为帝国主义压迫、奴役其他民族的反动思想工具。德国的反动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尼采，从种族主义出发，把人类分为“强者”和“弱者”，称前者是有统治本能的“老爷种族”，后者是只有服从本能的“奴隶种族”。他的这一反动主张大受法西斯恶棍们的喝彩和赏识。现今，美国的一千九百多万黑人，仍处于被奴役、被压迫和被歧视的地位，南非白种人种族主义者统治的政府，正在奉行一种极端反动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政策，迫害当地的有色种族，而苏修叛徒集团却公开主张“改良人种”，鼓吹臭名昭著的“优生学”，这表明他们已堕落到了何等地步！

毛主席在一九六八年《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中指出：“美国的种族歧视，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美国广大黑人同美国统治集团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只有推翻美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摧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制度，美国黑人才能够取得彻底解放。”这一论述不仅深刻揭露出美国种族歧视政策的根源和性质，为美国黑人的斗争指明了方向；同时也对全世界人民的反种族主义斗

争给以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世界主义

一种资产阶级妄图统治世界的反动理论。它主张消除“民族界限”、“国家界限”和“建立世界政府”。

世界主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最早产生于欧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54 页）原有的民族、国家界限成了资产阶级奔走全球、扩大市场、争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障碍。因而资产阶级的御用哲学家们提出了世界主义的主张，鼓吹世界是“每个人的祖国”，取消“狭隘的民族观念”，抛弃“多余的爱国主义”，建立一个“欧洲合众国”或“世界政府”。其目的是要世界各国人民漠视本民族利益和国家主权，忍受资产阶级强国的压榨和奴役。

在帝国主义时代，世界主义为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提供理论依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极力宣扬国家主权是“过时的概念”，“各民族的民族主义的趋向”是一种“严重的危险”，应该制定一个“世界宪法”，建立“世界联邦”、“世界政府”等“世界的权力机构”，要有“世界的计划”、“世界的文化”等等。他们制造这套理论，无非是为了压制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革命斗争，以实现他们称霸全世界的野心。苏修叛徒集团鼓吹的“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完全是世界主义的翻版，这充分暴露出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

战争与和平

在阶级社会中，敌对的阶级或国家，为实现一定的政治目的所采取的两种斗争手段。战争是和平时期政治的继续，和平是战争时期政

治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47 页）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爆发战争。毛主席指出：“**战争是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阶级和阶级、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互相斗争的最高形式。**”（《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66 页）几千年来，人类生活中充满了战争，到了帝国主义时代，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

历史上所有的战争依其政治性质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正义战争，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战争；一类是非正义战争，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战争。马克思主义不是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只是反对一切非正义战争。对于正义战争不仅不反对，而且要积极支持或参加。只有依靠各国人民的团结和斗争（包括武装斗争）去战胜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才能取得世界和平。只要阶级还存在，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还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消灭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58 页）

苏修叛徒集团叫嚣核武器出现以后，战争不再是政治的继续，不再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了。因为“原子弹不遵循阶级原则”，“将毁灭一切生物”，大肆制造核恐怖。但是，事实表明，核武器的出现，既不能取消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也不能改变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原理。一切不愿做奴隶的人民从来不怕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恐吓，也不相信他们的“和平”谎言。要全世界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俯首帖耳地屈服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这只能是痴心妄想。

列宁多次指出，帝国主义就是侵略，就是战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压迫者、剥削者和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当前，世界各种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一方面是世界人民的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越来越激烈，它们的激烈

争夺，总有一天要导致世界大战。各国人民对此必须有所准备。目前，革命和战争的因素都在增长，不论是战争引起革命，还是革命制止战争，国际形势总是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必须认真贯彻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

战争与和平是对立的统一，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和平可以转化为战争，历史的事实早已证明这一辩证规律。修正主义者对辩证法一窍不通，他们拼命反对这个道理，他们的历史知识等于零。

唯武器论

一种认为武器优劣决定战争胜败的资产阶级理论。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特别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大肆喧嚷核战争将毁灭全人类，竭力制造核恐怖，推行核讹诈政策，这是典型的“唯武器论”。

马克思主义认为，武器是战争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武器与人相比，人总是第一位的，武器是第二位的，任何武器都要靠人去掌握和运用。核武器虽然是一种进行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不是核武器。毛主席说：“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031 页）一切战争都是政治的继续，核武器的发明和发展，没有也不能改变这条真理。事实证明，核武器的出现既没有取消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也没有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更没有取消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相反地，愈来愈多的中小国家日益联合起来，敢于和两个拥有大量核武器的超级大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两个超级大国却内外交困，日子愈来愈不好过，处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归根到底，决定世界命运的是亿万人民，而不是用一两件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反动派。正如毛主席指出的那样：“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091 页）

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它高估武器的作用，轻视人的作用，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实际上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37 页）战争的胜负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正义战争一定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非正义战争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对。无数事实证明，劣势装备的正义战争总是要战胜优势装备的非正义战争的。我国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朝鲜人民、印度支那三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都是如此。当然，为了抗击两个超级大国的侵略，一切被压迫被侵略的中小国家必须努力使自己的国防现代化。为了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反击他们的核讹诈政策，我国必须制造和发展核武器。中国政府一再声明，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这充分表明我国拥有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

和平主义

也叫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面临着革命危机的现代资产阶级，不得不改变策略，装出一副“爱好和平”的样子，用“民主的和平”、“裁减军备”的高调来愚弄和欺骗群众。这就是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战争是帝国主义和平时期政策的继续，帝国主义和平是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政策的继续。资产阶级“和平主义”却把和平与战争都说成是抽象的、超阶级的东西，用和平的词句掩盖帝国主义准备新战争的实质。“和平主义”否认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不分正义战争与非正义战争，都一律反对，实际上正是为了反对正义的革命战争。

马克思主义者决不无条件地反对一切战争。如果是无产阶级为了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而进行的革命战争，或为了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的反侵略战争，这是神圣的、正义的战争。无产阶级不仅不反对，而且要积极参加或坚决支持。如果是剥削阶级为了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

而镇压本国人民或对外发动侵略别国人民的战争，那是罪恶的、非正义的战争。无产阶级必须坚决反对。总之，争取和平必须同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以及无产阶级革命联合起来，否则，就是空话，就是帮助资产阶级欺骗群众。列宁曾痛斥叛徒考茨基之流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摹仿者或应声虫。”（《列宁全集》第二十三卷194页）苏修叛徒集团比老机会主义者走得更远，他们竟无耻地叫嚷“和平”和“共产主义是同义词”，“最坏的和平也比最好的战争好”，同时却大搞军备竞赛，把侵略的黑手伸得长长的。斯大林说：“许多人认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和平的工具。这是根本不对的。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准备战争的工具，是用虚伪的和平词句来掩盖备战的工具。”（《斯大林全集》第十一卷174页）这正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实质。

只要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就存在着战争危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缓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天天讲“缓和”，实际上天天在搞紧张。他们所说的“缓和”，完全是骗人的鬼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有的资产阶级人士站在和平主义立场，反对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虽然其立场是错误的，但对其反对侵略战争的主张，应予支持。

修正主义

国际工人运动中一种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产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伯恩斯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2页）从此，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两种思想派别的尖锐斗争。

毛主席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切修正主义者都借口马克思主义的这个或那个原理已经“过

时”，用资产阶级可以承认和接受的东西来全面篡改马克思主义，阉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革命精神。“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修正主义以追求眼前的个人利益，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去迎合资产阶级的需要。伯恩斯坦提出的“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这个反动纲领，最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正如列宁所说的：“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列宁选集》第二卷7页）

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因而必然成为修正主义者攻击的首要目标。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斗争的焦点，也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论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这些老修正主义者，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刘少奇、林彪之流的现代修正主义者，他们都站在地主资产阶级立场，恶毒咒骂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倒退”、“独裁统治”、“最暴虐的形式”等等。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前，他们千方百计反对暴力革命，反对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他们就用一切阴谋手段来反对和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修正主义的产生不是偶然的，它的阶级根源是国内有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影响，国际上有帝国主义的存在和胁迫。它的认识论根源是主观和客观相割裂，理论和实践相脱离。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由于修正主义的阶级根源依然存在，因此掌握了国家政权的工人阶级政党内部出现修正主义，也不是偶然的。只要阶级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帝国主义没有被消灭，无论国际国内，修正主义思潮必然要继续兴风作浪，牛鬼蛇神必然要继续捣乱。因此，无产阶级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要警惕出修正主义，特别是要警

惕在中央出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我们现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斗争历史和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运动的伟大胜利证明，一切修正主义都是纸老虎，必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战胜。

现代修正主义

现代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

现代修正主义者口头上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招牌，打着攻击“教条主义”的幌子，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用主观唯心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地主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和人道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他们根本否认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是阶级斗争史，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根本否认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和对资产阶级的专政。他们打着“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幌子，鼓吹帝国主义的本性已经改变，美化帝国主义。他们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否认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主张复辟资本主义，开历史的倒车。

现代修正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产生。苏修叛徒集团篡夺了苏联的党政大权以后，形成了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们否认十月革命的道路，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无产阶级的刀子。他们提出了一个臭名远扬的“三和”（“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两全”（“全民国家”、“全民党”）的修正主义黑纲领，其要害就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们按照这个黑纲领，把社会主义的苏联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苏修头子勃列日涅夫为了进一步推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发展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炮制出一套什么“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社会主义大家庭论”、“国际分工论”和“利益有关论”等谬论，这个所谓“勃列日涅夫主义”是

地地道道的法西斯主义。

列宁深刻地指出：“机会主义不是偶然的現象，不是个别人物的罪孽、过错和叛变，而是整个历史时代的社会产物。”（《列宁选集》第二卷 654 页）现代修正主义是以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老修正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翻版，是适应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垂死挣扎的需要的产物。它不是个别国家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性的资产阶级思潮。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壓力，则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国外根源。对内维护或复辟资本主义，对外追随或投降帝国主义，是现代修正主义的共同特征。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是这样，刘少奇、林彪也是这样，他们都是新资产阶级的代表。

毛主席说：“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但“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原则，也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一条基本经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亿万人民群众反修防修的伟大实践，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一次大演习，反对修正主义上台的一次大练兵。批林批孔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胜利表明，修正主义是可以被战胜的，正像毛主席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真理，是不可抗拒的。人民群众总是要革命的。世界革命总是要胜利的。”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只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修修补补，反对无产阶级从资产阶级手中夺取政权，反对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十九世纪中叶，改良主义在资本主义发达的英法两国开始流行。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国际工人运动的高涨，改良主义成为资产阶级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工具。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就是工人运动内部的改良主义。

改良主义者力图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鼓吹阶级合作，把议会斗争作为主要的或唯一的斗争形式。他们反对暴力革命，污蔑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是“革命的空话”。他们一面虚伪地承认变一切生产资料为公共财产的要求是正确的，同时却又认为这只有在遥远的、实际上是不能确定的将来才有可能。老机会主义头子伯恩斯坦鼓吹“运动就是一切，最终的目的算不了什么”的谬论，充分表现出改良主义的反动本质。改良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当前的任务只是进行单纯的社会修补工作，搞一点一滴的改良，而不要触及反动制度的根本，甚至胡说改良就是局部实现了社会主义。列宁痛斥说：“改良主义者自以为是大政治家、政府要人、治国之才”（《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305 页），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看护妇”。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机会主义头子，以放弃人民武装为条件，当上了反动政府的部长、副总理，幻想用改良的办法过渡到“社会主义”，结果很快就遭到惨败。这就有力地证明列宁所说的“改良主义者的策略最不能保证实施改良和实现改良”（《列宁全集》第十一卷 58 页）这一真理。全部国际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表明，只有革命的阶级斗争，才能迫使统治阶级实行某些改良。历史的真正动力是阶级之间的革命斗争，改良只是这种斗争的副产品。资产阶级总是一手实行改良，一手又收回这些改良，使之化为乌有。总之，“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欺骗，因为只要资本的统治还存在，尽管实行个别改良，工人总还是雇佣奴隶。”（《列宁全集》第十九卷 372 页）改良主义正是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马克思主义虽然不是无条件地拒绝任何改良，但始终坚持改良必须服从革命这个原则。

改良主义是资产阶级削弱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志的腐蚀剂，对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危害极大。因此，和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作斗争，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一项重要任务。

和平过渡

“和平过渡”、“‘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议会道路”，这些不同的名词实质上都是一个意思，即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

级只要利用选举，取得议会里的多数，就能合法地取得国家政权，进到社会主义。“和平过渡”是第二国际机会主义头子伯恩斯坦首先提出的。后来的一切修正主义者都鼓吹这个谬论。

列宁指出，资产阶级议会是专门用来愚弄老百姓的清谈馆，实际权力掌握在各部、官厅和司令部那里。议会制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无论是政府人员、机构、政党的任何更换，就是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执行镇压人民的任务。苏修叛徒集团重弹“和平过渡”的老调，他们说，马克思不是“设想过英国和英国有和平过渡的可能性吗”？诚然，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马克思曾这样设想过，但他当时即指出，一旦当资产阶级“认为是生命攸关的重大问题上处于少数时，我们就会在这里遇到新的奴隶主的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 686 页）列宁强调说：“借口马克思在 70 年代曾经认为英国和美国可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诡辩，通俗一点说，这是用引证来骗人。”（《列宁全集》第二十八卷 91 页）苏修叛徒集团还狡辩地说，列宁不是也在“原则上允许和平革命的可能”吗？不错，在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后的一段时间里，列宁曾像马克思那样地设想过俄国的革命，但他明确地说：“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没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问题的实质。”（《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 173 页）到了七月间，他即指出：“俄国革命和平发展的一切希望都彻底破灭了。”（《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 167 页）苏修叛徒集团企图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中寻找“和平过渡”谬论的根据，只能是痴心妄想。

历史事实表明，只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没有被摧毁，一般说来，无产阶级要想取得议会中的多数是不可能的。资产阶级会随时修改选举法，使无产阶级争取不到议会里的多数。即使无产阶级取得了议会中的多数，也不等于摧毁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无产阶级的国家机器。资产阶级仍然可以宣布选举无效，解散议会，以至宣布共产党非法。列宁严正地指出：“凡是以为可以用和平方式使资本家服从大多数被剥削者意志，可以通过和平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设想，都不仅是极端的市侩的愚蠢行为，而且是对工人的公然的

欺骗，对资本主义的雇佣奴隶制的粉饰，对真理的隐瞒。”（《列宁选集》第四卷 294 页）

和平共处

是列宁制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待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关系的一项外交政策。和平共处是有原则的。我们主张一切大小国家，不管社会制度如何，必须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这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正常的国家关系。

和平共处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一个方面，不是其全部内容。社会主义各国之间的关系准则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对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国家，同样要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不能仅仅是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提出来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一再向全世界宣布和平的外交政策，帝国主义却一心要把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它们联合向苏联发动武装进攻。经过残酷的战争，帝国主义消灭不了苏联，才不得不讲“和平共处”。正如列宁所说：“你打痛了敌人，他就会来讲和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卷 124 页）帝国主义总是要利用一切可能，抓住一切机会来反对直至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从根本上来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不是为苏维埃共和国唱挽歌，就是为世界资本主义唱挽歌。”（《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 416 页）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胡说什么“和平共处”是“整个当代社会生活的基本法则”，是共产党人“政策的总原则”，是“在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整个时期的战略路线”等等。按照这种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和被压迫国家，无产阶级和一切革命人民，都必须放弃一切斗争，无条件地实行所谓“和平共处”，这是对列宁制定的和平共处政策的无耻歪曲。

苏修叛徒集团利用“和平共处”作幌子，疯狂地推行侵略政策和

战争政策，与美帝国主义正在重新瓜分世界，充分暴露出社会帝国主义的豺狼本性。他们和美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遍及世界各个角落，而且越来越激烈。“和平共处”只是外衣，激烈争夺才是实质。

和平竞赛

也叫经济竞赛。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种修正主义谬论。按照这种理论，只要苏修这个超级大国在生产上和生活上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就会自行灭亡，“社会主义”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根本用不着进行斗争，用不着起来革命，用不着去推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只要安安静静地等着，就可以同压迫者、剥削者一起进入共产主义。这实际上是要被压迫民族和国家永远忍受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掠夺和奴役，这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强盗的理论。

苏修叛徒集团利用“经济竞赛”的幌子，干着各种社会帝国主义的勾当。他们和美帝国主义又勾结又争夺，互挖墙脚，妄图重新瓜分世界。他们宣扬什么社会主义各国的“国际分工”、“全面合作”，是夺取两个体系经济竞赛胜利的保证。他们通过“经互会”使东欧一些国家和蒙古变成它的销售市场、附属加工厂、果菜园和畜牧场，实行超经济的剥削。他们说什么对发展中国家提供“援助”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经济竞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际上是借此对亚、非、拉国家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推行新殖民主义。日益觉醒的第三世界各国的人民，愈来愈清楚地看透了苏修推行“和平竞赛”的反动实质。他们说，苏联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而是“资本主义的老大哥”。“经济竞赛”这面破旗，是骗不了人的。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苏联党政大权之后，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把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变为新型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把集体农庄经济变为富农经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从而造成工业生产产期停滞不前，农业连年减产，生活用品奇缺，只好向资本主义国家乞债过日子。它所谓生产上和生活上超过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完全是自欺欺人

的谎话。

和平演变

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被国内外的阶级敌人用非暴力的手段复辟资本主义，成为“和平演变”。

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和平演变”，主要是由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对国内外阶级敌人丧失警惕和路线不正确，而导致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所造成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和平演变”就是这样。在斯大林逝世以后，隐藏在党内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修正主义集团，采取阴谋手段篡夺苏联党政大权。他们打着“反对个人迷信”的幌子，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打着“全民党”的幌子，把无产阶级政党变为资产阶级政党；打着“全民国家”的幌子，把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的政策，把社会主义经济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他们引进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打击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败坏社会主义道德风气。这样就暂时实现了资本主义在苏联的全面复辟。

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国内外阶级敌人都懂得，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们的名声已经很臭。因此，一定要煞费苦心地对干部和群众进行思想腐蚀，用拉出去、打进来的手法，在党和国家机关内物色和安置他们的代理人，进行篡党夺权，使无产阶级专政“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但绝不能说，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是不可避免的。根据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特别是苏联“和平演变”的教训，毛主席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理论。他强调指出：“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他还一再教导全党要“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作了深刻的阐述，

进一步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指明了道路。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认真学习，坚决执行。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反“和平演变”的伟大胜利。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正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只要我们坚持这条路线，对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斗争，就一定能够防止“和平演变”。毛主席说：“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全民国家

现代修正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一种谬论，也是资产阶级国家学说的一个变种。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国家是阶级专政的工具，它具有强烈的阶级性。“国家的特征就是存在着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的特殊阶段。”（《列宁全集》第一卷 397 页）“国家将一直生存到胜利的社会主义转变为完全的共产主义的时候。”（《列宁全集》第二十二卷 317 页）因此，任何国家都是一定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要国家还存在，就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当然，无产阶级专政在这个国家和哪个国家，在这个阶段和那个阶段，会采取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绝不能是什么“全民国家”。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就是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学说。

苏修叛徒集团宣扬的“全民国家”，是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对苏联广大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实行专政的国家。勃列日涅夫接替赫鲁晓夫上台后，叫嚷什么“全民国家继续无产阶级专政的事业”，这只能是欲盖弥彰，丝毫也改变不了问题的实质。

苏修叛徒集团还胡说什么只有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才能使民主进一步发展成为“真正的全民民主”。这不过是老

机会主义者考茨基的“纯粹民主”论的翻版。民主和专政一样，都是具有强烈阶级性的。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民主，没有什么“全民民主”。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兴无产阶级民主，一个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苏修叛徒集团所谓的“真正的全民民主”，正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即苏联新型官僚资产阶级对广大苏联人民的专政。

用“全民国家”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动路线，充分暴露出苏修叛徒集团的反革命本质，即他们取消无产阶级专政，代之以法西斯专政，同时又利用篡夺到的国家政权，对苏联广大劳动人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实行反革命专政。

全民党

现代修正主义抹杀政党阶级性的一种谬论。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公开宣布：“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变成了全体人民的党”。这就是鼓吹“全民党”的典型语言。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政党和国家一样，都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任何政党都具有阶级性，代表一定的阶级利益，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全民党”。无产阶级政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是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是无产阶级思想和意志的集中者，党性是阶级性的集中表现。同时，无产阶级政党也是唯一能够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这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另一方面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正确的领导。列宁在批判孟什维克机会主义时曾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绝对必须是一个单独存在的、阶级性十分严格的独立政党。**”（《列宁全集》第九卷 70 页）苏修叛徒集团却借口共产党代表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来否定它的无产阶级性质，鼓吹“全民党”，这是对列宁主义的彻底背叛。

由于苏修叛徒集团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苏联的现实不是什么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是资本主义已经复辟。苏修叛徒集团对苏联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过着寄生糜烂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们和广大苏联人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根本谈不上什么“一致”。他们所谓的“全民党”实际上只代表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一切活动都以这个阶级的私利为转移，它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政党、法西斯党。

党变修，国变色。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苏联就由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国家，同时也就由社会主义变为社会帝国主义。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教训。毛主席说：“苏联共产党是列宁创造的党。虽然，苏联的党和国家的领导现在被修正主义者篡夺了，但是，我劝同志们坚决相信，苏联广大的人民、广大的党员和干部，是好的，是要革命的，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阶级斗争熄灭论

一种否认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修正主义谬论。在苏联农业集体化和消灭富农经济的过程中，机会主义头子布哈林首先提出这种谬论。他胡说随着社会主义的胜利，阶级敌人将会不经过抵抗而让出自己的一切阵地，阶级斗争很快就会完全“熄灭”。苏修叛徒建团干脆说：“苏联没有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了。在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宣扬“阶级基本消灭”了。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则鼓吹，通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阶级敌人被“一网打尽了”，等等。他们唱的都是同一个调子。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的一个很长历史时期中，仍然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阶级斗争的形式则有了新的变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但还没有被消灭。被推翻的剥削阶级，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

堂”。由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由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除了在小生产者中会产生资本主义之外，在一部分党员中，在一部分工人中，在一部分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中，还可能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而国际上帝国主义的进攻和破坏，则是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列宁一针见血地指出：“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列宁选集》第三卷 200 页）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践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都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因此，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教育各个领域中的阶级斗争，是不可能熄灭的。这个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曲折的。它象波浪起伏一样，高一阵，低一阵，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他们为自己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出来不可。”消灭阶级必须经过长期的、艰难的、曲折的阶级斗争，不是一代人两代人所能解决的。我们必须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彻底批判和粉碎“阶级斗争熄灭论”。

人性论

剥削阶级的一种反动谬论，它否认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主张人具有天生的固定不变的共同本性。

人性论是维护剥削制度的反动思想工具。一切剥削阶级总是把他们的贪婪、残暴、享乐等吃人本性，说成是“人类共同的本性”，目的是要论证“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奴隶主阶级代表孟轲鼓吹“善”是人类先天具有的本性，他所谓的“善”就是维护奴隶制的道德观念“仁、义、礼、智”，谁违反这种道德观念，就是违反了“人类

的本性”。总之，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宣扬所谓“自爱”、“自保”是人类的本性，这是把资产阶级的唯利是图的本性说成是“普遍人性”，借以证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永恒不变的。现代修正主义者宣称他们追求“幸福生活”，是合乎人的本性的，这充分证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主张阶级论，批判人性论。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8 页）在阶级社会中，社会关系就是阶级关系，人的本质就是阶级本质。任何人都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毛主席说：“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我们主张无产阶级的人性，人民大众的人性，而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则主张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人性，不过他们口头上不这样说，却说成为唯一的人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27 页）这是对人性论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性问题的科学阐述。

从人性论出发，必然要反对阶级分析方法，抹杀阶级矛盾，否认阶级斗争，宣扬阶级合作，并直接引出机会主义路线。孔孟的忠实信徒刘少奇和林彪，是人性论的狂热拥护者和鼓吹者。他们吹捧反动儒家的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所谓“仁义道德”，是“人的关系”的最高原则，根本抹杀人的阶级性和阶级对立。这显然是为推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制造反革命舆论。

人道主义

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体系。十五世纪中叶至十六世纪，欧洲资本主义形成时期，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压迫和宗教统治，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束缚。他们蔑视“天国”，歌颂“世俗”，要求把人的思想，感情，智慧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一思潮开始从意大利兴起，后来遍及欧洲。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佩脱拉克、彭波那齐，西班牙的斐微斯，法国的蒙台涅

等。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发表的《人权宣言》，进一步把人道主义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的政治口号。

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人道主义反对教会的反动统治，批判神学和僧侣主义的世界观，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是，它始终是和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它的核心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所谓“人”无非是资产阶级自己，所谓“人性”无非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所谓“世俗”无非就是资本主义社会。恩格斯早就指出：“‘正义’、‘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它只能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 325 页）只要资产阶级认为需要时，就会用“步兵、骑兵、炮兵”代替“自由、平等、博爱”。1848 年法国的资产阶级正是这样对付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的。其实，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资产阶级剥削、压迫无产阶级的自由，没有无产阶级不受剥削和压迫的自由，在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人道、自由、平等、博爱”。人道主义无非是资产阶级用来欺骗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甜言蜜语而已。

形形色色的假社会主义者，妄图用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来冒充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的“真正社会主义”者公开宣扬“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苏修叛徒集团鼓吹“共产主义是人道主义的最高体现”。为了反共反华的需要，他们甚至把两千多年前的孔孟之道说成是人道主义的老祖宗，胡说什么孔孟的“仁政”“为人道主义传统奠定了基础”。叛徒刘少奇、林彪之流，把儒家的“仁义”、“忠恕”等破烂货和西方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糅合在一起，鼓吹“仁爱之心”、“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胡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极高的人类美德”，这充分暴露出他们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嘴脸。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向工人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77 页）

“左”倾机会主义

工人运动和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一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思潮。

“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0 页）他们“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271——272 页），凭着“想当然”去盲干。他们荒谬地认为革命力量要纯粹而又纯粹，除了本阶级以外，其他一切力量都是反革命。他们拒绝利用敌人阵营里的矛盾，为自己寻找可能的同盟者，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而主张“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使无产阶级陷于孤立的地位。

我国民主革命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使革命遭到很大的损失。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却认为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盲目地命令少数党员和群众，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使革命力量继续遭到损失。一九三〇年爆发蒋、冯、阎之间的军阀战争，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不懂得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就盲目地认为已具备了全国武装起义的条件，下令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结果，使中国革命力量又

一次遭到巨大的损失。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件爆发，推动了全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加上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就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只剩下“偏师了”，命令红军“全线出击”，夺取中心城市，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们还强迫白区党组织普遍武装工农，组织总罢工等冒险行动。同时，不顾民族矛盾上升的客观形势，硬说中间派是中国革命最危险的敌人，主张“打到一切”。结果，使白区工作几乎全部损失，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被迫退出江西根据地，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使辛苦地聚集起来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左右。”（《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02 页）

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对“左”倾机会主义者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终于在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上结束了他们的统治，确立了以毛主席为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从此，扭转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党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并正确领导了抗日救亡运动和正确解决了西安事变，组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左”倾机会主义者总是左右摇摆，好走极端，华而不实，投机取巧。往往从“冒险主义”走向“投降主义”。叛徒、汉奸王明自称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但历史却无情地宣判了他是百分之百的机会主义者和反革命。列宁指出，“左”倾机会主义者自称为“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其实他们特别缺乏无产阶级的气味，而特别富有小资产阶级的气味。**”（《列宁选集》第三卷 533 页）

右倾机会主义

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571 页），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即修正主义。

右倾机会主义的本质就是出卖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根本利益，向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屈膝投降。列宁指出：“**机会主义就是为了党的短暂的、一时的、次要的利益而牺牲党的长远的根本的利益。**”（《列宁全集》第十一卷 222 页）右倾机会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或无产阶级政党中的代理人 and 走狗，他们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用阶级合作来代替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专政。伯恩施坦、考茨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陈独秀、王明、刘少奇、林彪等，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头子。

右倾机会主义总是过高估计阶级敌人的力量，低估人民群众的力量，看不到革命的光明前途，看不到革命高潮的必然到来。他们主张取消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力图倒转历史车轮，阻止革命前进。例

如：一九二七年，正当我国北伐革命战争达到高潮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自动放弃对工农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放弃武装力量，背叛工农利益，去投降大资产阶级，从而断送了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叛徒王明荒谬地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投降蒋介石。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叛徒刘少奇抛出了所谓“和平民主新阶段”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妄图取消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解放后，他又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右倾机会主义黑纲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妄图复辟资本主义。事实证明，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毛主席说：“我们反对革命队伍中的顽固派，他们的思想不能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而前进，在历史上表现为右倾机会主义。”（《实践论》）

右倾机会主义就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来掩盖背叛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当他们无力对抗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的时候，就“只好施诡计，搞阴谋，耍无赖”（《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249页），用反革命两面派的手法反党反人民，以求一逞。叛徒、卖国贼林彪，一贯右倾，一贯耍两面派，欺骗党和人民。在党的九大期间和九大以后，他不顾毛主席、党中央对他的教育和挽救，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甚至阴谋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妄图把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变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专政，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这是一条极右的机会主义路线。

国防哲学

是国民党反共分子陈伯达于一九三六年炮制的反动哲学。它适应卖国贼蒋介石反共卖国政策的需要，是王明、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在“九一八”事变后，人民公敌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和卖国政策。一九三六年，他策划组织所谓“国防会议”，以“国防”的口号掩盖其反共卖国的真面目；同时鼓吹“国家至上”，坚持法西斯的一党专政。叛徒王明迎合国民党反动派的需要，主张成立以蒋介石

为中心的“国民政府”，要求“原来敌对的阶级互相礼让”、共同发展，抛出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实际上是“一切经过国民党”、“一切服从国民党”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叛徒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同样积极推行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就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抛出《哲学的国防动员》、《新启蒙运动》等反动文章，鼓吹“国防哲学”，为蒋介石的反共卖国政策效劳，为王明、刘少奇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制造理论根据。

国防哲学是“合二而一”哲学，是投降哲学。它打着“新哲学”、“新唯物论”的招牌，叫嚷要把“新唯物论”同蒋介石的“国防”这个“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主张“组织哲学上的救亡民主的大联合”，叫嚷“一切文化人”，不分界别，不分阶级，“在‘国防’这个目标上联合起来”；鼓吹“牺牲阶级的成见”，“绝对无条件地”联合一切人，实行“全国大合作”。它完全掩盖当时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不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不讲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这是地地道道的“合二而一”论、“阶级调和论”和“阶级投降论”。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这种右倾机会主义的倾向也要注意反对，否则也就会妨碍合作，妨碍发展，而变为投降主义的合作和无原则的发展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498 页）

国防哲学大肆贩卖先验论和英雄史观的黑货。它胡说什么“理性主义”是“进行联合阵线的起点”，宣扬通过反省来达到理性，反对一切思想受“物质的镣铐”。它污蔑人民群众“野蛮”、“落后”，“根深蒂固地和旧传统思想相固结着”，叫嚣要开展“新启蒙运动”，用“理性”去“开发民智”，“保卫祖国”，即保卫蒋介石的封建法西斯王朝。它无耻地吹捧独夫民贼蒋介石是“救国救世救民”的先知先觉，这充分暴露出国防哲学的反动本质。

总之，国防哲学是打着“国防”的旗号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它欺骗和麻痹人民群众，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效劳。毛主席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

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366 页）这是对国防哲学反动实质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社会意识形态

社会意识有政治思想、法权思想、哲学、历史、教育、文学、艺术、道德和宗教等多种具体形式，统称社会意识形态。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意识，从各个不同方面，以不同方式来反映社会存在和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例如政治思想和法权思想是经济基础最集中的反映，它们通过国家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政策法规，直接为经济基础服务。艺术是通过各种艺术形式来反映现实生活，并为一定阶级服务的。

在阶级社会里，任何社会意识形态都有阶级性。各个阶级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反映社会存在，形成各种不同的理论观点、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等。因此，政治法权观点、道德观念和文学艺术等每一种意识形态，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所鼓吹的超阶级的“全民的”意识形态，是根本不存在的。毛主席指出：“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之下，有多少阶级就有多少主义，甚至一个阶级的各集团中还各有各的主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48 页）

社会意识形态虽为社会存在所决定，但它又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并有相对的独立性。先进的、革命的社会意识能够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指导社会实践和社会革命，推动社会前进。我国先秦法家的思想理论（包括他们的哲学、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等各种观点），就属于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先进的革命的意识形态。而旧的错误的社会思想和理论，违反社会发展的趋势，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当社会制度根本变革之后，某些反动的意识形态还会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为反对新制度、复辟旧制度服务，阻碍历史的前进。我国二千多年来，社会制度几经变革，但代表反动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至今还在毒害人们，阻碍社会前进，就说明了这一点。政治、法权思想、道德、哲学、艺术等各种意识形态，都有自身发展的历史。先进阶级的意识形态都是在同反动阶级的旧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的

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斗争中发展起来，而且只有在斗争中才能发展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还会长期存在，因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还要进行长期的、曲折的斗争。但是，必须看到，“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介绍一个合作社》）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把上层建筑包括意识形态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以便彻底扫除这些垃圾。

各种不同形态的社会意识，是在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中发展的。任何哲学、道德观点，都反映一定阶级的政治观点，而这些观点又影响文艺、宗教和科学；宗教、科学和文艺对政治、哲学也产生一定的影响。在所有这些意识形态中，政治思想和政治路线是核心，是灵魂，是决定一切的。哲学是人们的世界观，它贯穿于各种意识形态之中，起着指导作用。

政治和经济

政治是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反映阶级斗争的路线斗争是最重要的政治。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和经济是对立的统一。毛主席说：“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问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

政治和经济这一对矛盾，主要矛盾方面是政治，政治总是第一，政治总是统率经济，总是决定经济的发展方向。毛主席说：“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把政治抽去了，经济就没有了灵魂，就要迷失方向。所以我们不能只谈经济，不谈政治，也不能把政治和经济并列，平起平坐，更不能把这种位置颠倒过来。列宁在批判托洛茨基主张“从经济上”看问题和布哈林把政治和经济等量齐观的折衷主义谬论时指出：“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全部问题就在于（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也只能在于）：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持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列

宁全集》第三十二卷 72 页)

毛主席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在社会主义时期，是否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实践证明，只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统帅一切，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正确处理两类社会矛盾，才能充分调动全国人民的一切积极因素，沿着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胜利前进，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如果不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事，放松思想政治工作，我们的经济工作就一定会走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我们的革命成果就有丧失的危险。

现代修正主义者总是歪曲和颠倒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或者公开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或者惯用折衷主义的手法，进行偷梁换柱，混水摸鱼，欺骗群众。刘少奇一贯鼓吹“技术第一”，“经济建设中心论”，反对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提倡利润挂帅、物质刺激，妄图使中国“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林彪则鼓吹政治和经济轮流突出，一会儿胡说：“农民种好地，工人做好工，就是政治”，企图引诱工农群众埋头生产，不问政治；一会又叫嚷“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实际上他是用资产阶级政治冲击无产阶级政治，用修正主义路线冲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用法西斯专政冲击无产阶级专政，为反革命政变制造舆论。

毛主席关于“政治是统帅”，“抓革命，促生产”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一系列指示，深刻地阐明了政治和经济、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辩证关系，粉碎了刘少奇和林彪的谬论。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在抓经济工作的时候，必须十分注意上层建筑领域的社会主义革命。只有抓好革命，才能搞好生产。毛主席指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实践证明：只要坚持这条路线，灿烂

的思想政治之花，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和其他各条战线上一派生气勃勃、繁荣昌盛的新气象，是谁也否认不了的。

法律

法律是国家制定的代表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章程、条例。它是经济关系的直接反映，是随着阶级和国家的出现而出现，随着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的。法律为国家政权服务，又要靠国家政权来执行。列宁指出：“如果没有政权，无论什么法律，无论什么选出的机关都等于零。”（《列宁全集》第十一卷 98 页）

法律总是统治阶级的法律，它绝不是各个阶级的“公共利益”和“共同要求”的表现，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反抗的手段。奴隶主阶级的法律是维护奴隶主占有制，保护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镇压奴隶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犯上作乱”的工具。封建地主阶级的法律是维护封建生产关系，镇压农民反抗的工具；在封建制度形成时期，也是打击奴隶主贵族复辟活动的有力武器。资产阶级的法律是资本所有权的集中反映，它宣布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资本家压迫工人的鞭子。资产阶级鼓吹“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完全是一种骗局。正如恩格斯所说：“工人在法律上和事实上都是有产阶级即资产阶级的奴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363 页）资产阶级法官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金钱是他们审判的标准，富人是他们保护的对象。俗话说：“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这是对剥削阶级法庭的绝妙写照和嘲笑。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彻底废除资产阶级的全部法律，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法律，才能使劳动人民得到解放。无产阶级革命不受任何旧的法律的约束，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暴力革命过程中，人民的革命意志就是一切。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法律，是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服务的，它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要工具。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社会主义法律的出发点；镇压敌人，保护人民是社会主义法律的根本原则。对敌人要

“强迫他们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人民内部则必须作教育和说服工作，使大家自觉地遵守法律。毛主席说：“**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四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我们一定要认真地执行这个宪法，勇敢地捍卫这个宪法，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苏修叛徒集团口头上高唱社会主义法制保障了“真正的民主自由”，实际上他们早已把社会主义法制抛到九霄云外。他们越来越露骨地依靠反革命暴力来维持其反动统治。今日之苏联，特务密探横行无忌，反动法令层出不穷。革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反革命有赏，叛徒弹冠相庆。许多革命者和无辜的人民被关进集中营、“疯人院”。总之，对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是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法律的实质。但是，“修正主义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社会主义的春天一定会回到苏联的大地。苏修叛徒集团必将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受到社会主义法律的严厉制裁。

艺术

艺术是通过典型形象反映现实生活的社会意识形态。艺术起源于人类的社会劳动实践，而不是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所说的起源于“人类的精神本性”或“动物界的自然美”。最初的艺术是原始人唱歌的劳动“号子”和反映原始部落劳动生活的舞蹈、壁画、雕像等。随着劳动生产和社会制度的发展，艺术成为一种精神活动的独特领域，形成了文学、建筑、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电影和摄影等一系列形式。艺术的内容和形式都来源于社会生活。毛主席指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这是唯一的源泉，因为只能有这样的源泉，此外不能有第二个源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17 页）

在阶级社会里，艺术具有阶级性。一切文学艺术都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者鼓吹的“为艺

术的艺术”、“全民的艺术”，是根本不存在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艺术，狂热地宣扬反动的帝王将相、牛鬼蛇神，歌颂反革命势力，污蔑革命人民；极力传播荒淫无耻的剥削阶级生活方式，毒害青年，麻醉人民，是为地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最反动、最腐朽的艺术。

无产阶级的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是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它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路线服务，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05 页）无产阶级的革命艺术，要求表现“**新的人物，新的世界**”（《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33 页），要求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它把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

在文艺战线上，历来充满着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我国解放以来，文艺战线上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周扬一伙的控制下，我国的艺术部门大多数基本上不执行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顽固地推行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使封、资、修的文艺毒草泛滥成灾。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国以革命样板戏为标志的文艺革命，向资产阶级发动了进攻，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战斗的序幕。革命样板戏的创作，从根本上改变了文艺舞台的面貌，把统治舞台千百年的帝王将相、牛鬼蛇神赶下了舞台，让工农兵成为舞台的主人。革命样板戏展现了雄伟壮丽的中国革命的历史图画，创造了具有中国民族风格的崭新的无产阶级艺术。这是文艺史上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伟大创举，是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光辉结晶，是毛主席关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文艺方针的集中体现。刘少奇、林彪一伙对文艺革命和革命样板戏恨之入骨，进行猖狂抵制和破坏，他们的阴谋诡计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在革命样板戏带动下，我国的文艺战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中，革命样板戏普及全国，深入人心，新的革命样板戏不断产生，发挥了巨大的战斗作用，推动了文艺革

命的深入发展。但是，文艺领域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斗争远远没有结束。我们一定要以党的基本路线为纲，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把无产阶级文艺革命推向新的高潮，夺取更大的胜利。

科学

科学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斗争的经验总结，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类。毛主席说：“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773—774 页）

自然科学是研究自然界的物质形态、结构性质和运动规律的科学。它和生产直接相联系，一开始就由生产所决定，并为生产服务。古代畜牧业和农业生产由于定季节等需要，引起了天文学的产生。天文学只有借助于数学才能发展，于是开始了数学的研究。后来由于农业水利灌溉、城市建筑和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力学也产生和发展起来。现代大工业生产的需要，推动了自然科学的革命，引起了天文学、化学、物理学、地质学、动物学、植物学、生理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505 页）

自然界的规律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自然科学的研究，自然科学的解释和利用，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决不能脱离哲学和阶级观点的影响。现代自然科学不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就是由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所支配；不是无产阶级用来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就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进行剥削和侵略的工具。

社会科学是以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历史学、伦理学等，都属于社会科学。它是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和阶级斗争直接相联系，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社会科学的产生和发展，直接由阶级斗争所决定。历史上的先进阶级的

利益和斗争目标，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和利用社会发展规律；反动阶级由于要维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开历史倒车，所以不但不能正确地认识这些规律，而且竭力歪曲这些规律。现在，反动资产阶级和现代修正主义的所谓社会科学，早已堕落为欺骗人民的假科学，成为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用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进行侵略活动的罪恶工具。

无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根本不同，它是最革命、最先进的阶级，它的利益和社会发展的方向完全一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正确地、全面地认识社会发展规律，建立真正的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空前的大革命，它为无产阶级专政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彻底解放指明了方向。

道德

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调整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道德不是天生的人的本性，而是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道德不是永恒不变的东西，而是随着社会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在集体生活中形成了原始的道德，随着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也就产生了反映私有制的道德。到了社会主义社会，一切以往的旧道德、旧传统正在被新的无产阶级道德所代替。地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宣扬什么超历史的“永恒道德”，胡说道德是“人类本能”，不能靠改造社会制度来改变等等，显然是唯心主义的鬼话。

在阶级社会里，“**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34 页）在旧社会里，压迫阶级的道德是“吃人”的道德，被压迫阶级的道德是反抗压迫的道德。封建地主阶级的道德是所谓“三纲五常”，“忠孝节义”。资产阶级的道德是个人主义，唯利是图。而无产阶级的道德则是集体主义、国际主义，消灭剥削和消灭阶级。因此，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决没有什么共同的仁义道德关系和“普遍的人类之爱”。鲁迅说得好：“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

现代修正主义者抹杀道德的阶级性，竭力宣扬“人类共同的道德”，“全民的道德”，鼓吹“抽象继承论”。他们把孔孟所鼓吹的“仁爱”、“忠恕”、“中庸之道”等等奴隶主阶级的虚伪道德，说成是一切阶级、一切时代都适用的“普遍形式”和“人类最完整的美德”，硬要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员去继承和修养这种“美德”。这些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目的在于欺骗群众，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认为，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超阶级的“全民的道德”是不可能有的。“只有在不仅消灭了阶级对立，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忘却了这种对立的社会发展阶段上，超越阶级对立和超越对这种对立的回忆的、真正人的道德才成为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34 页）

一面血淋淋地屠杀人民，一面假仁假义地鼓吹“仁义道德”，以掩盖反革命专政的本质，这是一切反动派的惯用伎俩。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89 页）孔丘大肆鼓吹“仁者爱人”，实际上是一个镇压奴隶阶级和革新派的刽子手。苏修叛徒集团也是在“人道关系和互相尊重”，“人对人是朋友、同志和兄弟”等美丽词句掩饰下，用极其野蛮、残酷的手段镇压和奴役国内外人民的。林彪一面大谈“破私立公”，“同舟共济”，一面大搞反革命阴谋诡计，是一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的阴谋家和野心家。对于这样的反革命两面派，我们必须提高警惕，不被他们虚伪的道德说教所欺骗。

宗教

一种唯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制度，是现实世界在人们意识里的一种虚幻的、颠倒的反映。宗教的基本特征，是把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人格化，使人们盲目地信仰和崇拜。在现代，世界上最大的宗教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

宗教观念的产生是自然压迫和社会压迫的结果。在原始社会的一

定发展阶段上，由于人们不认识自己身体的构造，不理解生和死的现象，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和对祖先的崇拜；由于对洪水、猛兽无法抵抗，对自然现象和自然规律不能理解，因而把自然看作是一种神秘的力量，把自然力人格化，产生了神的观念和对神的崇拜，认为人世间的一切事物和人的命运都是受神支配的，这样就形成了原始的宗教。

在阶级社会里，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以及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是宗教存在的主要根源。劳动人民为了反对这种剥削和压迫，进行过长期的斗争，但是他们由于无法理解和摆脱自己苦难的命运，就去追寻精神的解救以代替物质的解救。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劳动人民在“**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厉害一千倍）的资本主义盲目势力面前，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

（《列宁选集》第二卷 378—379 页）在阶级社会里，反动统治阶级总是竭力培植、支持和利用宗

教来麻醉人民，利用神权来镇压人民，以巩固他们的反动政权。例如，我国夏、商、周王朝的统治者，就已利用“上帝”、“天神”等宗教迷信，来加强奴隶主阶级的专政。春秋末期，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又利用孔丘“天命论”的宗教哲学，妄图“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度。后来，反动的封建统治阶级一直利用宗教神学、谶纬迷信、佛教、孔教等，以维护他们的统治。在西欧，罗马帝国的奴隶主阶级曾利用基督教作为统治奴隶们的精神武器。在中世纪封建社会中，基督教（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的宗教思想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竟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统治力量。这说明剥削阶级政权和宗教的结合，是宗教能够长期存在的根本原因。

“宗教是人民的鸦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 页）马克思这句名言深刻地揭露了宗教的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石。”**（《列宁全集》第十五卷 376 页）宗教通过种种教义，宣扬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把反动统治者说成是“全知全能”的“真命天子”，天生的英豪和普渡众生的“救

世主”；而劳动人民则是天生有罪的，只能等待“救世主”的降临，听从“上帝的安排”。宗教用“天堂”的幸福来掩盖人间的苦海，用“地狱”的恐怖来压制人民的反抗。所以毛主席把神权列为“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31 页）之一。今天，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帝国主义都在积极扶植宗教，麻醉和欺骗各国人民，进行罪恶的侵略活动。

几千年来，劳动人民和先进的思想家用唯物主义无神论对宗教有神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历史上每一次奴隶起义和农民起义，都给宗教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但是在剥削制度下，劳动人民不可能摆脱宗教的影响，反宗教斗争也不可能彻底。马克思主义无神论的产生是反宗教斗争史上的伟大革命。列宁写道：“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列宁全集》第十九卷 8 页）马克思主义认为，反宗教斗争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只有发动广大群众积极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从现实斗争中找到自身解放的道路，才能自觉地摆脱关于“天国”、“来世”的宗教幻想。只有彻底消灭私有制和阶级，实现了共产主义，才能最后消灭宗教。毛主席指出，宗教迷信的破除“乃是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胜利以后自然而然的结果。”宗教要群众“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33 页）

家庭

一种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生活组织形式。历史上最原始的婚姻形式是群婚。最早的三种家庭形式是：（一）“血缘家庭”，它是在一个血缘系统内同辈的兄弟和姊妹结成夫妻集团。（二）“普那路亚”（指亲密伙伴的意思）家庭，这是一群兄弟与另一群其他血统的姊妹结为夫妻集团，氏族制度就是从这种家庭形式中发展起来的。（三）“对偶家庭”，即一男一女的结合，因随时可以拆离，还不是牢固的一夫一妻制。

这三种家庭形式的经济基础都是原始共产制家庭经济。在这种家庭中，妇女劳动是主要的，因此“妇女是家里的主人。”（《马克思恩

格斯选集》第四卷 155 页) 后来由于男子在经济上逐渐取得支配地位和私有制的产生, 出现了由“母权制”到“父权制”的转化, 于是“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就代替了“对偶家庭”。个体家庭开始成为社会的经济单位。在这种家庭中, 男子占有生产资料和奴隶, 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 妇女的家务劳动无足轻重, 于是“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58 页) 这是奴隶制家庭的萌芽。恩格斯指出: “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 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 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61 页) 从此在妇女身上就加上了夫权的枷锁。

在阶级社会里, 家庭始终是阶级的家庭。在一切剥削阶级家庭中, 丈夫对妇女占有绝对统治的地位。例如奴隶主阶级的家庭, 奴隶主可以任意占有女奴隶, 妻子不过是婢女的头领。在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中, 妻子要绝对服从丈夫, 子女要绝对服从父母, 婚姻由父母包办, 结婚要“门当户对”, 一切都要按封建宗法制度办事。儒家所鼓吹的“男尊女卑”, “父子有亲”, “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 “三从四德”, “孝者德之本”等等, 正是奴隶制和封建制家庭关系的反映, 是为巩固反动统治服务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 金钱统治一切。资产阶级的婚姻, 是在“自由恋爱”、“自由契约”掩盖下的买卖婚姻; 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 纯粹是一种金钱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 家庭问题实质就是妇女解放的问题。社会的解放, 是妇女解放的前提; 而妇女的解放, 则是社会解放的尺度。只有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 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马克思主义路线的指引下, 才能使家庭制度和妇女的地位发生根本的变化。我国四届人大通过的新宪法规定了妇女在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力, 规定了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当然,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 由于仍然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 因此各种家庭仍然带有阶级的烙印。对待家庭问题, 我们也必须具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的实践表明, 只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才能使家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才能为妇女

的彻底解放和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开辟广阔的道路。

外国哲学史部分

【外国哲学学派】

古希腊罗马哲学

指欧洲奴隶社会的哲学。它经历了欧洲奴隶制的兴起、兴盛、没落和崩溃，前后约一千二百多年。公元前八至六世纪，古代希腊奴隶制社会形成，随着奴隶制经济以及航海交通的发展，奴隶和奴隶主两大对立阶级的斗争日益激烈。古希腊哲学在这一基础上产生并发展起来。公元前三世纪，罗马城邦日趋兴盛，公元前二世纪中叶征服了希腊，成为一个庞大的奴隶制强国，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古罗马哲学，接受了希腊哲学的广泛影响。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没有奴隶制，就没有罗马帝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220 页）但由于奴隶阶级受到极其残酷、野蛮的剥削和压迫，现在流传下来的古希腊罗马哲学主要是奴隶主的哲学。奴隶主民主派是新兴的工商业主阶层，他们反对奴隶主贵族的专制统治，要求建立奴隶主民主制；他们根据工商业及航海发展的需要，重视科学研究，并吸取东方古国的科学成果，这些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符合奴隶社会发展趋势的。所以，他们是当时社会中比较进步的力量，在哲学思想上具有朴素的、自发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奴隶主贵族是原始氏族社会分化瓦解过程中产生的特权阶层，他们为了维持自己的特权统治，反对社会进步，竭力宣扬宗教迷信及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古希腊罗马哲学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奴隶制形成时期有文献可查的早期希腊哲学（公元前七——六世纪），表现为米利都学派、爱菲斯学派的唯物主义反对毕达哥拉斯学派、埃利亚学派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奴隶制繁荣时期的希腊哲学（公元前五——四世纪），表现为以

德谟克利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路线和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唯心主义的斗争；奴隶制没落和崩溃时期的希腊、罗马哲学（公元前三世纪——公元五世纪），表现为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反对各种唯心主义的斗争。

古希腊罗马哲学从产生到终结始终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唯物主义哲学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和发展，特别是原子论学说在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的斗争中起过很大的作用。这一时期的哲学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具有自发辩证法思想，把自然界“当作一个整体而从总的方面来观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468 页）所以恩格斯说：“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9 页）这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是赫拉克利特和亚里士多德。但是，由于受到时代的限制，生产规模狭小，科学水平低下，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只是直观的和笼统的猜测，所以这一时期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只能是原始的、自发的、朴素的。罗马奴隶制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道德的衰败，古罗马哲学日趋腐朽，各种各样的神秘主义思想泛滥，哲学家们甚至堕落成为“纵酒作乐的有钱人所雇佣的小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十九卷 332 页）这也是欧洲奴隶社会哲学的特征之一。

恩格斯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找到以后各种观点的胚胎、萌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468 页）可见古希腊哲学在哲学史上具有深远的影响。在毛主席“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指引下，我们批判地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对现实的政治斗争和哲学斗争都有一定的意义。

米利都学派

古希腊最早的唯物主义学派，因出现于伊奥尼亚的米利都而得名。米利都位于小亚细亚沿岸，是希腊的殖民地，在当时伊奥尼亚地区中属于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城邦。这一派的主要人物有泰勒斯（约公元前 624—547 年）、阿那克西曼德（约公元前 624—547 年）和阿那克西米尼（约公元前 585—525 年），他们都是奴隶主民主派的代表。

米利都学派出现于公元前六世纪。公元前五九四年，梭伦被选为雅典第一执政官。他实行的政治改革虽然是很不彻底的，但对当时的经济、科学文化的发展起了一些推动作用。米利都学派就是在这一情况下出现的。他们根据对自然界的直观和猜测，得出世界的本原是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物体。如泰勒斯认为水、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无限、阿那克西米尼认为空气是世界的本原。现在看来，这些观点虽然是幼稚的，但它实际上以原始的形态提出了物质是第一性的观点，在人类认识史上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为后来的唯物主义发展奠定了基础。恩格斯称赞它说：“在这里已经完全是一种原始的、自发的唯物主义了，它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的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十卷 525 页）米利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既是哲学家，也是自然科学家。泰勒斯是几何学家，并被认为是第一个研究星象学、预言过日蚀和冬至夏至、规定一年的季节和天数的人。阿那克西曼德最早提出地球是圆形并且处于世界的中心的看法。他认为月亮本身不发光而是反射太阳的光，雨是由阳光蒸发的水蒸气造成的。他被认为是第一个绘制地图、制造地球仪的人。他对人的产生也做过臆测，说人最初很像鱼，人是由鱼变成的，是从水中到陆地上来的。阿那克西米尼认为，大地浮在空气上，它的形状是扁平的，天是离地最远的漩涡，运动是永恒的，各个天体由于空气的推动，在各自的轨道上循环；他还朴素的分析过产生云、雨、虹、冰雹、雪等的自然原因。在他们的自然观中虽然也有某些朴素的辩证因素，但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都未能说明运动的起源。

毕达哥拉斯学派

古希腊最早的唯心主义学派之一，它是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反动学术组织和宗教团体，主要活动于意大利南部的一些城邦里。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 580—500 年）是这一学派的创始人。他是萨摩斯人（一说是底仑群岛人），后来迁居到意大利的克罗多尼城，在那里招收几百名门徒，从事讲学和反动政治活动。他对数学有研究，特别是对几何学有贡献。他否认物质是世界的本原，主张数是世界的本

原，即先有点，后有线；由线产生平面；由平面又产生立体；由立体产生可以感觉到的各种物体。他把神秘的特性加给一些数字，如 1 是理智，4 或 9 是正义，5 是婚配，10 是完满，等等。但他提出的十种对立却反映出一定的矛盾。这些对立是：有限与无限、奇与偶、一与多、右与左、阳与阴、静与动、直与曲、明与暗、善与恶、正方与长方。他认为有限与无限的对立是最基本的。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所谓对立既不能共存（一方发生，一方便消失），更不能互相转化。他用数的规律性来解释宇宙的一切，这显然是荒唐的，但其中却包含有宇宙也有规律性的思想萌芽。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数服从于一定的规律，同样，宇宙也是如此。于是宇宙**的规律性第一次被说出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527 页）另外，据亚里士多德在《论天体》中说：“毕达哥拉斯派把火放在中央，而把地球看作沿轨道环绕这个中心体运行的一颗**星。**”这里所说的火虽不是太阳，但也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毕竟是关于地球运行的第一个推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527 页）

毕达哥拉斯学派宣扬灵魂不死的神秘主义。他们认为灵魂是由不死的原素构成的，它和日夜星辰一样在永恒的运动着，它虽然从血液中吸取养料，但它的理性部分却是不死的，它可以转生到别人或别的动物身上。毕达哥拉斯自称他的灵魂已经是第五次降生了，在转生到他身上之前曾下过地狱。有一次他阻止人打一只狗，他说那只狗是由他朋友的灵魂转生的。他的这种神秘思想对柏拉图是有影响的。作为反动的宗教团体，毕达哥拉斯学派也是很神秘的，每个加入该组织的人，不仅要举行仪式，而且要恪守戒律，严守秘密，每天要进行宗教式的反省。

毕达哥拉斯学派提出关于“秩序”的理论，以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人间秩序”，反对民主政体，攻击民主政体不合“秩序”。在该派的信条中特别强调要坚守神所给予的岗位，尽力援助所谓合法的统治者（即当权的奴隶主贵族），其反动面目是很明显的。毕达哥拉斯死后不久，他的反动团体即被奴隶主民主派取缔，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毕达哥拉斯派曾几经兴衰，直到公元三世纪才终止活动。

埃利亚学派

古希腊最早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之一。公元前六世纪末至五世纪初产生于意大利南部的埃利亚城（今意大利的坎盘尼亚区）。当时，意大利南部及西西里岛一带是希腊的殖民地，经济落后，奴隶主贵族占统治地位。埃利亚学派正是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它宣扬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为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服务。随着古希腊工商业的发展，奴隶主民主制的得势，这个学派也逐渐衰落，到公元前五世纪中叶以后就崩溃了。创始人是塞诺芬尼（约公元前565—473年），主要代表人物有巴门尼德（约公元前六世纪末至五世纪中叶）、芝诺（约公元前490—436年）。

埃利亚学派认为世界上运动变化着的万物是不真实的，唯一真实的东西是“存在”，“存在”是永恒的，不生不灭、不变的。巴门尼德说：“人们以为万物是真实的，并且相信这种真实，但是所有的万物只是空名”，而只有“存在均匀地充满着一切”。恩格斯说：“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83页）埃利亚学派把“存在”这个概念抽象化、绝对化，使它成为一个独立的、永恒的神秘东西，正像恩格斯在批判杜林时所指出的：“这种存在没有任何内在的差别、任何运动和变化，所以事实上只是思想虚无的对偶语，所以是真正的虚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83页）

埃利亚学派在认识论上否认感性认识的作用，认为感觉只能给人以假象和幻觉，是绝对不可靠的，只有理性才能认识真理。巴门尼德甚至认为单凭理性就可以把“存在”的一切性质推论出来。

埃利亚学派把一切都看成是固定不变的，极力反对赫拉克利特的“万物即存在，同时又不存在”的辩证法观点。巴门尼德的学生芝诺还提出“运动健将追不上乌龟”，“飞箭不动”等诡辩，妄图以此证明承认运动变化必然导致矛盾，因而运动和变化是不真实的。亚里士多德称芝诺是“辩证法的发明者”，实际上他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者，他只是不自觉地接触到辩证法，从反面揭示了客观事物运动中的一些

矛盾。

智者派（诡辩学派）

古希腊罗马以传授演讲术和辩论术为职业的教师的统称。这一学派的情形比较复杂，在政治上有进步与反动的区别。

早期智者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属于奴隶主民主派的普罗塔哥拉（公元前481—411年）和高尔吉亚（生死年不详）。他们把哲学的注意中心由自然界转向人类社会，由世界的本原转向认识论，对人类的发展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黑格尔论述早期智者派时说：“智者们也是以辩证法、普遍的哲学为对象，他们都是深刻的思想家。”

普罗塔哥拉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智者（即智慧的教师），能够教人懂得如何对待私事和公事的智慧。他说他的职业正是教人以政治艺术，以便使人成为良好的公民。他认为奴隶主共和国是最好的国家形式。他看不起人民，认为人民是没有什么知识的，只是跟着统治者的愿望去做。在认识论上他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一方面承认世界是物质的，对神是否存在以及神是什么样子表示无法知道，强调感觉永远只能是对存在的感觉；另一方面又错误地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人对事物感觉成什么样子，它就是什么样子，这等于说事物的真假没有客观标准。但在他的论述中也有辩证因素，例如，他认为每个问题都有互相对立的两方面，一切事物都处于一定的联系中，时刻在运动和变化着。

高尔吉亚有怀疑论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在《论非存在或论自然》一书中提出的三个命题：（一）什么也不存在，什么也没有；（二）即使存在着什么，那也是不可认识的；（三）即使是可以认识的，那也还是不能够把认识了的传达给别人。他在辩论中以善于运用辩证法而闻名，例如，他把存在和非存在的关系看成是“消逝着的环节”，便是辩证法的极好的规定。但由于立足于怀疑论，因而有时得出荒谬的结论。例如，他为了“论证”无物存在，便先证明“非存在”是不存在的，然后又“证明”存在也是不存在的，最后说，既然非存在和存在都不存在，

自然也就无物存在。这显然是诡辩。

列宁在《哲学笔记》里对早期智者派的学说做过许多摘记，着重注意它和辩证法的关系，以及它的怀疑论和相对主义的错误。这对了解早起智者派的特点和实质是很有帮助的。

后期智者派才是地地道道的诡辩学派，主要代表有克里底亚、卡里克利（都属于奴隶主贵族派）等人，他们不仅是文字游戏的能手，并且直接为反动的寡头政治辩护。

斯多葛学派

公元前四世纪末至公元六世纪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派别，创始人是塞浦路斯岛的芝诺（约公元前 336—264 年）。希腊文斯多葛即画廊的意思，该派经常在画廊集会和讲学，所以被称为斯多葛派。

斯多葛派并不是一个始终如一的学派，通常把它分为早、中、后三个时期。总的说来，它反映着古希腊罗马奴隶社会日趋没落和崩溃时期的奴隶主意识形态。它虽然把哲学分为物理学、伦理学、逻辑学，但着重注意的却是伦理学。它宣扬听天由命、逆来顺受，提倡禁欲或寡欲，决不可因苦难而忧愁，特别是不能因苦难而反抗。

斯多葛派的主要代表，除芝诺外，还有克吕西波（约公元前 281—278 年生，约公元前 208—205 年死）。他们在认识论上具有一定的唯物主义倾向和辩证因素，把火和气作为一切现象的基础，甚至还认为自然状态是可以转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称早期斯多葛派的自然观是“赫拉克利特式的、运动的、发展的、活生生的自然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143 页）。但是，在伦理学上，他们主张盲目服从命运，宣扬宿命论。芝诺把德行说成是最重要的、唯一的善，并且认为德行的好坏全靠自己，与别人无关。在他看来，只有按照命运生活，才是有德行的生活。

中期斯多葛派的主要代表有巴内修（约公元前 185—110 年）和他的学生斯采沃拉（生死年不详）。他们抛弃早期斯多葛派的唯物主义倾

向和辩证因素，公开宣扬宗教迷信和神秘主义。斯采沃拉认为，哲学应当是神秘的，这样才能使被统治的人民处于迷乱状态，有利于奴隶主的统治。

后期斯多葛派（即古罗马的新斯多葛派）的主要代表有塞涅卡（约公元前 6-3 年生，公元 65 年死）和爱比克泰德（约公元 50—138 年）。他们拼命鼓吹宿命论，叫嚷活着的人都是肉体的囚犯，为了幸福就要鄙弃快乐。塞涅卡认为，命运统治着一切，而且是无法改变的。爱比克泰德虽是奴隶出身，但他却认为，人的幸与不幸是命中注定的，与外界的善或恶无关；对神不能有任何非难和抱怨，做人就要“忍受！节制！”塞涅卡在口头上大讲道德和克制，而他自己却是阴谋家和富翁。恩格斯在谈到后期斯多葛派的卑鄙、反动时指出：“哲学家们不是单纯赚钱谋生的学校教师，便是纵酒作乐的有钱人所雇用的小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332 页）

新柏拉图主义

罗马帝国衰亡时期的一种神秘主义哲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普罗提诺、布理克和普罗克洛等。

新柏拉图主义以极神秘的形式复活柏拉图的反动的“理念论”。普罗提诺认为世界万物的本原是“太一”，它是产生一切、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超存在”；“太一”是不可捉摸的，它既不能是“一切事物”，也不能是“心智”和“存在”，如同柏拉图所说的是不可名状的。但为了把“太一”说成是万物之源，普罗提诺硬说：“‘太一’是完满的，因为它既不追求任何东西，也不具有任何东西，也不需要任何东西，它是充溢的，‘流溢’出来的东西便形成了别的实体”。具体说来，“太一”先是流溢出宇宙理性；然后又流溢出宇宙灵魂；最后才流溢出物质世界（宇宙中最低级的东西）。这完全是一种神秘的创世说。

新柏拉图主义在认识论上死守着柏拉图的所谓“回忆说”。普罗提诺认为只有使自己的灵魂处于忘我出神的状态，才能使其中神圣的部分离开肉体，接近于神而达到真理。

新柏拉图主义赤裸裸的宣扬宗教神学，胡说血肉之躯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人生的目的就是回到神，人们只有厌弃现实生活，摆脱一切尘世的牵挂和肉体的束缚，才能与神交往，达到人神合一的境界。这反映了没落反动的奴隶主阶级的绝望和幻想。新柏拉图主义无力挽救奴隶制的灭亡，然而其神秘的、寄希望于来世的思想却成为中世界基督教神学的哲学基础。

欧洲中世纪哲学

指欧洲封建社会的哲学。公元五世纪末，古罗马奴隶制崩溃，封建制在欧洲开始形成。欧洲封建社会一开始，基督教会的力量即十分强大，它和封建国王互相勾结，形成庞大的统治集团。由于基督教神学垄断了整个意识形态领域，哲学成为神学的一个科目，失去自己独立的内容。中世纪哲学上两条路线斗争和教会内部的派别斗争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欧洲中世纪哲学早期是教父哲学。它产生于古罗马奴隶社会末期（约公元二世纪），流传到公元七——八世纪。其内容是利用古代哲学中的糟粕，对原始基督教进行改造，制造了一套为教会统治辩护的宗教信条。主要代表是奥古斯丁。到公元八——十世纪，随着教会统治的加强而出现的经院哲学，是在教父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更加系统、更加烦琐的哲学体系。经院哲学是教会统治的主要精神支柱，是欧洲封建社会中占绝对统治地位的官方哲学。它盛行于十三世纪，瓦解于十五世纪。主要代表是安瑟伦、托马斯·阿奎那。

欧洲中世纪的哲学斗争，主要表现为唯名论和唯实论（实在论）的斗争。这场斗争围绕着“共相”问题而展开，实际上已涉及到什么是世界的本原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唯实论认为共相（一般）是先于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实体，它比个别事物更实在；唯名论则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共相（一般）不过是事物的名称、符号或概念。这场斗争是当时社会阶级斗争的反映。唯实论坚持唯心主义观点，代表正统的经院哲学，是教会封建统治的理论基础；唯名论具有唯物主义倾向，是进步的思想派别，往往成为异教运动以及新兴工商业

者的理论武器。

十三世纪由阿拉伯传入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阿威罗伊主义，推动了欧洲中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阿威罗伊主义认为物质和运动是永恒的、不可创造的。它否定灵魂不死、来世报应等宗教迷信思想，主张“双重真理”（即哲学的真理和神学的真理并存），这在当时是具有进步作用的。这个学说被当做危险的异端邪说，受到正统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之流的攻击，但十三世纪末在法国，十四、五世纪在意大利它都有很大影响。

十三世纪开始，随着手工业、商业和航海业的发展，自然科学也有了新的发展。它强调研究自然、重视经验、通过实验来认识周围现实。在农民、市民反封建斗争的基础上，它和唯名论、阿威罗伊主义结合起来，形成一股新的、反对派潮流，有力地冲击着宗教神学，对后来某些进步的哲学派别有很大的影响。

欧洲中世纪哲学反映着这一历史时期错综复杂的矛盾，正像恩格斯所深刻指出的：“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31 页）但同时又必须看到在文化、技术方面“中世纪的巨大进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25 页）在哲学领域中，两条路线的斗争十分激烈，进步的思想、唯物主义因素，在极其艰苦的斗争中闪耀发光，为资本主义形成时期的“文艺复兴”作了准备。

经院哲学

欧洲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哲学。因在教会的学院（经院）里讲习而得名。主要代表有：安瑟伦（他确定了早期经院哲学的基本内容）、托马斯·阿奎那（他完成了经院哲学体系）。

经院哲学就其内容来说，就是基督教神学。它利用反动的新柏拉图主义，以及被歪曲、伪造了的亚里士多德学说来为基督教的教义作论证。它宣称世界的最高本原是超自然的精神实体——上帝，宇宙万物都是由上帝创造和主宰的。它宣扬信仰高于理性，知识只是信仰的奴

仆；哲学的任务

就是论证《圣经》和教会信条，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正如恩格斯所说：“为了捍卫宗教，很快就不得不炮制出一种像肥皂泡那样吹起来的唯理论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 335 页）经院哲学就是为维护封建教会的反动统治而炮制出来的一种唯心主义神学体系。

烦琐、空洞、极端的形式主义是经院哲学的显著特点。列宁指出：“经院哲学和僧侣主义抓住了亚里士多德学说中僵死的东西，而不是活生生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却变成僵死的经院哲学”。（《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416—417 页）经院哲学抛弃了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中的积极因素，抓住其中空洞的三段论法，加上诡辩，作为它的论证方法。经院哲学家们甚至提出一些极端荒谬的问题，如：天堂里的玫瑰花有没有刺？把猪带到市场上去的究竟是手还是绳子？引经据典、信口开河地争论不休。由于上述特点，以后的人们把那种脱离实际、死啃教条、玩弄概念的恶习叫做“经院习气”或“烦琐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蔑视经院哲学，把脱离实践的，抽象、空洞的理论都称之为“经院哲学”和“哲学怪论”。

经院哲学内部关于“共相”问题的争论，实际上已涉及到世界的本原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一争论贯穿于经院哲学的始终，并形成对立的两大思想派别：宣扬唯心主义的唯实论（又叫实在论）和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列宁指出：这一争论“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列宁全集》第二十卷 185 页）

经院哲学在公元八——十世纪开始形成，十一——十三世纪开始发展、盛行。随着封建制度崩溃，教会势力衰退，它也走向没落，十五世纪瓦解。但是作为一种反动思想，它一直为教会所保存。十九世纪末，罗马教皇正式宣布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为教会官方哲学。现代反动资产阶级所宣扬的新托马斯主义，成为帝国主义对内镇压革命对外进行侵略的工具。

唯名论

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中的进步思想派别。早期主要代表是贝伦伽里、罗瑟琳、阿伯拉尔；后期主要代表是邓斯·司各脱、奥卡姆。

唯名论认为只有个别（具体事物）才是真实的、独立的存在，共相（一般）不过是用来表示个别事物的名字、符号或概念，是后于个别而存在的。后期的唯名论从这一观点出发，还强调认识只能从经验开始，一切知识都从感性经验中产生。显然，唯名论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马克思和恩格斯说它是中世纪“**唯物主义的最初表现**”。（《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163 页）

唯名论从个别先于一般而存在的观点出发，对神学教条提出怀疑和反驳。例如：对“原罪”说（所谓人类的始祖在“天国”犯了罪，人类要世世辈辈受苦受难来赎这个“罪”），它认为，既然没有先于个别人而存在的“人类”共相，因此，根本就没有所谓“全人类的原始罪恶”。又如，对“三位一体”说（所谓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它认为这如同说一个人同时体现出父亲、儿子、灵魂一样荒谬。因此，唯名论往往成为反对天主教会统治的“异教”运动、“异端”思想的理论武器，不少唯名论者直接参加了反罗马教皇的斗争。中世纪后期，唯名论反映了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和要求，它与自然科学思潮及其他“异端”思想结合起来，有力地冲击着天主教神学。

唯名论和唯实论的斗争，是中世纪两条哲学路线斗争的主要表现。斗争虽以抽象、烦琐的形式出现，但实际上已涉及到思维对存在的关系这个哲学基本问题，列宁说：它和“**唯物主义者同唯心主义者的斗争具有相似之处**”。（《列宁全集》第二十卷 185 页）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唯名论并没有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同时，它不懂得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把一般说成是标志个别事物的名称、记号，抹杀了共相（一般）的客观内容，从而给主观唯心主义开了方便之门。唯名论对以后的哲学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它是“**英国唯物主义者理论的主要成分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163 页）另一方面，又被贝克莱、休谟的主观唯心主义、不可知论，以及

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流派所利用。

唯实论（实在论）

也叫实在论，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反动思想派别。主要代表是：安瑟伦、托马斯·阿奎那等。

唯实论认为共相（一般）是先于个别事物而独立存在的精神实体，它比个别事物更实在。安瑟伦把共相（一般）说成是个别事物的“原型”，

存在于上帝的“理念”之中，上帝就是依照这些“原型”创造出个别的事物，显然，这是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理念论”的变种。托马斯·阿奎那歪曲亚里士多德关于“形式”的说法，把共相（一般）说成是一种“实体形式”（或叫“隐蔽的质”），既存在于个别事物之中，又存在于上帝和人的理性之中。可以看出，说法虽有不同，但把一般说成是独立的精神的东西，是第一性的，而个别的具体事物是第二性的，却是一切唯实论者共有的唯心主义特征。

唯实论直接为基督教教义作论证，为封建等级制度作辩护，它的反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例如对“原罪”说，它宣称“人类”这个共相，不仅先于个别人而独立存在，并且比个别人更根本、更实在。所以“人类的原始罪恶”也是比个别人的罪恶更根本、更实在。世上的每一个人人生来就有罪，注定要受苦受难，只有祈祷上帝赦免，才能使灵魂得救。又如，它从共相（一般）高于个别的观点出发，宣称愈普遍的东西就愈高，上帝是最普遍的，因而也是最高的实在，是万物的创造主；罗马教会是世界性的组织，比世俗政权更普遍，因而也更高，更有权威。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一个由低到高的等级阶梯，封建社会的等级制正是这个阶梯的一部分，因而是完全自然、合理的，违反这一制度就是对上帝的叛逆，就要受到惩罚。这都说明唯实论是一切科学和进步思想的死敌。唯实论的谬论在当时就遭到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唯名论的反驳。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

指十五世纪中叶到十六世纪欧洲各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的哲学。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和教会统治的斗争日益激烈。他们打着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旗帜，进行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历史上称这个时期为“文艺复兴”时期。其实，所谓“文艺复兴”，并不是简单恢复古代奴隶社会的文化，主要是创立资本主义的新文化。“文艺复兴”运动是早期资产阶级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恩格斯指出：“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49—250 页）

文艺复兴时期哲学的主要内容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也叫人文主义），即主张以人（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利益，以此来和宗教神学相对立。它提倡人性，反对神性；提倡人权，反对神权；提倡个性自由，反对宗教神学压抑人性。这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和人道主义的最初表现，它的核心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这一思潮对当时的哲学、文学、艺术、语言等各种意识形态，都发生广泛的影响。它最初在意大利兴起，后来遍及全欧洲。主要代表人物有意大利的彭波那齐，荷兰的爱拉斯谟，西班牙的微末斯，法国的蒙台涅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如英国莫尔的《乌托邦》和意大利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就是它的代表作。在这些著作中反映出早期无产者、手工业者和破产农民的愿望。

在“文艺复兴”时期，唯物主义哲学伴随着自然科学反对宗教神学的斗争而发展。由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反宗教神学斗争的需要，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力学等现代自然科学，获得了迅速发展，“它和意大利伟大人物的觉醒的现代哲学携手并进，并把自己的殉道者送到了火刑场和牢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533 页）哥白尼以“太阳中心说”否定了托勒密的“地球中心说”；开普勒和伽利略叙述了天体运行规律；布鲁诺论证了宇宙是统一的物质世界，公开宣布只承认科学真理，否认宗教真理；达·芬奇指出，认识来源于客观世界，只有采取科学实验的方法，才能把握真理。这都有力地打击了宗教的世界观，因而遭到罗马教会的强烈仇视和抵抗。教会

对自然科学家和唯物主义哲学家进行残酷的迫害，甚至将布鲁诺活活烧死，充分表明这场斗争的残酷性。

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在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起着进步的、革命的作用。“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361 页）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这个时期的哲学还没有完全摆脱神学的影响，即使是一些先进思想家的唯物主义学说，也往往披着泛神论的外衣。叛徒、卖国贼林彪胡说什么欧洲的“文艺复兴”是“无人超过”的“高峰”，他妄想用资产阶级的文化来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复辟资本主义，充分暴露出他的反动本质。

启蒙运动

一般指十七、十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思想文化运动。当时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的矛盾日益激化。资产阶级要求进一步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启蒙运动就是反映这一要求的。

启蒙运动开始于英国，逐渐扩展到法国、德国以及全欧洲，主要代表有英国的培根、霍布斯、洛克，法国的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德国的莱辛等。启蒙思想家的共同特点是：在哲学上，一般主张唯物主义的经验论、无神论，或倾向自然神论。在社会政治观上，提出以人性论为基础的“人权”，其内容包括“自由”、“平等”、“博爱”、“财产私有”等要求，主张实行开明的君主政治或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反对神权和君权专横，反对封建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反对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企图建立一个符合“永恒真理”、“永恒正义”的“理性王国”。

启蒙运动的各个代表人物，在具体观点上有着不同的特点。如在法国，伏尔泰宣扬自然神论，反对天主教和教权主义，但又反对无神论，力图用改良办法，达到资产阶级与王权的妥协，他是资产阶级温和派的

代表。唯物主义者狄德罗，是战斗的无神论者，坚决反对封建制度和宗教神学，是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空想共产主义者梅叶，在政治上思想上就更加激进，他不仅激烈反对封建专制制度，而且幻想通过农民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财产公有、人人参加劳动的普遍平等的社会制度。

启蒙运动在历史上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有力地打击了宗教神学和封建专制制度，对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起了先导作用。但是，启蒙运动毕竟是一次资产阶级的运动，它脱离劳动人民，只限于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反封建斗争。有些启蒙思想家还把变革社会的希望，寄托在所谓少数开明君主的身上。不论温和派和激进派，在社会观上都是唯心的。启蒙运动的实质，是资产阶级为夺取政权进行舆论准备，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以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社会。启蒙运动中提出的所谓平等、自由、博爱等口号，当时虽有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其实质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谎言和骗局。他们所谓的理性王国，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7 页）在三十年代我国民族危机的严重时刻，反共分子陈伯达胡说启蒙运动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竭力要无产阶级放弃武器，去搞什么“新启蒙运动”，妄图使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在“新启蒙运动”的外衣下，永世长存。这充分暴露出他的反动面目。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

指十八世纪法国新兴资产阶级的哲学。十八世纪中叶，法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专制制度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资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正是这一革命形势的反映，作为政治变革的前导，它为即将到来的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主要代表有拉美特利、狄德罗、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分别继承和发展了十七世纪笛卡尔和洛克的唯物主义。他们广泛利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新成就，“**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449 页），在自然观上和一切唯心主义作公开而鲜明的斗争。他们主张世界统一于物质，物

质是唯一的、无限的、永恒的实体；物质和运动不可分割，物质运动的原因在于自身；物质运动有它的客观规律性，自然界的一切都处在必然的因果联系之中。他们强调意识是物质的产物，是有机物质的一种属性；认识来源于感觉，感觉是外界事物对感官作用的结果。

战斗的无神论思想是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杰出贡献。和十七世纪英国培根、洛克的唯物主义不同，它完全抛弃了宗教外衣，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占统治地位的封建专制和神学体系。它有力地批判了宗教神学的虚妄荒诞，深刻地揭露了教会是专制暴政的反动支柱以及宗教道德的虚伪本质。列宁说：“**十八世纪老无神论者所写的那些锋利的、生动的、有才华的政论，机智地公开地打击了当时盛行的僧侣主义。**”（《列宁选集》第四卷 606 页）

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在反封建斗争中起了非常革命的作用。恩格斯称赞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都是“**非常革命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6 页），并嘱咐把他们的战斗的无神论文献翻译出来，传播到人民中去。列宁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也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在进行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它等等**”。（《列宁选集》第二卷 442 页）但是，由于剥削阶级地位及自然科学条件的限制，它具有三大局限性：机械性，即企图用力学来解释一切；形而上学性，即具有反辩证法的性质，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历史发展的过程；社会历史领域中的唯心主义，这突出表现在它企图用资产阶级理性主义和人性论来解释人类社会和历史问题。恩格斯曾深刻地论述了这种局限性，并且认为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

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以后，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很快就抛弃了这种战斗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转到唯心主义和僧侣主义的立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十分重视，批判地继承了这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

德国古典哲学

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上半期的德国资产阶级哲学，从康德开始，中经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的发展，到费尔巴哈告终。德国古典哲学不仅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有重大影响，并且其积极的成果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批判地继承。

德国古典哲学的主要代表，除费尔巴哈以外，都是唯心主义者。康德说，世界的本质是不可知的；费希特说，世界是“自我”的产物；谢林说，世界是精神和物质的无差别的混合；黑格尔说，世界是绝对精神的产物。这实际上反映着德国资产阶级的思想空虚和软弱无力，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相比，是一个倒退。马克思说：“**被法国启蒙运动特别是 18 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所击败的 17 世纪的形而上学，在德国哲学中，特别是在 19 世纪的德国思辨哲学中，曾有过胜利的和富有内容的复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159 页）费尔巴哈在反对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对恢复和捍卫唯物主义，作出了重大贡献。但他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并且只限于自然观方面，他在社会观上同样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彻底批判和抛弃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唯心主义，并把唯物主义彻底应用于人类社会和历史领域中去。

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对辩证法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特别是黑格尔作出了重大贡献。恩格斯说：“**这种近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63 页）但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在它原有形式上是毫无用处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拯救了

黑格尔辩证法，把它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才使辩证法成为正确反映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

德国古典哲学的产生和发展，标志着德国资产阶级哲学革命的开

始和继续，它和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一样，充当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它又不同于以革命姿态出现的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而是以公认的教科书和普鲁士王国的御用学者（费尔巴哈除外）的地位出现的。这说明德国古典哲学既反映着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变革要求，又反映着它的保守性和反动性。它和德国资产阶级一样，“**对于保守派来说是革命的，对于革命派来说却是保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323 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并对德国古典哲学做过大量的科学论述，肯定它的历史贡献，批判它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这是我们认识和研究德国古典哲学的指导思想。

思辨哲学

指从抽象思想或概念运动引伸和论证一切事物的一种唯心主义哲学。所谓思辨就是不依靠实践和经验而进行的纯粹思维活动。思辨哲学认为，人类的精神（理智、思想等）是事物的本原；具体事物是由精神产生的，是精神的表现形式。如以“果实”这一概念为例，它本来是人们从现实的苹果、梨等具体果实中概括出来的，而思辨哲学却故弄玄虚，把它说成是先验的独立存在物，并且认为具体的苹果、梨等是由它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思辨的用语中，具体的叫做抽象的，而抽象的却叫做具体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26 页）

近代欧洲思辨哲学的主要代表有法国的笛卡尔，德国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和黑格尔等。黑格尔是思辨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把正常的人类理智的形式变为思辨理性的形式，并且把现实的问题变为思辨的问题。但他强调辩证法，却是他比其他思辨哲学家高明的地方。他说：“思辨的东西，在于这里所了解的辩证的东西，因而在于从对立面的统一中把握对立面，或者说，在否定的东西中把握肯定的东西。”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旧唯物主义，就对思辨哲学进行过斗争。如费尔巴哈说，思辨哲学是从抽象到具体、观念到实在的一种颠倒的哲学，

思辨哲学家不是使自己的概念去符合事实，而是使事实去符合自己的概念。他认为“思辨哲学的秘密则是神学”。旧唯物主义对思辨哲学的批判是有历史功绩的，但由于旧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不懂得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以及思维的能动性，因而不能彻底地批倒思辨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思辨哲学是根本对立的。恩格斯说：“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74 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唯物主义的原则，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这样也就从根本上批倒了神秘的思辨哲学。

自然哲学

是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产生以前关于自然界的哲学学说。它同哲学一样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每个时代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形式。每个时代的自然哲学，都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斗争。

自然哲学在古代就有了。古代自然哲学是古代人对自然界的直觉或臆造。如我国先秦法家荀况的自然哲学，古希腊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都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性质。他们按自然界的本来面目去了解自然界，认为自然界是由火、原子或其他具体物质构成，有其发生和发展过程，有它必然的规律；万物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都在不断地流动和变化，有的还猜到向对立面转化的思想。但还缺乏自然科学依据，有些猜测并不符合客观实际。又如我国先秦儒家孔丘、孟轲的自然哲学，古希腊巴门尼德、柏拉图的自然哲学，都把非物质的“天”或理念作为自然界的基础，并认为自然界是永恒不变的，否认对立面的转化。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是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但最后倒向唯心主义。他的自然观也包含着对自然界发展的辩证猜测。

在西欧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自然哲学被宗教神学禁锢着，它竭力鼓吹托勒密的地心说，宣扬万物是由上帝创造的，为上帝创世说辩解。在我国封建社会，西汉儒家董仲舒的自然哲学，鼓吹“天人感应论”和“天不变，道亦不变”，也是为神权统治造舆论的。王充、刘禹锡、沈括、王夫之的自然哲学，都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反对唯心主义的天命观，坚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

近代西方自然哲学以分门别类的自然科学为依据，最基本的特征是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哲学，如霍布斯、牛顿的自然哲学。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自然哲学，都认为自然界是物质的，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在他们看来，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自然界只有空间上的扩张，而没有时间上的发展。但他们也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如牛顿的力学定律，狄德罗关于无机物向有机物转化、有感觉的生物向有思维的生物转化的思想等。唯心主义的自然哲学，如谢林、黑格尔的自然哲学，都把自然界看成是精神的产物。但也猜测到一些自然界的辩证联系和转化，包含着合理的东西。如谢林认为“原始的两重性”、对立力量的统一是一切自然过程观念的本质，并批判了燃素说、光素说，猜测到电力和磁力的联系等；黑格尔认为“运动的本质就在于空间和时间的直接统一”，承认化学元素的可变性，化学上两边引起质的区别的思想等。

马克思主义对近代西方自然哲学，特别是德国自然哲学的评价是：它“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42 页）恩格斯还批判那些盲目攻击自然哲学的资产阶级学者，指出自然哲学虽有许多谬误和空想，但“还包含许多有见识的和合理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2 页），特别是黑格尔，“他在许多方面是远远超出他同时代的经验主义科学家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2 页）

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产生以后，“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42页）

空想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以前，反映早期无产阶级愿望的一种不成熟的、幻想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六、十七世纪的代表有莫尔、康帕内拉、闵采尔；十八世纪的代表有摩莱里、马布利、巴贝夫。主要代表是十九世纪法国的圣西门、傅里叶和英国的欧文。

空想社会主义已经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对立，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剥削、压迫工人阶级的种种罪行，主张建立一个人人参加劳动、有计划地组织生产和消费、平等和谐的理想社会。有些人（如欧文等）还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产品公有、按每个人需要进行分配；消灭城乡对立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等主张。列宁说：空想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象征、表现和先声**”。（《列宁选集》第二卷432页）

当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还未充分展开，无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因而空想社会主义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它既看不到社会变革的经济根源，更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巨大力量。因而，它认为社会主义的“理想”，只是少数天才人物从头脑中“发明”出来的，而“理想”的现实，也只有依靠他们去向统治阶级、富人们呼吁、宣传，以获得他们的同情和支持；或是通过各种小型试验和示范，使人们认识它的优越性而接受它。总之，空想社会主义认为是英雄创造历史，不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主张和平改造，反对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恩格斯深刻指出：“**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09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十九世纪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作用给予应有的评价，认为他们的著作中“有

对新世界的预测和幻想的描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361 页），“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83 页）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了圣西门、傅里叶、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局限性也多次给予批判。并指出：空想社会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83 页）随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

发展，特别是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后，空想社会主义就愈来愈失去任何意义，并日益走向反动，成为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绊脚石。

批判主义（批判哲学）

指德国二元论和不可知论者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又叫批判哲学。康德认为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批判的时代，哲学的基本任务是在认识世界之前，首先要批判地研究人的认识能力。他说：“我所说的批判不是指对书籍和思想体系的批判，而是指关于可以不依靠任何经验而独立去求得一切知识的那种一般理性能力的批判。”他认为以往的形而上学用有限的范畴去认识无限的对象（上帝、灵魂、自由意志），正是无批判地超越了人的认识能力，因而陷入独断和荒谬之中。但是，他离开社会实践和认识过程来考察人的认识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列宁指出：“不能离开理解（认识，具体研究等等）的过程去理解”（《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220 页），“为了要理解，必须从经验上开始理解、研究，从经验上升到一般。为了学会游泳，必须钻到水中。”（《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221 页）

康德的批判主义，集中表现在他的三部主要哲学著作中，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

《纯粹理性批判》系统地阐述了康德的二元论和不可知论的思想，提出了所谓先验原理（包括先验感性论和先验逻辑）和先验方法。它对认识的三种形态——感性、知性、理性，作了先验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规定：感性不能思维，知性不能直观，理性和经验不相干，等等；还

为读者制定了一个认识论上的“万灵丹”——先验范畴表（包括量、质、关系、样式四大类的十二个基础范畴）。它反复强调知识的二要素论（即由感性经验和先验范畴才能形成知识）；只有现象可知，而物自身（自在之物）不可知；理性只是规定知性原理的能力，不能用理性认识任何有限或无限的对象。列宁说：“康德把认识和客体割裂了开来，从而把人的认识（它的范畴、因果性、以及其他等等）的有限的、暂时的、相对的、有条件的性质当做主观主义，而不是当做观念（=自然界本身）的辩证法。”（《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222 页）这段话深刻地揭露了康德在认识论上的唯心主义实质。

《实践理性批判》阐述了康德的先验唯心主义政治、伦理思想。所谓“实践理性”，就是给人的道德行为规定先天准则的先验的理性。它把社会的人抽象化，说人具有矛盾的两重性的存在，一是作为感性的存在，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支配；二是作为理性的存在，人可以超脱自然规律，按照理性的原则去行动，表明人有意志的自由。它把实践理性规定的道德律称为绝对命令，按照绝对命令行动，是纯粹处于“义务”，是不顾目的和效果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18 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康德的这个善良意志完全符合于德国市民的软弱、受压迫和贫乏的情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211—212 页）这段话深刻地揭露了康德的政治伦理思想的阶级本质。

康德为了创体系的需要，最后想把现象和自在之物、自由和必然、自然和精神、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人为地联结起来，又提出了《判断力批判》。他自欺欺人地认为有了这最后一部《判断力批判》，就可以万事大吉。其实《判断力批判》是康德先验唯心主义体系中最薄弱、最贫乏的部分。它宣扬反动的“天才论”和神秘的目的论，连康德在认识论上某些微弱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因素也不见了。它所谓“联结”和“统一”，实际上审美对象的内容和形式、审美同科学、道德以及人的实践生活的需要都割裂开来，这种观点完全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

和形式主义的。

批判主义反映了十八世纪德国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特别是它的软弱性、妥协性。批判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后来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它作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先导起了开端的积极作用，应该予以肯定；但同时还必须看到它所起的“限制‘理性’和巩固信仰”（《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99 页）的消极作用。

老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右派）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黑格尔逝世后德国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思想代表。主要代表人物有辛利克斯（公元 1794—1861 年）、加伯勒（公元 1786—1853 年）等。

老年黑格尔派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一窍不通，死守黑格尔的反动思想体系，极力宣扬黑格尔的宗教哲学。他们紧紧抓住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来解释一切，认为一切事物在绝对精神中都可以找到它本身存在的依据；黑格尔的逻辑是神圣、万能的，它是可以用来套到任何论题上去的刻板公式。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老年黑格尔派认为，任何东西只要归入某种黑格尔的逻辑范畴，就明白易懂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22 页）

老年黑格尔派是有神论者，认为宗教统治着现存世界，科学不应排斥宗教，哲学和宗教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基督教的上帝可以相提并论，黑格尔的哲学就是以理性形式阐述的基督教神学。老年黑格尔派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把普鲁士王国看作是绝对观念、宇宙精神的体现者，反对酝酿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这说明特别重视黑格尔体系的人，在宗教和政治两个领域中“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16 页）

黑格尔逝世后，他的哲学在德国仍独占统治地位达十年之久，当时老年黑格尔派在德国大学中开设讲座，从右的方面继承和宣扬黑格尔哲学中的糟粕。其反动影响一直保持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例如当时在拉萨尔的《爱菲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中，就

“充满了老年黑格尔派的精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九卷 257 页）

青年黑格尔派（黑格尔左派）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黑格尔逝世后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思想代表。主要代表人物有施特劳斯（公元 1808—1874 年）、布鲁诺·鲍威尔（公元 1809—1882 年）、施蒂纳（公元 1806—1856 年）等。

青年黑格尔派反对封建等级的专制政体，主张资产阶级的民主改革，提出“政教分离”和“个性解放”等口号。他们反对宗教，对《圣经》、

《福音》等“圣书”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起着一定的进步作用。但最初，他们是回避政治斗争的，只限于对宗教的批判，后来才被迫转入政治斗争。

他们也批判黑格尔，自称“超过了”黑格尔。事实上他们并没有摆脱掉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束缚，而是像黑格尔一样，把思想观念看成是产生、支配现实世界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哲学批判所能达到的唯一结果，就是从宗教史上对基督教作一些说明，但就连这些说明也是片面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23 页）

施特劳斯和鲍威尔之间的所谓“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争论，也是在黑格尔思辨范畴之内进行的。他们的历史观都是唯心主义的，所不同的是：施特劳斯把精神“实体”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鲍威尔把“自我意识”看作是历史发展的动力。鲍威尔还无耻地宣称：“精神的真正敌人应到群众中寻找。”施蒂纳把他的至上的“唯一者”（资产阶级极端利己主义者）说成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这都是赤裸裸的唯心史观。青年黑格尔派反对人民群众进行阶级斗争，把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国王身上，对封建专制的普鲁士国家政权卑躬屈膝。充分放映了他们所代表的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和妥协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在青年时代参加过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但他们不同于一般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当时，他们就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些观点有所斗争，后来在《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青年黑格尔派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和清算，并指出：“尽管青年黑格尔派思想家们满口讲的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 22 页）

人本主义

把人看作是脱离社会实践和历史的生物，并以此来解释一切社会现象的哲学学说。人本主义是在批判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中建立的，主要代表是德国的费尔巴哈。

人本主义认为天上的神不过是地上的人的幻象，不是上帝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主张把神“还原”为人，使神学“下降”为人本学。它把自然界当做基础，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一种生物，人的本质就是人的自然的生理属性。例如，费尔巴哈把人的两性关系等说成是人的本质，他说：“理性、爱、意志力……这就是作为人的人底绝对本质。”

人本主义在自然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它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在当时的条件下曾起过积极作用。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反对唯心论的斗争时把他的唯物主义称为“人本主义”。人本主义有很大的局限性，列宁称它“只是关于唯物主义的不确切的肤浅的表述”。（《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78 页）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在生产中总是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结成一定的阶级关系。所以，只有从整个社会关系、阶级关系中去考察人，才能把握人的本质。马克思针对费尔巴哈的错误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8 页）人本主义不懂得社会实践（特别是阶级斗争实践）的重大意义，离开了具体的历史条件，离开了人的社会性、阶级性，孤立地、抽象地研究人，因而必然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它宣扬超阶级的“理

性”和“爱”，即是鼓吹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因而为现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所欢迎。

“真正的”社会主义

又称德国的社会主义。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小资产阶级反动流派。代表人物有格律恩（公元1817—1887年）、赫斯（公元1812—1875年）、克利盖（公元1820—1850年）等。

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德国仍然是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随着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摧毁封建制度，而且要吞并小资产阶级。于是徘徊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就抛出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既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又反对无产阶级的兴起。从一八四四年起，它像瘟疫一样在德国流行，并通过格律恩、克利盖传入国际工人组织“正义者同盟”，成为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它反对共产主义，主张人道主义，把社会主义变成关于“爱”的胡言乱语，妄图用抽象的“博爱”、“人性”等道德说教来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反对暴力革命。格律恩胡说：“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人道主义的世界观才能开辟通向人类未来生活的道路”；克利盖宣扬共产主义是“爱的世界”、“爱的王国”，“用爱把一切人团结起来”，“爱和自制可以获得一切”，“爱万岁！”等等。“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218页）

它维护小私有制，把小市民的生活当作社会主义的理想。格律恩公开表示其愿望是“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地方，能够安安静静地生活和占有自己的财产，能够有足以供养我们的田地，能够有栖身之所”。克利盖在美国组织了一个社会改良协会，企图在社会各阶层、特别是上层的资助下，购置土地分给工人和其他劳动者。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克利盖“这种梦想就像梦想把一切人变成帝王和教皇一样，既无法实现，也不是共产主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94页）

它在哲学上完全是唯心主义的，妄图用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和费尔

巴哈的伦理学，作为它的哲学基础。它仇恨“对他之外的物的依赖”，把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意识神秘化，并把抽象的“人”作为出发点，宣称“人的本质就是一切中的一切”，要根据人的本质来判断一切，抹煞人的社会性和阶级性。

“真正的”社会主义完全是反动的。在德国，它是封建专制政府“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279 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它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相对抗。格律恩之流还公然向反动密探告密，出卖恩格斯和其他革命者，充当反动警察的警犬。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们展开过激烈的斗争，彻底揭露和粉碎了他们的反动言行。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一扫而光，但是它的阴魂却为后来的一些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在新的形式下复活。叛徒、卖国贼林彪一伙也打出“真正的”社会主义这面破旗，贩卖反动的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其结果同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无政府主义

一种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它产生于十九世纪上半叶，广泛流行于十九世纪下半叶和二十世纪初。“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游民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列宁选集》第一卷 218 页）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施蒂纳（公元 1806—1856 年）、法国的蒲鲁东（公元 1809 年—1856 年）、俄国的巴枯宁（公元 1814—1876 年）和克鲁泡特金（公元 1842—1921 年）等人。

无政府主义者认为，社会的最高理想就在于无秩序与无政府的结合。它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和国家权力，荒谬地认为，一切国家都是剥削和压迫的工具，一切权力都是“祸害”，主张“向任何国家、甚至最民主的国家宣战”（施蒂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无条件地反

对国家”（巴枯宁）。它还主张放弃一切政治斗争，用改良主义的办法“消除”资本主义，或用恐怖的手段摧毁国家机构，达到建立一个无政府社会的目的。其实，无政府主义者不是不要政府，而是不要别人的政府，只要他自己一家的政府。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是“在否定政治的幌子下使工人阶级服从资产阶级的政治”。（《列宁选集》第一卷 219 页）

“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列宁选集》第一卷 218 页）它鼓吹“一切为了个人”，声称“我就是一切”、“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东西高出于我”（施蒂纳）。它排斥集体和他人，宣扬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把个人的私利放在首位，反对集体纪律的约束，强调所谓个人的“绝对自由”。它的哲学思想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唯我论。

无政府主义者往往冒充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他们和社会主义者毫无共同之处。他们反对阶级斗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维护资本主义制度。**“无政府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敌人”**。（《斯大林全集》第一卷 272 页）

功利主义

通常是指资产阶级的一种伦理学说。这种学说认为，个人功利是社会道德的标准和人类行为的基础。代表人物有英国资产阶级伦理学家和法学家边沁（公元 1748—1832 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穆勒（公元 1806—1872 年）等人。

边沁把狭隘的个人打算、露骨的利己思想看作是人类一切行为的动机。他认为，人类都受着苦与乐的控制，人的一切活动目的都是为了获得个人的最大幸福。在他看来，“品行最坏的人和有德行的人都有完全一样的行为动机；无论这种人和那种人都想增加自己的幸福总和。”功利主义原则就在于造就个人幸福，增加乐的成分，减少苦的成分。苦与乐是道德的标准，在人的行为上，乐的行为占优势，便是好行为；苦的行为占优势，便是坏行为。苦与乐是立法的基础，国家应该用

法制的手段增进个人幸福，惩罚破坏个人幸福的行为。这是赤裸裸的资产阶级利己主义。为了掩盖这种观点的反动性，边沁声称，按照功利主义行事，就会保证“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他还企图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私有制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极力反对财产公有制，宣称：“任何事物都不像财产公有这样违反功利主义。”马克思把边沁的这套货色斥责为“庸俗不堪的东西”，并挖苦边沁是个“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669 页）

穆勒继承、发挥了边沁的思想。他和边沁不同的地方是：边沁以人的欲望作为社会动力，穆勒则以人的感情作为社会动力。他认为：“功用标准的制裁力和一切其他道德标准一样，就是人类的良心感情。”这种脱离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的唯心主义社会学，显然是非常荒谬的。穆勒对快乐的区分与边沁也略有不同：边沁认为快乐就是快乐，穆勒认为精神快乐高于肉体快乐，实际上是企图使人们去追求空虚的“精神快乐”。

边沁、穆勒的功利主义表达了已经取得政治统治权的资产阶级的思想，为当时以及后来的资产阶级所喜爱。流行于帝国主义国家的实用主义哲学，主张以“功效”为真理标准的观点，就是与功利主义一脉相承的。

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笼统地反对功利主义。毛主席指出：“世界上没有什么超功利主义，在阶级社会里，不是这一阶级的功利主义，就是那一阶级的功利主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21 页）我们是无产阶级的功利主义者，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反对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并且揭露它们的反动性和欺骗性。

实证论

十九世纪上半期产生于法国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创始人是法国的孔德，主要代表还有英国的斯宾塞。当时，在欧洲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开始激化。实证论的出

现反映了资产阶级从革命的阶级向反动的阶级转化。

“实证”一词是“确实的”意思。实证论标榜依据“确实的”事实，抛弃“抽象推理”，认为只有经验事实才是“确实的”，科学就是对于经验事实的描写和记录。实证论对经验事实的解释是唯心的，如孔德认为经验事实是由人们的主观感觉所构成。他宣称事物的本质是超乎人们感觉之外的，不可能认识，也不需要去认识，污蔑唯物论把感觉看作是客观事物的主观映像，是以“抽象推理”为依据的“形而上学”。斯宾塞也认为事物的本质是不能被认识的，这一“科学所不能认识的世界”，正是宗教信仰活动的领域。这说明实证论排斥真正的科学认识，宣扬僧侣主义，完全是不可知论和主观唯心论。

实证论自称是超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上的“中立性”、“无党派性”的哲学，这完全是骗人的鬼话。既然它认为人们感觉经验之外的东西都是“不确实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是不科学的，那就是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论。列宁指出：“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列宁选集》第二卷347页）

实证论把社会发展史看成是思想和认识的发展史。孔德胡说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历“神学阶段”和“形而上学阶段”而达到“科学极端”（即实证阶段）。他把资本主义社会说成是“科学阶段”的体现，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极力为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制造理论根据。斯宾塞鼓吹庸俗进化论，只承认事物发展中的量变，否认质变；胡说事物中的对立面必然趋向调和或均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切都达到了平衡。他还提出反动的“社会有机论”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胡说社会的各阶级就像生物机体的各器官，劳动人民服从资本家，犹如社会机体的各部分服从它的头脑，以此来论证资本主义剥削制度是“合理的”和永恒不变的。

新康德主义

十九世纪六十一—七十年代产生于德国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派别

之一。主要代表有朗格、李普曼、柯亨和文德尔班等。他们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企图从右的方面复活康德的观点。十九世纪末，新康德主义在德国进一步泛滥，以“马堡学派”（柯亨、那托普等）和“弗莱堡学派”（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影响较大。前者着重注意的是认识论问题，后者着重强调社会现象的神秘莫测。新康德主义在柯亨那里达到了高峰。二十世纪初，被新黑格尔主义所代替。

新康德主义是彻头彻尾的主观唯心主义，它否定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自在之物”是客观存在的，更加发展了康德哲学中的唯心主义因素——不可知论、形而上学以及神秘的道德原则等。恩格斯说：“从古典哲学的残余中保留下来的只有一种新康德主义，这种新康德主义的最高成就是那永远不可知的自在之物，即康德哲学中最不值得保存的那一部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467 页）新康德主义者宣扬“没有绝对超主观的东西”，一切实际的存在都是“意识内在的存在”，纯粹思维的判断可以产生自然界的全部内容，我们周围的一切东西，都是由思维创造的。他们还力图证明反映现实世界对认识论来说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认识世界这个任务，人类是无法解决的。他们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胡说谁要是把认识世界理解为世界的真正反映，那他就是否认科学。

新康德主义者在社会历史观上，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们从所谓社会和自然不同的前提出发，完全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认为社会发展是受所谓“目的论”支配的；否认研究社会规律的科学方法，反对马克思

主义的唯物史观。同时他们还以所谓“无党性”来掩盖其资产阶级反动本性，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党性原则，企图通过宣扬“自发论”来反对无产阶级革命。

第二国际修正主义头子伯恩施坦之流，为了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反对马克思主义，力图把工人运动纳入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也竭力宣扬新康德主义。列宁说：“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那里去’，修

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后面蹒跚而行。”（《列宁全集》第二卷 3 页）

新黑格尔主义

十九世纪六十一—七十年代出现于英国的一种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思潮。十九世纪末又相继流行于欧美一些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它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立场，从右边批判和继承黑格尔哲学，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吸取和发展了黑格尔学说中神秘和保守的东西。主要代表有英国的布拉德雷、美国的鲁易斯、法国的克罗纳、意大利的克罗齐，其中尤以布拉德雷和克罗齐的影响较大。

新黑格尔主义认为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还不够彻底，反对黑格尔在唯心主义前提下承认有客观的、外在的实在性。布拉德雷公开宣称他不同意黑格尔的主要原理，主张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绝对经验代替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他认为在心灵之外没有任何独立的存在和事实，一切都包括在绝对

经验（即心灵）之中。在他看来，观念是符号、形容词，和实在的内容不相干；只有心灵的最高体现——绝对经验，才能认识和把握实在。克罗齐主张一切知识都是心灵活动的产物，公开表示他的“心灵哲学”否定了黑格尔的辩证结构。

新黑格尔主义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看成是最荒谬、最危险的东西。它反对辩证法，否认矛盾，认为辩证法是非理性的，矛盾破坏了事物的合理性。布拉德雷为了调和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和形式逻辑的矛盾律的原则分歧，主张把对立统一看成是在事物的连续性中矛盾归于统一（即挖掉对立统一中的相互排斥和相互斗争），否定对立双方的矛盾。在反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上，克罗齐比布拉德雷走得更远，他认为黑格尔的根本错误就在于扩大了对立的概念，把对立的观念与相异的观念混在一起。他也和布拉德雷一样，只注重矛盾的统一，而不承认矛盾的斗争和转化，胡说唯一的真理便是统一。他还恶毒的攻击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改糟了，只保存了它的“形而上学残余”。这说明新黑

格尔主义者，对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极端无知和仇恨。

新黑格尔主义在政治上极端反动。它公开宣扬社会分裂为敌对阶级是完全合理的，无法改变的。它根本否认用斗争的方法解决社会矛盾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它还鼓吹国家是超阶级、超个人、绝对不可动摇的整体，对国家的统治只有顺从，决不可违背，更不允许反抗。布拉德雷鼓吹道德的目的在于自我的实现，只有谨守岗位，努力实践自己的义务，才合乎道德的要求。他把信奉宗教说成是道德的义务，而道德修养则是宗教的义务。克罗齐叫嚷哲学无党性，真理无阶级性；历史因人而异，可以任意歪曲和解释，根本没有客观规律。这种谬论盛行于帝国主义走向日益反动和没落的时期，表明它是维护帝国主义反动统治的工具。

人格主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于美国的一个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主要流行于美国的基督教新教徒中，同时在英、法、德等国也有一定影响。主要代表有鲍恩、福留耶林、布莱特曼等人。

人格主义是赤裸裸的神秘主义。它认为世界是各种“人格”的系统，上帝是最高的人格，世界是按照上帝的意志发展的；一切都是上帝这个“人格”的产物，只有这个“人格”才能统一一切；人具有的这种神秘的“人格”是上帝赋予的。它宣称唯物论和唯心论都不能解决宇宙之谜，只能使人感到不安；只有承认“人格”是世界的本原，才可以使唯物论和唯心论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得到解决。它认为对近代人来说，自然已经被征服，宇宙间已经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事；摆在人们面前的主要是宗教、道德和功利的问题。它公开宣扬宗教是唯一的真理，科学只是达到宗教真理的途径，上帝创造的世界是完美的。鲍恩公开鼓吹宗教中心论，把宗教看成是高于一切的，主张必须有个活的有人格的上帝。福留耶林也毫不隐讳地说，人格主义是以有神论为出发点的；人的人格顺从上帝则善，违背上帝则恶，人的思想、行为和物质环境根本不相干。这显然是用来麻醉和愚弄人民的。

人格主义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和阶级斗争学说。它叫嚷要在全部战线上对唯物主义作坚决的进攻。它认为，需要改变的并不是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是人的“人格”（精神）。它把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根源归之于人的精神，认为只要信赖上帝，进行“精神的自我修养”，

做到“内心的平衡”和“道德再生”，就能消除危机。它还公开宣扬，苦难包含于不可思议的“人格”之中，受苦受难也可说是对世界道德进步的一种贡献，死亡是可喜的解脱。这说明人格主义是维护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反动工具。

民粹派

十九世纪俄国革命运动中的小资产阶级派别。它否认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的必然性，认为这只是“人为的”偶然现象；否认工人阶级是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幻想在农民村社和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它还坚持反动的唯心史观，蔑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主张在斗争中采取个人恐怖手段。列宁指出：“民粹主义的实质就是从小生产者、小资产者的角度代表生产者的利益。”（《列宁全集》第一卷 374 页）

民粹派有早期和后期的区别。早期的称为行动的民粹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拉甫洛夫、特卡切夫等，他们从“农民有共产主义本能”出发，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但是，他们并不真正了解农民，农民也没有跟他们走，加上斗争又缺乏统一的组织，很快就被沙皇政府镇压下去了。后期的称为自由主义民粹派，主要代表人物有沃龙佐夫、米海洛夫斯基等。如果说早期的民粹派还同沙皇进行过某些斗争，那么，后期的民粹派则完全放弃了反沙皇斗争，而主张与沙皇政府调和妥协。“他们简直以为只要向这个政府客客气气地请求一下，它就会把一切都安顿得妥妥贴贴。”（《列宁全集》第一卷 238 页）他们代表富农的利益，提出一些反动的“社会改造”计划，并疯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

民粹派在哲学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者的大杂烩。他们把资产

阶级的实证论、新康德主义和马赫主义等拼凑在一起，还特别推崇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社会学。

由于民粹派的理论和实践严重地阻碍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政党的建立，列宁同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等著作，揭穿了民粹派名曰“人民之友”其实是人民之敌的反动面目，从思想上彻底粉碎了民粹主义。

“合法马克思主义”

是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派，俄国工人运动中第一个机会主义派别，产生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主要代表是司徒卢威（公元1870—1944年）。当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在俄国广泛传播，并逐步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于是混入工人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同路人”，就披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所谓“合法”的活动，来歪曲和反对马克思主义，所以被称为“合法马克思主义”。

“合法马克思主义”歪曲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百般地赞扬资本主义制度，掩盖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劳动群众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抹煞阶级矛盾。司徒卢威胡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压迫的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而在于“技术不合理”，“造成农民贫困的祸首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人口的增长”。他站在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反动立场上，胡说俄国人口过剩是由于人口的增长和生活资料不相适应，而不是由于资本的统治。列宁针锋相对地指出：“**农业俄国人口的过剩是由于资本的统治，而不是由于人口的增殖和生活资料之间的不相适应**”。（《列宁全集》第一卷455页）司徒卢威还公开提出“俄国应该从贫穷的资本主义国家变成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充分暴露出“合法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本性。

“合法马克思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阻挠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司徒卢威污蔑马克思否认国家，“过分”“迷恋”于对“现代国家的

批判”而犯了片面性的毛病。他宣扬“国家首先是秩序的组织”，反对推翻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列宁指出：“谈到现代国家时说现代国家‘首先（原来如此！?!）是秩序的组织’，这就等于不了解马克思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列宁全集》第一卷 397 页）司徒卢威还妄图用改良主义代替无产阶级革命斗争，要人们关心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去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

“合法马克思主义”还抹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用唯心主义代替唯物主义。司徒卢威诬蔑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还没有得到纯粹哲学的论证”，抹煞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他抽象地谈论各种问题，掩盖各种现象的阶级本质；泛谈一般“进步”，而不去研究某一具体社会形态的具体的“进步”。他对民粹主义的揭露，既没有指出它的“实质”，也没有指出它的“来源”，也是“过于抽象，是唯心主义的。”（《列宁全集》第一卷 373 页）

列宁同“合法马克思主义”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揭露了它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本性。在一九〇五年后的反动年代里，司徒卢威等人出版了《路标》文集，公开拥护斯托雷平的反动统治，诬蔑一九〇五年革命运动，号召知识分子为沙皇政府效劳。列宁称这个文集是“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121 页）后来，许多“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成了俄国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在十月革命胜利后，成了反对苏维埃政府的反革命分子。

经验批判主义（马赫主义）

奥地利资产阶级哲学家马赫和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阿芬那留斯于十九世纪末期共同创立的主观唯心主义学派。

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的基础是经过批判了的“经验”，即所谓“清洗过的完全的经验”、“纯粹的经验”，没有任何“物质”内容的神秘的东西。在经验批判主义者看来，经验并不来源于客观世界，而只是和自我感觉联系在一起。它认为物是“感觉的复合”，只有感觉才是唯一存在着的東西。这说明经验批判主义是属于所谓内省体验的那种

唯心的经验论。马赫、阿芬那留斯等人所以特别喜欢“经验”这个词，是为了给自己的理论涂上“实在论”的色彩。其实，对“经验”一词含混不清的解释，早就成为各种唯心主义体系的遮蔽所了。马赫、阿芬那留斯之流侈谈“经验”，是为其往返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间的折衷主义服务的。经验批判主义者惯用新的名词术语掩盖其唯心主义实质。马赫自吹发现了“世界要素”，并把感觉叫做“要素”，宣称一切存在的东西都是感觉；阿芬那留斯创造“原则同格”的谬论，胡说自我和环境是处于不可分割的同格之中。列宁指出，所有这一切，都是重弹主观唯心主义的老调，“**都是同样的破烂货色，只不过挂上了略加粉饰或重新油漆过的招牌而已。**”（《列宁选集》第二卷 65 页）经验批判主义者有很大的虚伪性，他们标榜自己的哲学是“自然科学的最新哲学”，事实上他们只是和自然科学中的一个学派有联系，这一学派由于物理学旧概念的崩溃和在相对主义的影响下陷入了唯心主义。经验批判主义者还标榜自己的哲学是“无党性”的，事实上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在经验批判主义认识论的烦琐语句后面，不能不看到哲学上的党派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着现代社会中敌对阶级的倾向和思维体系。**”（《列宁选集》第二卷 365 页）

经验批判主义渊源于贝克莱哲学和休谟哲学，它又和反动的实证论、内在论非常密切，可以说是一种五花八门的大杂烩。新实证论、实用主义、逻辑实证论、经验一元论等都受经验批判主义的直接影响，或者就是它的变种。随着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泛滥，二十世纪初，经验批判主义在西欧和世界其他地区有较广泛的影响，在德、奥、俄等国都有一些自命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以“改善”马克思主义为名，企图以经验批判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经验批判主义及其变种进行了彻底揭露和批判。

内在论

现代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之一，产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代表人物有德国的舒佩、雷姆克、舒贝特—索尔登和奥地利

的莱克列尔。“内在论”这个名称本来的意思是“经验的”、“凭经验得到的”，实际上和马赫主义是一路货色。马赫自称他的哲学和内在论处于同等地位，马赫主义者彼得楚尔特也承认内在论和经验批判论是统一的“新”派，他还公开宣称马赫、阿芬那留斯、舒佩三人是“新”派的领袖。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指出，内在论者和经验批判主义者“**亲密地同居着**”。（《列宁选集》第二卷216页）

内在论同马赫主义一样，坚持物是感觉的复合这一主观唯心主义观点。舒贝特—索尔登说：“我们直接感知的东西都是感觉，是不断变化的感觉的复合。”他宣称：“一切东西的直接基础是精神的（唯我论的）联系，个人的自我（个人的表象世界）及其肉体是精神联系的中心。没有这个自我，其余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没有其余的世界，这个自我也是不可设想的。”内在论者舒佩说，意识和外部世界有“绝对的联系”，“在这种联系中，它们构成存在的统一的、原初的整体。”这与阿芬那留斯的所谓“原则同格”唱的是一个调子。

内在论认为规律不是自然界所固有的，而是人们加于自然界的。它十分仇视唯物主义，攻击自然科学中的唯物主义是“超经验的”“形而上学”。

内在论公开护卫宗教。雷姆克宣扬神不是超感觉的，而是“实在的概念”。他吹捧牧师比德曼的《基督教教义学》是典型的“科学的神学”著作。内在论者莱克列尔宣称他的哲学能“满足宗教信仰者的一切要求”。另一个内在论者舒贝特—索尔登叫嚷“社会民主党人忽视了一个事实：没有神恩施的不幸，就没有幸福”。这充分表明内在论者扮演着信仰主义奴仆的角色，他们用自己的哲学为帝国主义的反动政治服务。列宁揭露内在论者的反动本质时指出：“**内在论者是反动透顶的反动派，信仰主义的公开说教者，彻头彻尾的蒙昧主义者。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不公开地用自己的理论性最强的认识论著作来捍卫宗教，替这种或那种中世纪思想辩护**”。（《列宁选集》第二卷215—216页）

唯能论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在欧洲流行的一种唯心主义思潮，是物理学唯心主义的一种表现，由德国化学家和折衷主义哲学家奥斯特瓦尔德（公元1853—1932年）首先提出。

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人们认识到物质的各种运动形式可以互相转化，经常用“能量”来表示物质的运动。

“自然科学把能量的转化看作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和人类经验的客观过程，即唯物地看能量的转化。”（《列宁选集》第二卷278页）到十九世纪末，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先后发现了电子和放射性元素等，打破了旧物理学的物质结构和性质的观念，使物理学发生革命性的变革。原来认为原子不可分割，实践证明是可以分割的。面对物理学这场革命，不同的物理学家和哲学家有不同的解释。唯心主义的“唯能论”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笼的。

奥斯特瓦尔德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可以归结为“能”，“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概念包含在能量概念之中”；“能”可以脱离物质而存在，“物质无非就是能的空间集合”，它“不仅可以省去，且属有害”；

“能”是由我们的思想创造的，“我们意识的过程本身就是能量的过程，它把自己的这种特性传给一切外界现象”。唯能论企图用“能量”一词，从字面上消除物质第一性还是意识第一性的问题，而实质上它把物质归结为“能”，否定物质的客观存在，想象一种没有物质的运动，这是纯粹的唯心主义。列宁指出：“**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这种企图偷运着和物质分离的思想，而这就是哲学唯心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274页）“**唯能论物理学是那些想象没有物质的运动的新的唯心主义尝试的泉源**”（《列宁选集》第二卷280页），“**唯能论是从唯物主义逃到唯心主义的借口**”。（《列宁选集》第二卷291页）

唯能论一出世，就遭到唯物主义自然科学家的驳斥。“唯物主义

者批判奥斯特瓦尔德，是因为他常常陷入唯心主义，是因为他企图调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 278 页）同时，奥斯特瓦尔德也受到唯心主义者的批判。唯心主义者批判他，是因为他承认唯物主义的能​​量观点。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先是接受唯能论转向唯心主义，后又站在马赫主义立场上批判奥斯特瓦尔德的唯能论，但他不是批判奥斯特瓦尔德的唯物主义不彻底，而是批判他的唯心主义不彻底。

“物理学”唯心主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流行于欧洲物理学界的唯心主义学派。主要代表有德国的马赫（公元 1838—1916 年）、法国的彭加勒（公元 1857—1912 年）、比利时的杜恒（公元 1861—1916 年）、英国的毕尔生（公元 1857—1936 年）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中先后发现了 X 射线、柏克勒射线和镭等放射性元素，发现了电子，它标志着人类对物质内部结构认识的深入，使物理学发生革命性的变革，这对形而上学自然观和旧物理学的传统观念是一次大冲击。一些自发的唯物主义物理学家把这场革命不确切地表述为“原子非物质化了，物质消失了”，“电代替了物质”；而以马赫、彭加勒为代表的的一伙实证主义者却利用物理学的新发现，得出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结论，疯狂攻击唯物主义。

他们否认物质的客观存在及其可知性，叫嚷物质“离开了思维它和感觉它的精神是不可理解的”，物理学的新发现驳倒了物质，物只不过是“感觉的复合”、“感觉群”、“感性知觉群”。他们否认自然界中一切

客观规律性，胡说物理的必然性是不存在的，宣称人是自然规律的创造者，自然规律是人为了“方便”而创造的符号、记号，鼓吹没有物质的运动，胡说“万物都在运动——但只在概念中运动”。他们否认科学理论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宣扬科学定律是“人心的产物”，理

论，定律都是人创造的符号、记号、标记等。列宁指出：“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基本思想“是否认我们通过感觉感知的并为我们的理论所反映的客观实在，或者是怀疑这种实在的存在。”（《列宁选集》第二卷 310 页）其实质就是企图用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来代替唯物主义，这完全是反动的。

列宁指出：“有教养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们像快淹死的人想抓住一根稻草来救命一样”（《列宁选集》第二卷 314 页），他们企图制造和利用“物理学”唯心主义来欺骗群众，以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这就是它产生的社会根源。其认识论根源，一是物理学数学化之后，一些物理学家在运用数学公式表达物理学规律时，抛弃了它所反映的客观内容，只剩下一些方程式；二是一些物理学家用相对主义的观点来对待物理学的新发现，他们在说明我们知识的近似的、相对的性质时，却否定了意识所反映的客观实在，从而导致了唯心主义。

列宁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物理学”唯心主义。他指出：“‘物质正在消失’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迄今我们认识物质所达到的那个界限正在消失，我们的知识正在深化；那些从前以为是绝对的、不变的、原本的物质特性（不可入性、惯性、质量等等）正在消失，现在它们显现出是相对的、仅为物质的某些状态所特有的。”（《列宁选集》第二卷 266 页）物质的某些具体性质的消失，决不是物质的消失。从哲学上学，“物质的唯一‘特性’就是，它是客观实在，它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外”。（《列宁选集》第二卷 266 页）这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永恒的，是永远不会消失的。物理学的新成就不但不会驳倒辩证唯物主义，而且进一步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

“物理学”唯心主义的出现，说明自然科学上的新发现往往伴随着哲学上的一场大论战，科学史上的斗争同哲学史上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我们必须重视自然科学领域的哲学斗争，并学会进行这种斗争，才能正确地辨别随着自然科学的变革而产生的各种学派和思潮，有效地抵制唯心主义的侵袭。

经验一元论

俄国马赫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的反动哲学。

经验一元论认为：世界最初是“要素”的混沌的世界；然后出现的是人们的“心里经验”（指意识、表象、感觉等）；并从“心里经验”“代换”（即引伸、派生）出“物理经验”（即物理的东西、外部世界、物质）；最后才产生出认识。它把物质世界叫作人们的“经验”，公开宣称心理的东西先于物理的东西。列宁指出其“唯心主义的实质在于：把心理的东西作为最初的出发点；从心理的东西引出自然界，然后再从自然界引出普通的人的意识”。（《列宁选集》第二卷 231 页）他还指出：这个作为出发点的“心理的东西”，实质上并不是普通人的意识、感觉，而是“神的感觉”。所以，经验一元论“就是纯粹的僧侣主义哲学”。（《列宁选集》第二卷 233 页）

为了掩盖其唯心主义面目，波格丹诺夫用“人类”的经验来代替马赫主义的个人经验。在他看来，“物理自然界”是由“生物的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派生的，这就是认识上的社会主义，就可以与马赫主义相区别。列宁指出：“以为用人类的意识代替个人的意识，或者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代替一个人的经验，哲学唯心主义便会消失，这等于以为用股份公司代替一个资本家，资本主义便会消失一样。”“真是痴人说梦。”（《列宁选集》第二卷 235 页）

经验一元论是二十世纪初适应俄国修正主义分子的反动政治需要而出笼的。它的思想来源就是贝克莱主义和马赫主义。列宁称它为哲学唯心主义变种中的“第一千零一种的小体系”（《列宁选集》第二卷 274 页），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批判。

寻神说和造神说

俄国一九〇五到一九〇七年革命失败后，流行于部分知识分子中的宗教哲学思潮。当时，“俄国资产阶级为了反革命的目的，需要复活宗教”（《列宁全集》第十六卷 33 页），寻神说、造神说便应运而生。

寻神说的代表人物有资产阶级路标派（以出版反动的《路标》文集而得名）布尔加柯夫、别尔加也夫等人。他们鼓吹进行“宗教改革”，力图把宗教、科学和哲学综合起来。他们宣扬所谓“神人的辩证法”，即从人中产生神和从神中产生人，把“神人”的创造搬到现实生活中来。他们说，生活的目的就是“寻神”，历史的使命就是使人变成神，即创立神化的人类，亦即创立建筑在宗教基础上的社会组织。他们妄图用这种非理性的神秘主义的东西，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相对抗，引诱人们离开革命的道路。寻神派分子受到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的严厉批判，他们大多数于十月革命后逃往国外，公开反对苏维埃政权。

造神说的代表是俄国的修正主义者，即披着“马克思主义者”外衣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尤什凯维奇等人。高尔基也曾一度受骗而参加造神派。他们在白色恐怖下对革命丧失信心，借口“改善”、“发展”马克思主义，企图把马克思主义与宗教结合起来，创造一种无神的宗教即社会主义的宗教。卢那察尔斯基甚至设想出了一个神，鼓吹“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神化”，说“新的宗教在我心中早已经成熟了”等等，这丝毫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只能更加暴露出俄国马赫主义者的反动面目。他们声称是反对寻神说的，列宁揭露他们反对寻神说，仅仅是为了要用造神说来代替它。寻神说同造神说的差别，“丝毫不比黄鬼同蓝鬼的差别大”。（《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 105 页）事实上，在这个时候，任何捍卫或庇护神的观念的行为，都是庇护反动派的行为。造神说终于在一九一二年革命高涨时彻底破产。

实用主义

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十九世纪末产生于美国，二十世纪初开始广泛流行。一九〇七年，列宁曾经指出：“在最新的美国哲学中，‘最时髦的东西’可以说是‘实用主义’了。”（《列宁选集》第二卷 349 页）实用主义的创始人是皮尔士（公元 1839—1914 年），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是詹姆士（公元 1842—1910 年）和杜威（公元 1859—1952

年)。中国的反动文人和政客胡适（公元1891—1962年）是杜威的门徒、实用主义的吹鼓手。

实用主义的基本观点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同马赫主义一样，它妄图利用对“经验”一词含糊不清的解释，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掩盖其唯心主义实质。詹姆士把“实在”和“经验”等同起来，认为实在就是经验，除了人们的经验知识，便无所谓客观实在。在他看来，世界的本原是“纯粹经验”，任何事物都是由这种“纯粹经验”构成的。对此，杜威曾加以解释说：“我们首先要注意‘经验’属于詹姆士的所谓‘双义语’”，既指事物，又指思想，“它是一个原始的整体，它不承认任何行动与材料、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而把双方面都包括在一个不可分析的总体之中。”杜威还认为，经验就是自然，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是无法分开的“完整的统一”；又说：“精神和物质两者属于同一个东西，这就是那些构成自然的事件的复合。”既然实用主义者不承认自然界的独立性，把自然界“统一”到他们的主观经验之中，这就彻底暴露了它的主观唯心主义实质。

实用主义者否认客观真理，把真理与实践中有用的东西混为一谈，认为有用即真理。詹姆士认为，所谓“真理”就是“证实和见效的观念”，“它因为真所以有用”，也可以说，“因为有用所以真”。杜威的真理观和詹姆士基本一致，他说“真理即效用”，真理“同所有的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并不在于它们本身，而在于它们的功效，功效是显示在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之中的”。因此，杜威的这种观点又称为“工具主义”。胡适也跟着学舌说：“我们所谓真理，原不过是人的一种工具”，“真理原来是人造的，是为了人造的，是人造出来供人用的，是因为它们大有用处所以才给它们‘真理’的美名的。”总之，在他们看来，任何真理都是主观的、相对的、没有什么客观的、绝对的真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把真理看作认识的工具，这就是在实际上已经转到不可知论方面，也就是离开唯物主义。在这一点上，以及在一切根本观点上，实用主义者、马赫主义者、经验一元论者都是一丘之貉。”（《列宁全集》第三十四卷431页）

实用主义主张“有用”即真理的反动观点，是为一切反动派效劳的，它特别适应了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和对外扩张的需要，是极端反动的。

工具主义

实用主义的变种，由美国的资产阶级反动哲学家杜威(公元1859—1952)所创立。

工具主义否认客观世界的实在性，认为“自然和经验是和谐并进的”，精神和物质“属于同一个东西”。这种观点和实用主义一样，在一切根本点上，同马赫主义没有什么差别。它把观念、理论的东西看作是一种工具。主张为了解决面前的任务，采用任何工具都是允许的，关键在于“效用”，看它干得是不是“漂亮”。它认为思想工具是同生活中的用品一样，都是人们制造出来的，按杜威的说法，是主观“演绎”的产物。因此，它根本否认客观真理，攻击唯物主义的真理观是“陈腐可憎的学说”。

工具主义既然否认真理的客观性，也就必然否定真理的绝对性，它把真理当做“权宜之计”或是“一种应变的对策”。这种随个人愿望、要求而变的真理观，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反动本质。工具主义为了掩盖这种反动本质，主张要进行“无所为而为的、大公无私的探讨”，就是说，在思索和行动中，要不受社会习惯和确定目标的约束。其实，“大公无私”的说法，完全是骗人的；“无所为而为”的主张，不过是资产阶级任意妄为、冒险行动的代名词而已。

在道德观上，工具主义认为符合眼前利益的就是最高的“善”，否则就无善可言。在杜威看来，所谓“善”，就是日常生活中“经验的满足”。你有你的“经验”，我有我的“经验”，过去有过去的“经验”，现在有现在的“经验”，道德的标准是不固定的，为了符合个人“经验的满足”，任何行为都应该被认为是“道德”的。这种道德观完全是为反动没落阶级的一切侵略、压迫、屠杀抢劫、荒淫无耻行为作辩护的。

总之，工具主义和实用主义一样，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完全适应了帝国主义时期垄断资产阶级的需要，是极端反动的。

新实在论

二十世纪初出现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之一，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与客观唯心主义的杂拌。主要代表有美国的培里、孟太格、霍尔尔特，英国的穆尔、罗素、亚历山大，以及由英国迁居美国的怀特海等人。

新实在论者通过制造反对唯心主义的假象来偷运唯心主义的黑货，它提出“认识的对象是客观独立的实在”这一感人的说法，却不敢直接回答对象的本原究竟是什么。孟太格转弯抹角地说：“最低限度某些被我们所认识的本质或共相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到它们的时候即已存在了”，这就是说，有脱离特殊的东西而独立存在的共相。他故意把特殊的东西叫做“存在”，称共相为“潜在”，以表示自己的哲学和中世纪的“实在论”以及柏拉图的“理念论”有区别，其实新实在论正是这种哲学的复活。

另一些新实在论者认为“思维中的事物和感性中的事物一样，逻辑的本质和物理的本质一样，作为观念而存在的事物和实际存在的事物一样都具有完全的实体论的意义”，他们宣称“实体”既不是物质的，也不是精神的，而是所谓“中性的实体”。新实在论者培里认为，在认识过程中，人们的观念和客观事物是溶为一体的，胡说郁金香的观念和郁金香在一切因素上都是同一的。这种谬论和马赫的“物是感觉的复合”一模一样。另一个新实在论者霍尔尔特认为，宇宙的最后“要素”是最简单的逻辑术语，精神和物质就是逻辑术语的不同组合，正是由这种逻辑术语组成“中性的物体”，这不过是给马赫的“世界要素”披上逻辑的外衣。

新实在论者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霍尔尔特胡说阶级斗争的原因在于人本身的自然特性，“聪明的人”不能不引起“愚蠢的人”的憎恨和嫉妒，而“愚蠢的人”，除了引起“聪明的人”的

轻视和嘲笑之外，再也不能从那里得到什么。阶级斗争就是这种冲突的结果和表现，而这种心理冲突则是由人们生理上的不同而产生的，这是赤裸裸地宣扬“剥削有理、压迫有理、造反无理”的反动谬论。他还鼓吹反动的种族论，胡说肤色是同人的聪明才能直接相联系的色素，公然叫嚷“美国人”是上帝挑选出来的，负有特殊天命的种族，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摇旗呐喊。

批判实在论

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之一，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流行于美国，代表人物有桑塔亚那、布拉特、罗杰斯等人。一九二一年，他们集体写作的《批判实在论概论》一书，集中反映了这一学派的基本思想。

批判实在论不同意新实在论关于客体、主体同一的观点。新实在论认为客体、主体是同一的，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客体、主体都不能独立存在。批判实在论认为客体、主体都是独立的存在，而且客体、主体之间还有一种名为“原素”（或“本质”）的东西。“原素”既不依赖于主体，又不是客观的物自体，它没有物理的实在性，不具有时间、空间的存在形式，但是它能建立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联系，并构成认识的内容。“原素”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样产生的？批判实在论没有、也不可能做出回答。

批判实在论坚持的是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不可知论。它自称承认客体的存在，但又认为人们很难证明客观事物的实在性。按照桑塔亚那的说法，外部事物的存在是根本不可能得到证实的一种“假说”。这说明，批判实在论所讲的“存在”完全是虚假的，这纯粹是唯心主义怪论。批判实在论和新实在论，形式不同，实质都一样，它们之间的分歧是唯心主义内部的分歧。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世界依赖于一般思维，——这是最新的实证论，这是批判实在论，一句话，这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欺骗手段！”（《列宁选集》第二卷 224 页）

批判实在论在政治上极端反动，它要求人民群众放弃积极活动，放弃阶级斗争，推崇“容忍现实”为做人的基本原则。桑塔亚那极力

维护阶级压迫制度，他认为，“强者”应该制服“弱者”；在一片混乱的社会中，只有“特等人”才能整顿社会秩序，等等。这些都是直接为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帝国主义侵略作辩护的。

逻辑实证论

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流派之一，和马赫主义一脉相承，是实证论的变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石里克建立的“维也纳小组”首创这种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个流派的中心移到美国。主要代表是美国的卡尔纳普、弗兰克和英国的艾耶尔等人。

逻辑实证论和实证论一样，自我标榜凌驾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上，实际上是地地道道的唯心论。它认为人们的认识只局限于经验，经验之外的客观世界究竟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是无法说明的。艾耶尔污蔑唯物论承认客观世界的独立存在，“不仅是虚假的，而且是无意义的”。石里克也认为“‘外界的实在性问题’是一个无意义的假问题”，只要人们一谈客观世界问题，就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和矛盾，只有不谈它，困难和矛盾才会消除。这完全是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

逻辑实证论认为，哲学不过是“语言逻辑分析”。因此，必须抛弃对所谓“形而上学”问题的研究，而致力于研究逻辑和句法。卡尔纳普说：“一切哲学问题都是逻辑问题”。在逻辑实证论者看来，认识只是探索各种不同的名词系统，并借以构造各种不同的“世界图画”；科学只是科学家头脑中创造出来的“逻辑结构”；真理只是科学句子彼此在逻辑上的协调。它特别强调逻辑学和数学是一种形式科学，是以纯粹的假言前提为基础的演绎体系，不反映客观现实。卡尔纳普认为：“把实在和幻想加以区别，这是心理学家的任务，而不是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的任务。哲学家和逻辑学家只能论列‘存在’一词的各种不同意义，并试图提供使用这些意义的规则”。这是打着逻辑的幌子肆意进行诡辩。

逻辑实证论者还公然鼓吹建立世界性的“消除各族人民绝对自主权的超政府”，否定民族独立和国家领土不可侵犯的神圣权利，明目张

胆地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政策服务。

语义哲学

从逻辑实证论演化出来的一种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开始盛行于美国。主要代表有卡尔纳普、培尔斯基、柯日布斯基、切斯等人。

语义哲学根据逻辑实证论关于哲学是“语言逻辑分析”的谬论，进一步认为语言只是一些符号。一切名词、术语都不反映客观事物，它们除了和人们的感情相关联之外，毫无别的意义。语义哲学把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看成只是不同语言体系的斗争，如柯日布斯基公开主张“从科学中完全消除‘物质’、‘实体’、‘空间’、‘时间’诸如此类的用语”，他的门徒瓦勃尔也说：“现实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最大的虚构”。

语义哲学把作为人们交际工具的语言说成是决定整个社会的因素，胡说一切社会问题都可归结为语言问题。切斯说：“‘资本主义’、‘原则’这些概念，乃是凭借语言在人脑中制造出来的，同时，也凭借语言使它们物化了。最高能率的显微镜也无法揭示它们”。他更荒谬地说：“‘失业’不是一种物体，你根本无法证明它是否实际存在，而仅仅是一个词”。按照语义哲学的怪论，资本主义剥削、经济危机、阶级斗争等等，都只是一些“有害的言辞”，这些言辞给人类带来了灾难。柯日布斯基公开污蔑人民群众是由“百分之九十九的精神病患者”所组成。这充分暴露出语义哲学的反动本质。

语义哲学吹嘘它为拯救社会指明了道路，办法就是改善语言，把一切“有害的言词”统统清除掉，这样人类就可以免除“灾难”，一切哲学争论也就会得到彻底解决。培尔斯基胡说，只要人们按照语义哲学来理解“民主”、“自由”等字眼，社会就会确立普遍的民主和自由。毛主席曾深刻指出，一切反动派“不但需要欺骗别人，也需要欺骗他们自己，不然他们就不能过日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按语）语义哲学正是腐朽没落资产阶级的自欺欺人的哲学，它反映

着这个阶级在政治上的极端反动和思想上的极端空虚。

新托马斯主义

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在帝国主义时期的复活。自从一八七九年，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以特别《诏书》宣告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为天主教会的最高哲学权威以后，托马斯的经院哲学就重新复活，逐渐成为现代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的一个流派。它开始流行于法国、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流行于美国。主要代表有法国的马利旦和吉尔松，美国的哈林顿和柯林斯，比利时的德·雷曼凯尔，西德的洛兹和德·弗里斯，奥地利的维特尔等。

新托马斯主义是一种公开的宗教哲学，它把物质说成是居于存在与非存在界线上的纯粹的可能性，只是“渴望”存在，还不是实际上存在，要由形式来赋予物质以实际上存在的权利，而最高的形式就是上帝。它宣称世界的历史是由上帝自由制定的永恒计划的实现，上帝本身是世界上一切事物的目的，“人只有与上帝联系在一起才能受到尊重，因为他的这一切——包括他的尊严在内——都是从上帝那里来的”。这完全是一派胡言。

新托马斯主义者尽管不得不放弃托马斯所坚持过的“地球中心说”，但又顽固地坚持理性（哲学、科学）与信仰（宗教迷信）一致并从属于信仰的反动观点，叫嚷哲学家绝无资格否认神学对哲学所拥有的种种权力。新托马斯主义认为有两个世界：即经验世界和超经验世界。经验世界是表面现象，超经验世界才是本质，人的理性只能认识经验世界，超经验的世界必须靠信仰去把握。它宣称宗教是最高真理——天启真理的保卫者，上帝自身的本质不是人的理性所能认识的，只能通过天启真理显示出来。马利旦认为科学只认识可以观察到的东西的空间—时间的联系，而不能认识存在；只有信仰才能认识存在。波尹尔叫嚷：“没有上帝的帮助，理性也不可能解释宇宙”。因此，他们认为人的理性认识不能和上帝的启示（即宗教信仰）相对立，科学家必须承认宗教信仰，不得干涉宗教。这和中世纪的托马斯一样，新托马斯主义者力图把科学变为神学的婢女。

新托马斯主义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它污蔑马克思主义是“对科学的一种破坏”、辩证法的发展观“破坏了事物”；并恶毒咒骂马克思主义是“隐藏的、魔鬼的、非人性的力量”，叫嚷要不惜一切代价“予以抵抗”。与此同时，它还公开鼓吹资本家与工人彼此相互依赖是绝对必需的，劳资调和是上帝规定的合理性的表现；私有财产制度是人的个性的必然表现；还胡说什么美国不仅“越过了”资本主义，并且已经“越过了”社会主义。这充分表明新托马斯主义是地地道道的垄断资产阶级的御用哲学。它的出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当权的资产阶级由于惧怕日益成长壮大的无产阶级而支持一切落后的、垂死的、中世纪的东西”。（《列宁选集》第二卷 449 页）

存在主义

也叫生存主义，现代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反动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于德国、法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流行于美国等国。丹麦反动分子克尔凯郭尔的神秘主义，对存在主义的形成给以极大的影响。主要代表有德国的海德格尔、雅斯贝斯和法国的马塞尔、萨特等。

存在主义是极端晦涩的神秘主义，它把人的主观精神——“自我”说成是世界的本原，一切事物（包括人的自身），都是“自我”的表现。它认为，没有这个“自我”，就没有世界，没有一切。雅斯贝斯称“自我”是“大全”（即包括一切），人是能把被认知了的东西包含于自身；但是，他又强调任何被认知的存在都不是存在自身，即使是被认知了的我也不是我自身。萨特曾公开表示，存在主义虽有有神论和无神论之分，但所有存在主义者，都主张“存在先于本质”，即神秘的存在先于事物的本质。萨特还宣扬人的唯一希望就在于行动，除去行动，就无所谓现实；但人对自己的理想是否能够实现，却一无所知。可见，存在主义乃是唯我论和不可知论的主观唯心主义杂拌。

存在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死敌，它打着“人是自由的”旗号，反对唯物主义的决定论，吹嘘只有存在主义才是给人以尊严的理论。萨特叫嚷：“不容有决定论”，还胡说什么：“一切唯物主义的结果，都是把一切人（包括这位正在作哲学思考的人在内）看成是东西，即是

说，把人看成是一堆受必然关系决定的反应所组成的总体，……我们明确地愿望把人类世界建立为一个和物质世界有所不同的价值总体。”其实，非物质的人，不受“必然关系决定”的人，根本就不存在，更谈不上什么尊严不尊严。存在主义还企图以所谓“自我选择”来抹煞阶级社会里的剥削和压迫的反动本质，还是这个萨特胡说什么：“人，不仅就是他自己所设想的人，而且还只是他投入存在以后，自己所志愿变成的人。”这等于说人一旦存在以后，处在什么地位就应安于什么地位，这是自己选择的、命中注定的，无法改变的。这种谬论的反动作用是十分明显的。

存在主义把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胡说成是整个世界的毁灭，悲鸣二十世纪是恐惧的世界和毁灭的时代，认为人生来就是烦恼的，人生是一场悲剧，活着就是等死。因此，有的主张人的行为不应受任何约束，可以为所欲为；有的主张要想消除恐惧，只有祈求上帝；有的主张要主动迎接死亡。它把死亡看成是人生最大的忧虑和恐惧，认为哲学的任务就在于对死亡进行研究。存在主义哲学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死亡哲学。它反映着腐朽反动的资产阶级在垂死挣扎中的绝望和恐惧心理。

神学

一种宣扬神是最高存在、神权支配一切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它是反动统治阶级用来保护宗教迷信，麻痹革命人民，反对社会变革，维护或复辟旧制度的思想工具，是唯物主义和科学的死敌。列宁指出：在现代，“任何捍卫和庇护神的观念的行为（甚至是最巧妙的、最善意的）都是庇护反动派的行为”。（《列宁全集》第三十五卷 110 页）

神学是奴隶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在西欧，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苏格拉底曾从哲学上论证神的存在，鼓吹神学“目的论”。柏拉图最先使用“神学”这个名词，他用灵魂不死和神创造世界的宗教学说反对唯物主义。古罗马的斯多葛派、罗马帝国衰亡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都鼓吹“神是万物的本原”，宣扬“宇宙灵魂”，提倡神秘主义。这种谬论后来成为欧洲封建社会基督教神学的基础。教

父哲学的主要代表奥古斯丁，首先提出哲学应当服务于神学。他利用新柏拉图主义来论证上帝创世的基督教教义，胡说只有上帝才能建立“幸福的天国”。

在中世纪，论证基督教教条的神学成为欧洲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恩格斯说：“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一卷 349 页）哲学成了神学的婢女，一切都要按照神学原则办事。早期经院哲学的代表安瑟伦，继承和发展了奥古斯丁的神学。他第一个用本体论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上帝创世”和“来世报应”等教会信条，鼓吹知识是信仰的奴仆。十三世纪经院哲学的主要代表托马斯·阿奎那是经院哲学即神学体系的集大成者，他的主要著作就叫《神学大全》。

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哲学家企图利用神学来对抗唯物主义和无产阶级运动。英国主教贝克莱用主观唯心主义“为了神的无上光荣”效劳。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莱布尼茨宣扬神是构成万物的最高单子，他用“神正论”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绝对观念”也是一种“神学的虚构”（《列宁选集》第二卷 231 页）。在帝国主义时代，“新托马斯主义”、“新经院哲学主义”等神学体系，都通过传播信仰主义对抗马克思主义，为垄断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辩护。

我国商朝奴隶主阶级宣扬上帝主宰世界，是神学的开端。春秋战国时期，孔孟鼓吹的天命论，是古代宗教神学的发展。西汉儒家董仲舒集中了殷周以来的宗教迷信观念，鼓吹“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的目的论，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封建神学体系。东汉章帝时的《白虎通》是封建神学的集中体现，成为当时反动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魏晋以后，门阀地主王弼等人提出的唯心主义本体论（即玄学），是一种改头换面的神学。后来它同佛教神学结合起来，成为南北朝隋唐整个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宋朝的朱熹是唯心主义本体论的集大成者，他鼓吹的“理”和“太极”说，是一种荒诞的神学，为后来的一切

反动派所利用。

有神学就有反对神学的斗争。在中外历史上，劳动人民和进步的思想家、科学家对神学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和斗争。但是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他们都不能揭露神学的社会历史根源，因而也就不能彻底地批倒神学。

只有到出现了大工业生产和近代无产阶级，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以后，才真正敲响了神学的丧钟。

拜物教

最原始的宗教形式。人们把自然力、自然物或人造的某些东西当作神灵加以崇拜，幻想借此避祸得福，求得自然的恩赐。

拜物教是在原始社会的一定阶段上产生的。它没有固定的宗教组织和形式，没有教义，也没有祭司。最初的宗教表现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等的庆祝活动。它的崇拜对象很广泛，并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原始狩猎时期，动物是拜物教的主要崇拜对象。到了畜牧业和农业时期，天体、土地、谷物变成主要的崇拜对象。一切原始民族都有过拜物教。如古巴比伦人崇拜天地、海洋和空气。古埃及人崇拜鸟兽，甚至把某些动物的羽毛也看作是神灵的体现而加以崇拜。古日耳曼人起初崇拜天空、太阳、月亮、火、雷电等，后来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又崇拜“肥沃之神”。在古代战争的影响下，他们把宝剑当作战神来崇拜。古罗马人除上述各种神灵外，还崇拜春播、秋收和五谷等神灵。我国古代人祭祀天神、地神、河神、山神、龙神、火神，以及四方百物之神，都是拜物教的表现。原始民族之所以会产生拜物教，是因为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对自然力还无法加以控制和利用，他们不能认识到自然界的奥秘，也不能意识到人的力量，于是自然力和自然物就以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这种拜物教反映了原始社会人类生活同自然界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原始人类对大自然的依赖性。

原始拜物教是一切其他宗教的出发点，“是一种正向多神教发展的

对大自然与自然力的崇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88 页）随着生产的发展和人们抽象思维能力的提高，原始拜物教逐渐发展为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把一定的动植物或其他现象，看作是自己的祖先，加以崇拜）。儒家提倡的“社稷五祀”，就是由古代人对地、水、火、风等的原始崇拜而来。他们把古代人崇拜的自然神当做是古代的圣贤或祖先；他们宣扬的“三皇五帝”、“先公先王”的各种称号，也无非是天地日月，山川草木，鱼虫禽兽之神的名称。他们利用原始拜物教来宣扬天命论，鼓吹“取法于天”，“尊天而亲地”，为巩固反动统治服务。

拜物教一词，也用来表示人们对社会生产关系的歪曲的反映。商品拜物教就是这样。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人们把商品看作是神秘的东西，好像是它决定了人们的命运。这就叫商品拜物教。马克思说：“**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叫做拜物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 89 页）

多神教

与一神教相反，是崇拜许多神的宗教。大约产生于原始社会的野蛮时期，是从原始拜物教和万物有灵观念发展而来。

原始拜物教是对大自然与自然力的崇拜，虽然已经给自然物赋予人的形象，把人的灵魂扩大到自然界，认为各种自然物都有精灵，但“**还不知道具体的造像，即所谓偶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88 页）多神教则造出许多神的偶像，它认为比较巨大的、与人们生产和生活关系密切的自然物都有神，天有天神，地有地神，太阳有太阳神，雷有雷神，风有风神，火有火神，山有山神，河有河神，生死有生死神，祖先有祖先神等。它按照人的形象来塑造神的形象，给神赋以人的思想和感情，把自然物人格化，然后对这些偶像加以崇拜。恩格斯指出：“**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就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

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 672 页）例如古代埃及人和希腊人曾崇拜“太阳神”、“月神”、“海神”、“天神”、“地神”、“火神”；古代巴比伦人曾崇拜“天神”、“地神”、“海神”、“火神”、“风神”、“暴风雨神”；在我国、日本的古代，崇拜“日神”、“月神”、“农神”、“祖先神”等。但不管怎样的神，总是原始人的化身和幻想。他们要神用手帮助工作，就产生长手和多手的神；要神帮助克服风雨灾害，就创造呼风唤雨、面目狰狞的神；遇到天灾、

人祸，认为这是神的发怒和谴责；遇到丰收和喜事，认为这是神的喜悦和恩赐。总之，人们所崇拜的自然物已进入人格化和偶像崇拜阶段，这是多神教的特征。这种自然力人格化的过程是很复杂的，“在不同的民族那里又经历了极为不同和极为复杂的人格化”。（《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354 页）

多神教的出现，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知识水平低下，人们对巨大自然力无法控制和进行科学解释；同时也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比之前发展、社会分工扩大和人们思维能力有了提高的结果。

在阶级社会，多神教不仅把自然力人格化，而且把社会力量人格化。“最初仅仅反映自然界的神秘力量的幻想，现在又获得了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355 页）我国古代奴隶主阶级所谓“有天下者祭百神”，就是信奉多神教的反映。他们按照当时奴隶社会的人的形象和人间关系去描绘神的形象和神的关系，神有不同的等级，也有统治和服从的关系，给多神教打上了深刻的阶级烙印。

多神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支配人们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是一种错误的世界观。它在历史上起着有害的作用，束缚了人们同大自然或社会反动力量作斗争的精神。有多神教，就有反多神教的斗争。在历史上，许多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都揭露和批判了多神教。

一神教

与多神教相反，是崇拜一种神的宗教。例如犹太教崇拜耶和华（上帝），伊斯兰教崇拜真主，基督教崇拜耶稣等，都属于一神教。

一神教是从多神教发展而来，它的产生有一个过程。最初，是从众神中推出一个所谓更崇高更伟大的神，使众神从属于它。如古代巴比伦人曾把巴比伦城的神“马尔杜克”（太阳）作为众神之首；古代埃及人曾把“拉”（太阳）作为超越诸神之上的崇拜对象；古希腊荷马诗中，“宙斯”（天空）是群神之首，居于奥林匹斯山上，统率众神。随后，出现一个民族只崇拜一种神，但不否认其他民族的神。最后，进一步把自己所崇拜的神，说成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神，而其他的神都是虚假的神，例如犹太人把民族神耶和华作为独一无二的神，否认其他神的存在，从而形成完整的一神教。从多神教发展到一神教，也是经过人脑不断地抽象化的过程。恩格斯指出：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355 页）

一神教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剥削阶级的统治工具。随着阶级的形成，国家的出现，君主的确立，于是剥削阶级就把人间的君主对臣民的统治搬到天国中去，就从诸神中制造出唯一的全知全能的神，作为最高的统治者，它实际上是人间帝王的化身。恩格斯说：“没有统一的君主就绝不会出现统一的神”，“神的统一性不过是统一的东方专制君主的反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七卷 65 页）剥削阶级制造了最高的神之后，又把自己的代表人物装扮成神的儿子，是受神的命令来统治人间，胡说“君权神授”、“天人感应”、“天命不可违”等，使宗教成为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起着压制人民革命斗争的反动作用。

一神教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例如基督教这种一神教，“从历史上说它是后期希腊庸俗哲学的最后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355 页），特别是以斯多葛派的哲学为基础。它的产生是对古希腊罗马唯物主义的否定，是退步。“古希腊罗马哲学是原始的自发

的唯物主义。……它不能彻底了解思维对物质的关系。但是，弄清这个问题的必要性，引出了关于可以和肉体分开的灵魂的学说，然后引出了灵魂不死的论断，最后引出了一神教。这样，旧唯物主义就被唯心主义否定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78 页）

一神教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也在不断地演变着。不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一神教，如公元前六至五世纪产生佛教，公元一世纪产生基督教，公元七世纪产生伊斯兰教等；而且同一种一神教也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如基督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就具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作用。因此对各种一神教必须作出具体的历史的阶级的分析。

在马克思主义之前，费尔巴哈曾对一神教和多神教作过对比，他说：“多神论、一般自然宗教把实在的东西当成了表象中的东西，当成了想象中的东西，一神论把表象中的东西、把想象、思想当成了实在的东西，甚至于把表象力、想象力、思想力的本质当成最实在的、绝对的、最高的实体。”“多神教徒把自己奉献给自然，给自然一只人眼和一颗人心；一神教徒把自然奉献给自己，给人眼人心以支配自然的力量和权威；多神教徒使人依靠自然，一神教徒使自然依靠人；前者说：如果自然不存在，我就不存在；但是后者反过来说：如果我不存在，世界、自然就不存在。”费尔巴哈的这一对比，揭露了一神教的唯心主义实质。但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彻底揭露一神教和多神教的阶级实质和根源，并指明消除宗教的根本途径。

犹太教

犹太人崇奉耶和華為“独一真神”的宗教，属于一神教。它的教义——《圣经》，后来为基督教所接受，称为《旧约》，以区别于基督教兴起后所编的《新约》。

犹太教发源于巴勒斯坦古代犹太人部落的多神教。公元前十四世纪以后，进入巴勒斯坦定居的游牧族希伯来人以牛犊形状的雨神耶和（即耶和華）为主神，同时也崇拜其他的神。公元前十世纪，巴勒斯坦

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太两个王国。犹太国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公元前六二二年，国王约西亚规定奉耶和華為全国之神，以耶路撒冷附近的锡安山为犹太人崇奉耶和華的中心。公元前五八六年，犹太国被新巴比伦灭亡。公元前五三八年，波斯帝国消灭了新巴比伦王国，犹太人重回耶路撒冷，建立了神权政体，祭司贵族采纳以西结的思想，规定耶和華為唯一的神，这时犹太教才最后形成。

犹太教把耶和華看做是社会正义的象征，鼓吹只有耶和華才是天地的创造者和一切生命的主宰，犹太人是耶和華的“选民”，必须皈依这个唯一的真神。它把劳动人民解脱苦难的希望寄托在耶和華的降临上，宣扬耶和華将派“弥赛亚”（即基督，意为救世主）下世来拯救人类，创造新的世界。犹太国王和祭司贵族曾利用犹太教长期统治和剥削犹太人民。公元前一世纪，犹太被罗马征服后，犹太教就成为罗马帝国统治的工具之一。在古罗马帝国灭亡时，基督教战胜了其他一切宗教，但犹太教仍然保留了下来。犹太教在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140 页）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使犹太人遭到空前的苦难和折磨。

在帝国主义时代，犹太教是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劳动人民，挑起民族纠纷的工具。十九世纪末，欧洲各国犹太资产阶级利用犹太教煽起了犹太复国主义。他们宣称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是统一的“犹太民族”，有一致的“民族利益”和“民族宗教”，要重建犹太国家，妄图使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劳动人民成为犹太资产阶级的奴隶。一八九七年犹太资产阶级召开首次复国大会，成立“世界犹太复国组织”。俄国沙皇和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墨索里尼都利用过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残杀人民，发动侵略战争。同时他们又煽动仇视犹太教、迫害犹太人的反犹太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法西斯匪帮就屠杀了六百万犹太人。战后帝国主义一贯利用犹太教、犹太复国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制造中东民族纠纷，破坏民族独立运动。现在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在利用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把苏联的犹太人输入以色列，以便在中东同美国争夺石油资源和战略要地。

犹太教曾在十二世纪传入我国，少数犹太人在河南开封设立教堂，称“一赐乐业教”（“一赐乐业”即以以色列），或叫“挑筋教”（因为犹太教不准吃牛羊之筋，教徒在吃牛、羊肉时把筋挑去）。它在中国没有得到发展。

佛教

在我国又称释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佛的意思是“觉悟者”。佛教起源于印度，相传是公元前六至五世纪印度王子悉达多·乔达摩所创立。他生于迦毗罗卫（现在尼泊尔王国境内）的释迦部落，后来佛教徒尊称他为释迦牟尼，意为“释迦族的隐修者”。传说他二十九岁出家修行，传教四十多年。他死后，佛教逐步成为与婆罗门教相对立的一个有势力的新宗教。公元前三世纪，在阿育王的支持下，佛教成了印度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佛教形成于印度奴隶制发展和奴隶主国家逐渐兴起的时期，是为巩固奴隶制服务的。它反对婆罗门祭司的特权地位，认为一切众生在灵魂上都是平等的，不需要祭司的引导，只要靠自己的修行，就可达到涅槃（意为人死后升入最完美、最幸福的精神境界）。修行以“五戒”（即戒杀、盗、淫、妄语、饮酒）为主。它宣扬人生皆苦，苦的原因在于人的欲望和造业，造业要受轮回之苦。只有禁欲才能消除苦因、苦果；只有修行才能成佛。这种教义抹煞了阶级对立，掩饰了劳动人民受苦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要他们放弃物质生活的欲望，放弃阶级斗争。佛教也像其他宗教那样，把“使人受害的弊端的补偿搬到天上，从而为这些弊端在地上的继续存在进行辩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218页）

佛教在发展过程中分为两派，即“小乘”和“大乘”。早期佛教称为“小乘”，它着重伦理教诲，不拜偶像；主张众生自救，修行能入涅槃，但不能人人成佛。公元一世纪，佛教受婆罗门教的影响，出现了新的教派——“大乘”。它主张佛有许多化身，造出各种菩萨，崇拜偶像，鼓吹只要虔诚信仰和修行，则人人都能成佛。从此印度佛教以“大乘”为主，“小乘”流行于锡兰、缅甸等地。公元七世纪初，印度封建

制度形成后，佛教成为巩固封建统治的工具。后来婆罗门教与佛教相结合，产生了印度教，佛教的势力衰落。十世纪初，印度教在印度获得优势。到了十三世纪初，伊斯兰教在印度取得统治地位，佛教基本上消失。可是佛教在锡兰、缅甸、泰国、中国、日本等国家中广为流传，在维护这些国家的封建统治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佛教约在公元一世纪初（东汉初年）传入中国。公元六十七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开始把佛经译成汉文。“小乘”“大乘”都曾传入中国，但“大乘”更为流行。佛教一经传入中国，就为反动的封建地主阶级所利用，并与汉代传统的神仙方士道术之类的宗教迷信相结合，逐步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为封建统治者奴役劳动人民服务。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为发展。梁武帝在公元五〇四年（天监三年）宣布以佛教为国教，大建佛教寺院，发展僧尼，造成了一个庞大的僧侣地主阶级。这时大批佛经译成汉文，佛教神学与玄学结合，形成许多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在唐朝，佛教达到了全盛时期。公元七至八世纪，中国佛教的一派——喇嘛教传播于藏族和蒙古族居住地区。宋以后佛教的地位虽被孔教所代替，但仍然流传很广。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利用佛教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反对工人运动。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和唯物主义哲学家对佛教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每一次农民起义都沉重地打击了佛教及其封建经济基础。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佛教神权的动摇，“**跟着农民运动的发展而普遍**”。（《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32 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爱国的佛教徒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对佛教中的反动分子进行了斗争，打击了国内外反动派的反华罪恶活动。

基督教

信奉传说中的耶稣为基督的宗教。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等主要派别。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是希腊语的音译，来自希伯来语的“弥赛亚”，意即“救世主”。该教以《旧约全书》、《新约全书》为圣经。

基督教最初是被奴役和被压迫群众的宗教。产生于公元一世纪西

欧奴隶制社会崩溃时期的罗马帝国。当时奴隶和破产的农民陷入了绝境，而起义又屡次失败，于是便到宗教中去寻找出路，基督教就应运而生。它是当时各种古代神话、东方宗教（太阳神教、犹太教等）和斯多葛派等唯心主义哲学的混合物。它打破了宗教的民族界限，它的宗教思想容易被信奉宗教的人们接受，因此基督教“就成了第一个可行的世界宗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334 页）早期基督教强调所有的人都是上帝的选民，都是平等的，并蔑视有钱有势的人，反对享乐，提倡禁欲主义。它宣扬有罪的人类一定会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它反映了奴隶和贫民对奴隶主阶级统治的愤怒和抗议，反映了奴隶们求解放的愿望。但是这种抗议和愿望是消极的，因为它只是“希望在彼岸世界，在天国，在死后的永生里，在据说不久必将到来的‘千年王国’里实现社会改造，而不是在这个世界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二卷 526 页）由于早期基督教具有上述性质，因而在它产生后的二三百年间，遭到了罗马帝国的多次迫害。

基督教成为剥削阶级的宗教以后，情况起了根本变化。公元二世纪下半叶以后，没落奴隶主贵族和富人的一些代表人物陆续参加了基督教，窃取了教会的领导权，建立起尊卑分明的教阶制度，形成了以主教为首的教会组织。这时候的基督教和中国的儒家孔孟之道一样，鼓吹天命论，宣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存在是合乎天意的，颂扬忍耐、温顺、自卑、驯良。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看到基督教可以成为维护帝国奴隶主政权的工具，于公元三一二年颁布了米兰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并赋予种种特权。他召开了尼西亚宗教大会，使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公元五世纪后期，随着罗马帝国和奴隶制的瓦解，基督教转化为西欧封建统治的工具。公元一〇五四年，由于宗教内部争权夺利，基督教分裂为罗马公教（天主教）和东正教。马克思说：“基督教的社会原则曾为古代奴隶制进行过辩护，也曾把中世纪的农奴制吹得天花乱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 218 页）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基督教又转化为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它既是“用来战胜国王和贵族的旗帜”，又是“操纵他的天然下属的灵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393—394 页）在十六世纪的西欧宗教改革运动

中，产生了与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的基督教新教派（即新教，包括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加尔文教曾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外衣。但它和天主教一样也极残酷地迫害劳动人民和进步的自然科学家。十七世纪末，基督教踏进了最后阶段，它再也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革命的外衣，而愈来愈变成“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53 页）

二十世纪以来，基督教（包括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和新教）始终帮助帝国主义进行反动宣传，疯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鼓吹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远征”，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赫鲁晓夫曾无耻地吹捧罗马教皇是“致力于世界和平”的“伟大人物”。苏修头目还亲赴罗马“朝拜”教皇保罗六世。他们在国内大力扶植东正教，鼓吹基督教同共产主义原则是“和谐、适应和协调”的，基督教已经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基督教”。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明目张胆地背叛。

基督教曾于唐初（七世纪）传入我国，称为景教。新教于鸦片战争前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大炮和鸦片而传到我国，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重要工具。美帝国主义在一九一三年就派了所谓“活基督”穆德来中国利用宗教搞侵略活动。人民公敌蒋介石公开承认他“信奉基督教”“是一种政治行动”。但是，美国的大炮加基督教挽救不了蒋家王朝失败的命运。全国解放后，我国的基督教（新教）进行了改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教徒与少数披着宗教外衣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败类进行了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反华的罪恶活动。

天主教

基督教的一派。产生于公元一〇五四年，以罗马教皇为首，自称罗马公教或加特力教。加特力是拉丁语的音译，意思是“普适性的”，所以称公教。因信仰“天主”，故又叫“天主教”。

天主教一产生就是封建阶级的宗教。它适应封建君主集权统治的

需要，把天主看作是人类唯一的主宰，一切都要听命于天主。认为只有天主教是代表真理的，其他宗教徒都是“异端”；除了天主之外，其他的神都是“邪神”，必须禁止。天主教和儒家一样，宣扬“孝敬父母”，“尊卑上下”，“主仆之谊”，“师徒之分”，为封建等级制辩护。天主教会建立了一套同封建制度相适应的封建教阶制度。其统治阶层有教宗、主教、司铎三级，后来主教阶层又分为宗主教、首主教、总主教、主教四等。主教拥有大量土地财产，有特殊地位和权力。天主教的特点是推行神权政治，它的僧侣是中世纪第一等级，控制着封建社会整个政治上层建筑和精神文化生活。罗马教皇通过神权政治发展宗教势力，扩张政治权力。天主教会都有自己的法庭（宗教裁判所），残酷迫害劳动人民和革命者，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唯物主义哲学家布鲁诺就是被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的。

十六世纪以后，天主教为了挽救没落的封建制度，于一五四〇年创立了极端反动的耶稣会。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罗马教廷和天主教又成了资产阶级统治势力的精神支柱。它宣扬财产私有是“天主赋予人的”，取消私有是违反人的天性的。它鼓吹要以“基督的博爱”为基础解决劳工问题，力图调和阶级斗争。后来又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在帝国主义时代，天主教及其领导中心梵蒂冈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镇压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工具。天主教拥有巨额资本和地产，在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有梵蒂冈的官方代表，它为帝国主义效劳的间谍机关遍布世界各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它曾是希特勒法西斯匪帮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帮凶。今天，它又成为美苏两霸的反动工具。

天主教于元代开始传入中国，得到元朝皇室的支持。明朝万历十年（公元 1582 年）再度传入，但没有多大发展。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时，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把传教士强加于我国，用不平等条约保障他们的“传教自由”，于是天主教势力蔓延我国各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重要工具之一。它曾大力支持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后来又帮助袁世凯鼓吹复辟帝制，配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新中国成立后，美蒋又利用天主教发展特务组织（如“公教报国团”、“圣母

军”等)，破坏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运动。我国政府及时清除了这些特务组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天主教爱国教徒同混入天主教的帝国主义走狗进行了斗争，打击了帝国主义反华的罪恶活动。

伊斯兰教

伊斯兰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思是“顺从”。伊斯兰教信奉“安拉”为“真主”。信仰“安拉”的人统称为穆斯林。我国称“回教”、“清真教”或“天方教”。与基督教、佛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

伊斯兰教产生在七世纪初的阿拉伯麦加城。创始人是麦加巨商穆罕默德(约公元570—632年)。他四十岁时自称受“安拉启示”为“安拉”的使者，宣布“安拉为唯一的神”，创立了伊斯兰教。公元六二二年，为了逃避麦加多神教徒的迫害，他率教徒迁往麦地那，建立了封建政权和政教合一的制度，同多神教徒不断开展“圣战”。公元六三〇年攻占麦加。从此，伊斯兰教就成为阿拉伯地区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伊斯兰教的产生反映了阿拉伯民族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过程，反映了这个民族由多神教过渡到一神教。阿拉伯南部各城市，在罗马时代曾经是很繁荣的，后来由于外族入侵的长期战争，到七世纪时成了荒无人烟的废墟。当时阿拉伯人希望从宗教改革中寻找摆脱贫困和灾难的出路。这是“**伊斯兰教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263页)

伊斯兰教的教义吸收了旧氏族宗教、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部分内容，是“**对自然的崇拜同正在解体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混合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八卷264页)。它的圣经叫《古兰经》，主要内容是宣扬“安拉”是“创造万物，掌握一切，无形象、无方位、无所不在的宇宙主宰”。“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它鼓吹阶级划分和社会不平等是天生的，要信徒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毫无怨言地忍受剥削和压迫，用现世的苦难生活去换取来世的“天堂”幸福。它和别的宗教一样，有自己的寺院、僧侣、斋戒、仪式、礼拜和严格的教规。它极端仇视科学，排斥“异端”，轻视妇女。伊斯兰教在发展中产生许多

派别，穆罕默德死后，他的门徒为了争夺继承权而分裂为逊民和十叶两大主要教派。在亚洲、非洲，特别是西亚和北非各地流传很广。

伊斯兰教一开始就成为剥削阶级的工具。在七世纪到八世纪，是阿拉伯封建神权政治国家（回教王国）的统治工具，对哈里发王国的巩固和发展起了很大作用。封建统治者利用伊斯兰教的教义和信徒对“安拉”的崇拜来强化军事纪律，利用“圣战”来进行对外侵略和掠夺。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土耳其地主、资产阶级和僧侣中产生了大伊斯兰主义，后来在英、法等国得到传播。他们企图利用伊斯兰教制造民族冲突和宗教纠纷，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扼杀人民革命。二十世纪初，土耳其统治阶级曾把大伊斯兰主义和大土耳其主义结合起来，梦想统治全世界的伊斯兰教徒。在帝国主义时代，帝国主义国家的垄断资产阶级经常利用伊斯兰教和大伊斯兰主义来反对东方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曾经号召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同那些企图利用反欧美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来巩固其可汗、地主、毛拉等地位的大伊斯兰主义和其他类似的派别作斗争”。（《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 129 页）现在，苏美两霸又利用伊斯兰教和大伊斯兰主义在近东和中东扩充势力，争夺霸权。

伊斯兰教于唐朝永徽二年（公元 651 年）传入我国。我国封建统治阶级和蒋介石反动派都曾利用伊斯兰教制造宗教纠纷，挑起回汉民族冲突，血腥屠杀人民，以巩固自己的反动统治。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族人民曾积极参加明末的农民起义和近百年来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全国解放后，在民主改革过程中，中国伊斯兰教的爱国教徒进行了反对宗教中的封建压迫剥削制度的斗争。

【外国哲学名词】

逻各斯

希腊文的音译，是由古希腊辩证法奠基人赫拉克利特提出的一个哲学术语。

他所说的逻各斯主要是指世界的本质和普遍的规律。具体说来，他对逻各斯的主要规定有二点：（一）是永恒的存在和普遍规律。他说：“‘逻各斯’……永恒地存在着”，“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它是人们“顷刻不能离的”、“指导一切的东西”。“命运的本质就是那贯穿宇宙实体的‘逻各斯’。”（二）是人们的思维规律。他说：“‘逻各斯’是灵魂所固有的，它自行增长”，“‘逻各斯’虽是人人共有的，多数人却不加理会地生活着……”。赫拉克利特有时把“逻各斯”与“神”作为同义语使用。但他的所谓神实际上和作为万物本原的永恒的火是一个意思。例如，他说：“神是日又是夜，是冬又是夏，是战又是和，是不多又是多余。他变换着形相，和火一样，……”。黑格尔为了把赫拉克利特歪曲成一个唯心主义者，不仅把赫拉克利特所说的永恒的火歪曲成是永恒的精神，并且把逻各斯也歪曲成是唯心主义的理性。这样，“万物都根据这个‘逻各斯’而产生”，便被颠倒成万物都根据理性（即绝对精神）而产生了。

在斯多葛派、新柏拉图派、中世纪的神学以及现代某些资产阶级的哲学著作中，都把逻各斯神秘化了，把无法变更的命运或不容抗拒的神灵说成是逻各斯。列宁在批判俄国马赫主义者把“逻各斯”作为抽象理性滥用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是一般的理性，而是特殊的理性；这不是人脑的机能，而是一种先于任何头脑而存在的东西、一种神灵的东西。”（《列宁选集》第二卷 169 页）

第一次推动

也叫“第一推动力”、“第一推动者”。恩格斯指出：“‘第一次推动’只是代表上帝的另一种说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92 页）“第一次推动”鼓吹者认为，世界从不运动到运动的最初原因，是从外部、从世界之外来的，是由于上帝的“第一次推动”的结果。这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观点。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已经提出了“第一推动者”的思想。他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无缘无故运动的，总必须有个东西存在着来推动它”。太阳、月亮、行星、恒星等星球都是固定在不同天层围绕地球

作均速的圆周运动，而“恒星天”的运动，是由“第一推动者”所推动，其它星球的运动是由次一级的推动者所推动。他认为“第一推动者本身必定是不动的”，它是世界运动的终极原因和动力。第一推动者就是神或世界理性，“神是一个至善而永生的存在，所以生命与无尽延续以至于永恒的时空悉属于神”。列宁在谈到亚里士多德关于神的观念时明确指出：“当然，这是唯心主义”。（《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313 页）

到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英国物理学家牛顿又提出了“第一次推动”的假说。他认为行星及其卫星，一旦由于神秘的“第一次推动”而运动起来，它们便依照预定的椭圆轨道继续不断地旋转下去。牛顿的“第一次推动”同样是上帝的另一种说法。他自己也明白地说：“行星现有的运动不能单单出之于某一个自然原因，而是由一个全智的主宰的推动。”“这个主宰者……是以万物的主宰者面目出现来统治一切的。因为他有统治权，所以人们称他为‘我主上帝’或‘普天之君’”，“各行星的周日转动不可能由重力得来，而需要有神力来推动他们。”恩格斯指出：“哥白尼在这一时期的开端给神学写了挑战书；牛顿却以关于神的第一次推动的假设结束了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449 页）这说明了资产阶级随着历史地位的变化，是怎样由反对神学走向崇拜宗教的，也说明形而上学唯物论最终必然要陷入唯心论。

“1755 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450 页）康德正确地指出，太阳系的形成是吸引和排斥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江湖骗子杜林出于机会主义路线的需要，还妄想重弹“第一次推动”的滥调。他认为宇宙的原始状态是自身等同的、没有任何变化的状态，后来怎么转入运动和变化呢？只能求助于上帝的“第一次推动”。恩格斯尖锐地指出：“杜林先生在自己的世界模式论中假装已经干干净净地扫除了上帝和彼岸世界，又由他以尖锐化和深化的形式带到了这里，带进了自然哲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92 页）

实体

马克思主义以前，许多哲学家用来表达世界本原和本质的哲学术语。不同的哲学派别对实体有着不同的解释。

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把实体列为他提出的十个范畴中的第一个范畴。他的整个哲学思想虽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并主要倾向于唯心主义。但他对实体的看法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认为只有实体才是独立存在的。他把实体又分为第一性实体（具体的个别事物）和第二性实体（抽象的一般事物）。他认为第一性实体最重要，它是一切事物和范畴的基础。这显然是与柏拉图的理念论针锋相对的。另外，在他的实体观中也包含着一定的辩证因素，例如他强调实体由于自身的变化而出现相反的性质。所以说，亚里士多德关于实体的论述，是他哲学思想中的积极东西。但他又认为神是世界的第一推动者，却是唯心主义的。

十七世纪法国的笛卡尔，对实体作了二元论的解释，他认为物质实体与精神实体并存，二者都是世界的本原。他把上帝说成是一个无限、独立、全知、全能的实体，其他一切东西都是由上帝这个实体创造的。这显然是荒谬的。

十七世纪荷兰的斯宾诺莎，对实体作了详细的唯物主义解释，在近代欧洲哲学史上影响较大，特别是对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很大。他把实体和自然、神看成是一个东西。他说：“宇宙间除实体及其分殊以外，不能有别的东西”。他认为实体是绝对的、永恒的、无限的、自因的、不生不灭的，是万物的内因。不难看出，他所说的实体其实也就是物质。只是由于时代和资产阶级的局限性，未能明确指出这一点，并且还披着泛神论的外衣。

十八至十九世纪德国的黑格尔，把斯宾诺莎的实体加以唯心主义化，作为他体系的主要因素之一。他强调实体也就是主体，把实体解释成神秘的绝对观念，即他心目中创造一切的上帝。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黑格尔“把实体了解为主体，了解为内部的过程，了解为绝

对的人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75 页）这就是说，黑格尔的实体既是神秘的又是辩证的，这正是他的哲学思想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主义认为，关于实体概念的唯物主义解释，是人类对自然界和物质认识的重要发展。从根本上来说，物体、存在、实体是同一种实在的概念，即都是物质，世界统一于物质。因此，物质概念比起实体概念，更能确切、清楚地说明世界的本原和本质。

天赋观念

唯心论先验论的一个术语。指人生来就有的、不依赖任何实践经验的观念。

古今中外的唯心主义者关于天赋观念的说法很多，但万变不离其宗。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顽固维护奴隶制的儒家创始人孔丘就鼓吹“圣人”是“生而知之”的。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孟轲认为“仁”、“义”，“礼”、“智”等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念是天生就有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反动儒家董仲舒宣称“圣人”的全部智慧是由于“天人感应”的结果（即受“天”的启示后，在自己内心中领悟到的）。在欧洲，古希腊奴隶主贵族哲学家柏拉图鼓吹人的知识不过是对灵魂在前世获得的知识的“回忆”，说人在生下来以前已经获得了知识。近代法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笛卡尔公开宣称有些观念如上帝、实体、数学的公理等是“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德国的莱布尼茨把观念说成是“作为倾向、禀赋、习性或自然的潜在能力而天赋在我们心中”。

人的观念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获得的？这个问题是认识论上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斗争——唯物论的反映论和唯心论的先验论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天赋观念说一直遭到唯物主义者的反驳，如中国汉朝的王充就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明确指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是自古以来没有的事，根本否认有天赋的观念。十七世纪英国的洛克，法国的伽桑狄等人，对天赋观念说也进行了系统的批判。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科学地阐明了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坚持革命的能动的反映论，坚持实践第一的观念，对天赋观念说给了致命的打击，彻底驳倒了

这一谬说。

天赋观念说是唯心主义天才史观的认识论基础。历来的反动阶级总是要利用天赋观念把自己装扮成为“生而知之”的“圣人”、“天才”、“上智”，污蔑人民群众是“群氓”、“下愚”，以达到愚弄人民、维护其反动统治的目的。

乌托邦主义

即空想主义。乌托邦是希腊文的译音，意思是一个没有的地方。一切出于幻想、虚构而根本不能实现的社会学说，都被称为乌托邦主义。

乌托邦这一术语最初为英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所使用。他在《乌托邦》一书中揭露了资本主义形成时期，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野蛮罪行，同时描绘了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剥削和贫困的理想社会。这就是他所说的“乌托邦”。莫尔的理想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以及手工业者、破产农民的情绪和幻想。恩格斯称《乌托邦》一书，是“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58 页）乌托邦主义所以是空想的，就在于它不依靠社会力量，也不依靠阶级政治力量的成长和发展。

列宁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一切乌托邦”。（《列宁选集》第二卷 433 页）同时又指出，对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乌托邦要作具体的分析。例如对于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既批判其错误，又肯定其包含着积极因素。

我国清朝末年，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描绘了一个所谓“公工、公农、公商”，“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大同世界。毛主席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60 页）一语道破了康有为和一切乌托邦主义者的幻想。

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

这是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洛克表达他的一种错误观点的用语。他把物体的质分为两种：一种是物体固有的（如广延性、形状、体积、运动、静止等），一种不是物体固有的，而是物体固有的质通过主观形成的（如颜色、声音、味道等）。他称前一种为“第一性的质”，后一种为“第二性的质”。他认为，第一性的质不论在什么情形下都与物体联系在一起，如一粒麦子不论如何分割，它仍然具有一定的广延性、形状、体积等；第二性的质就不是这样，如麦粒的颜色、味道不是麦粒固有的，而是由人的感觉产生的。他从这一错误观点出发，说什么“眼如果看不到光或色，耳如果听不到声，上颚如果不尝味，鼻官如果不嗅香，则一切颜色、滋味、香气、声音等等特殊的观念便都消散停止”。这说明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他不懂得物体的任何性质都是物体固有的，一切主观感觉都有它的客观来源，因而在这个问题上倒向唯心主义。贝克莱就利用洛克的这一错误观点为自己的主观唯心主义辩护。他在《人类知识原理》一书中曾诡辩地说过，既然承认颜色、声音、冷热等不存在于心外，为什么不可以根据同样的理由把广延性、形状、运动等也看成是不存在于心外的呢？因此，他的结论是，不论是第一性的质或第二性的质，它们都只能存在于心中，而不能存在于别的地方。可见，对唯物主义的动摇，就是对唯心主义的帮助。

此岸性和彼岸性

某些哲学家借用宗教的术语，说世界分为可认识的与不可认识的两部分。可认识的部分是“此岸性”的，不可认识的部分是“彼岸性”的。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拉图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都是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

柏拉图认为，现实生活中可以感知的东西是“此岸”的，但不是第一性的，而是派生的，是“理念”的影子。他认为，“理念”是真实的存在，是万事万物的源泉。然而“理念”在“彼岸”世界，是人类无法感知、不能认识的。

康德承认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自在之物”，但又认为人们只能认识“自在之物”作用于人而引起的现象，不能认识“自在之物”

本身。在他看来，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现象是可以认识的“此岸”世界，“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彼岸”世界。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绝没有原则差别。差别只不过是已经认识的东西和尚未认识的东西。列宁指出：“所谓二者之间有着特殊界限，所谓自在之物在现象的‘彼岸’（康德）”，“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说都是废话、怪论……、狡辩、捏造。”（《列宁选集》第二卷 100 页）

二律背反

是指可以并存的两个完全对立的论证。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用它来论证他的不可知论。

康德认为，人只能认识事物的现象，当理性一涉及到现象之外的超经验对象（如灵魂、世界、上帝等）时，便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从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康德把这种矛盾规定为四个“二律背反”：（一）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有限的；世界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二）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是单一的、不可分的；世界上没有单一的东西，任何事物都是复杂的、可分的。（三）世界上存在着自由；世界上没有自由，一切都是必然的。（四）世界有其最初的原因；世界没有其最初的原因。康德用的是反证法，比如，为了证明时间是有开端的，就先证明时间没有开端的说法如何不合理，因而时间应该是有开端的；反过来，他要证明时间没有开端，就先证明时间有开端的说法如何不合理，因而时间应该是没有开端的。康德断言，既然人们试图认识超经验对象时就会陷入这种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这就证明事物的本质是不可能认识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度的。

康德的二律背反是为他的不可知论辩护的。但是，他却看到人的认识在一定程度内发生矛盾的必然性，这对辩证法是有贡献的。当然，康德根本否认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把矛盾看作主观的，只存在于理性之中；不懂得人的认识中的矛盾是客观事物的矛盾的反映，这是

唯心主义的。而且矛盾绝不止四个，世界充满着矛盾，矛盾是多种多样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康德有四种‘二律背反’。事实上每个概念、每个范畴也都是二律背反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119 页）康德的辩证法思想既具有唯心主义性质，又是很肤浅的。

绝对命令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在伦理学中的用语。康德把人的行为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叫做命令。他又把命令分为两种：假言命令和绝对命令。

假言命令是有条件的，是指有某种实际愿望的行动意志，或者说，为达到某一目的或实现某种愿望而采取某种行动，支配这种行动的意志就叫假言命令。例如援助某人，如果是出于个人的正义感、友爱或同情心，即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有所行动，便不属于绝对命令的范围，而属于假言命令，因为它不具有普遍意义，不能上升为道德的普遍规律。

绝对命令是无条件的，它与实际愿望完全无关，它不是为任何个人目的，而是为了履行抽象的道德义务。所以康德把绝对命令说成是先天的、普遍的、永恒的，它不是从经验中得来的，而是任何人在任何时间、地点和条件下都必须遵守的最高道德准则。假言命令说：为了保全我的声誉，我不应该说谎；绝对命令则说：纵使说谎不会影响我的名誉，我也不应该说谎。

康德的所谓绝对命令，纯粹是一种超阶级的道德幻想，它把思想和行动对立起来，因而软弱无力。恩格斯在谈到康德的绝对命令的软弱无力时指出：“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27 页）这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向往革命而又不敢采取实际行动的软弱特点。而他的绝对命令又是先验的、超阶级的，所以后来它又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奴役劳动人民的思想工具。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任何道德始终都是阶级的道德，恩格斯说：“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马克思

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134 页) 康德把他的绝对命令, 说成是凌驾于历史和阶级之上的永恒的终极的道德原则, 当然是十分荒谬又极其反动的。

绝对观念

这是黑格尔哲学的神秘术语。黑格尔把绝对观念看成是先于世界和人类的唯一真实的、最高的存在, 而整个世界和人类都是由它异化(即外化或转化)出来的。这说明绝对观念其实就是黑格尔式的上帝。恩格斯曾挖苦他说: “……绝对观念——其所以是绝对的, 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14 页)

绝对观念在黑格尔的神秘体系中, 既是起点又是终点。他把绝对观念说得神乎其神, 玄而又玄, 目的无非是想使人相信它就是世界的灵魂, 它就是绝对真理。按照他的规定, 绝对观念首先表现在一系列的逻辑范畴的推演之中, 所有逻辑范畴都是由绝对观念中引伸出来的, 都是绝对观念的一个环节、一种表现, 而不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和概括。绝对观念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中经过一系列的推演以后, 为了创造更大的奇迹, 便摇身一变, 把自己异化为自然界和人类。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便是描述这一异化的具体内容的。这说明黑格尔的所谓绝对观念, 完全是为了创造体系的需要而虚构出来的神秘东西。

在黑格尔关于绝对观念的叙述中, 除去神秘的外壳以外, 却包含着许多辩证因素, 比如, 他强调绝对观念是一个全体、一个过程; 是有限和无限的统一、自在和自为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理想和现实的统一等等, 便都是辩证的。黑格尔在《逻辑学》一书中论述“绝对观念”的一章, 主要是讲绝对方法(即黑格尔的辩证法)。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指出: “极妙的是: 关于‘绝对观念’的整整一章, 几乎没有一句话讲到神(仅仅有一次偶然漏出了‘神的’‘概念’), 此外——注意这一点——几乎没有专门把唯心主义包括在内, 而是把辩证的方法作为自己主要的对象。”(《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253 页)

列宁在读黑格尔著作中, 常把神秘的绝对观念给以唯物主义的颠

倒，如把“观念”读作“人的认识”或“真理”，这对我们批判地阅读黑格尔著作是很有启发的。

自我意识

唯心主义惯用的术语。有时唯物主义者也用这一术语，但与唯心主义的含义不同。唯心主义者把自我意识看作是纯粹精神，而唯物主义者却认为自我意识是客观世界的反映。

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认为绝对精神是世界的本原，自我意识是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绝对精神外化成了人，通过人达到对绝对精神的完整的认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就是绝对精神的化身，就是抽象的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黑格尔把人变成自我意识的人，而不是把自我意识变成人的自我意识，变成现实的人即生活在现实的实物世界中并受这一世界制约的人的自我意识。黑格尔把世界头足倒置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 245 页）费希特从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出发，认为自我意识是第一性的、绝对的、无条件的，是万物的本原。他认为事物的存在要依赖于自我意识，而人永远也超不出自我意识的范围。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从费希特主义出发，片面发展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把自我意识作为世界最高的创造力量，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黑格尔和费希特的哲学中，自我意识被看作是一个能动的主体；这里具有辩证法因素。但不论黑格尔、费希特和鲍威尔都把自我意识神秘化，作为脱离物质的纯粹精神的东西，显然，这是十足的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

唯物主义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观点出发，认为自我意识是指人的意识，即现实的人对自身的认识。如费尔巴哈把现实的人当作对象，说“人由对象而意识到自己：对于对象的认识，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他又说：“意识，就是意味着存在者将自身当作对象；所以，意识绝不是特殊的东西，绝不是跟具有自我意识的存在者不同的东西。”但旧唯物主义不懂得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不懂得认识的辩证法，把人看作是一个脱离社会的超阶级的生物学上的人，这种人的自我意识是消极的、直观的、被动的。

辩证唯物主义把实践的观点作为认识论的第一和基本的观点，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认为意识、自我意识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们在实践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反映。意识、自我意识都是第二性的，但有着相对的独立性，并反作用于物质。自我意识是受阶级、历史条件制约的。剥削阶级的阶级地位和偏见，决定了它们不可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只有同大生产相联系的、深受剥削压迫的、觉醒了的无产阶级，才能够正确地认识自己。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是在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实践斗争中不断形成、发展的。无产阶级的自我意识，除了阶级的、实践的条件外，它的思想条件就是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列宁选集》第一卷 87 页）

反思

有时译为“反省”，是近代欧洲某些资产阶级哲家用过的哲学术语，特别是黑格尔经常喜欢用这一术语。一般说来，在不同的哲家用这一术语时，各有某些不同的含义。但不论唯物主义者（如洛克、斯宾诺莎）或唯心主义者（如贝克莱、黑格尔），都把反思（反省）当成人的心灵活动和内省方法。比如，洛克把离开感觉而由心灵活动形成的内部经验称为反省的观念；斯宾诺莎认为反思是内心思考惯用的方式，唯有这种方式才是认识真理的完善方法；贝克莱认为心灵所以能思想，就在于它能感知观念；黑格尔认为反思是以思想自身为内容，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

黑格尔的所谓反思，是和他的客观唯心主义体系紧密相联的。他一再强调的是，实体也就是主体，即思想既是自身又是对方，一切都是沿着自己构成自己的道路（即一切都是由绝对观念产生的）发展的。反思就是对这种神秘的自己构成自己的思想考察。他说：“哲学的认识方式仅是一种反思，——意指随在后面的反复思考的思想。”“要想得到对象的真实性质，我们必须加以反思。唯有凭借反思方能达到这种知识。”这说明黑格尔的所谓反思，是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对认识对象进行

思想加工的意思。他把反思分成好多种，如思辨的反思、一般的反思、知性的反思、外在的反思等等。他认为只有进行辩证思考的思辨反思，才能认识和掌握对象的本质；一般的反思、知性的反思、外在的反思，都是属于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是辩证的，人们的认识也应当是辩证的。为了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需要进行思想加工的。但是，我们所说的思想加工，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反映论，不仅不同于唯心主义者贝克莱、黑格尔的所谓反思（反省），并且也不同于旧唯物主义者洛克、斯宾诺莎的所谓内省。他们都把反思（或反省）与感性认识分割开。毛主席说：“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否则理性的东西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只是主观自生的靠不住的东西了。”（《实践论》）这句话恰好打中了他们的要害。

中介

中介是指事物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讲的。一切对立统一的双方，都是互为中介的。列宁说：“一切都是互为中介……，连成一体，通过转化而联系的。”（《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 103 页）例如，政治与经济、工业与农业、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正是由于存在着中介关系，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离开事物的中介关系，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内在联系和真实情形，所以列宁教导说：“要真正地认识事物，就必须把握、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中介’。”（《列宁选集》第四卷 453 页）

黑格尔在他的哲学著作特别是《逻辑学》中，常在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意义上使用“中介”这个术语，即把它看成是绝对精神的环节和辩证表现。但他在不同场合又各有不同的强调点，如有时强调它是相互联系的“前提”；有时强调它是矛盾的“根据”和“自身就包含着的环节”；有时强调它是“界限”、“对立”和“转化”等等，基本意思都是一致的。总之，他关于中介的看法既是神秘的又是辩证的。列宁在《哲学笔记》中作过摘记和评述，肯定他的辩证观点，批判他的神秘东西。

不懂得事物的中介关系（即辩证关系），也就不可能全面地辩证地看问题，势必会陷入形而上学泥坑。它的危害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

“这样，是不能找出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是不能完成革命任务的，是不能做好所任工作的，是不能正确地发展党内的思想斗争的。”（《矛盾论》）

独断论

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对唯物主义的诬称。列宁说：“**它是唯心主义者和不可知论者在反对唯物主义者时所爱用的字眼**”。（《列宁选集》第二卷 137 页）如现代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中的内在论、马赫主义等主观唯心主义学派，都用独断论来攻击唯物主义。俄国的马赫主义者切尔诺夫污蔑恩格斯的学说是“**素朴的独断的唯物主义**”，是“**最粗陋的唯物的独断主义**”；波格丹诺夫胡说什么承认马克思的社会经济理论是普遍的客观真理，就是“**独断主义**”。列宁痛斥这种胡说“**是向资产阶级经济学作不可宽恕的让步**”。（《列宁选集》第二卷 143 页）

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不仅在指责唯物主义时用过这一术语，而且在批判十七世纪莱布尼茨等人的形而上学时，也用过这一术语。他认为对人的认识能力不事先“**批判的**”考察，就断定它是全能的、可靠的，单凭理性思维就能认识事物，那是一种“**独断**”（武断）。但他把认识和客体割裂开来，企图离开实践和认识的过程来考察人的认识能力，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真理是客观的。一种学说究竟是真理还是独断，既不能靠自夸，也不能靠谩骂，而要靠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来检验。

唯我论

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谬论。它认为世界上只有“**我**”是真实存在的，除“**我**”以外的整个世界只不过是“**我**”的感觉而已。如我国明朝儒家、主观唯心主义者王守仁（王阳明）就说：“**意之所在便是物**”（我意识到的就是事物），“**无心外之物**”（在我意识之外的东西

是没有的)。又如,英国资产阶级大主教、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宣称,物是“观念的集合”,“存在就是被感知”。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哲学流派内在论者也叫嚷:“没有这个自我,其余的世界是不可设想的”。这都是十足的唯我论观点。

坚持主观唯心主义,必然要陷入唯我论泥坑。因为按照主观唯心主义的说法,整个世界是人的主观意识的产物,那么,除了“我”以外的所有的人,也是整个世界的一部分,当然只能是“我”的意识的产物,“从这个前提出发,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一论。”(《列宁选集》第二卷 36 页)

由于唯我论和人们的常识及自然科学存在明显的矛盾,所以主观唯心主义者往往用伪装、诡辩的手法掩盖唯我论的实质。例如俄国的马赫主义者用“世界要素”标榜自己的哲学是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最公正的”哲学。列宁指出:这不过是“妄图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术语来掩饰唯我论真面目的唯心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 50 页)

唯我论是反动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从我党的历史来看,凡是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唯我论者。他们否认亿万人民的伟大革命实践,否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大搞以“我”为核心,“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甚至自比“天马”、以“至贵”、“超人”自居,仿佛离开了他们地球就不转了。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唯灵论

一种神秘主义的谬论。它主张灵魂、精神是世界的本原,并且是永恒的,而一切物质现象不过是灵魂、精神的显现,都是暂时的形态。

唯灵论和宗教神学有直接的联系。恩格斯曾指出:在唯灵论者看来,世界是统一的,“就是说,在上帝那里,是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82 页)唯灵论者往往采用各种骗术(降神术、扶乩等)作为“神灵”启示的途径和“显灵”的表现。这种骗术在近代欧洲的一些城市里,曾风行一时,甚至有些片面强调经验而蔑视理论思

维的自然科学家，也受骗上当，陷入神秘主义泥坑。恩格斯对此专门写过一篇论文《神灵世界中的自然科学》，揭露唯灵论者的欺诈手段，并批判了自然科学家中的经验主义。恩格斯说：“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经验主义轻视辩证法便受到这样的惩罚：连某些最清醒的经验主义者也陷入最荒唐的迷信中，陷入现代降神术中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482 页）

现代资产阶级的唯灵论者，披着科学的外衣，贩卖他们从唯灵论中直接引出的信仰主义谬论，如英国心理学家、唯灵论者华德，便是其中的一个。他虽承认运动，但他把运动和物质割裂开来，并且把自然界看成是人们智慧的产物，列宁说，这种所谓智慧实际上“**即华德的神**”。（《列宁选集》第二卷 288 页）

近年来，在苏联，随着资本主义复辟，唯灵论的幽灵也沉渣泛起。许多科研机构用所谓的最新技术，起劲地研究一种“传心术”，声称人们两地相隔，不用任何电讯仪器，就可彼此“传心”，教师不用语言就能影响受教育者，医生不接触病人就可诊断、治疗；间谍光凭“视觉想象”就可拍摄别国的武器装备，真是荒唐至极！一些苏修的御用学者甚至胡说什么传递思想的能力是“出现在某些人身上的‘返祖’现象”，“对心灵学就像对宗教一样，信仰胜于事实”。十分清楚，这种“传心术”不过是把灵魂从教堂搬到科学实验里，它和前几年在苏联喧嚣一时的所谓“共产主义基督教”一样，都是苏修用来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

自然符号论

也叫“普遍自然符号论”。是英国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贝克莱把人的感觉说成是上帝给予的标记、符号的一种谬论。

贝克莱认为自然界的一切都不过是人的“感觉的组合”，而感觉是由于上帝在人们心中的刺激引起的。上帝的意志就是自然法则，所以人的感觉就是上帝意志（即自然法则）的“标记”、符号。上帝凭借这些“标记”、符号同人们交往，把神的旨意传达给人们，而人们也通过这些“标记”、符号使自己领会神的意志，知道“自然法则”，由此

来指导自己的行动，有利于生存。贝克莱根本否认自然界的因果关系。他说：“观念间的联系并不表示因同果的关系，它只表示一个标记和其所表示的事物的关系”。所以他荒谬地宣称，自然科学家的任务并不是去研究、发现自然界各种事物的规律，而是“研究和了解上帝所造的那些标记”。这就是他的自然符号论的基本观点。

贝克莱企图以自然符号论来论证经验、科学和宗教三者的一致，从而达到调和矛盾、宣扬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目的。列宁指出：在贝克莱看来，“利用这些‘经验符号’来使我们通晓事物的不是别人，而是神”。（《列宁选集》第二卷 25 页）贝克莱的符号论“在认识论上的意义就在于：符号论应当代替那种‘妄想以有形的原因来说明物’的‘学说’”。（《列宁选集》第二卷 25 页）即妄想以唯心主义符号论来代替唯物主义反映论。

符号论

也叫象形文字论。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它认为人的感觉、观念不是外界事物的反映，而仅仅是一些和外界事物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记号、符号或象形文字。主要代表是十九世纪德国的自然科学家赫尔姆霍茨。

赫尔姆霍茨虽然承认人的概念和表象是由所见或所思的对象作用于神经系统的结果，但在康德的不可知论影响下，却错误地宣称：“……我曾把感觉叫作外部现象的符号，并且我否认感觉和它们所代表的物之间有任何相似之处”。这明显暴露出符号论和不可知论的血缘关系。列宁说：“赫尔姆霍茨继康德之后，企图在‘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划一道原则的界限。”（《列宁选集》第二卷 240 页）

俄国的普列汉诺夫也犯过“象形文字论”的错误。他说：“我们的感觉是把现实界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的特种象形文字，象形文字不同于它们所传达的那些事件”。这显然是和唯物论反映论相违背的。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符号论作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指出它的不可知论成分和否认客观实在和客观真理的反

动实质，批判它把观念和现实、意识和自然界割裂开来，错误地认为感觉只能是客体的符号和任意的标志，因而滚入主观唯心主义的泥坑。

经验符号论

俄国马赫主义者尤什凯维奇宣扬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谬论。

尤什凯维奇认为：人的感觉、观念并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或模写，而只是一些“经验符号”。他说：“认识是充满了经验符号的，它在发展中走向更高度符号化的经验符号。”他否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在他看来，天体（包括地球在内）是人类认识的符号，自然界是没有规律性的，自然规律是人把抽象的理性“导入”其中的“经验符号”；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限大的终极的符号体系”。列宁挖苦他在制造“最新”术语上真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是一个小丑式的主观唯心主义者。

尤什凯维奇的经验符号论并不是什么新货色，说穿了不过是剽窃了贝克莱的自然符号论和彭加勒的所谓自然规律是人为了“方便”而创造的符号、记号的谬论，贴上他的新商标——经验符号论，作为“最新”发现来贩卖。这说明经验符号论和自然符号论、符号论都是一丘之貉，它的实质就是否认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和规律性。列宁在批判彭加勒的符号论时说：“新术语一点也没有改变不可知论的陈旧不堪的哲学路线”。（《列宁选集》第二卷 166 页）这也完全适用于尤什凯维奇的经验符号论。

嵌入说

经验批判主义者阿芬那留斯提出的一个名义上反唯心主义而实际上反唯物主义的哲学谬论。

阿芬那留斯宣称，流行心理学作了不能容忍的“嵌入”，因为它把思想放进头脑里，或把感觉从外边放到我们的头脑里，这是违背自然常识的。他认为，把看得见的东西放到人的头脑里，就等于把外界的东西变成了观念的东西，使外界的东西失去了它的实在性。这既是唯

心主义，又是二元论。只有他的“原则同格”说（即否认环境的独立存在，主张环境和自我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才是唯一的真理。它主张自我和外部世界都具有实在性，不把外部世界放在人脑里，而是以自我为中心地来说明一切。这可说是不打自招。只要稍微知道阿芬那留斯所谓“原则同格”的主观唯心主义怪论，便不难看出这是在玩弄贼喊捉贼的惯伎，企图以此来转移视线，掩盖他的唯心主义。列宁一针见血指出：“阿芬那留斯用攻击唯心主义的手法来转移读者的注意力，但实际上是用一些稍微不同的词句来保护同一种唯心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 85 页）

阿芬那留斯炮制的“嵌入说”的反动实质，正像列宁所指出的：它“否认思想是头脑的机能，否认感觉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机能，也就是说，嵌入说为了破坏唯物主义而否认生理学的最起码的真理”。（《列宁选集》第二卷 86 页）他用唯心主义的一元论来反对二元论，其目的也是为了取消主体以外的客体的存在，维护他的唯心主义。俄国修正主义者波格丹诺夫，无耻地追随和吹捧马赫、阿芬那留斯，完全像瞎子一样，轻信阿芬那留斯骗人的鬼话，看不出在他的“嵌入说”中隐藏的那个反对唯物主义的毒刺，受到了列宁无情揭露和批判。

感觉复合

十九世纪后半叶资产阶级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马赫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由马赫、阿芬那留斯提出。

马赫主义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并不是客观存在着的，“物”只是感觉的复合。例如一张方桌，它本身并不真实存在着，只是人们的各种感觉——棕褐的颜色、四方的形状、坚硬等感觉的总和。马赫主义进而认为：人们感觉的总和就是事物的全部内容，假如抽掉这些感觉内容，物也就不存在了。因此，“世界仅仅由我们的感觉构成”，而关于物质客观存在的这种“假定”，“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和多余的”。总之，马赫主义把事物本身的客观特性归结为人的主观感觉，把“物”看作是人的“感觉复合”，从这点出发，大肆攻击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否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马赫主义哲学的这个基本前提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列宁首先从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高度指出，把物看作是感觉的复合，这是一条从思想和感觉到物的唯心主义认识路线，“是主观唯心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 36 页）这种谬论的认识论根源在于：把人们认识过程中的一个初步环节——感觉，片面扩大，抹杀感觉的客观来源，把通过感觉来认识外界事物，歪曲为感觉就是外界事物，“它把感觉不是看作意识和外部世界的联系，而是看作隔离意识和外部世界的屏障、墙壁；不是看作同感觉相符合的外部现象的映像，而是看作‘唯一的存在’。”（《列宁选集》第二卷 46 页）它以唯心论的感觉论来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列宁进一步指出：“感觉的复合”不过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的“感觉的组合”的翻版，“是贝克莱主义的简单的重复”。（《列宁选集》第二卷 36 页）这种学说必然导致极反动的结论：整个世界不过是我的感觉而已，“除了自己以外，就不能承认别人的存在，这是最纯粹的唯我论”。（《列宁选集》第二卷 36 页）

“感觉复合”是马赫主义早期公开提出的一个赤裸裸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前提，在遭到唯物主义的批驳以后，它又改头换面以“世界要素”、“原则同格”等不同形式出现，但不管怎样伪装和诡辩，都丝毫没有改变它的唯心主义实质，反而更加暴露了它的荒谬和混乱。

世界要素

马赫主义哲学的术语。马赫主义在早期公开宣称世界是由感觉构成的，这种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受到唯物主义的有力批判，马赫的“世界要素”说就是为了掩盖这一唯心主义实质，于一八八三年提出的。

马赫说：世界是由“要素”构成的。他所说的“要素”就是指颜色、声音、气味、冷、热等等人的主观感觉。但是为了掩盖这一点，他把“要素”说成是中性的，——既不是物理的（即外界的、物质的），也不是心理的（即主观的、精神的）。他说，只是由于“要素”的不同联系才出现了物理的东西和心理的东西的区别，构成了整个世界。例如，热这个“要素”，它本身是中性的，当热与火光联系时，它就属于

物理的东西，当热与神经（人的感官）联系时，它就属于心理的东西。马赫又说，这两种“要素”的联系不是单独地存在着，而是一起存在的。

“世界要素”说是一个前后矛盾、思想混乱的折衷主义大杂烩。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深刻地批判了这一谬论。列宁首先责问道：“要素”是什么？然后又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要素”是感觉，那马赫主义仍然是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主义；如果“要素”不是感觉而是物质的东西，那岂不和马赫主义哲学的基本前提相违背？马赫承认有物理的东西存在，这是“非法地”剽窃唯物主义观点；但同时他又说物理的东西不能离开心理的东西而独立存在，这又是承认意识第一性的唯心主义观点。因此，列宁得出结论说：“世界要素”说不过是“妄图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术语来掩饰唯我论真面目的唯心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 50 页）

马赫提出“世界要素”，是企图用这一含混不清的名词术语来混淆物质和精神的界限，把自己的哲学装扮成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最公正的”哲学；同时又暗暗地偷运一些唯物主义观点来调和它与自然

科学的矛盾。但是这丝毫没有使马赫主义摆脱困境，反而更暴露了它的混乱和荒谬，正如列宁所说：“玩弄‘要素’这个字眼，显然是一种最可怜的诡辩”。（《列宁选集》第二卷 50 页）

原则同格

马赫主义哲学的术语。马赫主义在早期公开宣称：“世界仅仅是由我们的感觉构成的”。这种露骨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和人们的常识、自然科学都有明显的矛盾，遭到唯物主义的有力批判。因而在后期，马赫主义采用了一些“新”的名词术语，妄图用伪装、诡辩的手法来掩盖它的唯心主义实质，继续招摇撞骗。原则同格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由马赫主义创始人之一的阿芬那留斯于一八九一年至一八九四年抛出来的。

原则同格的内容是：我们对任何一个事物的描述（认识），不能只有“环境”（外部世界）而没有“自我”（我的思想）；因而“自我”和“环境”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同格（相互关联）；在这种同格中“自我”是“中心项”（即以自我为中心），“环境”是“对立项”（即环境从属于我）。

原则同格强调思想和外部世界两者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是强调外部世界不能离开我的思想而独立存在。它把思想说成是中心，是主体，外部世界只不过是思想的派生物，有我的思想才有外部世界。很明显，这和“世界仅仅是由我的感觉构成的”完全是一个意思，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谬论。这里它采取了十分狡猾的手法：把“对事物的认识”和“事物”本身混为一谈，由此偷换概念，得出“事物不能离开我的思想”、“我的思想是中心”这一唯心主义结论。它采用“原则同格”这一古怪的术语，无非是妄想用它来从根本上抹杀物质和思想的界限，把自己的哲学凌驾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

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对“原则同格”作了深刻的批判，并进一步挖了它的老根。列宁指出：“贝克莱在 1710 年，费希特在 1801 年，阿芬那留斯在 1891—1894 年所使用的不同表达方式，丝毫没有改变问题的本质，即主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哲学路线。”（《列宁选集》第二卷 64 页）它们“都是同一个论点，都是同样的破烂货色，只不过挂上了略加粉饰或重新油漆过的招牌而已。”（《列宁选集》第二卷 65 页）

思维经济原则

马赫主义哲学的一种谬论。“思维经济”意思是怎样思维才能“费力最小”、“最省力气”而获得最大的效果。马赫主义把“思维经济”说成是思维的原则。在这个“原则”的幌子下，他们宣称：设想世界上只有我和我的感觉存在，其他的一切都是“感觉的复合”，这样的思维是最省力气、最“经济”的，并把它看作是认识论的基础。

思维经济原则是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在早期哲学著作中提出的。一

八七二年马赫在《功的守恒定律的历史和根源》一书中提出这个“原则”。一八七六年阿芬那留斯在《哲学——按照费力最小的原则对世界的思维》一书中又作了详细论述。俄国马赫主义者巴扎罗夫为了篡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哲学，竟然把这一荒谬的“原则”同马克思主义混淆起来，胡说这个“原则”“无疑是认识论中的‘马克思主义’倾向”。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思维（即理性认识）只有如实反映客观实在才是正确的。正确的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思维“经济”原则，否认客观世界和实践，是十足的主观唯心主义。列宁指出：“只有在否认客观实在，即否认马克思主义基础的情况下，才会一本正经地谈论认识论中的思维经济”（《列宁选集》第二卷171页），这样做，无非是“企图在新的伪装下偷运主观唯心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171页）列宁还进一步指出，当这一“原则”的唯心主义性质早已被“公认”，连马赫本人在晚期著作中也企图修改和掩饰它时，俄国马赫主义者还要模仿和推崇它，并想把它同马克思主义相混淆，实在是滑稽的怪事。毛主席说：“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这段话击中了包括所谓“思维经济”原则在内的一切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要害。

蒙昧主义

一种否定科学的唯心主义思潮。它贬低人类的认识能力，宣扬不可知论、宗教信仰和神秘主义，认为人类的各种罪恶都是科学文明造成的，主张人的思想应回到原始的蒙昧状态去。

在历史上，直接为信仰主义服务的经院哲学以及其他宣扬神秘主义的唯心主义哲学，都与蒙昧主义有关。列宁曾批判反动透顶的内在论者是“彻头彻尾的蒙昧主义者”（《列宁选集》第二卷215页）；并一针见血地指出：“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全部理论是哲学蒙昧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73页）蒙昧主义的反动目的在于使人民群众陷于愚昧无知，以维持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群众的长期奴役。蒙昧主义是

日益腐朽、没落的现代资产阶级哲学的特征之一。

儒法斗争史部分

【学派】

法家

中国先秦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一个进步学派，和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相对立，因主张法治，所以称为法家。其主要代表是少正卯、商鞅、荀况、韩非。它最初是作为腐朽没落的奴隶主贵族的对立面、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思想、政治代表登上历史舞台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它在和反动的奴隶制度的斗争中，逐步形成了一条解决当时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路线：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在劳动人民反腐斗争的基础上，加之有一条正确的路线，中国社会终于完成了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历史转变。

春秋战国时期，成千成万奴隶不断举行革命起义，反动的奴隶制日益崩溃，法家顺应历史潮流，一开始就以奴隶制生产关系变革者的面目出现。早期法家李悝在魏文侯的支持下，在魏国推行“尽地力”和“善平糶”等政策，较快地发展了封建主义经济。以后，商鞅辅助秦孝公在秦国变法，明确提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他大刀阔斧实行改革，废除奴隶主贵族的土地所有制“井田制”，确立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推行耕战政策，改革上层建筑，经过劳动人民的奋战，使秦国从落后的国家一跃而为先进的国家。法家的杰出人物荀况，批判了儒家“法先王”的复辟倒退思想，提出“法后王”来肯定新兴的封建制，为地主阶级革命作了大量的舆论准备工作。

战国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奴隶主阶级之间的阶级搏斗进入了决战阶段，地主阶级面临着最后统一六国的形势，迫切要求为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一条比较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韩非总结了战国时期整个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复辟，特别是总结了当时儒

法斗争的现实经验，提出了以法为本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完整的法治理论，这是一条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防止奴隶主复辟的思想政治路线。它指出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不可调和，必须用法治战胜礼治；它还指出建立中央集权的地主阶级专政，必须警惕钻进封建国家机器内部的奴隶主贵族野心家、阴谋家篡夺政权；它还指出在同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作斗争时必须批判反动的孔孟之道，否则地主阶级专政就无法建立和巩固。秦始皇执行了这条革命路线，完成了统一中国的历史任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毛主席指出，在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一段时间以后，“由于他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088 页）地主阶级这种向反面转化，在政治上思想上的表现，就是从尊法反儒转向尊儒反法。西汉以后，随着奴隶制复辟的危险逐渐消失，地主阶级中除了有些人在不同情况下坚持法家路线外，大部分已经背叛了原来的革命进取性，转而把本阶级先驱者曾经批判过的儒家路线奉为至宝。此后儒法两条路线斗争主要的是在地主阶级内部进行的。这种斗争或多或少受到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斗争的支配或影响，曲折地反映了阶级斗争的起伏、激化。在农民革命起义之前或之后，往往会有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出现。一般说来，这些法家人物是代表地主阶级中经济、政治地位比较低的阶层，他们敢于批判儒家思想，宣扬某些进步观点，采取某些革新措施，对压抑、排挤他们的大地主阶级或地主阶级中的顽固派作了某些斗争，在不同程度上揭露了反动封建统治内部的黑暗和生产关系的腐朽。在近代，儒法斗争又有其不同的阶级内容，主要表现为尊孔与反孔的斗争。

从两千多年法家的历史来看，这个学派的主要特点是：在政治上主张法后王、反对法先王，坚持集权统一、反对分封割据；在经济上比较注意生产问题，但其目的在于建立或维护封建主义生产关系和地主阶级政权，因而对生产的促进作用也是有限的；在对外关系上，一般都

能坚持抗击侵略，反对投降卖国；在哲学上一般主张唯物论，反对唯心论的先验论。

法家在历史上起过进步作用，但仍然是剥削阶级的代表。随着整个地主阶级走向没落反动，作为这个阶级一翼的代表法家也是一代不如一代。封建制度在自身固有矛盾的推动下，无可挽救地逐步走向灭亡，此时的法家虽然能够尖锐地揭露本阶级顽固派尊孔复古的丑恶面目，但在政治上却再也不可能提出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真正革命的主张。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奴隶和农民起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历史上的劳动人民为法家人物的活动创造了条件，开辟了道路，儒法斗争的进程和演变，归根到底是受上述基本矛盾决定的。

一切反动阶级的代表人物都是尊儒反法的，他们咒骂法家是为了反对社会变革。两千多年来的儒法斗争一直影响到现在。林彪骂法家是“罚家”，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大肆攻击法家，其目的是为了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因此，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研究分析法家著作，对法家作阶级的、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吸取历史上阶级斗争和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古为今用，这对于加深理解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儒家

中国先秦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一个反动学派，和法家相对立。最早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儒家的头子是孔丘和孟轲。儒家宣扬“克己复礼”即复辟倒退的思想政治路线。两千多年来，它总是和最反动、最保守的势力联结在一起，成为反对社会进步、大开历史倒车的政治代表。

儒，本来是指替奴隶主贵族办丧事仪式之类的人。孔丘开始也干过这类职业，后来办学校宣扬复古倒退思想，从事反对社会变革的复辟活动，逐渐形成一个学派，成为儒家。

春秋战国时期，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儒家反对社会变革，提出“克己复礼”的反动政治纲领，妄图复辟西周奴隶社会的“礼治”；他们宣扬复古主义的历史观，“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要求效法西周奴隶主头子周文王，周武王，叫做“法先王”。他们鼓吹天命论和先验论，借天吓人，要人们“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提出“生而知之”、“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胡说奴隶主贵族是天生聪明的“劳心者”，奴隶是天生愚笨的“劳力者”，强调奴隶主的统治是天然合理的。他们还宣扬“仁义”、“忠恕”、“中庸”一类虚伪的道德来欺骗人民。儒家的这套谬论贯串着剥削阶级的“人性论”的黑线。对此，毛主席曾指出：“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27 页）

在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在巩固了自己的政权以后，逐步走向反动。西汉以后开始尊儒反法，把儒家思想定为推行礼治路线的正统思想。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凡是反对社会变革的反动派，无不继承和宣扬孔孟之道。在西汉，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和谶纬神学，他提出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在唐朝，有韩愈的“道统”论，编造了一套儒家思想继承系统的理论。宋朝以后，在儒家思想中吸收了一部分儒家和道教的思想，出现了以程朱（程颢、程颐、朱熹）和陆王（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理学，分别从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方面发挥了儒家的学说。在近代和现代，儒家的代表有曾国藩、袁世凯、蒋介石等人，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也是尊孔派，刘少奇、林彪都是儒家的忠实信徒。

从我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来看，这个反动学派的一些主要代表人物在政治上是复辟派，在哲学上是尊天派，在对外关系上一般又是投降派，他们的为人是反革命两面派。在他们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历史的黑暗面。

有反动必有进步。历史上的劳动人民是儒家的死对头。从春秋末期奴隶起义领袖柳下跖怒斥孔老二开始，一直到近代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历代的奴隶、农民起义不断地给儒家以沉重地打击。历史上的法家也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尖锐地批判。“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斗争是近代中国文化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大革命，鲁迅是“打倒孔家店”的一员主将。从“五四”以来半个多世纪中，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密切结合同国内外反动派的斗争，结合同党内“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多次深刻地批判了孔孟之道和尊孔派，这种批判，成为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重要任务。

历史充分证明，只要还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还存在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尊孔和反孔的斗争就不会结束。尊孔和反孔的斗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和政治内容，但都是当时阶级斗争、党派斗争的一种形式，是政治思想领域里两条路线的斗争。

历史上的劳动人民和进步的社会力量，对孔孟之道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不能用科学的世界观深刻揭露孔学的阶级内容和反动实质，往往不能从儒法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去进行批判，只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即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主义，才能彻底战胜孔孟之道。

名家

战国时以辩论名实问题为中心的一个学派，当时称“辩者”，汉朝称“名家”，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利益辩护的。主要代表是惠施和公孙龙。

名实问题即概念与事实的关系问题，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一个重要内容。当时，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新旧事物交替，旧的“名”已不能适应新的“实”，出现了“名实不符”、“名实相怨”的情况。没落奴隶主阶级死抱住旧的“名”不放，反对社会变革，妄图通过“正

名”维护旧制度，扼杀新生事物；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建立和巩固封建制度，就要求打破奴隶制的传统观念，主张根据自己的利益，重新正名来肯定社会变革，这就产生了名家。

名家主张地主阶级的“法治”。他们“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蔑视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认为“赏罚”须按“法”行事，强调用地主阶级的是非观代替奴隶主阶级的是非观。“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以奴隶主阶级的可为不可，然为不然；以奴隶主阶级的是为不是，非为不非。名家人物提出的一些命题，曾被视为“怪说”，其实都是为新兴地主阶级进行进步变革制造舆论的，目的是“正名实而化天下”。

名家的“审其名实”是朴素的唯物论。公孙龙提出“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天地和天地产生的一切都是物。“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具体的事物都有它特定的内容和形式，是实在的。有物才有名，“正其所实，正其名也”，概念必须如实地反映客观事物，应该用“实”来纠正“名”，决不能反过来用“名”纠正“实”。“知此之非此也，知此之不在此也，则不谓也”。事物发生了变化，“此”非“此”，“此”不在“此”，那就不应再使用原来的“名”，而应代之以新的“名”。名家坚持是“实”决定“名”，“实”变而“名”亦应随之而变，以此来肯定封建制，肯定新生事物。这个观点是和儒墨“正名”、道家“无名”的唯心论相对立的。

名家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们认为事物的大小、高低、长短、黑白等矛盾，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惠施提出“日方中方睨”，“南方无穷而有穷”，承认事物的相对性。他提出“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天”、“地”、“山”、“泽”都不是固定不变的。他还认为世界是无限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任何事物都是可分的，“一尺之锤，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公孙龙在和儒家的辩论中以“白马非马”为例，强调区别一般与特殊、共性与个性等不同概念。名家对古代逻辑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由于他们常常片面地强调事物的某一个方面，走向极端，有时又陷入形而上学。

名家从墨家中分化出来，归于法家。他们尖锐地批判了儒家和墨家，“破正理而立异”，破除儒墨的所谓“正理”，为确立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标新立异。名家的认识论被法家荀况、韩非所继承和发挥。名家是法家的同盟军。但名家有时也宣扬“兼爱”、“偃兵”，说明他们尚不能彻底摆脱墨家的影响。

阴阳家

战国宣扬阴阳五行说的一个学派，儒家的同盟军。是为没落奴隶主阶级服务的，以齐国人邹衍为代表。

“阴阳”和“五行”本来是先秦流传的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释自然现象的两种学说。“阴阳”说认为物质由阴阳二气构成。“五行”说认为物质由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构成。战国时的阴阳家适应没落奴隶主阶级进行复辟活动的需要，大肆宣扬迷信思想。他们把阴阳和五行结合起来，在阴阳五行之上冠以人格神的“天”，说阴阳五行受天命支配，物质世界是天的意志的体现，从而建立了阴阳五行说的唯心论思想体系。

阴阳家还鼓吹“五德始终”的历史循环论。他们给“五行”赋予道德属性，也叫“五德”，以此来比附历史上的王朝兴衰，说历史的变化根据“五德转移”，每一个朝代受一种“德”的支配，“德”有盛有衰，当这个朝代的“德”衰败时，这个朝代也就灭亡，而被代表另一种“德”的朝代所代替。代替是依照五行“相生”的次序：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如此周而复始。他们编造说舜代表土，被代表木的夏所代替，夏又被代表金的商代替，商又被代表火的周代替。他们还说“德”的盛衰在自然界会出现征象，统治者的行动可以感动自然界，使之出现正常或不正常的现象，这叫“符应”。阴阳家狂热鼓吹历史循环论的目的是妄图证明奴隶制的灭亡是暂时的，归根结底历史要走回头路，变来变去的结果是退回到古代奴隶社会中去。思孟学派的创始人子思和孟轲面临着奴隶制彻底瓦解的战国时代，吸收了阴阳五行的学说，利用这种历史循环论来为自己的复辟、倒退辩护，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神秘主义的唯心哲学。

阴阳家从方士演变而来。方士和儒家原来都是替奴隶主办理祭祀的，方士专讲鬼神迷信，兼事占卜、星历。阴阳家将方士的一套系统化、理论化，实际上它不过是儒家的附庸。正因为阴阳家和儒家的关系极为密切，秦始皇采取“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时，也严厉打击了阴阳家的复辟活动。两汉时期，儒家与阴阳家合流，产生了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和谶纬神学。以后的反动统治者也是常常利用阴阳家的思想，把自己说成是“奉天承运”的皇帝，是奉了天的意志并根据五德运行统治人民的，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反动统治。

思孟学派

战国中期以子思和孟轲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子思姓孔名伋，孔丘的孙子，相传《中庸》是他所著。孟轲是子思学生的学生。因孟轲思想直接继承子思，而称为“思孟学派”，代表着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它吹捧孔丘，自认是孔丘思想的真传。在政治上主张“克己复礼”，推行礼治路线，妄图复辟奴隶制。

思孟学派把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念“诚”，看作世界的本原。它宣扬“不诚无物”，没有诚就没有物质世界。而“诚”是人性中固有的东西，只要“存诚尽性”，把握这个固有的“诚”，充分发挥人的本性，就可以从尽“人之性”到尽“物之性”，进而达到“至诚通神”、“至诚通天”，进入“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论。

思孟学派还宣扬一套内心“反省”的修养经。它认为既然世界不过是自己本性中“诚”的体现，那么认识就不需要和外界接触，只要“反身而诚”，做内心反省的功夫就可以了。反省的方法有：“慎独”，即使在一个人的时候，也要使自己的言行不能有一点违反奴隶主的道德；“求放心”，即把被外界影响的心寻回来（实际是要使主观和客观隔绝）；“养浩然之气”，即养义理之气，在内心培养奴隶主的道德观念等等。这些所谓修养方法都是唯心主义的，是为复辟奴隶制服务的。

思孟学派流毒深远，后来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朱熹的“性命”论、王守仁的“致良知”、曾国藩的以“诚”自我标榜，都是思孟学派

的唯心主义谬论的翻版。刘少奇的修养经和林彪鼓吹的“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也是与思孟学派的黑货一脉相承的。

程朱理学

封建社会末期的孔孟之道。在哲学上是客观唯心主义的一个派别。首创者是北宋时期的二程（程颢、程颐），进一步发挥的是南宋的朱熹。因为他们都鼓吹“理”是世界的本原，所以称为程朱理学。

宋朝以后，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没落，随着农民起义的高涨，反动统治者需要加强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妄图消灭农民的革命思想，同时阻止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变法。程朱理学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的。

程朱理学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理”。儒家所宣扬的“天命”思想，经过历代唯物主义者不断的揭露批判，特别是经过农民战争的猛烈冲击，到宋朝时其欺骗性已愈来愈不灵，宋朝的反动统治者便用“天理”代替“天命”，于是儒家哲学就以“理学”的形式出现。程朱提出“天下只是一个理”，“理生气也”。说宇宙万物只是一个绝对不变、永恒存在的精神实体“理”所派生的。这个虚构出来的“理”既能创造万物，又能统辖万物，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最高原则。又说“理者，礼之谓也”，即“天理”就是封建的三纲五常（“礼”）。既然三纲五常本之于天，因而“纲常万年，磨灭不得”，“天理如此，岂可逆哉？”三纲五常的封建教条被说成是至高无上、万古长存的东西，人们只能对之顶礼膜拜，不得有半点违抗。

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反动观点。“存天理”就是要维护三纲五常，“去人欲”就是要消灭违反封建制度的一切思想和行动。程朱理学特别重视加强思想领域里的地主阶级专政，不许人民产生丝毫反封建的念头。寡妇再嫁被认为大逆不道，提出什么“饿死者事小，失节者事大”，以此来奴役妇女。朱熹还把“去人欲”说成是“克己”，把“存天理”说成是“复礼”，把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作为加强思想统治的纲领。

程朱理学是先验论的狂热鼓吹者。他们否定人们从实践活动中获

得的“闻见之知”，宣扬一切知识“皆出于天”。主张“知”先于“行”，“行”是由先天的“知”决定的。他们还说人的智慧和愚蠢是决定于禀受先天的“精英之气”和“浑浊之气”。“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胡说统治阶级的“智”和劳动人民的“愚”是天生的，这种反动理论也是孔丘“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翻版。

程朱理学是没落地主阶级的意识形态，它的思想极其反动，由于它提出的“理”有很大的欺骗性，宋以后封建统治者大大加以提倡，把它当做孔孟道统的嫡传，强迫人民信仰。在中国北宋以后的阶级斗争史上，程朱学派起了杀人不见血的精神屠刀的作用，清末唯物主义者戴震曾揭露理学“以理杀人”。在中国近代现代的历史上，一些反动家伙如曾国藩、蒋介石之流无不吹捧程朱理学，并从程朱的反动哲学中寻找反革命的武器。

陆王学派

以宋朝陆九渊和明朝王守仁（王阳明）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陆九渊和王守仁都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他们为了要消灭农民的反封建思想即所谓“破心中贼”，反对法家的变革思想，根据思孟学派和佛教禅宗的反动思想，建立起一套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

陆王学派鼓吹“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认为人的主观意识是派生宇宙万物的本原，否定客观事物及其规律的存在，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陆九渊还狂妄地叫嚷“抬头天外看，无我这般人”。自以为少了地球就不转了。他们如此露骨地宣扬唯我论，是企图把“三纲五常”的一套“理”说成是“根与人心”，因而切不可违抗，以此来奴役人民的思想。

陆王学派宣扬先验论。他们提出认识只要“发明本心”就可以达到“知”。“心即理”，通过自我修养，使自己的心“清明”起来，也就可以获得一切知识。此派还有所谓“知行合一”说，把知和行混而为一，实际是以知代行，强调“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他们提出“致知不假外求”，反对参加实际斗争，害怕人民在实际斗争中获得新的

知识，用来反对他们所宣扬的封建教条。

陆王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起了恶劣的影响，它和程朱学派都是套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这两派之间有过狗咬狗的争论，程朱学派把三纲五常的“理”放在天上，说“天理”必须遵守；陆王学派把三纲五常的“理”安在心上，说“本性”不可违抗。他们“同植纲常、同扶名教”，都是为了维护反动的大地主大官僚集团的利益。在明朝，王守仁的弟子遍及全国，分成许多支派，甚至还物色一些出身盐丁、陶匠、柴夫的人做徒弟，培养了一批武训式的小丑向劳动人民宣扬“安分守己”的奴才哲学，瓦解人民的革命意志。一些法家人物如李贽、王夫之等人都曾经对陆王学派作过猛烈的批判。

【奴隶起义、农民起义及其领袖】

柳下跖（生死年不详）

中国古代杰出的奴隶起义领袖，著名的劳动人民反孔英雄。春秋末期鲁国人。姓展，名跖，住在柳下（今山东省西部一个地方），所以他叫柳下跖。

他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代。他坚决反对儒家的“圣人”之道，痛斥孔丘效法先王、大搞复古倒退的反动主张。他认为“先王”不足法，“圣人”不足贵，奴隶主贵族的“先王”、“圣人”根本不值得效法和尊重，这些人都是欺压人民的“乱人之徒”。他戳穿孔丘称为“忠臣”、“贤士”的人都是奴隶主贵族的帮凶、奴才，这些人为奴隶主而死，不过像死在臭水沟里的猪狗一样。他用大量事实揭露孔丘的忠孝仁义是“诈巧虚伪”的东西，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孔丘“修文武之道”，是为了自己的富贵，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反动统治，使奴隶永远受苦受难。他还断言，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

他坚决反对残酷的奴隶制度。认为这个制度是“以利惑其真，而强反其情性”，完全是维护奴隶主贵族的利益，是违反奴隶和劳动人

民本性的。他提出要坚决同奴隶主贵族斗争到底，就是死了，也要在棺材里放一把榔头，看到“六王五伯”，砸烂这些人的狗头，充分表现出他对奴隶主阶级统治者的深仇大恨。他强烈渴望建立一个“耕而食，织而衣，无有相害之心”的平等社会。

他同反动奴隶主阶级代言人孔丘是势不两立的，明确地表示“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孔丘曾妄图以游说各国国君对他分地封侯来收买他，遭到他的严正拒绝。他并当面痛斥孔丘是“作言造语，妄称文武”，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好面誉人”，“亦好背而毁”人的“巧伪人”；“摇唇鼓舌，擅是生非”维护奴隶制的辩护士；到处碰壁的丧家狗；“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寄生虫；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盗丘”。

他坚定地站在反抗压迫、剥削的奴隶阶级立场上，认为奴隶们起来造反，用暴力夺回被奴隶主霸占的财富是合理的。他在战斗中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善于调查研究，分析形势，掌握战机，当机立断；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他把缴获的财物，平均分配，深受人民的爱戴。相传他率领的奴隶起义军多达九千人，驰骋天下，所向无敌。历来的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诬蔑他为“盗跖”；而人民群众和进步的思想家赞扬他是智勇双全的革命英雄、出类拔萃的圣人，称颂他的革命事迹“名声若日月”。

毛主席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23 页）柳下跖领导的奴隶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奴隶制，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的发展。

陈胜、吴广

秦朝末年发生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领袖。

陈胜（？—公元前 208 年）又名陈涉，阳城（今河南登封）人，原是雇农。吴广（？—公元前 209 年）又名吴叔，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原是贫农。公元前二〇九年七月，他俩同其他贫苦农民九百人，被强征去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县）服兵役。因遇到暴雨，耽误了日期。按

照秦朝法令，误期到达就要杀头。于是，陈胜、吴广带头杀了押送他们的秦朝军官，率领九百农民“揭竿为旗”，举行起义。

起义军手拿木棍、锄头，英勇奋战，接连攻下许多县城，并在陈县（今河南淮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革命政权。陈胜被拥立为王。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响应，残存的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也抱着各种野心混入起义行列。起义队伍迅速扩大为几十万人，短短几个月内，大败秦军，势如破竹，直逼秦朝首都。

陈胜、吴广所以能迅速发动一场规模巨大的全国性农民革命战争，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秦二世时，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代表赵高，篡夺了政权，大大加剧了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使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化，面临饥饿和死亡威胁的人民再也无法忍受，农民起义的烈火已在各地燃起。所以，陈胜、吴广起义后，很快就出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的大革命形势。

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起义军最后失败了。吴广在西征途中被部将假借陈胜命令杀害。陈胜在撤退途中被叛徒庄贾杀害。失败的原因，除了政策上的一些问题之外，主要是六国旧贵族和反动儒生从内部的破坏。他们腐蚀农民军干部，分裂起义队伍，甚至在战斗的关键时刻，割地称王，实行复辟。他们是农民革命的死敌。

陈胜、吴广胸怀“举大计”，以“死国”（革命造反，为国牺牲）的决心，慷慨宣称：“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为革命死得壮烈），充分表现了劳动人民大无畏的革命斗争精神，有力地驳斥了孔孟的“中庸之道”和“忠恕”、“仁爱”、“安贫乐道”等反动谬论。他们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帝王将相难道是天生的贵种吗）的响亮口号，狠狠地痛击了孔孟鼓吹的天命论和英雄史观。他们领导农民起义，建立革命政权，气势磅礴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把儒家鼓吹的“君君臣臣”、“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等反动说教砸了个稀巴烂。陈胜还当面批驳了混进起义军的孔老二八世孙孔鲋关于“兴灭继绝”的复辟谰言，指出“六国之后君，吾不能封”，并豪迈地说：“吾亦自有不及于周，又安能纯法？”我们是自己造反斗出来的，从来不是周朝的臣民，

怎能效法周礼呢？这些话表达了广大起义农民反对复辟倒退的战斗意志。陈胜、吴广是我国封建社会中最早的反孔斗争英雄。

陈胜、吴广虽然牺牲了，但他们发起的农民大起义的历史功绩是不朽的。正是这场大起义推翻了被赵高篡夺了政权的秦王朝，粉碎了奴隶主贵族的复辟阴谋，推动了历史向前发展。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588 页）

绿林、赤眉起义

西汉末年爆发的农民大起义，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战争。

西汉末年，剧烈的土地兼并，惨重的徭役、赋税、苛刑，加上连年灾荒，农民大批破产逃亡，社会陷入严重的危机。王莽（汉皇室的外戚，掌握中央实权的大贵族）代汉称帝后，在政治、经济上施行复古“改制”的倒退反动措施，更使人民生活陷于绝境，阶级矛盾愈加激化，酝酿已久的绿林、赤眉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

公元十七年，湖北旱灾，饥民几百人在王匡、王凤领导下举旗起义。队伍聚集在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因此称作绿林军。他们“劫富济贫”、“除霸安民”，打击莽军。公元二十二年，离开山区，分兵北上、西进，声势浩大，队伍迅速发展十多万人。

公元十八年，农民樊崇率领一百多人在山东莒县起义，后转入泰山。为了作战时不与莽军相混，他们把眉毛涂上红色，因此叫做赤眉军。公元十九—二十二年，赤眉军多次打败莽军，严惩官吏、贵族和地主，深受群众欢迎，队伍迅速扩大为几万人，驰骋在今山东、江苏、河南、安徽等省相连的广大地区内。

绿林、赤眉两支起义大军，在南方、东方两个战场互相呼应，痛击莽军主力。公元二十三年九月，绿林大军杀进长安城，城内居民纷起响应，王莽被攻入未央宫的群众砍死；赤眉军在东方也基本肃清王莽政

权的统治力量，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但是，抱着各种野心参加起义队伍的地主、贵族分子却大肆活动，争夺领导权，他们采取两面手法，腐蚀、排挤甚至杀害农民军将领，挑拨绿林、赤眉两军关系，制造分裂，导致自相残杀。公元二十五年，破落贵族刘秀伺机袭击起义军，篡夺革命胜利果实，建立了东汉封建王朝。

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这场持续九年、震撼全国的农民起义最终失败了。对混入革命队伍中的阶级异己分子的复辟阴谋失去警惕，是它留下的一条深刻教训。但是大起义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它直接推翻了反动的王莽政权，给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基础以沉重的打击，许多农民、奴隶得到解放，土地兼并势力被削弱，这对东汉前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以绿林、赤眉为主力的西汉末年农民大起义，不仅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封建统治，而且在思想上有力地冲击了尊孔逆流。他们毁经书，捉儒生，使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孔孟之徒闻风丧胆；他们用革命的实践有力批判了孔孟鼓吹的天命、正名、仁义道德等反动谬论。赤眉军内部不设高官，相互之间都称“臣人”，这种朴素的平等思想，也有力地批判了孔门儒学宣扬的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宗法等级观念。

黄巾起义

东汉末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因参加起义的群众用黄巾裹头为标记，所以称为黄巾军。

东汉后期，地主豪强势力疯狂地兼并土地，广大农民纷纷破产，加上连年灾荒，弄得“万民饥流”（大批流亡）、“死者相枕”（尸体重叠）。残酷的阶级剥削，迫使农民奋起反抗。当时民间流传的一首歌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充分表现出劳动人民敢于造反的革命精神，也反映了当时农民所进行的连绵不断的反抗斗争情景。正是在这种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激化的历史条件下，于公元一八四年爆发了黄巾起义。

黄巾起义的领袖叫张角，河北巨鹿（今平乡县）人，原是太平道（道教的一派）首领。他利用太平道这一宗教形式，以治病、传教为名，在农民中秘密进行起义的发动工作。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张角和他的弟子组织起几十万农民军，编成为三十六“方”，每“方”设一首领，由张角统一指挥，并选定甲子年（公元一八四年）三月五日全体起义，同时，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政治口号，大造舆论。因叛徒告密大起义提前于二月爆发。起义军矛头直指东汉王朝和整个地主阶级，其势如暴风骤雨，席卷了半个中国。张角不幸病逝后，由其弟张梁继续领导起义军，与敌人血战九个月。终于因农民军自身的弱点和缺乏战斗经验，在战略战术上犯了错误而于当年十一月失败。但分散在各地的起义队伍仍然顽强战斗，此起彼伏，持续二十多年。

黄巾起义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纲领、有组织、有准备的农民大起义。它不仅猛烈地冲击了东汉王朝反动统治的根基，加速了这个王朝的最终覆灭，同时对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孔孟之道也是一场有力的批判。黄巾军公开宣告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苍天”已死，农民起义的政权“当立”，根本否定了儒家“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反动谬论；黄巾军提出“人人自有筋骨，各自衣食其力”的朴素的平等思想，对儒家鼓吹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剥削阶级“通义”以有力回击；黄巾军还主张男女平等，指出“多贱”、“残杀”女子是“天下无道”，给儒家“男尊女卑”、“夫为妻纲”之道当头一棒。黄巾起义极大地鼓舞了以后农民革命的斗志，也为后来的农民起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我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黄巢（？—公元884年）

唐末杰出的农民起义领袖，今山东菏泽人。公元八七五年，他聚众响应王仙芝领导的起义。王失败被杀后，他率领王的余部转战于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十几个省的广大区域。起义军由几千人发展到六十多万人，于公元八八〇年十二月占领唐朝京都长安，建立

起以他为首的革命政权，国号“齐”。后因内部分裂（大将朱温降唐），于公元八八四年被逃亡四川的唐朝残余势力勾结沙陀酋长李克用打败。

黄巢自称“冲天大将军”，提出了“冲天”的革命口号。“冲天”就是要冲倒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把矛头对准以“天子”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相传他作“冲天”诗一首：“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这是起义农民的雄壮战歌，也是对孔丘鼓吹“畏天命”、“君受命于天”等反动说教的蔑视和有力批判，与儒家叫卖的天命循环的“道统论”是根本对立的。

以黄巢为首的农民政权建立后，下令各级官吏打开仓库，把粮食分给贫苦农民。同时，对负隅顽抗的一小撮唐宗室贵族、贪官污吏实行严厉的镇压。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就是对这些人实行革命专政的写照。

黄巢起义提出了“均平”的战斗口号，这是针对当时“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的情况而提出的革命要求，公开向所谓“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孔孟之道的挑战。这个口号对后来许多农民起义提出“均贫富”、“等贵贱”等口号是有积极影响的。

黄巢起义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农民战争之一，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遭到了失败。但起义军坚强不屈地坚持了十年革命战争，歼灭了唐末大量的军阀武装，镇压了一大批贵族豪绅，加速了唐王朝的灭亡。这又一次证明了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多数朝代的更换，都是由于农民起义的力量才能得到成功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586 页）

王小波、李顺

北宋初期农民起义的两位领袖。

王小波（？—公元 993 年），又称“小幡”，青城（今四川灌南县）人，茶贩出身。公元九九三年春，王小波在青城以“均贫富”的口

号，动员农民起义，“贫民由是附之者众”，迅速组成农民武装队伍，先后攻下青城、彭山等县；冬季，在江原（今四川崇庆县境）与宋军激战，击毙宋西川都巡检使张巳。王小波亦不幸受重伤，不久即逝世。

李顺（生死年不详），青城人，茶贩出身。他是王小波的妻弟。王小波牺牲后，部下推他为领袖。他继续领导农民斗争，“旬日之间，归之者数万人”，随后又发展到数十万人。公元九九四年春，起义军连克许多州县，并攻占成都，建立了“大蜀”政权，李顺为“大蜀王”，年号为“应运”，并发行“应运元宝”铜币等。随即分军攻占附近州县，“北抵剑关，南踞巫峡”，威震东西两川。宋王朝急调宦官王继恩入川镇压。夏季，成都失陷，李顺在群众掩护下脱险，后又转移到广州，三十多年以后被捕遇害。成都失陷后，张余（？—公元995年）曾领导所余部队继续战斗，并发展到十余万人，拥有战船千艘，先后攻占川东八个州县，兵力曾到达施州（今湖北恩施）。公元九九五年，起义军连续失利，张余被捕遇害。

王小波、李顺起义，是为了反对北宋大官僚地主的统治和赵蜀政权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北宋初年，大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造成“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当时四川豪强地主仍然维持旧的农奴制，“每富人家役属至数千户，小民岁输租庸”，“豪属家民，皆相承数世。”佃农没有独立户籍和迁徙自由，仍然依附于地主，地主“役使之如奴隶”。一般自耕农亦“愁苦不聊生，耕稼不足以给”。赵蜀官府又垄断包括茶叶在内的贸易，使“兼并者余贱贩贵，以夺其利”，不仅增加农民负担，而且使许多小商贩断绝了生路，逼着他们走上反抗的道路。

王小波、李顺在起义中，明确地提出“均贫富”的战斗纲领。王小波对农民说：“吾疾（痛恨）贫富不均，吾与汝均之”。李顺当领袖后，即“悉召乡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财粟，据其生齿足用之外，一切调发，大赈贫乏”。“均贫富”就是要平均财产和地权，它反映了农民要消灭地主阶级所有制的革命思想。列宁说：“‘地权’和‘平分土地’的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

制而斗争的农民力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列宁选集》第二卷 418—419 页）

王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军，对孔学实行了猛烈的武器的批判。他们捣毁地主豪绅武装盘踞的庙宇，烧毁成都的孔庙，把绘在孔庙大殿的“仲尼、四科十哲像”（四科十哲是孔丘的十个门徒）也一并“焚毁略尽”，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革命热情。起义军“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因此深得群众拥护。他们“录用才能，存抚善良”，这对于壮大起义军力量和巩固大蜀政权，以及分化瓦解敌人，都起了一定作用。

王小波、李顺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人民为了怀念农民革命军的英雄业绩，就在成都江渎庙北壁外，画了一幅美髯李顺“据银胡床坐，从者甚众”的壁画。

方腊

（？—公元 1121 年）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青溪（今浙江淳安县）人，“家本中产”，有漆园。

北宋末年，封建统治腐败不堪。从皇帝到大官僚地主，对内大量兼并土地，刮尽民膏，营造宫殿，劳民伤财，不顾人民死活；对外卖国求和，每年贿赂契丹和西夏的银绢，常以百万计，使人民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

公元一一二〇年，方腊为了反对宋徽宗（赵佶）政权的压迫和卖国，利用摩尼教组织农民起义，几天之内，即“聚众数万”，建立“永乐”农民革命政权，自称“圣公”。第二年，起义军发展至数十万人，先后攻占杭州等六州五十二县，北到秀州（浙江嘉兴），南到信州（江西上饶），东到处州（浙江丽水），西到歙州（安徽歙县），威震东南。宋王朝派宦官童贯率兵十五万镇压起义军。公元一一二一年夏，方腊战败被俘，八月在汴京（河南开封）就义。余部坚持到公元一一二二年三月。

方腊在起义中，痛斥了封建宗法制度的不平等，指出当时封建统

治者“贪鄙成风”，“暴虐如是”；他提出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口号，并且“刻版摹印”，分发“流布”，广泛宣传。“是法平等”的实质就是反对封建所有制和宗法制度。“在反对旧专制制度的斗争中，特别是反对旧农奴主大土地占有制的斗争中，平等思想是最革命的思想。”（《列宁全集》第十三卷 217 页）方腊起义是对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一次大扫荡。它毫不留情地镇压了贪官污吏，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政权。它揭露了地主阶级利用宗族势力进行剥削和压迫的罪恶，深刻批判了族权。它抛弃了殷周以来对鬼神、祖宗的迷信思想，坚决摒弃孔丘的厚葬久丧，实行“不事神佛、祖先”，“死则人执柴一枝烧焚，不用棺槨衣衾，无复丧葬祭祀之事”；还毁掉神像，挖掘大地主的祖坟，“露其骸骨，加以唾骂”，大胆地否定神权。他们在斗争中，“男女无别”，打掉了“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夫权。

方腊揭穿了宋朝理学家宣扬的所谓“天理”。他指出在这种“天理”统治下，“吾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他痛斥理学家的“天理”是“安有此理”！认为只有“仗义而起”，才是有理。

方腊坚决反对卖国投降。他揭露宋王朝“岁赂西北二虏（指辽、西夏）银绢以百万计，皆吾东南赤子膏血也。”驳斥了所谓送银绢求和是“安边之长策”，指出二虏得此，会更加骄横，造成“岁岁侵扰不已”，“仇雠赖我之资，益以富实，反见侵侮”，表现了高度的爱国主义。

方腊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北宋王朝的反动统治，有力地批判了孔孟之道。这次起义对后来的农民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钟相、杨么

南宋初年农民起义的两位领袖。

钟相（？—公元 1130 年），武陵（今湖南常德县）人，曾利用农村会社组织，宣传“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长达二十多年。周围数百里的群众“悉来归奉，谓之投拜法下”，人们称他为“拜爷”。公元一一二七年，他组织民兵三百人，命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抗金，到南阳折

回，即以这个队伍为基础筹划起义。公元一一三〇年，钟相毅然发动起义，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钟相为楚王，年号为“天载”。先后攻占两湖七州十九县。同年夏，宋军孔彦舟派奸细混入起义军，内外夹攻，钟相父子被俘，不久被杀害。

杨么（？—公元1135年），龙阳（今湖南汉寿县）人。原名太，因他年幼，土语称幼为么（音腰），故叫杨么。钟相牺牲后，杨么继续领导农民斗争，号称“大圣天王”，立钟相少子子仪为太子。起义军曾发展到二十多万人，攻占地方东起岳阳，西达枝江（今湖北枝江），北至公安（今湖北公安），南抵长沙，超过钟相极盛时期。他坚持革命，坚决抵制了南宋政权的诱降招安。他痛斥个别将领叛变“不是丈夫汉”，并派兵攻城，要惩罚叛徒。公元一一三五年，起义军被宋将岳飞施计瓦解，杨么投水未死，被俘后牺牲。这次起义坚持达六年之久。

钟相、杨么起义，是为了反对南宋高宗（赵构）政权的腐败，领导群众投入抗金斗争。南宋初年，金军不断侵宋，被金军打败的宋军和金军相继进入湖湘地区。“金人未到，而溃散之兵先至；金人既去，而袭逐之师继至。官兵盗贼，劫掠一同；城市乡村，搜索殆遍。”而大官僚地主仍然肆行兼并，官府衙役依然“无屋而责屋税，无丁而责丁税”，使“贫民不能生”，逼着广大群众起来造反。

钟相、杨么在起义中，“焚官府、城市、寺观、神庙及豪右之杀家，杀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之人”，猛烈冲击了封建政权、神权和孔孟之道。他们否定地主阶级的“法”和“理”，针锋相对地提出农民阶级的“法”和“理”。钟相向农民宣传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他们还严正地批驳了理学家对农民革命的污蔑和攻击。理学家攻击起义军“杀人”、“劫财”；起义军回答说，这是“行法”和“均平”。理学家攻击起义军是“乱常”、“害理”；起义军理直气壮地回答说，“等贵贱，均贫富”才是“天理当然”。他们以农民阶级的“法”和“理”来代替地主阶级的“法”和“理”，这是两个阶级的斗争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尖锐反映。

起义军春夏耕耘，秋冬攻战，实行兵农结合。他们采取了正确的战

略战术，打了许多胜仗，特别是公元一一三三年沚江之战，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让敌军“车船”进入沚江狭窄处，待沚江水落，沚口滩浅，“车船”不能退出，然后尽夺敌二十多艘“车船”，并俘虏造船者高宣，获得了很大的胜利。从此，起义军大造大型“车船”（最大的有二十四车大楼船，分三层，可载千余人），使战斗力大大增强，屡败官军。

钟相、杨么坚持爱国主义，坚持抵抗金军侵略。钟相派兵抗金，杨么打击了金人走狗齐伪政权。总之，这次起义有力地打击了赵宋王朝和金军的入侵，推动了历史的前进，对后来的农民起义有着重大的影响。

李自成（公元1606—1645年）

明末农民起义的杰出领袖。陕西米脂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小时给地主放过羊。

李自成处于明朝末年我国封建社会逐步走向衰落的时代。当时，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广大农民在反动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奋起反抗，纷纷起义。李自成参加了高迎祥的起义队伍。一六三六年，高迎祥牺牲，李自成被拥戴为“闯王”。一六四三年占领襄阳，改称“新顺王”。次年正月，他在西安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国号大顺，年号永昌，改西安为西京。三月，攻占北京，李自成举行了即皇帝位的典礼。但在满汉贵族、地主的联合反扑下，起义军不得不退出北京。一六四五年九月，李自成在湖北壮烈牺牲。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把矛头指向整个封建制度，猛烈抨击了二程（程颐、程颢）及其宣扬的反动理学。他们提出了“均田”、“免粮”的革命纲领以及“平买平卖”等政策，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行。他们向往于建立一个使“贫汉”“大小都欢悦”的理想社会。这是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有力冲击，也是对二程“富贵由来自有天”、“灭私欲、则天理明”等反动谬论的尖锐批判。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横扫了二程理学所维护的封建秩序，他

们大破等级制度，每到一处，“杀富济贫”，“为民除害”；毁郡学，焚孔庙，砸碎二程祠，散发反孔小册子，张贴反孔标语口号；毁弃一切烦琐的礼仪、典章制度，提倡白话文；李自成还把皇宫里的一块刻有“法祖”字样的匾额，改为“爱民”，使“纲常纪法，扫地全无”。

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经过十多年的南征北战，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推翻了腐朽反动的明王朝，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反动统治，在我国农民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来遭到失败，是受到时代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起义采取“流寇”式作战，未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攻入北京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发生宗派斗争，从而对反动阶级失去警惕。毛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曾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教导全党“引以为鉴，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902 页）

洪秀全（公元1814—1864年）

太平天国革命的杰出领袖。原名仁坤，广东花县人，出身于农民家庭，当过私塾教师。

洪秀全处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一八四三年，他创立“拜上帝会”，决心“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一八五一年一月十一日，他在广西金田村领导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年三月，在武宣乡称天王。一八五三年三月攻克南京，改称天京，建为都城，继续与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进行斗争。

洪秀全是一个坚强的反孔战士。在金田村起义前，他就毅然捣毁私塾里的孔丘牌位。他写了《原道救世歌》等著作，批判孔孟鼓吹的“天命论”、“忠君论”，宣布“天地之中人为贵，万物之中人为灵”，“古来事业皆人做”，农民应该自己起来推翻封建的统治；“乱极则治，暗极则光”，封建制度总有一天会灭亡；“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公平正直之世”一定可以实现；“死生有术，富贵在地”，号召农民奋起击灭封建统治的“阎罗妖”及其“妖徒鬼卒”，掌握自己的命运。他还创作了一个鞭挞孔丘

的故事，并得出结论说：“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这些都成了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有力的思想武器。

他领导的太平军所到之处，烧孔庙、拆宗祠，宣布《四书》、《五经》为“妖书邪说”，严禁买卖藏读，“尽行焚除”。还建立删书衙，将孔孟书中“一切鬼话、怪话、妖话、邪话，一概删除净尽”。

他领导的太平天国提出了“革故鼎新”的革命口号，宣布要用革命暴力打倒“富儿当权”、“荼毒生灵，害虐黎庶”的清朝反动统治，实现“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制定了《天朝田亩制度》，宣布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按人口多少，不分男女，平分土地。

他同叛徒李秀成等人的尊孔复古行径作坚决斗争。他反对李秀成的投降分裂路线，痛斥李秀成奉行“中庸之道”，表示“誓不与清妖两立”，坚决“斩邪留正”。他多次当面斥责李秀成的失败主义谬论。

洪秀全是一位“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58 页）他的一生是光辉战斗的一生，批孔反儒的一生。他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它沉重地打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和孔孟之道。由于阶级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洪秀全想依靠宗教和上帝的“权威”来组织群众斗争，太平天国也没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领导集团又犯了许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错误，因此它既不可能彻底批孔反儒，也不可能战胜清朝的反革命军队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联合进攻，取得革命的胜利。

主要著作有《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

【名词】

法治

先秦法家提出的维护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路线。它要求适应历史的发展，变革社会制度，“依法治国”。它与儒家的“礼治”路线相对立，后来为封建社会尊法反儒的地主阶级革新派所继承。

随着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生产关系的兴起，奴隶主阶级所谓“礼治”的反动性和虚伪性充分暴露，严重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变奴隶制为封建制，必然要以“法治”代替“礼治”。在经济上，他们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井田制，要求承认土地私有和封建剥削制度，允许土地自由买卖，自由开垦荒地，鼓励农民耕作，发展封建地主经济。在政治上，他们反对奴隶制的宗法等级制和“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剥夺和削弱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特权，主张按照功劳和才能选拔官吏，建立封建官僚制度。他们反对奴隶主阶级的分封制，主张实行地主阶级统一的中央集权制。他们要求把这些主张制定为国家的成文法律，予以公布，做到“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这就是地主阶级的“法治”，实质上就是地主阶级专政。

“法治”如同“礼治”一样，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阶级内容。在春秋战国时代，实行“法治”还是复辟“礼治”，是新兴地主阶级和没落的奴隶主阶级、封建制和奴隶制两个阶级、两种制度斗争的中心，也是法家和儒家两条政治路线斗争的焦点。通过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法治”逐步战胜了“礼治”，封建制逐步代替了奴隶制。在封建制建立起来以后，体现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的“法治”和妄图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的“礼治”的斗争，又继续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地主阶级政权巩固以后，“法治”成为地主阶级革新派的进步要求，而“礼治”则成为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反动主张。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法”和“礼”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为一定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的。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政治代表的法家所主张和实行的“法治”，当然也包含有对劳动人民的镇压；但是“法治”路线同历史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对于促进社会的发展起着进步作用。它同搞复辟倒退的“礼治”路线绝不是一回事。恩格斯指出，封建制虽然也是建立在剥削劳

动人民的基础上的，但它“大大胜过于奴隶制”。（《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153）苏修叛徒们攻击“法治”“包含着一系列反动的概念”，宣扬“法治”与“礼治”是“追求同一目的”，把“法治”说成是和“礼治”一样的东西，把进步说成反动，混淆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政治路线。他们散布这种谎言，是为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掩盖他们自己镇压和摧残革命力量的法西斯暴行，为他们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社会帝国主义的反动制度辩护。

礼治

先秦儒家提出的维护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政治路线。它要求按周礼进行统治，与法家的“法治”路线相对立，后来为封建社会尊儒反法的地主阶级保守派所继承。

最初，殷朝奴隶主祭上帝和祖先时，用两块玉放在一个器皿里作供奉，表示尊敬，就叫做“豊”（即礼）。后来“礼”与“政”结合起来，发展为区别君臣、父子、上下、亲疏、尊卑的规范，用来规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地位，成为奴隶主统治奴隶、“治政安君”的典章制度。

“礼”在周朝得到继承和发展，形成了一套极严格极繁琐的规章制度。周礼规定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人的等级，并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数量不等的土地和奴隶，叫做“大封之礼”。这些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可以世袭。为了维护各级奴隶主的特权，周朝统治者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到日常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制订了一套礼节仪式，凡是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喜怒哀乐，都要遵循这套礼仪，不得违反。这就是孔老二鼓吹的“礼治”。

“礼治”绝不是什麼仁慈的东西，而是极残酷的奴隶主阶级专政。“礼治”本身就包含了刑罚。“礼者君之大柄也”，奴隶主阶级用他们的“礼”作为“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的唯一标准，谁敢于“越礼”，就是大逆不道，就要被镇压。他们特别规定了“乱民之刑”，以“纠万民”，使奴隶们和新兴地主阶级不敢“犯上作乱”。

“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礼治”的一个原则。历来主张“礼治”的儒家，都打着“仁慈”的幌子，给“礼治”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实际上他们杀人最多。周礼所规定的人殉和人牲制度，就是对奴隶的非常残暴的镇压和迫害。

春秋末年，奴隶制急剧崩溃，封建制日益兴起，孔老二逆历史潮流而动，鼓吹“克己复礼”，妄图推翻新兴地主阶级的“法治”，复辟周朝的奴隶制度，是一条倒退复辟的反动政治路线。后来，凡是维护和复辟旧制度，开历史倒车的一切反动派，都打着“礼治”的旗号，只是它的阶级内容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所不同。林彪打起孔老二“克己复礼”的黑旗，就是要复辟资产阶级专政，把我国重新拉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世界中去。但是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证明：“世界是在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个历史的总趋势任何人也改变不了。”（《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061 页）儒家鼓吹的所谓“礼治”是违反历史发展趋势的，必然归于失败。

井田制

中国奴隶社会的土地制度和经济基础。这是一种奴隶主国家所有制。

殷商、西周时代土地和奴隶全属奴隶主阶级头子国王所有。国王把土地和奴隶分封给他的亲属和臣下去统治，他们再一层一层地分下去，形成奴隶主的等级制度。《诗经》中所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清楚地表明了井田制的奴隶主国家所有制性质。

为了计算封地的大小和监督、压榨奴隶的劳动，奴隶主把土地划分成“井”字形的方田。每百亩（约合今亩三十亩左右）叫“一田”，九田为一“井”。井田中间开有灌溉渠道，和渠道相应的纵横道路叫“阡陌”。许多井田合在一起，四周挖壕沟、筑土围，形成“封疆”（疆界）。大批奴隶被强迫在井田劳动，毫无人身自由。

春秋时代，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大大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反抗

奴隶主残酷统治的斗争日益开展，大批奴隶逃亡，不断发生暴动，它瓦解、摧毁了奴隶制的经济基础——井田制。一些国家先后实行“初税亩”，对奴隶主阶级的“公田”和新兴地主势力开的“私田”一律征税，这意味着封建土地所有制开始合法化。

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后，为了发展封建经济，都或迟或早地废除了井田制。公元前三五〇年，在秦孝公支持下，法家的杰出代表商鞅，适应时代的要求，在秦国实行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封疆”，从法律上确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进一步保护和发展封建土地所有制，促进封建经济发展。复辟奴隶制的吹鼓手孟轲，公开主张“仁政必自经界始”，即复辟奴隶制必须先从恢复井田制开始，妄图开历史倒车。这说明儒法两家关于“复井田”和“废井田”的斗争，是我国由奴隶制走向封建制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前进与倒退，复辟与反复辟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分封制

我国奴隶社会分封诸侯、世袭爵位的制度，它是在奴隶制经济和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

奴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天子（国王）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的统治，把城邑、土地连同依附在土地上的奴隶分封给他的亲属、臣下去统治。得到封土的“诸侯”，在他的领地上建立诸侯国，掌握着统治大权。诸侯除听从天子的命令外，还要定期朝拜天子、进贡珍宝财物等。发生战争时，天子有权调用各诸侯国的军队。在诸侯国中，诸侯又按不同等级将土地连同奴隶分封给大夫、士去统治。这样就形成了奴隶社会的等级制度。封土和爵位是世袭的，但天子握有废封的权力。历史上所说的“封国土、建诸侯”，“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天子掌握全国疆土，诸侯接受封疆），古之制也”。就是指的这种分封制。

奴隶社会的分封制，对广大奴隶进行残酷的统治压榨，并造成全国割据、分裂状况，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发展的严重障碍。经过长期的奴隶起义和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分封制逐步瓦解。公元前二二一年，秦

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全国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终于废除了分封制。

分封制被郡县制代替是历史的必然，尽管被剥夺“世卿世禄”特权的奴隶主贵族不甘心自己的灭亡，一再跳出来妄图复辟，但总是碰得头破血流，以失败而告终。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初，丞相王绾和以淳于越为代表的一伙反动儒生鼓吹复辟分封制，遭到廷尉李斯的坚决反对和秦始皇的坚决镇压。秦始皇死后，以赵高为代表的奴隶主贵族复辟，公开主张恢复六国的分封制，遭到了农民革命运动的坚决反击。在推翻秦朝的农民革命潮流中，六国旧贵族乘机起来割地称王，实行复辟，项羽自称西楚霸王，推行分封制，结果落得自刎乌江。西汉初期，以刘濞为首的诸侯王，坚持分封制，发动“吴楚七国”的叛乱，也很快就被汉景帝镇压下去。毛主席指出：“**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96 页）两汉以后，从魏、晋到唐、宋，一些反动儒生适应地主阶级保守派和封建割据势力的政治需要，一再鼓吹分封制，攻击郡县制，遭到了进步思想家的有力驳斥。唐朝柳宗元写的《封建论》、明清之际王夫之写的《秦始皇》，都是批判分封制，维护郡县制的战斗檄文。

郡县制

我国封建社会实行中央集权制的地方政权形式。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个郡管若干县，郡设郡守，县设县令（不满万户的设县长），都由中央任免、调动，不能世袭；全国的军事、法令也统一由皇帝指挥和发布，由此创建了一套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这对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维护国家的统一，防止奴隶制复辟，发展封建地主的经济起了重大的作用。实行郡县制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趋势，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措施。以后历代的封建王朝基本上都采用这一制度。

“任何新生事物的成长都是要经过艰难曲折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封建社会中，郡县制取代分封制也经历了一个长期、激烈的斗争过程。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初，代表奴隶主贵族利益的丞相王绾就跳出来，反对郡县制，主张恢复分封制，遇到廷尉李

斯的坚决反对。以淳于越为代表的一伙反动儒生一再颂古非今，为复辟分封制大造舆论，秦始皇以“焚书坑儒”的革命措施，狠狠打击了这股反动思潮。从两汉、魏、晋到唐、宋，历代的“强宗豪右”、藩镇割据势力的政治代表，一再以反动儒学为武器，大肆宣扬复古倒退，攻击郡县制，美化分封制，妄图分裂祖国，开历史倒车，遭到历代进步思想家的有力驳斥。唐朝柳宗元写的《封建论》、明清之际王夫之写的《秦始皇》，在颂扬郡县制驳斥鼓吹分封制的谬论上作出了重要贡献。关于分封制和郡县制的长期争论，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复辟与反复辟，前进与倒退的激烈斗争。

克己复礼

孔丘提出的复辟奴隶制的反动政治纲领。孔丘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言行符合周礼，这就是仁。一旦这样做了，天下的人就会归顺你的统治。孔丘的克己是手段，目的是恢复周礼。“周礼”指西周奴隶社会规定的等级制度和礼节仪式。按照周礼规定，君、臣、父、子各有名分，臣对君、子对父要绝对服从，贵贱、上下、尊卑、亲疏都有严格区别，这是奴隶社会的统治秩序。孔丘的所谓“克己复礼”，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恢复灭亡了的奴隶制国家，把丧失了世袭地位的贵族世家扶植起来，让被打倒的旧贵族重新上台。孔丘以“克己复礼”为纲，提出要“立于礼”，“约之以礼”，一切言行都必须纳入“礼”的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然而历史潮流是不可抗拒的。孔丘为了“克己复礼”，复辟西周奴隶制，奔走呼嚎了一生，但仍挽救不了奴隶制的灭亡，最后不得不哀叹：“吾道穷矣”。

一切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为了复辟倒退，都要祭起孔丘“克己复礼”的黑旗。野心家林彪梦想当“皇帝”，多次叫嚷：“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他把孔丘这面破旗视如至宝，把复辟资本主义作为万事中最大的事。然而，一切搞倒退复辟的人都没有好下场。毛主席说：“凡属倒退行为，结果都和主持者的原来的愿望相反。古今中外，没有例外。”（《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96 页）林彪及其一伙

和他们的祖师爷孔丘一样，结果也是自取灭亡，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经历着长期、反复、激烈的斗争。社会主义革命是要彻底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斗争必定是更复杂、激烈和长期。因此，进一步认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增强识别现代儒家搞“克己复礼”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

正名

孔丘为挽救奴隶制而提出的反动理论。孔丘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是说一定要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啊！……名分不正，说起话来就不妥当合理；说话不妥当合理，事情就办不成。

春秋末期，奴隶不断起义，新兴地主阶级崛起，出现所谓“臣弑君”、“子弑父”、“陪臣执国命”、“庶人议政”的局面，破坏了周礼规定的“君臣父子”的等级名分。孔丘大叫要“正名”，就是要用旧的奴隶制的等级名分去纠正已经发展了的客观现实，重建奴隶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名分是阶级关系的反映，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先有阶级关系，后有名分。孔丘倒行逆施，妄图用“正名”来阻止社会的变革，保住行将灭亡的奴隶制，在政治上极其反动，在哲学上完全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是唯心主义的。

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名家和法家批判了孔丘反动的“正名”论。名家的代表公孙龙在他的《名实篇》中指出儒家的正名是“不当而当，乱也”，硬把不符合实的名说成名实相当，这是搞乱名实关系。他提出“正名实”，即把被儒家颠倒了的名实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他认为“此之非此”，“此之不在此”，事物发生了变化，就不应再用原来的名，坚持先有实后有名的唯物主义观点。法家代表荀况在《正名篇》中揭露儒家“用名乱实”，并提出“有作于新名”，要新兴地主阶级摆脱儒家“正名”论的束缚，敢于根据变化了的事实创立“新名”。名家和法家对儒家“正名”论的批判，反映了先秦名实问题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

的斗争。

林彪为了抢班夺权，捡起了孔老二的“正名”论，对抗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多次指示，抛出反动的政治纲领，胡说什么“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正名”，就是梦想当“皇帝”，建立法西斯专政，奴役劳动人民，他要“正”的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名”，要“顺”的是帝、修、反的“言”，要“成”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事”。他妄图倒转历史的车轮，只能是螳臂当车，自取灭亡。

天命

宣扬“天”可以主宰一切的有神论观点，最初形成于殷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阶级利用劳动人民对自然力量的迷信和崇拜，把自己的意志假托为上帝的命令，称为“天命”。奴隶主贵族的最高统治者自称“天子”，说自己的权力是天授予的，凭借“天命”来强制奴隶为他们效劳。春秋末期，随着奴隶制的衰落，天命思想也发生了动摇。孔丘作为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竭力维护与宣扬反动的天命论。他提出“畏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说奴隶制度是“天”的意志，不可违抗，贫富、贵贱也是天授予的，不能改变。孔丘的孙子子思在《中庸》中提出“天命之谓性”，把天命和人性结合起来，说奴隶主阶级的人性是天赋的，因而是最合理的。孟轲发挥了子思这个观点，提出“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思想，说只要扩充人的本性，就可以通天，成为全知全能者。以后，封建统治者也总是鼓吹“天命”。在汉朝，董仲舒提出“天人感应”、“天象谴告”，把地主阶级的意志说成是天的意志。在唐朝，韩愈宣扬天有目的、有意志，“能赏功而罚祸”。在宋朝，朱熹把三纲五常说成是万古长存的“天理”，提出“天理如此，岂可逆哉？”以此来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古代进步的思想家曾对这种有神论的“天命”论展开了尖锐的斗争。战国时魏国的西门豹是个无神论者，他在做地方官时将那些利用天命思想来害人的巫婆、官吏丢入河中，给以严厉惩罚。法家基本上是不信天命的。荀况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否认天有意志，并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韩非说“事鬼

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认为搞迷信活动是行将灭亡的征兆。汉朝王充说“天道自然无为”，物质是自己运动的；“天无口目”，“于物无所求索”，天不会有感觉欲望，根本不存在什么“天命”。唐朝柳宗元的《天说》、刘禹锡的《天论》都认为天即自然，它不能“赏功而罚祸”，驳斥了天道、天命之类的鬼话。宋朝王安石提出“天命不足畏”，公开向孔孟的“天命”论提出了挑战。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反动派尊孔崇儒，把神权作为束缚中国人民手脚的绳索之一。毛主席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光辉著作中，对儒家宣扬的这种神权观念，作了极其深刻而有力的批判，对天命论进行了致命的打击。毛主席深刻地指出，由于“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只有推翻了地主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毛泽东选集》一卷本31页）但是，一切没落阶级为欺骗别人和欺骗自己，为他们倒行逆施壮胆鼓气，总是乞求天命。林彪自比“天马”，狂吠“天马行空，独往独来”，结果自取灭亡，又一次证明了天命论的破产。

忠恕

先秦儒家的反动主张，“仁”的重要内容。所谓“忠”，指死心塌地为奴隶主阶级效劳。在奴隶社会，臣要忠于君，诸侯要忠于天子。“忠”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所谓“恕”，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不要加给别人。“恕”只是对奴隶主阶级内部而言的，要求奴隶主之间按照周礼规定的等级名分，相互体谅，推己及人，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共同利益。主张“恕”的儒家对待奴隶和革新派人士，从来都是残酷镇压，根本谈不上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

“忠恕”之道，是孔丘维护和复辟奴隶制的手段，是贯穿孔丘全部反动学说的重要思想。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国历代反动统治阶级，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赋予忠恕以不同的阶级内容，作为统治人民的精神枷锁。叛徒刘少奇为了复辟资本主义，在黑《修养》一书中，要共产党员学习孔孟的所谓“忠恕”。卖国贼林彪也

捡起儒家忠恕的破烂，表面上宣扬什么“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以宽宥原谅之恕”、“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故曰忠厚之至也。”暗地里却磨刀霍霍、策划反革命政变，妄图建立封建法西斯王朝。他的忠，就是要人们忠于他的封建王朝；他的恕，就是要对地富反坏右“一律给予政治上的解放”。林彪的忠恕，完全是麻痹人民斗志、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工具。无产阶级、革命人民对反动阶级绝不施仁政，也绝不能讲“恕道”，必须对他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孝悌

先秦儒家的反动主张，“仁”的重要内容。孝指对父母、祖先尽孝道；悌指对兄长要敬爱。孝悌之道，是维持奴隶主阶级的血缘宗法关系、调整奴隶主阶级内部矛盾的重要手段。由于中国奴隶社会是氏族奴隶主贵族统治，统治集团有着共同的祖先。在春秋时期，社会矛盾激化，阶级斗争激烈，奴隶主阶级内部你争我夺，矛盾尖锐，奴隶主阶级政权摇摇欲坠。儒家提出孝悌，就是要用孝悌来维持氏族关系，使氏族奴隶主统治集团内部上下左右的关系都团结得好，以此巩固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把“孝悌”作为“仁”的根本。认为只有“孝子”才能成为维护奴隶制国家的“忠臣”，才能维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孔丘说：“孝慈，则忠。”这是说，忠以孝悌为前提，对奴隶主阶级的忠是建立在孝悌的基础之上的。孟轲认为仁的本质就是事亲、孝悌。做到孝悌，就不会“犯上作乱”，就不会造奴隶主贵族的反，奴隶主的天下就太平了；不讲孝悌，打乱君臣父子的“常位”，则是最大的罪过。孝悌之道是奴隶主阶级和一切反动阶级维护统治的思想工具，是欺世惑众的谬说。林彪死党陈伯达叫嚷：“忠孝节义”“在现代可以成为新的美德”，妄图用儒家孝悌之道，腐蚀群众，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极端反动的。

法后王

同儒家的“法先王”相对立，是先秦法家实行社会变革的进步理论。“法”指效法，“后王”指当世的帝王，即当世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者。法后王就是主张厚今薄古，主张前进，反对以古非今，反对倒退。

“法后王”是在同“法先王”的斗争中产生发展的。法家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立场上，坚决反对儒家“法先王”的政治主张，认为现在比过去好，近古比远古好，社会是不断前进的，一代胜过一代。商鞅说：“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国家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对当前的地主阶级政治有利，就不必效法古人。荀况继承和发展了先期的法家思想，第一次提出了“法后王”的政治口号。他说：“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他赞扬确立了法治的秦国，“威强乎汤、武；广大乎舜、禹”。秦国的威力比商汤、周武王统治的国家强；国土比舜、禹统治的国家大。地主阶级的后王，超过了奴隶主阶级的先王。他还劝诸侯各国法后王，效法当时的秦国，把新兴地主阶级专政确定下来。并揭露孟轲“法先王”的反动实质，是为了捣乱新兴地主阶级的统治，复辟奴隶主阶级专政。

韩非在反击儒家“法先王”复辟倒退的斗争中，进一步发展了法家“法后王”的思想。认为历史是不断前进的，当今之世，儒家还鼓吹“尧舜汤武之道”，是对历史的反动。“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就像守株待兔一样的可笑又可悲。他提出“新圣”，同奴隶主阶级的“圣人”相对立，树立新兴地主阶级领袖的权威。指出“新圣”代替奴隶主阶级的汤、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他还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不遵循古道，不墨守常规。这些理论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敢于改革旧制度，创立新制度的进取精神。

“法后王”朴素地反映了社会历史的发展变化，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是法家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对促进封建制的发展，有着一定的进步作用。

法先王

同法家的“法后王”相对立，是先秦儒家反对变革、主张倒退的反动理论。“法”指效法；“先王”指尧、舜、禹和以周文王、周武王为代表的奴隶主头子。法先王就是主张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反对前进，取法先王。

“法先王”是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反动社会历史观。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都是过去的好，新生的事物都是不好的。什么春秋不如西周，战国不如春秋；新兴的封建制不如没落的奴隶制。只有西周的奴隶制最好。总之，今不如昔，一代不如一代。

孟轲继承和发挥了孔老二“信而好古”的思想，第一次提出了“法先王”的反动政治口号，鼓吹“遵先王之制”，“守先王之道”，说：“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他周游列国，到处兜售先王之道。苟况一针见血地揭露“法先王”的反动目的，是为了“乱世”，即“乱”新兴地主阶级之“世”。

儒家鼓吹法先王，政治上是要复辟西周的礼治，经济上要恢复井田制，实质就是“克己复礼”，复辟奴隶制。历代反动阶级为了反对社会变革，开历史倒车，总是拣起法先王的破烂。卖国贼林彪效法先王，自比周文王，又教子学习文王的“明传子孙”之道，其目的就是为了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说：“历史的巨轮是拖不回来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696 页）法先王者妄图倒转历史车轮，只能是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以害己告终。

仁政

孟轲复辟奴隶制度的政治主张。孟轲发挥了孔丘“仁”的反动思想，鼓吹要实行“仁政”。他说古代实行的是仁政，殷周奴隶主统治者“有不忍人之心”，能够实行“不忍人之政”，对人施行仁爱。这个“人”当然不包括奴隶在内，奴隶主对奴隶是敲骨吸髓，没有半点“不忍”，而是极端残忍。孟轲所说的“仁政”实际上是奴隶主阶级的暴政。

“仁政”首先要复辟“井田制”。孟轲说：“仁政必自经界始”，

首先是恢复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的“经界”。当时许多国家适应社会的发展，“开阡陌封疆”，铲除了井田制的经界，用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代替井田制，孟轲反对这种进步的措施，咒骂这是“暴君污吏”的行为，他企图通过恢复井田制进而全面复辟奴隶制度。

“仁政”还要恢复奴隶主阶级的特权。孟轲大肆鼓吹“周室班爵禄”，周朝奴隶主的等级制度，目的是反对商鞅变法所实行的地主阶级等级制度，妄图恢复被废除了的奴隶主贵族的“世官世禄”，让奴隶主贵族重新上台。

“仁政”拼命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暴力革命和耕战政策。孟轲极端仇视革命的暴力，他说“善战者服上刑”，叫嚷要对用战争手段来推翻奴隶主统治的人处以极刑；“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对讲耕战的人则要处以重刑。

孟轲鼓吹的“仁政”是极其反动的，但是他却用一个漂亮的字眼掩盖起来，因而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以后一切没落阶级为了实现他们的复辟希望，也总喜欢拣起“仁政”这面破旗来和新兴阶级较量。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阶级敌人攻击无产阶级专政“不仁”，叫嚷要实行“仁政”，其实就是要复辟资本主义。毛主席说：“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我们仅仅施仁政于人民内部，而不施于人民外部的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65 页）这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

仁义

儒家虚伪的政治道德观念。它是孔孟之道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处理奴隶主内部关系的准则。对于革新派和劳动人民，所谓“仁义”就是要放弃反对奴隶制度的斗争，对奴隶主的反动统治逆来顺受，还要感恩戴德。后来封建社会的儒家又把仁义的内容改造成为适合大地主利益的道德原则。

孔丘虽没有把“仁”、“义”并提，但他说过“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确提出“仁”和“义”只能是

奴隶主的道德，而奴隶则是不仁不义的。孟轲开始使用“仁义”这一概念。他为了复辟奴隶制度，到处鼓吹仁义，反对新兴地主阶级讲“利”，实质是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的暴力革命和耕战政策；并把仁义说成是先验的道德，是永恒的东西。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商鞅、韩非，为了摧毁奴隶制度，对仁义作了严厉的批判，把它比作虱子和害人虫。对“仁义”的估价，成为先秦儒法斗争亦即没落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汉朝以后的儒家也无不鼓吹“仁义”，以此来反对社会变革，维护腐朽的旧制度。西汉董仲舒提出“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汉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儒家之徒在会上再次叫嚷“君子立仁修义”，反对法家的路线和政策。唐朝韩愈以“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谓义”，作为建立儒家道统学说的理论基础。宋朝的朱熹更是把仁义吹得天花乱坠，甚至说虎狼豺獭等兽类也有仁义，叫做“仁兽”、“义兽”，这恰好暴露了儒家“仁义”说教的虚伪性和地主阶级的豺狼本性。鲁迅曾用“吃人”二字一语道破了“仁义”的实质。

蒋介石这个大儒宣扬“仁”、“义”是什么中华民族“八德”中的二“德”。叛徒、卖国贼王明和蒋介石唱一个调子，说“仁”、“义”是“大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叛徒、卖国贼林彪叫嚷“仁义”是“处理人事关系的准则。”苏修社会帝国主义也大肆吹捧儒家的“仁义”，说这是“高尚的道德品质”。毛主席说：“帝国主义政府的反革命事业尽管每天都在做，但是在嘴上，在官方的文书上，却总是满篇的仁义道德，或者多少带一些仁义道德，从来不说实话。”（《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89 页）苏修把没落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虚伪的反动的道德，说成是“高尚的”，这只能证明他们妄图用这种反动的道德来掩盖他们每天都在做的反革命罪行。

中庸之道

儒家反对社会变革的反动理论。孔丘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是最高的“德”。“中”指奴隶主“奉天之命”进行统治的最高准则。又说：“礼乎礼！夫礼所以制中也。”礼啊礼！礼就是

“中”的规定。所谓“中”，在政治上的体现就是“礼”，即奴隶制度。“庸”指的是“常”，就是不变。目的是要强调奴隶制原则的永恒性和普遍性，反对所谓“过”。在孔丘看来，如果“过”了，就是违反了中庸之道，不符合“礼”的规定。中庸之道就是要“复礼”，复辟奴隶制，反对社会变革。孔丘的孙子子思特意写了一部《中庸》，发挥了中庸之道。说什么“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没落奴隶主贵族（“君子”）能够按照“周礼”办事，符合“中庸”，奴隶和新兴地主阶级（“小人”）破坏“周礼”，违反“中庸”。在奴隶制日趋崩溃，封建制正在兴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大肆鼓吹“中庸之道”，完全是为了反对前进，维护和复辟没落的奴隶制。

历代反动剥削阶级对孔丘的中庸之道，进行加工修饰，使之适应自己的需要。宋朝程朱（程颢、程颐、朱熹）理学为了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竭力鼓吹中庸之道，提出“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所谓“不偏”，就是不偏离封建统治秩序；所谓“不易”，就是三纲五常的封建教条不能改变。程朱用中庸之道反对农民起义和王安石等人的改革，以此维护封建旧制度。蒋介石称中庸之道为“很好的伦理哲学和很好的政治哲学”，是“最精微而亦最实际的人生哲学”。其目的是为了反对人民革命，维护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制度。

我党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路线头子，都是孔孟的信徒，也是中庸之道的吹鼓手。叛徒林彪叫嚷：“中庸之道……合理”，“不过极则成”的反动谬论，竭力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反对对立统一规律，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和反修斗争“超过了限度”；咒骂新生事物，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散布“今不如昔”等等，把中庸之道作为他投降苏修，发动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中庸之道是唯物辩证法的死敌。列宁说：“‘中庸’：把两个极端‘调和’起来”，“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5页）毛主席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毛泽东选集》一卷本17页）深刻阐明了革命的辩证法，尖锐地批判了中

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要永远保持旧的矛盾统一体，保持旧质的稳定性，在政治上要把旧制度绝对化、神圣化，否定社会变革，主张保守、倒退。这是一种反动阶级的哲学。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必须彻底批判中庸之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

性善论

战国时孟轲提出的一种反动人性论。孟轲认为人生来就有善性，“仁”（“同情心”）、“义”（“羞耻心”）、“礼”（“恭敬心”）、“智”（“分别是非的心”）这些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念，不是从外面传给人的，而是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只是奴隶主阶级能保持它发展它，劳动人民不能保持它，丧失了善性，这才出现了善与不善的区别。孟轲还认为奴隶主阶级能够实行“仁政”，是因为他们具有善性。孟轲把奴隶主阶级的道德观念说成是“善”的，是天赋的，这是唯心主义观点。以后宋朝的程颐、朱熹等人又提出人性分“义理之性”和“气质之性”。前者是“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纯粹是善的；后者是“理”和“气”的混杂，有善有不善，得清气者善，得浊气者不善。他们对孟轲的说法作了一些修补，但根本观点和孟轲没有什么不同。

性善论把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道德观念说成是人心里自发的要求，它的目的是要人们相信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道德是最合理的，要人们都来树立这种道德观念，维护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政权。“性善论”的反动实质就在于它掩盖了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的丑恶面貌，要劳动人民放弃斗争，放弃革命，永远做反动统治者的驯服工具。

由于“性善论”对反动统治者特别有利，儒家之徒竭力加以鼓吹。宋朝以后成了唯一法定的地主阶级的人性论，“人之初，性本善”，作为不容怀疑的教条写进了《三字经》这类反动小册子。以后资产阶级也竭力提倡这个东西，它要劳动人民相信资产阶级都有一颗善良的心，能够施行“仁政”。修正主义者适应资产阶级的需要，鼓吹剥削阶级可以明智和发善心，目的都是为了麻痹人民的革命斗志，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 18 页）。人们的思想、感情、认识是由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的，并随着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任何剥削阶级的人性论，归根结底，都是对劳动人民的陷阱和骗局。毛主席指出：“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在阶级社会里就是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而没有什么超阶级的人性。”（《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27 页）这就是我们对人性问题的基本观点。

性恶论

战国末期法家荀况首先提出的地主阶级的一种人性论，和孟轲提出的“性善论”相对立。荀况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人的本性是“恶”的，“善”是人为（“伪”）的，是经过后天学习改造的结果。荀况不承认奴隶主阶级的人性是善的，他说“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人性“好利而恶害”。就是说高贵者和卑贱者的自然本性是一样的，而且都是“恶”的，揭露了奴隶主阶级凶残的本性，撕下了他们假仁假义的面纱。他又说“贵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这是为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用封建制代替奴隶制作辩护的。

性恶论还为新兴地主阶级进行“法治”提供理论根据。既然“人性恶”，就要“立君上之势以临之”，“重刑罚以禁之”，必须实行“法治”，以化“恶”为“善”。韩非对荀况的“法治”思想作了系统的发挥，也是把性恶论作为一种理论根据的。

性恶论和性善论的斗争是先秦法家和儒家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性恶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恩格斯在比较和评论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善恶观时，指出：“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为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33 页）中国的历史发展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真理。当然，性恶论也是一种抽象的超阶级的人性论，它离开人的阶级性，把人性说成普遍是恶的，并没有摆脱天赋道德的观念，因而它仍然是一种唯心主义观点。

良知良能

儒家宣扬先验论的术语。最早由孟轲提出，孟轲说人有“不虑而知”的“良知”和“不学而能”的“良能”，认为人的知识和才能是先天就有的。

孟轲所说的良知良能的内容，就是仁、义、礼、智这些奴隶主阶级的道德教条，他认为这些东西是人性中固有的，用不着向客观外界去寻求。孟轲鼓吹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和伦理观，是为他复辟奴隶制的政治路线服务的。

明朝的王守仁根据孟轲的这个观点提出“致良知”。他说“知善知恶是良知”，认为人先天就具有地主阶级的道德，能够辨别“善”“恶”，只要“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就是说认识不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是反过来，客观事物之理倒是人的“良知”的体现。王守仁宣扬这种主观唯心主义，把地主阶级的道德说成是永恒的，是为了反对当时的农民起义，扼杀一切反封建的意识，以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叛徒、卖国贼林彪鼓吹反动的“天才论”，否认知识来源于实践，就是贩卖孟轲“良知”“良能”这种唯心论的先验论，其目的是为了复辟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认识是来自实践的，“**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实践论》）同样的，人们的才能也是在实践中锻炼和增长的，离开了实践，是不可能有任何才能的。一切真知都是由直接经验产生的，列宁说：“**唯物主义的基本前提是承认外部世界，承认物在我们的意识之外并且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着**”。（《列宁选集》第二卷 79 页）宣扬先验论的儒家和其他反动的唯心主义者一样，为了他们的反动政治目的，故意抹煞这一真理。但是，真理是客观存在的，是抹煞不了的，真理是不可战胜的。

王道

即鼓吹“仁政”的先王之道。儒家的反动政治主张，指用所谓仁、义、道、德治天下。

周朝是最早标榜“王道”的。《尚书·洪范》载：“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这是说，没有偏私，没有朋党，王道是宽广的；没有朋党，没有偏私，王道是平坦的；没有反复，没有偏私，王道是正直的。这都是骗人的鬼话。鲁迅深刻指出：“虽是那王道的祖师而且专家的周朝”，也用武力伐纣，“非使他们的血流到漂杵不可”；同时把造反的“顽民”（殷民），“从王道天下的人民中除开。”可见“王道”是“毫无根据”的。说穿了，周朝的“王道”就是奴隶主阶级的专政。

到了春秋战国，孔丘、孟轲大肆宣扬“王道”。春秋末年，奴隶们不断造反，新兴地主阶级致力变革，实行法治路线。这时，孔丘拼命地以“王道”、“德治”反对“法治”。他叫嚷：“为政以德”，“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说，用政令来治理老百姓，用刑法来约束他们，这样老百姓就会竭力逃避惩罚，而不知道犯罪是可耻的；用德来治理老百姓，用礼来约束他们，这样老百姓就会有羞耻之心，而且也守规矩了。其实他的“王道”，是为了反对奴隶们起义，反对新兴地主阶级变革，维护奴隶主阶级专政。战国中期，孟轲进一步系统地提出“王道”、“仁政”的学说。他说：“以德行仁者王”，“行仁政者王，莫之能御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他把法家的强兵政策和为实现统一所必须的封建兼并战争，污蔑为“霸道”。实际上，他和孔丘一样，到处煽动奴隶主复辟势力进行武装的反夺权，策动对地主阶级政权实行反革命武装干涉。他讲的是“王道”，行的却是“霸道”，是一个十足的奴隶主霸权主义者。孔孟的“王道”，集中反映了奴隶主贵族对封建新制度的反抗和企图复辟的愿望，是地地道道的复辟之道、倒退之道。

秦汉以后，“王道”成为地主阶级顽固派守旧倒退的理论。他们把奴隶主阶级的“王道”，改造成为地主阶级顽固派的“王道”，并且给“王道”披上超阶级的外衣，对劳动人民搞思想上的欺骗和麻醉，反对地主阶级革新派的进步主张。西汉儒家董仲舒认为，“三纲五常”就是“王道”，“王道”是从“天道”来的。他说：“王道之三纲，可

求于天。”“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饰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而不任刑。”可是他对劳动人民，却主张“设刑以畏之。”可见，他的“王道”也是假的，是为了反对西汉初期的法治路线。此后，北宋儒家程颢、南宋儒家朱熹、明朝儒家王守仁，都打着“王道”的招牌，镇压劳动人民，反对地主阶级革新派，为地主阶级顽固派服务。

由于“王道”是复辟倒退之道，是杀人的软刀子，是愚弄劳动人民的麻醉剂，因此它受到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欢迎和利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时，就宣扬“王道”是“建设东亚新秩序”的“指导的原理”，把侵略中国说成“是为了帮助中国建立‘王道乐土’。”他们所谓“王道”，就是烧杀抢掠，所谓“乐土”，就是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毛主席曾尖锐地指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849 页）

叛徒、卖国贼林彪也鼓吹孔孟的“王道”，叫嚷要实行“德”、“仁义”、“忠恕之道”，咒骂无产阶级专政是“绞肉机”，宣扬“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林彪的“王道”，就是要对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施“仁政”，让他们重新上台，复辟资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施用暴力的机关或者机器。”（《列宁选集》第三卷 321 页）所谓不使用暴力、广施“仁义”于一切阶级一切人的“王道”，是从未有过的。我们无产阶级公开申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要使用暴力镇压被推翻而又不甘心死亡的反动阶级和一切敌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1365 页）

法、术、势

战国末期法家韩非提出的关于“法治”理论的基本内容。

韩非从新兴地主阶级反复辟斗争的需要出发，总结了前期法家商

鞅之“法”，申不害之“术”，慎到之“势”的经验教训。他肯定秦国因商鞅变法而富强，同时也指出商鞅“徒法而无术”，“无术以知奸”，使国家富强的果实落入权臣的手中，所以当时未能统一中国。而申不害虽然尽力帮助韩侯“用术于上”，但他“不擅其法”，权臣仍然很多，不能清除复辟势力，经过十七年还是达不到霸王的地位。韩非说：“二子之于法术，皆未尽善也。”他主张法术并用，“不可一无”。韩非还继承和发展了慎到关于“任势”的思想。慎到主张“势治”，反对儒家的“贤治”，但他强调的是“自然之势”。韩非则主张“人设之势”。他提出“抱法处势则治”的论断，认为新兴地主阶级只有掌握了权势，建立地主阶级专政的“法治”，才能巩固政权。这样，韩非就把“法”、“术”、“势”有机地结合起来，提出了以“法”为核心的完整的理论和路线。

韩非主张的“法”，指的是体现新兴地主阶级意志的政策、法令。其主要锋芒是针对没落奴隶主贵族复辟势力的。他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令条文由官府制定颁布，使大家都知道赏罚的标准，谨慎守法的得赏，违反法令的就罚，这就是法。他还提出“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的原则，对那些“惑主败法”的权臣，坚决实行“严刑峻法”，严厉镇压。这样就取消了旧贵族的政治特权，否定了儒家“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治”路线，从法律上保证法家路线的贯彻。

韩非主张的“术”，指的是根据法家路线进行政治斗争的策略，包括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和手段。他说：“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他认为“术”必须和“法”结合，为政治服务。他主张“使法择人”，“使法量功”，根据地主阶级的利益选拔人材，判断功过，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只有这样，才能驾驭臣下，防止“奸邪”，使“大臣不得擅断，近习不敢卖重”。他坚决反对奴隶主贵族“无功而显”，“无老而富”的“世卿世禄”制和任人唯亲的路线，主张采用“有能而任官”，“有劳而爵禄”，“所爱不亲，所恶不疏”的任人唯贤的路线。他提倡用人不问

资历名望，多从基层提升富有实际经验的人做官吏，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这样才能有效地巩固新兴地主阶级专政。

韩非主张的“势”，就是指君王的地位和权力。他说：“国之所以强者，政也；王之所以尊者，权也。”君主只有牢牢地掌握国家权柄，才能推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他极力反对奴隶主贵族“大臣执柄独断”，“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主失势而臣得国”，以避免奴隶主贵族复辟的危险。

韩非关于“法、术、势”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三者的内在联系和相互作用。他说的势，就是要君主建立和运用中央的权力，控制全国各地。而法和术则是摧毁奴隶主旧势力，建立强大的封建国家的工具；新兴地主阶级只要能“服术行法”，那就“兼天下不难矣”。恩格斯指出：“在阶级反对阶级的任何斗争中，斗争的直接目的是政治权力”；“统治阶级保卫自己的最高政治权力”，“被统治阶级首先争取一部分政治权力，然后争取全部政治权力，以便能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和需要去改变现行法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 284 页）韩非的法治理论，适应了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最高政治权力”的需要，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全国中央集权的新兴地主阶级专政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对后来的法家也有重大影响。

耕战

先秦法家为推行法治路线而采取的富国强兵的政策。“耕”就是发展农业生产；“战”就是加强和发展新兴地主阶级的军事力量，进行消灭奴隶主阶级的割据势力和抵御外侮的战争。

耕战政策是法家反对礼治，实行变革的重要措施。管仲认为“粟多者国富”，“国富者兵强”；李悝提出“尽地力”和强兵政策，初步阐述了耕战思想。商鞅、韩非进一步发展和阐述了这一思想。商鞅说耕战是“治国之要”，“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把耕战看作是治理国家的刚要。他主张用赏罚来鼓励耕战。凡是努力生产的奴隶，可以改变身份；给国家缴纳粮食布帛多的人，可以免除徭役和赋税；打仗时则以

战功大小，分别予以奖赏。他把“不作而食，不战而荣”的奴隶主贵族，看成是“奸民”，提出怠惰的人要降为官府的奴隶。他指出“避农战”，“国之危”，不搞耕战，国家就有灭亡的危险。韩非十分重视耕战，把它作为富国强兵之道，认为积极耕种的人“可得以富”，英勇战斗的人，“可得以贵”。他反对“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他把不从事耕战的儒生、高谈阔论的纵横家、游侠刺客、害怕服兵役的人和投机的工商业者，统称为“五蠹”（五种蛀虫）。他认为只有奖励耕战，发展封建地主经济，加强地主军事力量，才能统一天下，巩固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的国家。列宁说：“革命军队所以必要，是因为只有强力才能解决伟大的历史问题”。（《列宁全集》第八卷 528 页）

耕战政策的推行，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巩固了地主阶级政权，破坏了奴隶制的“世卿世禄”制和“井田制”，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旧势力。这项进步的改革，为后来历代的法家所重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为了复辟奴隶制，十分仇视耕战。孟轲曾叫嚷对主张“耕战”的人要处以严厉的刑罚。可见奖励耕战还是反对耕战，是儒法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

参验

韩非关于朴素唯物主义认识论的重要思想，主张以事实和效果来检验人的认识正确与否。

战国末年，儒家为了复辟奴隶制，大肆鼓吹唯心论的先验论。韩非提出唯物主义的“参验”说与其对抗。他发展了荀子关于“征知”的思想，提出了检验认识是否合乎实际的“参验”的方法。他主张“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就是要以“功用”即实际效果作为“听言观行”的标准，把言行和实际效果作比较，来检验认识是否正确。韩非举了许多例子来论证“参验”的重要性。比如只看炼宝剑时的颜色，就是铸剑的专家也不能完全区别剑的好坏；但只要实地试验一下，那么一般人也不会怀疑剑的钝利了。

韩非用“参验”说揭穿了儒家“法先王”的复古倒退论的欺骗性。他指出儒家对几千年前的“先王之道”，“无参验而必之”，没有经过事实的检验而盲目肯定；“弗能必而据之”，把不能肯定的东西作为依据，是“非愚则诬”，不是傻瓜就是骗子。他把儒家学说斥为“愚诬之学”，要新兴地主阶级的君王“举事实，去无用，不道仁义”，“不听学者之言”。这就从认识论上批判了儒家复辟倒退的路线。

韩非的“参验”说是为“法治”路线服务的。他把实效当作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认为看一个人是否有才能，不能只“观容服，听辞言”，而要“试之官职，课其功伐”，从实际工作中去断定。他反对用那些“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的空谈家，而主张从基层提拔有实际经验又经过考验的人。韩非还把“参验”作为施行赏罚的重要依据。他主张“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反对“不合参验而行诛，不待见功而爵禄”。他说，如果不用参验的办法，而专听“左右近习之言”，那就会被亲信所蒙蔽，造成“无能之士在廷，而愚污之吏处官”的局面，使君权削弱而“私门益尊”，就有奴隶制复辟的危险。

毛主席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离开人的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因此不能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认识对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依赖关系。”（《实践论》）韩非的“参验”说是从地主阶级的功利观念出发的，它只靠个人的直观，而不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实践。因此，这和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实践是根本不同的。

焚书坑儒

秦始皇采取的镇压奴隶主贵族复辟的革命行动。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废除了分封制，“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结束了全国的分裂状态。面对这一新的政治局面，是巩固统一，坚持中央集权的郡县制，还是瓦解统一，复辟奴隶社会的分封制，就成了当时儒法斗争的中心内容。以丞相王绾为代表的的奴隶主贵族，主张恢复分封诸侯；以廷尉（最高司法长官）李斯为代表的法家，反对分封，主张推行郡县制。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意见，决定“分天下以为三十六

郡”，由中央委派地方长官，以加强中央集权，巩固统一。

但是，奴隶主贵族并不甘心自己失败。毛主席说：“反映旧制度的旧思想的残余，总是长期地留在人们的头脑里，不愿意轻易地退走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编者按》）公元前二一三年，秦始皇在咸阳宫召集群臣举行盛大宴会。仆射（博士的长官）周青臣称颂秦始皇统一中国，实行郡县制的丰功伟绩。博士淳于越当场跳出来，胡说殷周搞分封，统治“千余岁”，现在搞郡县制是“陛下之过”，“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主张复辟分封制。秦始皇把这两种意见交给群臣议论。已升为丞相的李斯当即反驳淳于越说：“时变异”，“不相袭”，“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并指出，“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百姓）”，为害极大。因此他主张禁私学，烧诗书（秦国史书、“博士官所职”的书籍、“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烧），“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之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黔为城旦。”秦始皇批准了李斯的建议。这就是所谓“焚书”事件。

公元前二一二年，即秦始皇公布“焚书令”的第二年，以侯生、卢生为代表的儒生又发动了一次进攻。他们诽谤“法治”是“专任狱吏”，攻击中央集权是“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咒骂秦始皇勤于政事是“贪于权势”。他们到处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这就迫使秦始皇对这些“诵法孔子”的儒生采取了进一步的镇压措施。他要掌司法的官吏审问诸生，令其相互告发，严加追究，并把其中情节最严重的四百六十多个儒生，“坑之咸阳”。这就是所谓“坑儒”事件。

对秦始皇“焚书坑儒”，历来就存在着相反的评价。历史上主要的法家都肯定“焚书坑儒”。王充说：“燔诗书起淳于越之谏。坑士起自诸生为妖言。”严复说：“秦王坑之，未为过也。”章炳麟说：“不燔六艺，不足以尊新王。”无产阶级革命家鲁迅深刻指出：“秦始皇烧过书，烧书是为了统一思想。”历史上的儒家都攻击“焚书坑儒”。唐朝章碣在他的《焚书坑》黑诗中，叫嚷“竹帛烟销帝业虚”，污蔑“焚书坑儒”促使秦朝灭亡。明朝王守仁认为，如果秦始皇不烧儒家经典，

而把反对儒家的书籍统统烧掉，那就同孔子删诗书的目的一致了。一语道破了儒家攻击“焚书坑儒”的反动目的。叛徒林彪及其死党诅咒秦始皇“焚书坑儒”，背诵章碣的《焚书坑》黑诗，借以攻击我们伟大的党，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苏修叛徒集团也咒骂“焚书”是“消灭文化”，“坑儒”是“活埋学者”，借以攻击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列宁在批判叛徒考茨基时指出：“谈一般‘暴力’，而不分析区别反动暴力和革命暴力的条件，那就成了背弃革命的市侩”。（《列宁选集》第三卷 670 页）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秦始皇“焚书坑儒”是对奴隶主复辟势力的镇压，是对反动派的专政，是进步的。秦始皇坑掉的是奴隶主阶级的代言人，烧掉的是儒家的经典，这是革命的暴力行为。但是，秦始皇镇压反革命是不彻底的，这正是这位地主阶级革命家的局限性。

天人合一

儒家关于天人关系的反动谬论。商朝的统治者即以“天罚”来威吓人民。周灭商也是打着“受命于天”的旗号。孔丘顽固地要维护日趋崩溃的奴隶制，就大肆鼓吹“畏天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反动谬论。

子思、孟轲进一步发挥了天命论的思想。子思认为“诚”是人的本性，只要人们守住这个本性，加以充分发挥，就可以知“天”，“至诚通神”，“至诚通天”。孟轲认为人的本性是“善”，“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人们只要尽量扩充心中固有的这种“善”，通过自我修养，就可以到达“上下与天地同流”的境界。这就是所谓“天人合一”。

西汉儒家主要代表董仲舒，将“天人合一”论系统化、神秘化，提出“天人感应”论。他说：“天人一也”，天完全按照自己的模型塑造了人类。人类的形体、精神、道德品质等都是天的复制品，与天相符合。

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阴阳，人有哀乐等等。他把人世间的一切，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的安排，并大讲天能“赏善罚恶”，如“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出灾害以谴责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宣扬“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其尊皆天也”等等，正像列宁在批判唯心主义者的臆说时所指出一样：“所有这些哲学的臆说都是废话、怪论、狡辩、捏造。”

（《列宁选集》第二卷 100 页）董仲舒把儒家学说完全神学化，力图论证封建制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极端反动的宋明理学，又给“天人合一”论披上哲学的外衣，宣称：“天者，理也”，把天地间万事万物都说成是这个“理”所产生的。“理”体现于人，就是“仁、义、礼、智”、三纲五常这一套。理学家们强调要“存天理，去人欲”，即要劳动人民遵守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安于受剥削奴役的地位，放弃任何造反的念头，借此来挽救日趋灭亡的封建制度。

法家针锋相对地提出“明于天人之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是两回事），“制天命而用之”（人定胜天）等唯物主义理论，有力地驳斥了“天人合一”的反动谬论。

三纲五常

儒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反动理论。“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纲”是准则的意思。三纲就是说臣要绝对服从君，子要绝对服从父，妻要绝对服从夫。这是从孔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孟轲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发展而来的。“五常”也叫“五性”，指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这是从孔丘的仁和孟轲的“仁、义、礼、智”发展而来的。西汉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认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阴道无所独行”。三纲和天地阴阳是同样的道理，不可改变的，永恒存在的。又说，“夫仁、谊（义）、礼、智、信，五常之道”。东汉儒家的

反动神学著作《白虎通义》第一次完整地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又提出人生下“得五气以为常，仁、义、礼、智、信也”。它特别强调三纲中的“君为臣纲”。封建统治者还用“五常”来欺骗人民，束缚人民的反抗斗争，以达到其庇护封建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的目的。毛主席说：“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毛泽东选集》一卷本 31 页）三纲五常就是这四种权力的反动理论基础。

三纲五常是维护剥削阶级反动统治的重要工具。宋朝反动理学家朱熹把“三纲五常”说成是永恒的，以此论证封建等级制度不能改变。他把当时的农民起义，斥之为违反“三纲五常”，加以残酷的镇压。独夫民贼蒋介石把“三纲五常”改头换面为“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声称这是国家的“纪律”，社会的“规律”，自然的“定律”，以此掩盖他们大搞法西斯专政的丑恶面目。叛徒林彪也胡说，对“三纲五常”要“用其内容”。这完全是为他建立封建法西斯专政，复辟资本主义服务的。

性三品说

地主阶级的一种人性论，西汉董仲舒最早提出的。他继承和发挥了孔丘、孟轲的反动人性论，认为人生来就有“性”和“情”两种品质，“性”表现为“仁”、“善”，“情”表现为“贪”、“恶”。他把人性分为三类；一类是情欲少，生来性善的“圣人之性”；一类是情欲多，生来性恶的“斗筲之性”（“斗筲”，即卑小微贱）；一类是虽有情欲，但可善可恶的“中民之性”。他把反动统治者说成是天生性善的“圣人”，把劳动人民说成是天生性恶的“小人”。至于“中民之性”，则必须通过反动统治者的“教化”才能变善，这是“天意”。所谓教化，实质就是奴役，就是用孔孟之道来毒化人们的思想。

唐朝的韩愈继承和发挥了董仲舒的性三品说。他也把人性分为上、中、下三等。认为上品的人性生来就是善的，具有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中品的人性虽具有封建道德，但还不够纯粹；下品的人性

生来就是恶的，不具备封建道德。他还认为，人不仅有性，而且还有喜、怒、哀、惧、爱、欲等“七情”。“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情是接触外物后产生的。“情”也有三品：上品的情抒发出来能够符合封建道德原则；中品的情抒发出来有的过多，有的不及；下品的情抒发出来则完全不符合封建道德原则。他说上中下三品的情和上中下三品的性一一相当，上品的性表现为上品的情，中品的性表现为中品的情，下品的性表现为下品的情。上品和下品的人性都不能改变，而情欲是可改变的，因此必须控制情欲，使之符合人性，即符合三纲五常的教条。他的结论是“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就是说，在他看来，“下之性”的劳动人民无可教化，只有靠“威”来镇压，迫使劳动人民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只有带着阶级性的人性，道德也“始终是阶级的道德”。（《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 134 页）性三品说抹煞了人性、道德的阶级内容，鼓吹封建统治者是天生的“善”，理应统治劳动人民，而劳动人民是天生的“恶”，理应接受统治。其目的是为了麻痹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

三世说

儒家公羊学派的反动历史理论。“三世”原指“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后来演变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西汉讲《春秋公羊传》（传说此书是战国时公羊高阐述《春秋》的著作）的儒者如董仲舒等人，把《春秋》所记载的鲁国十二世划分为三段：“所传闻世”是前人传述下来的；“所闻世”是孔丘听人说的；“所见世”是孔丘亲自见到的。东汉何休进一步说：《春秋》分三世，是为了“制治乱之法”。在“所传闻世”讲“衰乱”之中如何治理；“所闻世”讲如何进于“升平”；在“所见世”讲如何达到“太平”。汉朝公羊学派的三世说，把《春秋》的复古主义吹成历史发展的规律，用它和法家的历史进化论相对抗。

清末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把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所说的“大同，小康”结合起来，认为太平世即大同之道，升平世即小康之道。他说：“所传闻世托据乱，所闻世托升平，所见世托太平。据乱者，文教未明也。升平者，渐有文教，小康也。太平者，大同……文教全备也。”他认为自据乱世进至升平世，再进至太平世，是社会进化的规律。在他看来，当时中国还是处在据乱世，而欧美各国则已进入升平世，所以中国必须向西方国家学习，变法维新，进入升平世，最后达到太平世。他还说：“大约据乱世尚君主，升平世尚君民共主，太平世尚民主。”康有为利用三世说为他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服务，反对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反动观点，在当时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即便是经过康有为改造过的三世说，也不过是一种庸俗进化论。他强调“进化有渐”，认为历史只有渐变，没有质变；只能进化，不能革命。这种改良主义的观点，反映了他代表的那个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三统说

两汉儒家的一种循环论历史观。以西汉董仲舒和东汉《白虎通义》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认为历史是黑、白、赤“三统”（又叫“三正”）的循环；如夏朝以寅月（夏历正月）为正月，衣服、旌旗、车马等崇尚黑色，属于黑统。殷朝以丑月（夏历十二月）为正月，崇尚白色，属于白统。周朝以子月（夏历十一月）为正月，崇尚赤色，属于赤统。“三者如顺连环，周而复始”。他们捏造说孔丘就已经预见到继周而起的是汉朝，并给汉朝规定了制度：以寅月为正月，崇尚黑色，属于黑统。他们把三统循环归于天命，用王权神授说来为两汉的封建统治辩护。

董仲舒等还提出，改朝换代一定要“改制”，以显示新王是“受命于天，易姓而王”。但他所谓“改制”，只是迁都、改国号、改历法、易服色而已。“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就是说，“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秩序（即所谓“道”）是一切照旧，根本不变。所以董仲舒说：“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形式上的“改制”是为了欺骗人民，实质是换汤不换

药。以后历代封建统治者新上台时常常要搞迁都、改国号之类的名堂，也就是这个道理。毛主席说：“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矛盾论》）三统说就是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的形而上学的历史观。

三从四德

封建统治阶级奴役妇女的儒家教条。所谓“三从”出自《礼记·郊特牲》，它要求妇女“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所谓“四德”出自《礼记·昏仪》，指“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它要求妇女遵守封建道德，是按照孔孟之道铸造的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

儒家祖师爷孔丘早就提出“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的反动谬论。后来封建地主阶级便把这种谬论用来为自己的反动统治服务。西汉儒家的主要代表董仲舒宣扬“妻受命于夫”的男尊女卑思想。东汉儒家的反动著作《白虎通义》明确规定“夫为妻纲”，主张妻子绝对服从丈夫。宋朝的一班“业儒”又鼓吹“饿死者事小，失节者事大”。稍后出笼的《女儿经》又强调要“有三从”“莫胡行”，“有四德”“德容言工无欠缺”。这些封建教条，把广大劳动妇女压在社会的最底层。在旧社会，广大劳动妇女身受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迫，苦难特别深重。

历史上一些进步政治家、思想家，对“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道德都作过批判。西汉的吕后和唐朝的武则天，冲破了“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吕后帮助汉高祖统一天下，以后又“临朝听政”；武则天当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皇帝。明朝的法家李贽在《答以女人学道为短见》中，也抨击了“男尊女卑”的思想，指出：“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猛烈地冲击束缚妇女的精神枷锁，太平天国革命提出“男女平等”和解放妇女的革命主张，太平军内有女兵、女官，分田地不论男女， “天下婚姻不论财”。伟大的革命家鲁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做男人的物品。”“便是‘孝’‘烈’这类道德，

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者弱者的方法。”

毛主席指出：“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得到。”解放后，我国广大劳动妇女摆脱了封建的绳索，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翻了身，撑起了社会主义的“半边天”，做了国家的主人，这是对孔孟之道的有力批判。叛徒刘少奇、林彪之流污蔑妇女落后、无用，妄想用“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把广大劳动妇女重新禁锢起来，变成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驯服工具。这不仅表明他们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野心家，也表明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

讖纬

两汉流行的儒家神学，是一种把儒家经典和宗教迷信进一步结合起来的反动思想。“讖”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因为它自说将来会应验，所以叫“符讖”。又说出自“天命”，又叫做“符命”。

有的有图有字，还叫做“图讖”。“纬”对“经”而言（“经”的原义是直线，“纬”的原义是横线），就是假托神意，把经学神学化。纬书用宗教迷信来比附儒家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孝经》，所谓儒家“七经”，都有比附的纬书，合称“七纬”。又有《论语讖》及《河图》、《洛书》等，所以统称“讖纬”。

讖纬神学在西汉末期开始盛行，这是因为当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激化，西汉王朝即将覆灭，反动统治者企图乞灵于讖纬迷信来麻痹人民的革命意志。东汉王朝建立后，也大力利用讖纬迷信来欺骗人民。东汉初期，讖纬迷信达到极盛。公元五六年，光武帝刘秀“宣布图讖于天下”。公元七九年，汉章帝召集一批儒生和官僚在白虎观讨论儒家经典，大量引用纬书来解释儒家思想，编成《白虎通义》一书，可算是当时官方儒学的代表作。

纬书中虽然也包括一些有关天文、历法、地理、乐理、医学等方面

的资料，但其主要内容是神学迷信。讖纬的基本思想仍然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王权神授”说以及“三纲五常”的教条等，只不过它比董仲舒更加荒诞，它把儒家宗教化，编了许多有关孔丘的神话，把孔丘吹成“通天教主”，能够未卜先知，成了名副其实的“儒教”。但是，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任何宗教教义都不足以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 402 页）

随着物质生产和科学的发展，经过唯物主义者桓谭、王充等人的揭露批判，特别是经过东汉末年农民起义的打击，讖纬神学越来越不灵了，于是封建统治者便变换手法，改为利用佛教和道教来散布符讖迷信，南北朝以后讖纬神学逐渐衰亡。纬书现已失传。明代孙壳《古微书》、清代马国翰《玉函山房佚书》和黄奭《汉学堂丛书》都有辑录。以赵在翰所辑《七纬》和乔松年《纬攬》比较完备。

形神

指形体和精神。形体和精神的关系问题，早在原始社会即已发生。恩格斯说：“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219 页）这个问题后来演变为哲学基本问题的一个侧面而展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

儒家和道家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的利益，竭力宣扬鬼神迷信思想，在形神问题上坚持唯心主义路线，认为精神是第一性的，形体是第二性的，精神可以离开形体而独立存在。孔丘认为鬼神是存在的。后来儒家的著作《礼记》发挥孔丘的思想，说“形魄”即形体属“阴”，死后归于地而腐朽；“魂气”即精神属“阳”，死后归于天而无所不往。这种形神分离的说法在汉朝极为流行。道家庄子则说“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认为形体是从精神产生的，而人的精神又是从“道”（客体精神）产生的。庄子的这个观点，汉朝以后为道教和玄学所继承和发展。

和儒、道两家的唯心主义相反，法家的代表荀况站在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用无神论破除鬼神迷信，提出“形具而神生”，精神是依存于形体的唯物主义的路线。汉朝桓谭针对当时盛行的谶纬神学，指出“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燃）烛”，形体和精神的关系，就像蜡烛和它的火光。烛烧完了，火光就灭了。形体死亡，精神也就不再存在。王充进一步指出：“天下无独燃之火，世间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天下没有无燃料而能燃的火，世界上哪里会有离开形体而独存的精神？

汉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反动统治者又利用宗教欺骗人民，大肆宣扬灵魂轮回、因果报应。“神不灭论”成了南北朝时最时髦的学说。范缜写了《神灭论》批驳了这种反动学说。他说“形者神之质（实体）也，神者形之用（作用）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他把形体和精神的关系比喻为刀刃和锋利的关系，锋利离不开刀刃，精神离不开形体。他肯定形体第一性，精神第二性，坚持了唯物主义路线。

范缜以后，形神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继续着。但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者，不可能真正科学地解决形神关系问题。他们只能简单地把形神关系了解为人的精神活动对肉体器官的依赖关系。他们不懂得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只有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依赖于社会实践的观点，才能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

道统

指儒家所谓的反动传统。“道统”的思想由来已久。孟轲以孔丘学说的正统继承人自居，根据儒家的标准，把历史上的一些人物加以美化，称他们为“圣人”，并在他们之间虚构了一种前后相承的关系，这就是“道统”的思想。他宣扬奴隶主阶级的“道统”，是用来反对以法家为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在政治思想领域的革命，为复辟奴隶制制造反动舆论。

唐朝的韩愈进一步发挥了孟轲的思想，系统地提出了适应地主阶级顽固派需要的“道统”说。他认为，传统的先王学说的中心思想，是仁、义、道、德。而其政治体现，就是君主统治百姓，百姓服事君主，

臣帮助君统治人民（“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这就是自古以来的“道”。这个“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继承从尧舜到孔孟的“道统”。他编造“道统”说的根本目的在于论证孔孟之道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维护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借以麻醉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对抗法家的法治思想。

到了宋朝，孔门恶狗程颢、程颐、朱熹等都宣扬“道统”说。程颐讲“道统”，是撇开董仲舒、韩愈，直承孔孟。程颐说，孟子死后，所谓圣人之学不得其传，好在生个程明道（即程颢），“先生生乎千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焕然复明于世。”朱熹也自称是儒家孔学的正传。他说，儒家由孔子到孟子，“及孟子没而其传泯焉”，经过一千四百年，“于是河南程氏两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子之传”，而他自己则是直承二程的。他们鼓吹“道统”，要“辨异端，辟邪学”，也就是妄图反对农民的革命思想，抵制法家的革新思想，维护孔孟的反动思想统治，以适应地主阶级顽固派的需要。

儒家的所谓“道统”，实际上是孔学的一条黑线。这条黑线，并不是儒家所谓到孟轲而中断，也不是到朱熹而结束。而是从孔丘开始，中经孟轲、董仲舒、李翱、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王守仁、曾国藩、张之洞、袁世凯、蒋介石等等，一直继续到现在的反动派。这条黑线是适应反动阶级的需要而出现的。凡是搞复辟倒退，都是要宣扬孔孟之道。党内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孔孟的徒子徒孙。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信徒。他尊孔反法，把孔孟之道作为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理论基础，妄图篡改党的基本路线，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因此，只有狠批孔孟之道，才能挖掉修正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摧毁反动儒家的孔学“道统”。

道器

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对范畴。最早见于先秦的著作《周易》，《易·系辞》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但在书中对于“形而上”和“形而下”、“道”和“器”及其相互关系没有明确解释。后来，唯心主义哲学家认为，道是精神，器是物质，先有道后有器；唯物主义哲学家认为，道是规律，器是具体事物，道离不开器。

围绕道器关系问题，儒法两家存在过激烈的斗争，反映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宋朝儒家朱熹认为“形而上者，无形无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状是此器。”他把“道”说成“理”，是“无形无影”的客体精神。把“器”也说成“气”，是“有情有状”的物质。他说“理在气先”，也就是说道在器先，认为先有精神后有物质，物质是精神派生的，这是唯心主义的观点。南宋法家陈亮，提出“道在物中”的唯物主义观点反对朱熹“道在器先”的唯心主义。他说：“夫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者也。”这是说，“道”不是形而上的精神本体，是不能离开具体事物的；而是体现在具体事物之中的规律。清朝法家王夫之也反对朱熹的观点。他说：“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无形之上，亘古今，通万变，穷天穷地，穷人穷物，皆所未有者也。”这是说“形而上”也是形的一种表现，脱离了形的“形而上”是从来没有的。他提出“无其器则无其道”，形而上的道离不开形而下的器。“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道之器也”，只能说“道”由“器”产生，不能反过来说“器”由“道”产生。这是唯物主义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离开物质的所谓“精神客体”或规律，都是不存在的。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是物质的最高产物，物质本身固有自己的规律。斯大林指出：“世界是按物质运动规律发展的，并不需要什么‘宇宙精神’。”（《列宁主义问题》636页）

性命

指“人性”和“天命”。《中庸》提出“天命之谓性”，把人性说成是天赋的，这是天命论的观点。孟轲根据这个唯心主义观点提出“性善论”，说人的本性中先天就有仁、义、礼、智这些道德属性。人性是

天命在人身上的体现，只要发挥人的本性（“知性”），就可以“知天”，认识“天命”。性命并不是什么新货色，它不过是用“天命”装饰起来的人性。孔孟儒家鼓吹这些东西，企图说明奴隶主阶级的人性符合天命，是合理的，其目的是为了复辟奴隶制度。

宋朝反动理学家进一步发挥了思孟学派的“性命”学说，程颐说：“在天为命”，“在人为性”。他和朱熹都认为，命是对天来讲的，性是对人来讲的，人性是天命或天理在人身上的体现。性命其实是一个东西。他们还把人性分为两个方面，即“气质之性”（也叫“人欲”、“人心”）和“天命之性”（也叫“天理”、“道心”）。同时，他们把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天理在社会中的体现。它与人性都来源于天理，互相息息相通，因此，遵循封建伦理纲常是符合人性的，是天理所决定的，绝对不能违反。借此要人民服服帖帖地服从地主阶级的统治。他们并把这叫做“知性”、“知命”。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抽掉人的阶级性编造人性来自天命的谎言，是十足的唯心主义，是极为反动的。

格物致知

中国哲学史上唯心主义认识论的命题。主张从物中找出主宰事物的先验知识。原出自《礼记》的《大学》篇：“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致知。”《大学》宣扬这一套，是为了维护没落的奴隶制。

宋明理学的两大派——以程朱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派和以陆王为代表的的主观唯心主义派，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曾有所争论。程朱认为“理”是万物的主宰，“格物”就是格去外物的“迁迷”和“人欲”物念，以“正人心”、“存天理”（程颐）；通过“悟”、“贯通”的功夫，穷究那“万物之理”，达到“明理”即致知（程颐）；“即物而穷其理”，就是格去“理”的外壳——物，穷究了“理”便达“知”。一句话，“格物”就是“穷天理，明人伦”（朱熹）。陆王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格物”在于格去内心的物念，“发明本心”而达到“知”（陆九渊）；“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心上做”，把“格物”看做是“格心”的功夫（王阳明）。马克思指出：“关于离开实践的思维是否具有现实性的

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16页）宋明理学两派的说法尽管不一，但他们都把“理”说成是先验的“天理”，所不同的只是有的主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的认为是头脑里固有的。他们都否认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是彻头彻尾的唯心论的先验论。他们都是为愚弄群众、维护地主阶级的反动统治服务的。

我国历史上有些唯物主义者批判儒家的唯心论时，曾对“格物致知”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叶适强调人的认识“不可须臾离物”，故“知之至者，皆物格之验也，有一不知是吾不与物所至也”，肯定了知或不知在于你是否有“验”于客观事物。王夫之则把“格物致知”解释为“推行于物”，认为“知行者，致知力行之谓也”。颜元强调“格物”就是“犯手实做某事”、“亲自下手一番”，然后才能“致知”。当然，这些旧唯物主义者所说的“行”主要是指个人的生活作事，并不了解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因而不能彻底驳倒唯心论的先验论。只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才把社会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能够彻底战胜唯心论的先验论。

天理人欲

儒家扼杀革新思想的反动理论。理性与欲望的问题，先秦儒法斗争即开始争论。孔孟主张“寡欲”，老庄主张“无欲”。他们宣扬克制欲望和禁欲主义，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反对社会变革，反对奴隶造反和地主阶级向奴隶主阶级夺权。荀况作为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驳斥了“寡欲”和“无欲”之说，认为人的情欲是生来就有的，应给予适当的满足。他主张按照地主阶级的理性原则来规定人间的“度量分界”，以避免因欲望冲突而引起争乱。他的“养人欲，给人之求”，反映了地主阶级要求实行权力再分配，是为建立封建制度辩护的。

理欲问题到了宋朝争论更加激烈。理学家提出“存天理，去人欲”。朱熹说“天理人欲，不容并立”。“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理学家所说的“天理”，即“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也就是封建礼教、三纲五常这一套。他们所说的“人欲”，也叫“私欲”，是指广大人民要求改善物质生活和反对剥削、反

对压迫的愿望。所谓“存天理，去人欲”，就是只许遵守三纲五常，不准反对封建礼教。理学家严密控制人民的思想，不许人民产生丝毫反封建的念头，他们反对寡妇再嫁，提出“饿死者事小，失节者事大”的反动观点来奴役妇女。朱熹还说“去人欲”就是“克己”，“存天理”就是“复礼”，把孔老二的“克己复礼”作为地主阶级在思想领域里实行专政的根据，以此来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

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如南宋的陈亮、叶适，明朝的李贽，清朝的王夫之、戴震等人，都先后对理学家的这种反动观点提出了批判。戴震说“理者，存于欲者也”，“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无欲无为，又焉有理？”他反对把理欲对立起来，认为理存在于欲之中，欲望变成行动，只要这个行动得当就是理。如果没有欲望，没有行动，哪来的理呢？戴震关于理的理解虽然还没有超出封建关系的范围，但是他反对有所谓先验的理性，主张有欲而后有理，批判了理学家“理在气先”的观点。他揭露理学家“以理杀人”，他说：“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抗议理学家用精神屠刀来残杀人民。

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理”是根本不同的。北宋农民起义领袖方腊指斥封建剥削压迫是“安有是理”？认为“是法平等，无有高下”才是有理。南宋农民起义领袖钟相提出剥夺地主阶级的财富，实行“均平”，是“天理当然”。到了近代，太平天国革命领袖洪秀全则说“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认为反封建君主专制是合“理”的。这些都是对理学家的“理欲之辨”的强有力的批判。

知行

知指认识，行指实践。知行的关系，实质上是认识和实践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历来存在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条路线的斗争。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和道家为了反对社会变革，阻止人们参加实际斗争，就脱离“行”来谈“知”。如孔丘的“生而知之”，孟轲的“万物皆备于我”，老子的“不出户，知天下”，“圣人不行而知”等等，都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荀况，主张以封建制代替奴隶

制。他强调“行”的重要，提出“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荀况的学生、著名法家韩非，反对奴隶主贵族复辟，批判了儒家所谓“前识”。他说：“先物行，先理动，之谓前识。前识者，无缘而妄意度也”，主张以行动的功效作为检验言行的标准。他还说：“夫言行者，以功用之为的彀者也。”“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坚持了唯物论的反映论。

宋明理学家进一步发挥了孔孟的唯心论的先验论。程颐说人生来就有“德性之知”（封建道德观念），这比“闻见之知”更重要。他认为知和行的关系是知先行后，“说到底，须是知了方行得”，“须是识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须得光照。”他说的知先行后，实际上是根本不要“行”。朱熹也是一样，说什么“论先后，知为先”，“知之为行，行之为后，无可疑者”。明朝的王守仁不赞成程朱学派“知先后”的论点，认为这是把“知”和“行”分割为二。他提出“知行合一”，“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这是把知和行混为一谈，知就是行，行就是知。他还进一步说：“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最后得出了以知代行的结论。所谓“求理于吾心”，就是他一再鼓吹的“致良知”，他的所谓“行”不过是“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他和程朱学派的知行观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宋明理学家狂热鼓吹先验论，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都代表保守势力。他们企图把人们的思想永远禁锢在封建教条的框子里，竭力反对人们通过实践获得新的知识。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于宋明理学家的这种唯心主义知行观，作了尖锐的批判。例如清朝的王夫之反对“离行以为知”，认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他强调“行”的重要作用，认为“知”不能离开“行”。以后，孙中山提出“知难行易”说。针对当时某些革命党人在实际斗争中产生畏难情绪，因此他强调“行易”，以此来鼓励他们投身到实际斗争中去。他的“知难行易”说是以经验论为基础的。他说“先有事实，然后才发生言论”，“必待行之成之而后乃能知之也”。他批判王守仁的“知行合一”是“不合于实践之科学也”。孙中山的知行观在当时发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他有时又把知和行割

裂开来，承认所谓“先知先觉”，这是不正确的。“知难行易”的提法也存在片面性。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地解决了知行问题。毛主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实践论》）但是，林彪却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贩卖孔孟及其后继者的唯心论先验论，鼓吹什么“天赋”、“天资”、“天分”、“天才”作为他们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理论纲领，这就充分暴露林彪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建筑在唯心论的基础上的。